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牛津口才



第一部分 风雨牛津

飞翔？在风雨飘摇的路上，多少个故事，多少代梦想，多少世纪已沧桑。

在牛津，并没有单独开设口才学科，但牛津人士对言谈举止均有高规格的训练和要求。

几个世纪以来，牛津人士的讲演谈话在其高品味的原则下早已形成了一门学问，欧洲上流社会、工商、文化各界的成功人士在牛津口才学的影响下，大获其益。人们纷纷感到提高生活质量、增长自信和热情、学会为人处世的技巧、加强表达能力，在社交、事业、私人生活中获得极大的成功和幸福，克服平庸言行，追求高雅修养是必不可少的。

第一章 寻找

牛津是一座小城，人口不足 20 万。但就在这座位于伦敦西北角美丽的泰晤士河畔的牛津城里，自从 12 世纪中叶以来，赫赫有名的牛津大学占尽了风流。牛津大学作为英国最古老的大学，恐怕也是西方各大学中最知名，历史最悠久的大学之一。

透过岁月的迷雾，让我们以深情的目光注视着它——它的一切，今天的一切。让我们以探索的激情去寻找它那冷峻的面貌里蒙娜丽莎式的微笑，它的建筑物和它的各种仪式和章法将使我们随时透过时代的外表注意到它几个世纪的历史。

从伦敦出发，向西北而行，驱车或乘公共汽车约一个半小时左右，此时可见路旁树木掩映，风景渐入佳境。行近巧韦尔河，远远便可望见莫德林学院的钟楼，这就是牛津了。

然而牛津大学并没有统一的校园，它的 35 个学院散布全城，就如一颗颗明珠点缀在牛津城里。那么什么地方算是牛津大学的中心呢？

如果我们真的不得不找出它的中心来展开我们的视野的话，那么我们不妨先穿过莫德林桥，踏上牛津大学最长，也是最主要的街——高街，然后直接走下去，到达凯特街后往北拐，就可见到宏伟的拉德克利夫圆形阅览室。这就是我们要寻找的“圆心”。站在这个圆心上，让我们随便怎样投视充满神秘与好奇的目光吧。

我们首先不得不从牛津大学林立的古建筑中抽取出来而加以介绍的是博德利图书馆，刚才我们提到的“圆心”即是这一图书馆的综合阅览部。从圆心往北行即进入博德利图书馆的四方院。这里本来叫做“老学堂”，四周几个小门楣上用拉丁文写着“医学堂”、“自然哲学堂”、“文法和历史学堂”等名称，本是旧时讲课的地方，后来由于博德利图书馆的藏书越来越多，不得不忍痛割爱，把课室挤走。这样下去，藏书日见其多，以至于周围的房屋全都占用还不够，只得把地下挖空，做藏书库。后来还在附近盖起了新博物馆，由此可见博德利图书馆藏书之丰富了。

出博德利方院北门，是谢尔登则院，为 1669 年著名建筑师雷恩所设计和建筑，三百多年以来一直用作牛津大学各种大型庆典的礼堂。凡颁发学位、接受新生、欢迎贵宾、就职演说和高级音乐会，都在此举行。颁发学位的时候，校领导和高级学位获得者穿着各式红、黑色的学袍，鱼贯而入，行礼如仪，用拉丁文演讲，或按传统作幽默的致辞，盛况空前。剧院结构特殊、天花板特别宽广，绘有仙境。剧院正门外有一排古罗马哲人石像，年久剥落，不堪辨认。

出门往东，在赫特福德学院的天桥下走过，折入巷的尽头，便可进入“新学院”。当年的新学院，今天若从建筑史的意义上来说，实在已经可算在牛津最老的学院之列了。新学院的规模不大，除门楼和一个四方院以外，还有教堂、食堂和图书馆（像这种小的专题图书馆在牛津有 50 个以上），空空寥寥，简洁而不罗嗦。

从新学院折回，沿凯特街向南直到高街。路南有“大学学院”，这是牛津号称最老的学院，不过它现在的建筑物都是 17 世纪及以后的风格，可以代表牛津大多数学院的建筑。在这所学院第一个四方院的西北角，有浪漫主义诗人雪莱的纪念像。雕刻家所表现的正是诗人在意大利比萨近海暴风雨中溺

死后尸体被冲到海岸边来时的形象，赤身侧卧，一幅惨状，引动人们无限的哀思。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雪莱原是牛津大学“大学学院”的学生，后因写了宣传无神论思想的小册子《无神论的必然性》而被开除的。这里为他塑像以志纪念，未免要带些讽刺的意味了，但从另一个侧面来看，这也说明了学院当局还是有胆量改正前人所犯的错误，不独见其气魄，也正是牛津人文精神之光的一次大照耀。

在大学学院之南为默顿学院，这也是一个较老的学院，有不少 13~14 世纪的古建筑遗物，弥足珍贵。默顿学院之南有花园，隔墙便是基督教堂学院的营地，地势很开阔，可畅神思。

基督教堂学院是牛津规模最大的学院，为 16 世纪沃尔西红衣主教和他的君主亨利八世所建。我们今天仅从这个学院的宏伟布局，即可想见当年这些恩主们显赫一时的权势。学院的教堂是英国最小的“大教堂”，有其独特的地位。它现在的位置就是牛津城最早的圣处女弗里德斯怀德修道院的旧址。

基督教堂学院的门楼朝西，叫做托姆楼，也是出自大设计师雷恩的手笔。出大门沿北上，要经过牛津市政厅，在它的南侧有市立牛津历史博物馆。在这里面，无数或久远或晚近的展品生动地显示了牛津的历史及其当时风貌，可以说就是牛津历史的一个缩微胶卷，或者毋宁说是凝固在文物中的有血有肉的历史。如果有准想要提到牛津之魂或者要想感受一下牛津的异日风流，那么请把你的脚步停下来，让你逡巡的日光在这里开始搜寻吧。

往北过了四叉路，便是牛津市区的中心。它北面的谷物市街现在是商业中心。谷物市街的北头和宽街相交，交叉处之北是岛状的圣玛丽·马格德林教堂以及殉道者纪念碑。宽街的西北侧是贝利奥尔学院，这也是一个规模较大的学院，曾培养出许多名人。它的门口大街的地下砌着一个十字，标志着这里曾经是焚烧过异教者的地方。当人们以极大的勇敢和牺牲精神冲破黑暗的中世纪的牢笼，能够以自由的精神瞻望美好的明天时，那曾经烧死过布鲁诺的鲜花广场以及这一处（又例如说是处处呢？）鲜为人知的“受难地”确乎是值得后来的人们凭吊和纪念的。

贝利奥尔北而是圣约翰学院，它的坎特伯雷四方院，连拱廊和花园，均以别致和优雅著名。

在贝利奥尔西侧、圣贾尔斯街对面，是阿什莫尔博物馆，这里陈列着许多名画、17~18 世纪欧洲的银器、中国的瓷器以及其他各国的古文物，为艺术家和考古学家们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欣赏与研究的珍品。

沿博物馆南的博蒙特街走到西尽头，可以参观别有天地的武斯特学院。它以湖畔的风景著名。夏日在这里草地上演出戏剧，真是再理想不过了。

从武斯特往北，可达赫赫有名的牛津大学出版社。这个出版社是在 15 世纪 70 年代开办的，起初规模很小。后来争取到皇家特许权，可以印刷和出售各种书籍，特别是《圣经》和《祈祷书》。这无疑就为牛津大学出版社展开了一片无限广阔的蓝天，可以自由翱翔了。事实上，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发展也正是如此。现在牛津大学出版社是世界最大的出版公司之一。由于它有牛津大学一流的学术和一流的作者作为中流砥柱和坚强后盾，因而它出的书不但学术质量高，而且排字、校对和装订都很讲究，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都足称精品。它最著名的出版物是《牛津英语大字典》，有 13 大卷，1879 年由詹姆斯·默雷开始编辑，到他死后的 1928 年才出齐。正是这部权威性的字

典以及《圣经》和其他诗集的印刷出版，为牛津大学出版社带来了丰厚的利润，从而使它能够颇有余裕地补偿一些赔钱的高品位的学术著作的出版，维持了自己的学术声誉，能够经久不衰，永远出色。还需要提及的是，牛津大学出版社在英国的法律地位却是慈善机关，而不是公司，也没有股东。

出版社对面是赫赫有名的拉德克利夫医务所。实际上这个名称已经陈旧得不能跟上它的发展了，这个医务所现在已经发展成了规模宏大，设备齐全的大医院。它主要的任务是对重大医学疑难问题进行科学实验和理论研究，真正的临床医院则已搬到了另一个城市黑丁顿。

医务所对面往东南是计算实验室，再往东是工程科学、核物理学和冶金学三个实验室，从实验室再往东则是叫做“大学科学区”的大片科研单位和实验室。这些大实验室和科研单位的如此密集的排布使得这一带毋庸置疑地成了牛津大学科技研究的中心。

到此为止，我们已经在文字所构建的想象的图画中畅游了牛津大学城。不知你是否已经对这座知识与智慧的殿堂有些心驰神往了？或者有了些浮光掠影的认识？实际上，牛津大学的印象不仅活在每位牛津学子的记忆中，它也在诗人和文学家们的笔下得到了或合乎实际，或合乎理想的刻画和展现。那么在牛津莘莘学子的心中与眼中，可爱的母校又是什么样子的呢？早年曾经留学牛津的吴宓教授在他的《牛津大学风景总叙》一诗中这样写到：

牛津极静美，尘世一乐园，
山辉水明秀，天青云霞轩。
万里集群校，嶙峋玉笋繁，
悠悠植尖塔，赫赫并堞垣。
桥屋成环洞，深院掩重门，
石壁千年古，剥落黑且深。
真有辟雍日，如见泮池存，
半载匆匆往，终身系梦魂。

对于这样极静极美的“尘世乐园”，也不怪乎连吴宓这样的大学者也要“魂牵梦绕”了。

让我们再来看看文学家笔下的古院牛津。在英国文学里，描写牛津大学的佳作举不胜举。华兹华斯、拜伦、德昆西、马修·阿诺德等诗人都有作品赞美牛津。其中尤以阿诺德的作品为最。他以其华美的文笔和优雅的笔调把牛津写绝了，写活了，写神了。在他的笔下，牛津的风物外貌以至实质精神都被高度理想化了，因而能够把人带入一种出神入化的美的境界。下面这一段特别有名的散文诗或许能够使你触摸到牛津的风韵。

“美丽的城市！这样古老，这样可爱，这样超脱于本世纪激烈的学说纷争，这样宁静！”

“‘我们年轻的野蛮人全在球场上游戏！’然而她沉浸在伤感中，把她的花园袒露在月光下，从她的许多钟楼上喁喁道出中世纪最后的迷魂耳语。谁能够否认，牛津以她不可名状的神韵，在不断召唤我们走近我们大家的目标，最完善的理想，简言之就是‘美’，而‘美’即是真的另一面。……敬爱的梦想家啊，你的心这样罗曼

蒂克，你这样慷慨地献身于人，献身于非属于我的事物和英雄，但从不下顾没有教养的庸人！失败了的事业、被放弃的信仰、不吃香的名声、难以置信的忠诚——都在你这里找到了家！”

多么优美、多么流畅的文字！像哗哗的流水，像二月的杏花雨，一丝丝沁人心脾，荡人心魄。

但把牛津大学说成是“失败了的事业的家”，却颇遭嘲笑和非议，但这句话已成为名言不可更改。它实际上反映了牛津大学的另一个侧面：保守、怪僻、容忍和同情失败者。

第二章 光荣与梦想

阵痛，在每一次变革的前夜。然而它是那样坚定、那样沉着、那样自僵，像一面旗帜，高高飘扬；它是一束燃烧着的火炬，在对光明的期待中和数不尽的梦想里，走向辉煌。

中世纪

牛津大学创始于 12 世纪中叶。1249 年，头一所学院“大学学院”建立（目前共有学院 35 所）。八百年来，教学重点经历了经院哲学、古典学（希腊罗马文史哲）和现代知识三大阶段。

牛津大学是逐渐发展起来的。最初 12 世纪天主教教主在牛津的一些修道院中讲学，学生前来听讲，散居在城中。后来以巴黎大学为模式，有了大学的机构，并和巴黎保持过长期的关系。再后创立了许多资助学生膳宿的学院，发展成为师生集体生活的独立单位，它们在大学领导之下，却有相当大的独立性。这便是牛津大学在中世纪的概况。

欧洲的中世纪从第 6 到第 14 世纪，长达 800 年。在这段时期，学问掌握在天主教会的高级神职人员手里，他们主要从事于用古希腊哲学的基督教义做注脚的工作，称之为经院哲学，就是修道院或教堂书院里的哲学，说话和写作用的都是拉丁文。

从 11 世纪开始，这类讲学逐渐频繁，讲学的教主在欧洲一些城市间往来，不分国界，在欧洲大陆的最主要的讲学中心是意大利的波洛尼亚和法国的巴黎。到 11 世纪末，波洛尼亚和巴黎都形成总学，意思就是各地教主都可以来讲学和听课的地方，前者以法律为主，后者以神学擅长。

英国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是在 7 世纪基督教化的。起初英国天主教教士都去欧洲大陆求学和进修。11 世纪末才开始有人在牛津讲学，有人来听讲。从 1096 年到 1102 年，或者可能更晚一些，埃当普的西奥博尔德在牛津讲学时，曾自称为“牛津学生”。1129 年牛津建立了奥古斯丁教派的圣弗里德怀斯德修道院和奥斯尼修道院，这些修道院成了做学问的地方。1133 年神学家罗伯特·普伦在牛津作了一系列关于《圣经》的讲演。1149 年意大利人伐卡琉斯在此讲了罗马法。

1167 年英格兰国王亨利二世同法兰西国王菲利普二世奥古斯特斯发生争吵，他把英国学者从巴黎召回，并在一个时期禁止他们去法国进行教学交流。这批英国学者来到牛津，于是牛津迅速发展成为英国经院哲学教学和研究的中心。人们也就开始把牛津作为一个“总学”，这实际上就是牛津大学的开始。到 12 世纪末，牛津已被称为“师生大学”。

在欧洲，从文艺复兴到 19 世纪初，人们倾向于认为中世纪整个是“黑暗世纪”，并贬低经院哲学，说它只是服从于教皇神学的烦琐空谈。黑格尔就主张跳过从 6 世纪到 17 世纪这段时间，认为 529 年罗马帝国皇帝朱斯蒂尼下令关闭雅典的柏拉图学院，即标志着古典哲学的终结，直到笛卡尔，才提出新的、真正的哲学，而其间这段长达一千一百多年的历史是无哲学可言的。19 世纪的某些浪漫主义者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把中世纪的一切估计得过高。然而客观公正地评价，实际情况却是处在这两个极端之间。

关于中世纪天主教会的愚昧和残酷，关于经院哲学是宗教的婢女，关于针尖上究竟能够站多少天使……诸如此类的烦琐而无聊的争论，却是中世纪的一大“风景”。但在另一方面，中世纪也是欧洲北部“野蛮人”消化、整理、讨论希腊罗马文明与基督教义的巨大的学习运动，经院哲学家们曾企图调和理智与迷信，但这种努力却不可避免地失败了。可是我们仍然可以引以为自豪的是，每当理智略占上风的时候，他们就把知识向前推进一大步。比如许多学者向波斯人阿维森纳和阿拉伯人阿威罗依等人学习医学和其它领域

的知识，促进了文化交流；许多关于古希腊的知识也在这个时期通过阿拉伯文的翻译而传到了西欧；此外，中世纪欧洲不仅是建筑艺术和工程等方面作出了巨大成就，而且欧洲的大学和印刷术也是在此时创立和引进的，这些都是可以载入史册的不朽的成就，因而我们丝毫没有理由说中世纪就是一片黑暗或者就是一张白纸。我们从上面对中世纪的历史估价和全景式扫描中或许是能为牛津大学找到一个合适的大注脚的。

牛津总学的第一位学长，普通称为牛津大学的第一任校长，是罗伯特·格罗斯泰斯特，担任校长大概是从1215年至1221年。因此也有人就以1215年作为牛津大学正式成立的第一年。格氏在巴黎学过神学，到1230年才开始攻读希腊文。他对《圣经》、语言、数学和自然科学都有浓厚兴趣和较高造诣，曾把亚里斯多德的《伦理学》和《天体学》从希腊文译成拉丁文，并写了对亚里斯多德《后分析学》和《物理学》的评注和对《圣经》的评注，以及其他论文。他对牛津大学学术的发展施加了深刻的影响。

在他离任前后，牛津来了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这两派的行乞僧。这两派都是天主教徒，但在细节方面主张各异，以致争吵和竞争都很激烈，直到1320年方告和好。多明我会强调教育，后来成为中世纪教会中最尊重知识的一翼。他们的最著名学者是大艾伯特和托玛斯·阿奎那斯。他们本人没有到过牛津，但他们的弟子在牛津比较激进和野心勃勃，结果却不很得人心。

方济各会比较保守，注重继承奥古斯丁的传统神学。他们在牛津的成就很大。除格罗斯泰斯特校长本人是方济各派以外，最著名的学者还有罗杰·培根、邓斯·司各脱和威廉·奥卡姆三人。

罗杰·培根约在1247年从巴黎回到牛津，1257年加入方济各派。他注重实验科学，对数学、天文、语言等颇有研究。不过他同时又相当轻信，对于占星学和炼丹术也深信不疑。他这种逐奇追新的态度，曾一度引起方济各派教友的不满，以致晚年被监禁了一个时期。他著有《大作品》、《小作品》和《第三作品》，对于后世科学研究中的实验方法作出了贡献。

司各脱和奥卡姆都是唯名派，具有唯物主义的倾向。更重要的是，他们的逻辑论著有很大价值，其中最早提到了数理逻辑的某些思想，为现代控制论开了先河。

一般认为1249年是牛津创立它特有的学院的一年。在此以前，可以说牛津大学是光有人，而没有自己的建筑物的机构。这一年达勒姆的威廉副主教把一笔钱馈赠给牛津大学，以资助学神学的硕士们。这些人形成了“大学学院”的核心，并盖起了学院的房子。“大学学院”后来还曾自称是西萨克逊王艾尔弗雷德所创立的，并且在1727年就这个问题在一次诉讼中胜诉，断言该学院的视察人是国王而非本校校长。但这一点后来通常被认为是虚构的。

十几年后，又盖起了贝利奥尔学院和默顿学院，它们与“大学学院”一起构成了牛津大最早的三个学院，而且它们都早于剑桥大学的任何学院。牛津的“学院”，最初都是私人出钱修房舍，供穷学生寄宿，用以资助、保护和约束学生。至于聘有固定的教师，成为半独立的教学和研究机构，那是稍后的事。

大部分学生当时仍散居在市民家或公寓里，组织松散。他们只是听一些教士讲课，并在最后参加口试。师生关系类似行会里的师徒关系。本科生学业开始时年龄较小，从10岁到16岁不等，学习的期限和一般手工学徒的期

限一样是7年。学生要交钱给老师，少数有钱的学生得到老师的宠爱和纵容，而多数贫穷的学生往往受歧视，或半途而废，不得毕业。不得毕业，就意味着不能在教会里谋到神职，而神职正是贫穷的本科生来牛津求学的目的。

当时学习的基本内容是中世纪的“文科七学”，其中“三学”是拉丁文的文法、修辞和逻辑，旨在训练表达思想的能力；其余“四学”是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不久又加上了自然哲学、伦理哲学和形而上哲学。考试用公开答辩的形式，因为那里纸张笔墨还太贵，也无法印制考卷。考得学士和博士者分属三种高等学科，即神学、法律或医学，其中神学最多。所有大学教员都必须是大主教会的某种神职人员，多数学生的求学目的也是谋取神职或在教会里得到晋升。学位起初还是合格教师的证书。例如，有学士证书者，可以任英国文法学校校长；有硕士、博士证书者，可以到欧洲任何大学去讲课。现在牛津大学师生穿的各种学袍，就是承袭了当时各级神职人员所穿的不同教袍。

到了14世纪，牛津大学增加了4个学院，它们是：埃克塞特学院、奥里尔学院、王后学院和新学院。创立“新学院”的威廉·威克姆曾任温切斯特主教和英格兰大法官，在牛津大学历史上是一个重要人物。他制定了学院的详细规约，创建了导师制，为其它学院所仿效。

这时牛津学者中间兴起了批判之风对中世纪经院哲学和教皇的权力表示怀疑。其中最著名的人物是约翰·威克利夫。他是牛津大学毕业生，曾任贝利奥尔学院院长，于1372年获得神学博士学位。但此后他思想激变，对罗马教皇的权力提出挑战，主张政教分离，认为教皇也应受制于民法。他组织并参加了《圣经》的英译工作，完成了历史上第一部完整的英译本，其目的在于使英国人民得以自己直接阅读和解释这部基督教的经书。他还公然否认神甫执行的天主教仪式能使葡萄酒和面饼化为耶稣的血和肉。为此宗教法庭几次对他进行审判，谴责他的主张为异端，他死后，还把他的尸体从坟墓掘出来抛入河里。当时的牛津大学校长威廉·巴顿任命了委员会对威克利夫进行调查，把他逐出牛津。但是牛津一般的学者还是很尊重威克利夫的，有少数人还追随他。威克利夫和他的追随者实际上开了英国宗教改革的先声。

13~14世纪时，来自不同地区，即英格兰北部、英格兰南部、苏格兰、爱尔兰和威尔士的学生之间常常发生争执。后来矛盾最大的还是在学生和市民之间，激烈时甚至在街头发生械斗。1354年2月10日至12日，连续3天市民大打学生和教士，甚至活剥人的头皮，师生纷纷逃走，到伦敦去告状。最后国王爱德华三世指派了王家委员会进行调查，责令市长和市民认罪道歉，并颁布特许状，规定给予大学当局以一定的特权。延续下来，至今大学得选派代表参加市政委员会；学生违犯纪律由大学自行处理，不归市政当局管辖。

当我们从这场惊心动魄的大骚动中“逃”出来，跨越漫漫长夜的黑暗世纪，文艺复兴的曙光已经可以遥遥在望了。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

文艺复兴在欧洲大陆从 10 世纪的意大利开始，15 世纪波及到英国和其他一些国家，16 世纪达到高潮。伟大的文艺复兴运动在意大利兴起之时，英国的许多人和一些外国学者就到意大利学习，正是这些人最初从意大利把希腊“新学”和人文主义思想带到了英国。这其中最著名、贡献也最大的是尼德兰人（今荷兰）伊拉斯谟。他前后到过四次英国，1499 年到牛津，在圣玛丽学院住了 3 个月，和许多牛津学者进行了交谈。

以反对罗马大主教教会弊病开端的宗教改革运动在欧洲大陆从 1517 年马丁·路德发表《95 条论纲》开始。而在英国，威克利夫早于 14 世纪时即已开了宗教改革的先声。到 1534 年亨利八世国王正式宣布拒绝罗马教皇的控制和成立独立的英国国教教会（圣公会），宗教改革在英国宣告完成。

牛津作为英国思想、学术的中心，在英国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中也是得风气之先，起了重要的作用。

促成文艺复兴的有多种因素，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印刷术的传入。英国的印刷术是从欧洲大陆传去的。一般认为第一个英国印刷家是威廉·开克斯顿，他于 1477 年在伦敦西敏寺开业印书。这样牛津在 15 世纪 70 年代即有了印刷的书籍。这对牛津的“新学”无疑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这里需要解释的是，所谓“新学”即直接从希腊原文去读《新约圣经》并研究古希腊罗马的世俗文学、哲学、法律等等，而不再迷信罗马天主教会的拉丁译文和宗教讲解。

牛津的，也就是英国的第一批新学者，都是伊拉斯谟的朋友。威廉·格罗辛于 1481 年起在牛津大学教授希腊文，这是一个新的开端。约翰·科利特在牛津直接从希腊文本讲解《新约圣经》中圣保罗的书信。托马斯·李乃克尔 1510 年在牛津讲医学，创设了医学讲座。《乌托邦》的作者、英国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托马斯·莫尔爵士于 1492 年入牛津大学坎特雷伯堂读书，1524 年任牛津大学总管事，亨利八世时任下议院院长和大法官。他反对英王蔑视罗马天主教会权力、离婚重娶和自任英国国教最高首领，被监禁和处死。这类对宗教异端的镇压，使 15 世纪大部分时间英国大学的文化活力受到窒息。

到 16 世纪，世俗的英语文学兴起，出现了一批所谓“大学才子”。大学才子是牛津和剑桥大学毕业生中无钱无势的人，只好靠文墨为生，到伦敦写剧本和小册子。其中毕业于牛津大学的才子有：约翰·黎里，他毕业于莫德林学院，著有绮丽、雕琢的散文传《尤弗伊斯》和许多神话喜剧。乔治·皮尔，毕业于基督教堂学院，在牛津即有诗名，1583 年又为牛津大学演出威廉·盖吉尔写的拉丁文剧本《情敌》和《黛多》当过导演，著有《帕里斯的受审》和其他文雅的浪漫剧。托马斯·洛奇，毕业于三位一体学院，是一位抒情诗人并著有《罗莎琳德》等浪漫散文剧。这些文人对英国文艺复兴大师莎士比亚的早期作品都产生过影响。

同一时期在牛津大学读过书的还有：沃尔特·雷利爵士、菲利普·西德尼爵士，他们两人都是伊丽莎白女王时期典型的文武全才的廷臣，古物研究者威廉·卡姆登、地理学家理查德·哈克卢特、诗人威廉·华纳和塞缪尔·但尼尔等。

那真是英才辈出的时代啊！一时人物之盛，竟显风流。

1588 年，英国舰队击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成了海上的新霸主，

于是血腥的海外殖民掠夺开始了。这些变化不仅带来了英国人冒险精神的大发扬，也使英国的地位突然上升了，英国的民族意识高涨。1598年弗朗西斯·米尔斯在他的《帕拉迪斯·塔米斯——机智的宝库》一书中即自豪地把英国文人和古希腊罗马的文人相提并论。牛津也受到这种民族主义热潮的影响。但与此同时，拉丁文仍是牛津的教学和学术语言。

在宗教改革方面，科利特和英尔等人虽反对过天主教会的特权和腐化，但效果不大。真正的变化，在英国是从上而下实行的，主要出于国家对西班牙斗争的政治和经济需要和国王亨利八世本人离婚的需要。鉴于英国天主教会权力太大，里通外敌，并占有大量土地和财富，亨利决定向天王教会及其附属机构开刀，解散修道院，没收财物，以充国库和军费。亨利要休弃第一个妻子——西班牙阿拉贡郡的凯撒琳，再娶他心爱的英国女郎安·波琳，而教皇不允，亨利就毅然切断了同罗马教廷的关系，宣布英国教会独立。

但这场斗争是长期的和出现过反复的。当亨利和凯撒琳所生的女儿玛丽继位时，她又恢复了天主教的势力并进行大规模报复。但当她的同父异母的妹妹，安·波琳的女儿伊丽莎白一世登上王位后，则又恢复了新教的国教地位，并竭力在既反天主教又反新教极端势力的两条战线斗争中维持平衡的局面。

这种反复在牛津有突出的反映。莫尔被处死是为天主教殉道；而武斯特主教休·拉铁默伦敦主教尼古拉斯·里德利和坎特伯雷主教托马斯·克兰默被处死，则是为新教殉道。后三人都在剑桥大学受过教育，也都是英国国教的重要领导人。天主教的玛丽女王一接位，就把他们监禁起来，在牛津召开宗教会议审判他们，判定他们犯有信奉异端罪，勒令他们公开认罪。拉铁默和里德利拒绝认罪，被普通法庭判处死刑。1555年10月16日他们两人被拴在一根铁链上，拉到牛津宽街贝利奥尔学院门前，绑在火刑柱上活活烧死。在游街时拉铁默说：“里德利师傅，请你拿出气概，并感到宽慰吧，今天蒙上帝的恩惠，我们要在英国点起一根通天的蜡烛，它的火我相信将永远扑不灭。”克兰默的地位更高，他在牛津的圣玛丽教堂受罗马指派的委员会审讯。他感到自己原已接受“君主神圣的至高权力”，处在矛盾之中，十分痛苦。于是他一度签了认罪书，后来又反悔。在刑场上他把签过字的手伸入火中焚烧，惩罚自己，一直到死。

在15~16世纪，牛津陆续建立了9个新的学院，在其他地方还建立了为进大学作准备的“公学”。这标志着牛津教育事业的发展。但由于反复的宗教斗争，新建立的学院各有不同的背景和遭遇。林肯、众灵、莫德特、布雷齐诺斯和基督圣体等5个学院是在天主教仍为国教时期建立的。它们中的大多数在宗教革命时期遭到焚烧或洗劫。特别可惜的是，亨利四世的幼子格洛斯特公爵汉弗莱在人文主义思想启示下捐资创办的大学图书馆（包括其中收藏的全部珍贵手稿和手抄本书籍）在1549—1550年时被破坏无遗。

莫德林学院的钟楼，是人们进入牛津时望见的第一个高建筑物，它美丽的身影是牛津的象征之一，落成于1504年。有幸的是，它没有在宗教改革时期受到破坏。

牛津规模最大的基督教堂学院，是在新教占统治地位时期建立的。1525年红衣主教沃尔西为它制定了宏大的计划，在旧修道院院址上进行建筑。在他失宠、失权之后，国王亨利八世亲自接办了这一浩大的工程，并于1546年再次宣布学院的正式成立。

圣约翰和三位一体两学院，则是 1555 年玛丽女王复辟天主教时的产物，足以作为记录这段历史一本“活书”。

1535 年亨利八世国王的定新教为国教的命令以及其后解散所有天主教修道院的行动，对于经院哲学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从此牛津大学的主要课程改为古典学，即古希腊罗马的文史哲，外加医学、数学等自然科学学科。神学不再特别突出和重要，而逐渐变为许多平等的学科之一了。

其后天主教顽固势力虽依赖新登基的玛丽女王而有过短暂的复辟，但已经不可能挽回大局了。1558 年玛丽女王逝世，伊丽莎白一世接位，英国国教的地位进一步巩固了。这一历史巨变在牛津大学也产生了剧烈的震荡。新教的耶稣学院于 1571 年建立，其他学院也继之陆续改组，新教的地位在牛津大学加强了、巩固了。以后虽然天主教和清教从两个方面不时对国教的权威提出挑战，但宗教纠纷却被严格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伊丽莎白一世在位 45 年，是英国文艺复兴的鼎盛时期，牛津大学的地位提高，面貌一新，而且世俗化了。以后大学毕业生不再专门做神职人员，而多半从事非宗教的职业，许多人成为统治集团的成员。同时大学也贵族化了，进大学的逐渐变为以贵族子弟为主。

伊丽莎白女王本人曾两次访问牛津。第一次是在 1566 年，她带领一些大臣、驻外大使和侍从前往，兴致勃勃。一连三天她听学者们用希腊语和拉丁语进行哲学、民法、神学和物理学方面的辩论。她自己也在圣玛丽教堂作了拉丁语的演说。第二次是在 1592 年夏天，她仍然带去了不少宫廷大臣和随从，气派很宏大。她同样听了学术辩论，参加了颁发学位的仪式。离开时她用拉丁语向牛津大学祝福：“别了，别了，亲爱的牛津。愿上帝祝福你，使你的儿子们数目增加，在圣洁和道德方面不断增进。”1571 年她又颁布法律，改组了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并使它们成为独立的法定组织。她还任命宠臣莱斯特伯爵罗伯特·达德利为牛津大学校长。

女王死后接替王位的是来自苏格兰的詹姆斯一世，他自命为学者，对牛津大学也很关注。他在位期间，牛津新创了沃德姆学院和潘布洛克学院。后者因潘布洛克伯爵三世威廉·赫伯特而得名。他是文学庇护人，从 1617 年到 1639 年任牛津大学校长。1623 年莎士比亚戏剧全集出版时，就是由莎士比亚的朋友献给这位伯爵的。

1604 年，在牛津基督圣体学院院长、清教徒约翰·雷诺尔兹博士的建议下，在汉普顿宫召开会议，决定修订《圣经》的英文本。这一艰巨任务得到国王的支持。雷诺尔兹不仅自己参加了翻译工作，而且在牛津招待了参与这项工作的 40 多位学者。他们译成的《詹姆斯一世钦定本英文圣经》在英国宗教的和文化史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它成为英国国教正式使用的文本，取代了天主教会使用的拉丁文《圣经》和《主教圣经》以及卡尔文派译的《日内瓦圣经》。它的英语庄严、优美，对后世的英国文学家、演说家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这个时期对牛津大学卓有贡献的是托马斯博德利爵士。他在牛津受过教育，任过学监，后来担任伊丽莎白女王的外交官。他退休后，在 1589 年开始主持重建牛津大学图书馆，捐赠了许多资金。1611 年这一规模恢宏的图书馆落成，就以博德利命名。当时的英国书业公所决定，此后在英国出版或重印的每一种书籍，都要免费赠送一本给博德利图书馆收藏。这个决定至今有效，保证了牛津大学图书馆藏书的丰富和完整。

1629 年任牛津大学校长的威廉·劳德原是圣约翰学院的学生、院士和院长。他主持了圣约翰学院的扩建，并力行改革，表现出极雄伟的魄力。这突出表现在他于 1636 年把过去杂乱纷繁的规章制度编纂成为一整部详细的校规，世称《劳德规约》，使大学和国教建立了牢固的联系，并为师生订立了许多行为规则。这个规约一直生效到 1864 年。经过整顿之后，牛津大学在一个时期内名声大振，得到许多捐款，增添了许多建筑物。

从内战到工业革命

应该说，从 17 世纪初伊丽莎白女王当权时起，英国社会就充满着各种复杂的矛盾。一场新的革命正在悄悄酝酿。但标志着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真正开始的是 1640 年英国议会的重新召开和于 1642 年真正爆发的内战。

1642 ~ 1651 年的英国内战有其复杂的宗教、经济和社会的原因，但它的爆发集中表现为新兴资产阶级清教徒下院多数派反对国王查尔斯一世强行征税的政策。全国到处出现了议会派与保王派之间的分裂。在牛津，大学当局属保王派，市民和市政府则偏于造反的清教徒；总的来说，是保王的势力占上风，不过两派没有达到公开分裂的程度。

内战开始不久，国王于 1642 年冬天率部从伦敦逃到牛津。此后三年半期间，牛津成了查尔斯一世的临时京城。许多学院被占用，学生担任了卫队。国王按传统住在基督教堂学院。忠于他的议员在该学院的食堂开会。王后住在默顿学院。军火贮存在新学院。并从各学院收集了金银器皿，用来铸币。国王有时出击，但总是回到牛津，以此作为基地。幸好战事没有在牛津城里打，所以破坏不多。到 1646 年 4 月，国王见大势已去，便化装成仆人，过莫德林桥逃出牛津，几天以后被捕。最终他在 1649 年 1 月 30 日被处死，成为英国历史上唯一被杀头的君主。

1649 ~ 1653 年为五年共和时期也即克伦威尔专政时期，新军首领奥利弗·克伦威尔亲自于 1651 ~ 1657 年兼任牛津大学校长。他企图用清教徒思想改造牛津大学，但效果不大。

共和时期以后，1660 年王政复辟，牛津恢复了正常教学生活。以沃德姆学院新院长约翰·威尔金斯及其年轻的学生克里斯托弗·雷恩为中心，形成了一个锐意进取的科学家集团，对学术贡献很大。雷恩先学天文、医学，后来成为伟大的建筑师。牛津的谢尔登剧院、基督教堂学院大门的汤姆楼以及伦敦在 1666 年大火以后重建的圣保罗教堂等 52 座，都是雷恩设计建筑的。当时在他们周围，还有发现波义耳定律的化学家罗伯托·波义耳、发明无限大符号的几何学家约翰·沃利斯、大文学家塞思·沃德、劳伦斯·鲁克、科学家兼文体学家托马斯·斯普拉特、经济学家威廉·佩蒂、年轻的实验科学家罗伯特·胡克等。这些学者成为 1662 年正式成立的王家学会（即英国科学院）的第一批核心成员。

牛津大学及其各学院现存的主要建筑物，大多是 17 世纪后半叶王政复辟时期兴建或重修的。其中雷恩以及受他影响的一些建筑师作出的贡献最大。

王政复辟是一种妥协产物。查尔斯二世虽然登基，实际王权已大力削弱，议会争得了征税的决定权。议会内部划分为两党：托利党和辉格党，各自代表着不同阶级或阶层的利益。这是英国两党制的开始。在两党合作颁布《权利法案》和决定防止天主教徒任君主之后，英国的君主立宪制最终定型。从此英国两党轮流执政，由内阁掌权，内政一直就比较稳定了。英国最著名的两所大学，界限分明。牛津倾向托利党，剑桥则倾向辉格党，这种情况至今犹然。当然就个别人物或个别学院来看，却也不能一概而论。

鉴于在内战时期牛津大学曾是保皇派的基地，查尔斯二世给予了不同寻常的青睐。他曾几度率领宫廷女眷到牛津游玩。然而由于内战以及同宫廷的频繁接触，也使牛津的道德水准大为降低。同时，宗教上的关门主义也必然

地要阻碍牛津大学的发展。

牛津誓忠于国教。当詹姆斯二世企图把亲信的天主教士硬塞进去担任莫德林学院院长，以促使牛津逐渐天主教化的时候，他遇到了坚决的抵制。自从国教莫立一直到 1871 年，牛津大学一直排斥一切非国教者。非国教者在牛津是找不到市场的，非但牛津不许非国教者任教，亦不许非国教信仰者入学。这样一来，牛津大学的教师就不但必须是国教神职人员，还不得结婚。排斥宗教歧见堵塞了交流和辩论的途径，对学术切磋是莫大的损害。而这也直接导致了学科考试的程式化以及教学质量的降低。

在英国国教保守停滞的同时，由清教演变而来的贵格教会也丧失了宗教热情而成为了新兴的工商业者，在这种情况下，具有执著的宗教理想的约翰·韦斯利，查尔斯·韦斯利和乔治·怀特菲尔德发起了一场宗教复兴运动，创立了卫理公会。他们主张灵魂得救的顿悟，坚持一套自己的严格组织形式，终于从国教中分裂出去。这一运动后来传到美国，有相当大的发展，而在牛津却影响不大。

英国的工业革命，一般认为约开始于 1780 年，是棉纺机、织布机、蒸汽机的发明以及运河、公路、铁路交通发展的结果。这些物质的东西不是在牛津产生的。牛津大学也没有像剑桥大学那样，出过牛顿和达尔文这样对科学技术的进步起过伟大推动作用的自然科学家。但是工业革命却迅速反映在牛津大学毕业生的一些社会科学著作里。例如，贝利奥尔学院毕业生亚当·斯密 1776 年出版《原富》，第一次提出专业化、协作化的社会效益理论；女王学院毕业生杰里米·边沁 1780 年出版《道德和立法原则序论》。前者是早期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学的经典著作，后者则提出功利主义的原则，为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提供了理论根据。

18 世纪下半期，英国大兴变革之风。除了国内的工业、商业、财政、金融革命以外，1776 年的美国独立和 1789 年的法国大革命也给予英国以不小的冲击。此期牛津大学造就了不少杰出的政治家，参与和领导了这些变革。例如查塔姆伯爵（即老皮特）、诺斯勋爵和议会里的一些重要议员。

撰写《罗马帝国衰亡史》的著名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朋后来曾经撰文说：

“我从不认为自己欠下牛津大学什么恩情；牛津大学也不会乐于承认我做儿子，因为我更愿意承认她不是我母亲。我在莫德林学院呆了 14 个月，这 14 个月是我一生中最闲散和最无效益的时期。……当时的院士们是一些正派的、易于相处的人，他们消极地享受着创建人的馈赠。他们一天天过着刻板的生活：教堂和食堂，咖啡店和公共活动室，最后力乏意懒、长长地睡一大觉。他们已经告别读书、思考、写作的苦差使而不感到内疚；学问和智慧的嫩枝枯萎倒地，没有为出资人或社会奉献出任何果实。我作为出身士绅家庭的自费生，得与院士们交往，原以为他们会对一些有关文学的问题进行有趣和有教益的讨论，可他们的谈话停滞在学院事务、托利党政治、个人轶事和隐私丑闻的圈子里。他们沉闷乏味的嗜酒使年轻人的痛快暴饮得到了借口……”

这一段回忆式的记录生动地说明了，18 世纪时牛津大学不仅教学水平确实不高，而且还沉溺在保守、狭隘、沉闷的学术气氛之中。牛津大学要想铸

造新的辉煌，还需有一个走向现代化的艰苦历程。

现代化过程

工业革命也推动了教育革命。18 世纪末期的英国，新兴的工商业者迫切要求新的知识，于是成人教育和新的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勃然兴起。社会需求反映到议会，议会便对古老的牛津和剑桥大学施加压力，促其进行调查、提出改革方案。牛津大学进行改革遇到过很大的阻力，但改革的潮流是阻挡不住的。真正富于创新精神的魄力十足的领导们审时度势，认清了牛津大学教育发展的方向和社会的大趋势、大要求，以冲决一切的顽强斗争进行了大刀阔斧式的改革，终于使得牛津逐渐步入了现代化的大道上。

牛津的现代化过程远不是一次内部的小改革，而是一项浩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因而这场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循序渐进的。它的改革主要包括了如下主要步骤和方面：

1. 非宗教化

1768 年牛津大学开除了 6 名不信奉国教的学生。1811 年诗人雪莱和他的朋友霍格因印发《无神论的必要性》小册子而被开除。1833 年前后，牛津大学还掀起了著名的“牛津运动”。一时宗教讨论十分热烈，压倒了学术研究。到了 1858 年，经过改革的《牛津章程》方才规定不信英国国教的人也可攻读学士学位。1871 年的《考核法》废除了对谋取学术职位者的宗教考核，规定不信国教者可以攻读硕士学位。1868 年，大学职位和学院院士对所有的申请人开放，不论其宗教信仰如何。

2. 非贵族化

这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受到诸多时代条件的制约，但这却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取消”贵族入学的优先权，所有的人一律平等。

3. 考试面前人人平等

牛津创始之初，考试采取纯粹的口试形式，很不合理，致使人校和毕业都有大量走后门的。到 1800 年，牛津大学通过了《公开考试规则》，规定了荣誉级别和及格学位两种本科生毕业考试等级，对笔试要求比以前严格，由大学当局统一掌握。本科毕业考试时，及格者成绩分一、二、三等，予以公布。成绩优异的一等毕业生不但享有社会荣誉，而且一辈子就业和晋升处处有利。特别是两种学科考试成绩都属优异的所谓“双一等”毕业生，则保证有飞黄腾达的前途。对于因贫富悬殊而形成的差别，1850 年从制度上和名义上就消除了。但话得说回来，贵族和其他富家子弟，从小条件优越，见多识广，直至今今天仍然占有捷足先登之利。

4. 学科范围的交叉和扩大

18 世纪末，牛津大学的学科范围有所扩大，一些新的自然科学开始受到重视。不过那时有些学科还带有伪科学的成分。比如，1860 年在牛津就曾发生过威尔伯福斯主教因反对达尔文进化论而同托马斯·亨利·赫胥黎进行辩论的事件。那位主教竟侮谩地说，请问你是在祖父方面还是在祖母方面从猴子遗传下来的。赫胥黎冷静而庄严地回答道，我并不以为猴子是我的祖先便感到耻辱，相反，我倒是耻于与这样的人为伍，他利用才智来掩蔽真理。一时双方唇枪舌箭，剑拔弩张，煞是激烈。一位妇女竟当场昏厥过去，被人抬出会场。

以语言来说，教学长期限于使用拉丁文和希腊文。英语到 19 世纪中叶才被认为是值得研究的对象，能够成为独立的学科。1845 年，西方现代语言

系的藏书楼——泰勒研究所落成，标志着牛津大学对法、德、意、西班牙语的教学和研究的开始。

针对现代科学范围重叠交叉、出现边缘学科的情况，牛津大学从 20 世纪 60 年代起开始允许学生选择多学科同时学习，并进行相应的学位考试，这无疑有利于促进交叉学科的发展。

5. 男女平等

在 1878 年以前，牛津大学是根本没有女生的。只到 1878 年牛津相继成立 5 个女生学院，即玛格丽特夫人堂·萨默维学院，圣休学院、圣希尔达学院和圣安妮学院后，牛津大学才正式招收女生入学学习。1880 年女生开始能和男生一起听课，1884 年能参加考试，1920 年起能领取学位。这时女生在牛津取得和男生完全平等的地位，时间较剑桥为早。

6. 强调创造性的研究成果

除大学本科毕业通过考试全部是取得学士学位以外，牛津大学逐步设置了一系列分学科的高级学位：高级文学学士、高级科学学士、高级哲学学士、哲学博士等。获得这些学位的主要条件，是写出一定水平的论文，表现出创造性的研究成果。如果我们追寻牛津大学的发展轨迹的话，那么可以说：二战以前牛津大学以培养本科生为主，而二战以后培养研究生的工作则迅速发展，现在研究生已超过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从教学任务和设备用途来说，培养研究生逐渐有成为主要部分的趋势。牛津向来注重培养学生自学能力；对于研究生则更强调培养他们自己从事创造性研究工作的能力。

7. 国际化

即逐渐聘请一些外籍教师、招收一些外籍学生。特别是奥尼尔学院毕业的西塞尔·罗兹，这个殖民主义者在南非办金矿，赚了许多钱，在 1902 年死后遗赠了一笔“罗兹基金”，设立了 171 名到牛津大学学习的奖学金名额，其中 60 名给英联邦国家学生，96 名给美国学生，15 名给德国学生。这些名额的数目后来有所变化，但从 1903 年以来，接受罗兹奖学金生也共达 4000 余人。罗兹奖学金创了先例，以后就陆续有其他奖学金的设立，也对外籍学生开放。现在，牛津大学体现了一种广泛的国际文教和科研交流，虽然它同时仍旧保留着鲜明的英国特点。

从上面对牛津大学历史的线条式的勾勒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牛津大学始终向上的轨迹以及他在八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中曾写下的辉煌与梦想。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我们期待着牛津更加光辉灿烂的明天。

第二部分 牛津之光

——人文精神与语言风格

人类永远是向上的、向前的。对于知识的渴求，对于真理的探索，对于自由的向往，对于人类的热爱，是永远不会停止的。而这一切不也留存在古往会来的灿烂华章之中吗？

第三章 丘吉尔，纵横捭阖，力挽狂澜

牛津大学将牛津大学荣誉博士学位授给丘吉尔时，牛津大学校长激动地说：“他是英国的化身，是牛津的全部骄傲……他的每句话都叫英国人民激动……。”

天才演说家丘吉尔将牛津的风格用最完美的演说艺术以一种崭新的方式表现出来。他的演说词无不闪耀着智慧、和谐的幽默，富有启发性和创造力的光辉。丘吉尔让人们懂得了政治的鼓动并不是演说的职责，演说可以是这样的，理应是这样的，似乎原来就是这样的。他给单调的政治演说带来了令人兴奋的色彩。人们发现议会里也有幽默乐趣的生机。

丘吉尔的演说，语言精炼，论点缜密，掩盖弱点那样巧妙，比喻生动贴切而充满幽默色彩。“议会之父”或许是对他的最好褒扬。人们在最危难的时候，希望听到他激奋人心的话语。丘吉尔也正是以其坚强不屈的精神和正义之心，在演说中发自肺腑地摇旗呐喊。

受命于危难之际

1939年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张伯伦政府的绥靖政府破产。1940年5月10日英王授权海军大臣丘吉尔组织新内阁。丘吉尔发表著名的就职演说，他说：“我没有别的，只有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贡献给大家。”他又补充说：“你们问：我们的政策是什么？我说：我们的政策就是用上帝给予我们的全部能力和全部力量在海上、陆地上和空中进行战争；同一个邪恶悲惨的人类罪恶史上从未见过的穷凶极恶的暴政进行战争。这就是我们的政策。你们问：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可以用一个词来答复：胜利——不惜一切代价去争取胜利，无论多么恐怖也要去争取胜利；无论道路多么遥远和艰难，也要去争取胜利；因为没有胜利，就不能生存。”

牛津的教育在丘吉尔身上灿灿发光，正义终将战胜邪恶，这是牛津口才力量的源泉。

这篇简短的演讲向德国法西斯分子坚定的表明了与之斗争到底的决心和态度。这样英国成为二战中同盟军中的坚强分子。丘吉尔作为在英国政治舞台历史上卓有领导才能的首相之一深受人民的尊崇。当时著名的英国社会活动家詹宁斯·普里特指出：“丘吉尔无论遭到何种挫折与失败，始终是一个强者，他善于鼓舞民众并且毫不妥协地敌视德国人。”

丘吉尔的演说才能为他的政治生涯铺平了道路。在丘吉尔任英国首相前已是闻名于世的演说家了。

1897年春天，在印度南部班加罗尔第四骠骑兵团服役的丘吉尔回伦敦休假。他拜访了保守党总部，同秘书们进行磋商，以便安排他将在樱草会于巴思举行的会议上发表第一次政治演讲。他自己深信演说是他的多方面才能之一。虽然在此之前，他总怀疑自己能否正确发字母“S”这个音，并且觉得这一缺陷会使听众拂袖而去。然而，这次讲演效果极好；他在日记中写道：“演讲结束时，掌声如雷，一直持续了好长时间。我毕竟也能做这样的事！……，我开始对自己和世界非常满意。”丘吉尔的演讲成功之道与其苦心孤诣的追求分不开，而自身的职业、爱好、人生经历为他的演讲才能的发挥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和广阔施展才华的大地。丘吉尔在他写的小说《萨优罗柱》中深刻的反映了他本人理想的追求：

“他希望得到不朽的功名，却又冷静等待着毁灭的到来。在这当中，生活会赋予他什么样的责任，是一个极有趣的问题。他生前进行了多次演讲，并且总是告诫说，世上没有一件好东西不是经过努力就能获得的。这些即席讲演的技巧存留在听众的心中，这种修辞之花培植于温室之中。”

丘吉尔的战地记者经历以及努力地写作为他的演讲提供了大量生动而形象的素材，同时他为投身于政治生涯进行周游全国的演讲。1900年，他出版了《从伦敦到莱迪史密斯》、《伊恩·汉密尔顿的进军》描述他作为骑兵中尉在战场上的经历。这些书受到新闻界的热烈的赞许，几乎所有的报章杂志都认为他具备作为一个记者的才能。《圣詹姆士杂志》说，他在“活跃的战地记者中是无可匹敌的。”在南非作为《晨邮报》记者领取的薪水，以及新出的两本书的版权使丘吉尔收入颇丰。此后他为1900年的竞选奋斗，在奥德姆选区勉强取得一个席位。11月，他在全国周游演讲，获得4000英镑收入。他的活动正如他所说：“在所有最大的会议厅里都挤满了友好的听众，演讲中还伴以放映灯，来展现我所经历的冒险业绩如从俘虏营中逃出的经过，所

有这一切又都镶嵌在这场战争的总的框架之中。”

在实践磨练下，丘吉尔的演讲才能得到发挥。在丘吉尔进入下院进行首次演说前，他已是一个比许多议会老手更具吸引力的人物。在竞选中，许多选区都极其需要丘吉尔这样的演说家为保守党赢得选票。丘吉尔后来追述说：“在我进入会场时，全体到会人员起立欢呼……”在丘吉尔到下院发表首次演说时，他作了极其精心的准备，并倾注全力背诵下来，在结束语中讲到：“这里，如果不表达我十分感激之情，我将不会安然入座。感谢诸位善意而耐心地在下院听我讲话。我完全知道这种善意与耐心赐给我，并非出于我本人的原因，而是由于在座许多尊敬的议员先生至今仍保留着某种美好的回忆。”丘吉尔在演讲中巧妙地提及作过下院议员的父亲伦道夫勋爵以此获得下院听众的好感。而实际上他达到了目的。这篇演说发表时议院座无虚席，走廊也挤满了听众。

丘吉尔为了掌握辩论的技巧，勤勉地参加议会各项活动，在许多政治论题上深信自己特殊的禀赋，因而认为自己对问题拥有发言权。这种在各项议会活动建立自己见解的信心使他在二战前夕成为反法西斯的先行者。

丘吉尔习惯于背诵演说词，但是在辩论复杂和或许不合兴趣的问题时，有一次他竟忘记了演说词。他未能发表完演说，就不得不慌乱地回到座位上去。但他找到了最好的补救方法，一种简单的应急办法，即把想要说的内容提要写在手上，以防中途忘掉。这作为他的演讲习惯，在演讲前细仔地这样做着。

丘吉尔的演讲艺术在竞选演说中成熟并且耀射着迷人魅力。冷静的头脑，文雅的大家风度，演说的技巧、辩论中的敏捷思维，这些都具有丘吉尔式的独特风格。1895年末，丘吉尔以一名地位较低的大臣身份投入1896年大选斗争之中。他和私人秘书在威斯敏斯特举行了两周集会。《曼彻斯特卫报》描述道：

“假如丘吉尔先生能够向每一个参加他的集会的人收费一先令，在最后两个星期内，就会交上小小的红运，发一笔财。在宣布他将于明天下午3点钟在曼彻斯特煤炭交易所发表演说后，2点30分大厅里就装满了听众；另一批听众在通向大厅的楼梯上拥挤着：还有一批人只好贴在大街的人行道上听。”

报纸报道说，听众热情地向他欢呼。《每日邮报》报道说：“这种热闹非凡的场面在曼彻斯特的政治竞争中是史无前例的。”

对此我们可以毫无疑问地说，大选中曼彻斯特公众兴趣的中心与焦点均放在温斯顿·丘吉尔先生个人身上……，那些享有特权与他交谈的贵妇人，都受到女性们的妒忌……，他头上总是戴着一顶崭新的旧式帽子，这是一顶平顶毡帽。帽商们正在搜寻这种样式的货源。

丘吉尔的妈妈在给她的一个姐妹的信中激动的写道：“我参加了许多选举，但我从未看到这种激动人心的场面。”而他的儿子就是这种场合中大有作为的候选人。《曼彻斯特卫报》将他之所以如此深孚众望，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他的知识和演讲技巧，以及“他的平易近人和善于辞令”。真是一语中的！在丘吉尔的兵役时期他在闲暇时忙于自学，通过阅读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麦考莱的《英国历史论文集》、柏拉图的《理想国》和温伍德·里民《人类殉难记》等著作，以此找到自己所要走的道路。此外，他让妈妈寄给他一套《政治年鉴》，以使自己能够学习当代政治史。丘吉尔对军队“思

想呆板”状态深感苦恼，决定系统地读一些经济学和历史学方面的书籍，并攻读亨利·福西特的《政治经济学》，计划对莱基的《欧洲的道德》等著作进行研究。这些阅读为丘吉尔的演说提供了不竭的武库。而演说技术的高明让听众领略到丘吉尔的机敏与睿智。他的对手，威廉·乔因森—希克斯是一位强有力的宗教界人士，在关税改革问题上是个稳健派，他攻击丘吉尔由保守党人摇身一变为自由党人，所持态度前后自相矛盾。他还出版了一本小册子，节录了丘吉尔过去对自由党的主张和政策发表的不友好评论。丘吉尔用承认事实的态度简单地作了答复：“我在为保守党工作的时候，我说过许多蠢话，正是因为我不想再继续说这些蠢话，我才离开了它（欢呼声和笑声）。”

丘吉尔在演讲中提出的观点几乎都符合听众的观点，因此听众容易接受。这样他与听众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异乎寻常的亲密关系。《每日邮报》的记者这样描述道：

“他置身于拥挤不堪的人群中间显得得意洋洋，人们向他欢呼，高兴得喜形于色，感情过分直率而又真挚，这一切又反过来更增强人们对他的兴趣和感情……，他越是努力工作，就越是觉得精力充沛、思维敏捷、前途光明。我从未见过他的体质现在像这样健壮……，斗争的欢乐是上述一切最大的促进因素。”真挚中显出几分迂讷，迂讷中充满真挚。牛津的学生气还在丘吉尔身上若隐若现。这给他增添了几分“天真”与可爱，令人们更容易接受他，更喜欢听他的演讲了。

在演说中丘吉尔不时带有某些幽默的格调以此激起听众的热情。这种投桃报李的演说方式使这一竞选区的支持自由党的人振奋起来。这以前他们情绪相当低落，以致不得不与工党分享议员代表名额，这一回他们有力地团结在丘吉尔周围。这样5天以后所举行的投票中，丘吉尔就稳操胜券了。

丘吉尔的演说的鼓动性令他的政敌焦头烂额坐立不安。听众在丘吉尔的无可辩驳的言词下听从与相信了他以及他的观点。政敌们在他犀利的词锋下被刺得体无完肤，全然没有还手之力。丘吉尔的演说魅力不仅赢得了听众，也获得了敌手无可奈何的褒扬。保守党前议员之一亨利·查普林，在给他的秘书的一封信中写道：“温斯顿对工人来说是一个有极大魅力的演说家，在他们动摇不定的时候，他所表演的恶作剧就能起到稳定作用，这是真正重要的因素。”保守党领导人，曾做过几年印度总督的寇松勋爵在竞选中，丘吉尔走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但寇松不能与丘吉尔相提并论，他不是一个受欢迎的演说家。他引用雷纳的一句话对选民说：“所有文明都是贵族所创造。”丘吉尔听到这话后，开玩笑说：“这里没有一个公爵，侯爵、伯爵或子爵不认为应该向他表示敬意。但是，我们应该更确切地说，供养贵族是整个文明世界的艰苦工作。”

牛津之子慷慨激昂，他面对的是整个世界

丘吉尔的演说繁多，但是无论发表多少次演说，他的演说内容都很少重复。这种才能令当时的英国首相深受感动，甚至请丘吉尔在自己的选区里发表演说。

演说是一种耗费精力的活动，丘吉尔在连续不断的演说活动中并没有表现出一丝疲惫，在听众眼中他总是意气风发精力充沛，演说词里听不到沮丧泄气的句子。他保持着斗士的形象，给人们以振奋之感。他几乎是坚强、勇往直前的代名词。许多人说看见丘吉尔，我就充满信心。丘吉尔在历史上留下的人物风格之一就是坚强不屈。而丘吉尔怎样保持了他从不泄气的旺盛精力呢。他在演讲之余坚持去打高尔夫球，即使在投票的日子，他也从未间断。这种体育锻炼保证了丘吉尔发表演说时的状态，因此获得了良好效果。

丘吉尔认为要获得反对者的支持，就要满足他们的意见，就应该作出让步。在实际行动中丘吉尔把让步措施做了下去。在议会一场激烈的辩论中，下院议长刚宣布议会休会，一个愤怒的反爱尔兰自治者挥臂朝他掷来一本书，把他打得鼻青脸肿。丘吉尔为让步的演说负出了代价，但他并未改变见解，他对自己的话负责：

“如果没有和平的愿望，如果所作出的每一项让步均遭到践踏和被人利用……，如果我们在所有这许多个月中被迫听到的一切不确切的、不负责任的、信口雌黄的喋喋不休的话，最终暴露出一种险恶和反叛的目的，那么，先生们，我们只能对你们说，让我们一起来把严重的问题摊到大庭广众之下来检验吧。”

丘吉尔在英国人中没有获得以往的好感，虽然是以得到爱尔兰人的支持为交易筹码。这次演说，《泰晤士报》作了以下评论：

“一位大臣，从他本部门的要求出发，对来自激进百姓的可怕威胁，他似乎认为必须表明，必要时他可以大叫大嚷地向别人表示蔑视。”

这次演说，虽然没有得到在贝尔法斯特的演说中希望获得反对爱尔兰自治者的响应，但是他的演说受到热烈赞许，这不仅来自自由党内，而且还来自首相本人。他的妥协之举是成功的。

丘吉尔的演说艺术在他的政治竞选中丰富着。在二战前夕，世界政治形势极度紧张，战争全面爆发在即，丘吉尔上任英国首相，达到了他的政治生涯“最光辉的时刻”。也是丘吉尔的演说艺术达到“最光辉的时刻”。历史上，丘吉尔在二战中的演说给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运动以坚强力量和信心。“胜利——不惜一切代价去争取胜利，无论多么恐怖也要争取胜利；无论道路多么遥远和艰难，也要去争取胜利；因为没有胜利，就不能生存。”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感召下，人们汇聚成无坚不摧的反法西斯洪流，团结起来为生存而战。每一次时局演说都是一次冲锋战斗的号角，给人们以力量，让敌人心惊胆战。

丘吉尔的反法西斯决心是坚定政治见解的外化。丘吉尔从自己的学识和政治精神得出了正确的政治方针，使自己成为当时英国政治舞台上的显赫人物当中唯一具备领导这场战争的卓越才能的政治家。丘吉尔对自己的才能充满信心，他始终不渝地捍卫积极抵抗希特勒的政策，在国家最困难的时候当上了英国首相。在日记中丘吉尔写道：“我想我对全局了如指掌，深信自己不会失败。”

丘吉尔在危难之际上任；对自己的信心源自于他对德国纳粹上台的敏锐洞察。丘吉尔一直坚持收集有英德关系和双方军备状况的情报。他当时在政府中没有任何职务，因此他只有靠同陆军部和外交部的许多高级官员保持密切联系。丘吉尔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同法国的一些政治家保持联系，也同柏林的一些人建立了联系。许多重要情报丘吉尔是从牛津大学实验物理学教授弗雷德里克·林德曼那里得到的。林德曼是一位精通军事技术的专家，在现代战争的科学问题方面，尤其在各种统计问题方面成了丘吉尔的主要顾问。国际政策方面的情报，丘吉尔从外交官拉尔夫·威格拉姆那里获得。丘吉尔同英国驻巴黎和柏林的新闻记者保持联系，也是收集情报的来源。还同在纳粹恐怖下被迫离开德国迁居英国的著名政治家保持良好的关系。丘吉尔关注各国报刊的大量对外政策方面的消息，从中过滤出一些重要事实。丘吉尔通过这些途径掌握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使自己的居处变成了“小外交部”。当然，政府官员的情报也不少，但他们不善于分析局势。丘吉尔既掌握情报又善于分析局势，因此他在30年代关于英国重整军备和德国危险问题的讲演具有说服力。丘吉尔在下院发表的关于改装英国空军的演说是当时的各种观点的演说中是最合情理和最成功的。丘吉尔的演说证明了他无论对德国动向还是对英国军事装备的现状，都了如指掌。这为他以后的前程开辟了新的天地。

1939年，丘吉尔再任海军大臣，这是他于1922年离任后隔了十多年后的再次任职。这次上任，丘吉尔的演说才能再度发挥。在罗斯福总统的特使的报告中说：

“丘吉尔开始发表谈话，整整持续了1小时50分钟，期间我没有机会插一句话。一连串的词汇像瀑布一样倾泻而出，才华横溢，自始至终打动着听者的心，不时夹杂着趣味横生的妙语。”

丘吉尔常在深夜口述第二天广播讲话的稿子。在场的海军情报局长约翰·戈弗雷少将回忆说：

“一位工作效率极高的打字秘书，一架寂寂无声的打字机，三本对开的大页书写纸，两个高脚杯和两支大雪茄，丘吉尔先生一边踱来踱去，一边进行口述，他穿着不整洁的晚餐夹克衫，弹落的雪茄烟灰和溢出的苏打威士忌掉在他的背心上……。我的插话与枝节性的提示得到他的赞许，并当即采纳……。第二天上午10点钟，让我拿走一份副本，文中对各种细节都作了充分的说明。简直是把整个事情化为一首无韵的诗篇，从那时起，我才在英国广播公司的卷宗中看到了这样的稿件，他就是以此为基础，向全世界发表广播讲话的。”

丘吉尔的海军部的政务秘书杰弗里·莎士比亚在他的回忆录中也写过丘吉尔口授演说稿的情形：

“直到现在，在我想象中还能看到他如何口述一篇演讲稿的情景。他穿着一双卧室用的旧拖鞋，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活像一头关在笼子里的狮子，他背着双手，弯腰低着头，一支雪茄老是叼在他的嘴角上，透过浓密的烟雾，他嘶嘶地向着寂静无声的打字机说出那些妙语连珠的句子。他没有事先拟好的草稿，甚至连记述他演讲顺序的标题也不事先写出。所有那些表明他演讲特色的出色句子，都是在他想象力的熔炉中冶炼而成，脱口而出。”

丘吉尔的广播讲话为他赢得了许多民众的支持，特别是那些收入较低的人中，这些人的年龄在21岁到30岁之间。一些保守人士在听取了她的广播

讲话以后说，“他在这个和平主义笼罩的年代里，颇有些好战的色彩。”

并非一帆风顺

丘吉尔的演说也并非一帆风顺的出色与成功。在政治上失意的时候常常有些捉襟见肘时的落魄与尴尬。他的演说表演因此而变得拙劣，破绽百出。在1940年，在英国海军与德国海军在挪威沿海进行拼死的公开战斗，由于丘吉尔的战略上错误，使英国海军落入德国海军的圈套，损失了2艘战舰。丘吉尔作为海军大臣向下院作报告时，他非常疲倦，又没有带来什么好消息。他给议员们的印象坏透了。

“当他站起来讲话时，显然非常疲倦。开始时他作出一副发表演讲的架势，继而就沉溺于含糊不清的修辞之中，还伴以令人厌倦的嘲笑，我们很少看见他这样被动……。他支支吾吾，把报告草稿的次序都搞错了。戴错了一副眼镜，又到处乱摸那合适的一副；讲话时，他要讲的是‘丹麦’，却一再说成‘瑞典’，一出又一出，成了一次拙劣的表演。”

丘吉尔这个时候面容消瘦，目光刺人，这与他那种踌躇满志、体态圆胖的样子是无法相比的。

丘吉尔的政治道路因他反对德国的侵略而变得光明，暂时的军事上的挫折没有打垮丘吉尔。1940年5月，英国首相张伯伦因妥协政策破产，他到王宫递交了辞呈，并建议国王授权给丘吉尔。当天，丘吉尔被召到王宫，他后来这样记载道：

国王“以一种锐利和奇妙的眼光打量了我一会儿，然后对我说，‘我想你不知道为什么我要找你来吧？’我顺着他的情绪回答说：‘陛下，我简直想不出为什么。’他笑着说：‘我要请你组织政府。’我说我当然愿意遵命。”

从国王自己对这次召见的记载中，似乎他认为丘吉尔作出吃惊的反应是真的，相信他确实不知道为什么召他来王宫。但是丘吉尔对政治形势了如指掌，他得到国王正式邀请组织政府是他意料之中的事。

丘吉尔接过帝国大权后，立刻实施了对德国的强硬政策。他新组成的内阁政府在民意测验中获得较高的支持。丘吉尔是个性格果断，意志坚强，精力充沛的人，而且是个雄辩的演说家。在对德作战时期，他充分运用这些素质来领导国务活动。他的大量演说都能准确地分析局势和英国民众的心理，他抨击希特勒及其党羽并号召本国人民积极抗战。丘吉尔的这些演说受到人民群众的赞扬，也终于得到反映群众情绪的有才干的军事将领们的拥护。

英国军人同丘吉尔共事是困难的，因为丘吉尔的性格果断、自信、专权，并且不论是谁都不能触犯他。同他争辩非常困难，他能高谈阔论、滔滔不绝地压过任何人。丘吉尔曾经对某些军队将领用浪漫主义语气说，如果他能枪毙几个将军，甚至几个司令，战争会进行得更顺利些。而丘吉尔的演说才能让他的威望日益提高，包括在军队中。

丘吉尔的无比自信在特定的历史中，由于形势所迫已经变成了“独裁者”。在战争时期，小型战时内阁的阁员集中掌握了英国的整个大权。战时内阁得到议会所有政党的支持，因此它有稳固的基础。丘吉尔就其个人素质来说是战时内阁的杰出阁员。他独揽首相和国防大臣的职权，掌握了极大的实质上是无限的权力。许多同事都有些怕他。

正是丘吉尔的坚定自信，使他在组织新政府初期遇到的许多困难得以克服。那时德军突破了英法前线，战火向法国北部蔓延，危及巴黎，英国远征军有被歼的现实危险。英国不久即将失掉最后一个主要的同盟国——法国。

1940年6月4日，英法盟军在敦刻尔克撤退取得成功，但部队的装备不得不全部丢弃在法国。英军遭到惨重损失，继续同德国作战的前景十分暗淡。丘吉尔在这个不寻常的时候表现坚定、勇敢。在当天下院会议的时候，首相向英国人民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

“ 尽管我们失利，但我们决不投降，决不屈服。我们将战斗到底。我们将在法国作战，我们将在海上和大洋上作战，我们将充满信心在空中作战，我们将越战越强。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保卫本土。我们将在海滩上作战，在敌人登陆的地点作战，在田野和街头作战，在山区作战，我们任何时候决不投降。即便我们这个岛屿或这个岛屿的大部分被征服并陷于饥饿之中——我从来不相信会发生这种情况——我们的由英国舰队武装和保护的海外帝国也将继续，直到新世界在上帝认为是适当的时候，拿出它的全部力量和可能，来拯救和解放这个旧世界。 ”

战局的形势没有向有利的方面发展。丘吉尔曾经希望把墨索里尼争取到自己方面来，但意大利却成为英国在南欧、地中海和北非的又一个新的强大敌人。6月22日法国同德国签订了停战协定，英国失掉了所有的同盟国，只好孤军作战。

这时，英国人民意识到国家、民族遇到了致命的威胁，从而表现得异乎寻常的英勇顽强，准备焕发精神，继续坚持抗德斗争。处于这种困境中的时候，丘吉尔再一次回忆起了自己在牛津大学的岁月。这几乎已经成了他的一个习惯，每当自己不顺时，他就会静静地咀嚼那年轻时代的一幕幕，一桩桩。它们给他的心灵的莫大的慰藉，使他重新燃起自信之火与斗争的力量。丘吉尔写道：“ 在法国被击败之后，英国凭借岛屿多的有利地势，从失败的痛苦和致命威胁中产生出一种不亚于德国的民族果敢精神。 ” 温斯顿·丘吉尔的演说表达了英国人民的战斗意志，因而显著提高了他的群众威望。丘吉尔成了民族战争的领袖，人民相信他能够采取有力措施把战争进行下去。

英国民众反法西斯的坚定立场使丘吉尔的行动更加果断；而国家首脑在对敌斗争中也表达了英国人民经过战争考验的坚韧不拔和不屈不挠的精神。6月16日，丘吉尔对下院发表讲话时说：

“ 法兰西之战已经宣告结束。不列颠之战就要开始……因此让我们勇敢地承担起我们的责任，而且我们应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英帝国就是存在一千年之后，人们还能说‘ 这是他们最光辉的时刻 ’。 ”

英国将这个“ 最光辉的时刻 ” 作为一个为确保国家生存而需要采取坚决行动的时刻。丘吉尔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果断的军事行动使英国海军保持了至高无上的优势。丘吉尔在下院的报告中，他向政府官员发出训令，要求“ 保持戒备的精神和自信的力量。 ” 这些话表达了政府的信念，即如果德国企图侵入英国，就要遭到失败：

“ 皇家空军情况良好，拥有前所未有的力量。德国海军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虚弱，而不列颠的陆军则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坚强。首相瞻望英王陛下的所有身居要职的臣仆要作出沉着、坚决的榜样。 ”

这次演说后，丘吉尔得到了整个下院的热烈欢迎，当他就坐时，大厅四周所有的人都起立向他欢呼。正如他在回忆录中所说：

“ 直到这时，保守党总是以几分保留的态度对待我，每当我走进议院或在紧要场合起立发言的时候，我所受到的最热烈的掌声是从工党席位上传来的。而现在，在这庄严的、响彻云霄的和声中大家都联合在一起了。 ”

到8月中旬，英国政府为准备全国迎击入侵作好了准备，一旦德国的侵略行动开始，丘吉尔就会亲自指挥抵抗。丘吉尔对东北沿海等可能入侵的地区开始进行一系列的视察。正如《泰晤士报》所报道：

“在他经过一个小村庄时，人们很快就认出了他，举帽和挥手向他致意。丘吉尔先生似乎处于最佳精神状态之中，他对人们表示感谢，笑容满面……。如果丘吉尔的微笑是一种表示满意的尺度的话，他诚然是很满意的。首相还视察了英国东北部的一个造船厂，他在那里呆了一个小时，很快被认了出来，人们大声向他欢呼……。工人们的妻子聚集在造船厂的大门口，丘吉尔先生被热烈欢迎他的气氛所感动，大声问道：‘我们泄气了吗？’妇女们高声回答：‘不’。”

德国的大规模空袭从9月开始，“不列颠之战”拉开了序幕。德国空袭英国时，英国空军给以坚决回击。在空战中英国人的损失惨重，可是德国人也蒙受重大伤亡。在这一战斗中，英国人民的意志锻炼得更加坚强。

丘吉尔在某些受到伤亡的场合进行了视察，场景令人感动：

“他们哭喊道：‘好心的老温尼，我们想你是会来看我们的。我们能够经得住，给他们狠狠地回击’。丘吉尔失声痛哭。当我使劲让他穿过人群时，我听到一位老年妇女说，‘你看，他真关心我们，他哭了。’他镇定了一下情绪，以极快的速度穿过码头走了”。

英国政府在法国失败之后仍坚持作战，这一举动提高了丘吉尔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声望，也逐渐改变了他在保守党内的地位。9月底，前首相张伯伦去世，因此需要选举新的保守党领袖。这时大家都很清楚，只有丘吉尔能获胜。《星期日泰晤士报》写道，丘吉尔是我们的秘密武器。在这个伟大的时刻我们在伟大领袖的英明领导下战斗感到无比幸福。今天，温斯顿·丘吉尔不仅是英国精神的化身，而且是我们的坚强领袖。不仅英国人，整个自由世界都对他无比信任。”

丘吉尔懂得，英国孤军作战必须设法摆脱不易避免的迅速失败，因此他根据抗敌需要动员国内的各类资源，扩大军火工业，建立民防队。与此同时，他还积极设法争取新的盟友：苏联和美国。丘吉尔的注意力转向这两个国家，他继续保持并加强同罗斯福总统的个人书信往来，共同商讨最重要的英美关系和世界局势问题。丘吉尔在信中仍然署名“前海军人员”。他非常喜欢玩弄华丽的词藻，在战时也是如此，他总是给各种会议和战役冠以名目繁多的代号。

8月20日，丘吉尔在下院发表演说，以优美的措词说明英美两国联合起来的作用，说服下院议员同意以租让英国西印度群岛的基地来换取美国的50艘驱逐舰的交易，也让罗斯福相信英国取胜对美国有利，而德国取胜必将给美国带来不幸和灾难：

“毫无疑问，这种措施意味着英语世界的两大民主国家，英国和美国，为了相互的共同利益，在它们的某些事务中将彼此结合起来。我个人觉得，瞻望未来，这种措施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即便我想制止也制止不了，没有人能够阻止这么做。就像密西西比河一样，它将滚滚奔流。让它奔流吧！让这势不可挡的温暖的滚滚洪流奔腾向前，一直流向更广阔的原野和更美好的日子。”

一尊推上战场的大炮

丘吉尔对国家事业明显表现出的朝气和活力，以及他竭尽全力来消除英国军备现存的软弱状态，使形势出现了新的因素，即首相的个人威望惊人地提高。他通过广播，用其前任未曾使用过的方式向广大公民呼吁。据英国广播公司听众部估计，有64%以上的成年人，收听了他在7月14日发表的广播讲话。演讲本身所具有的高质量使人们广泛的产生了兴趣。小说家兼诗人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说：

“我想，人们之所以被他所使用的伊丽莎白时代的词句所打动，原因之一就是人们感到，在这些词句背后，有着像一座坚强堡垒那样巨大的力量和决心全力支持着，而决不是字斟句酌、咬文嚼字的缘故。”

8月初，丘吉尔的声望被《新闻纪事报》公布的一次盖洛普民意测意的结果所进一步证实。在问到他们是赞成还是不赞成丘吉尔的领导时，抽样调查的结果表明，88%的人作了肯定的回答，只有7%的人表示反对，5%的人持怀疑态度。表示赞成的人的比例，要远远比张伯伦所获得的高。

随着战争的进行，珍珠港事件爆发，美国加入了二战。1941年12月关于太平洋战争问题，丘吉尔与罗斯福在白宫进行会谈。会谈因圣诞节庆祝活动而中断。丘吉尔同罗斯福一起站在白宫草坪上灯光闪耀的圣诞树下，但丘吉尔还必须在圣诞节这天花费一些时间，来准备定于26日对国会两院发表的演说。这个机会至少对丘吉尔说来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在此之前，他还从未对某一外国的议会发表过演讲。他以一种沉静的语调开始，他说，他多么希望他的母亲此刻能在这里，“在跨越人生岁月的长途中，我一直对她怀有至深的思念。”他接着说，“我老是免不了有这样一种念头，如果我的父亲是美国人，我的母亲是英国人，而不是相反的话，那我可能早已自己主动到这里来了”。总的来说，这篇演说受到了热烈欢迎，特别是当说到日本人发动的进攻时，他说“他们把我们看作一个什么样的民族呢？”在演说结束时，他表示了对未来的信心：“在即将到来的日子里，英国和美国人民将为他们自身的安全，永远肩并肩地站在尊严、正义与和平一边。”当他要离开会场返回白宫时，听众起立向他欢呼致意。

丘吉尔的美国之行获得了丰厚的收获，不仅得到了美国民众的尊崇和欢迎，还与美国政府达成了实质性的协议。1942年午夜，丘吉尔陪同新闻记者们发表一篇措词谨慎的祝酒词：“1942年来到了。这是艰难的一年，充满斗争与危险的一年，也是朝着胜利迈开一大步的一年。”元旦，他和罗斯福签署了一项文告，宣告成立一个“联合国家”组织，即现今联合国的前身。

丘吉尔回到英国，发现舆论界的情绪不够稳定，主要是两艘战舰遇难引起，部分由于隆美尔在西部沙漠地带突击成功。于是他决定就信任问题举行一次议会辩论。1月27日，辩论开始，他首先发言，他宣布隆美尔的德国部队近2/3的人“受伤、被俘和阵亡”，但他称赞隆美尔“是一位极其果敢而机智的敌人……，若抛开战争带来巨大破坏不谈，我可以说他是一位伟大的将军”。另外，他还谈到对俄国提供武器和物资问题，提及在华盛顿作出的决定——成立联合参谋部和建立西南太平洋盟军联合司令部。哈罗德·尼科尔森对此次演说发表评论，认为演说是极其成功的：

“人们能够实际感受到，随着演说一字一句的进行，对立情绪渐渐平息下来，到演说结束时，很明显对立情绪荡然无存，仅仅只有某种担心……。”

当他发现整个下院都同他休戚与共时，他感到难于掩饰演说给他带来的欢乐，事实上，这只是他具有迷人魅力的一部分。他双手深深地插进裤袋里，肚子里一会儿转向右边，一会儿转向左边，显然对他主宰局势感到高兴。”

那些在辩论中发言的人，有许多人抱着同情的态度批评丘吉尔。工党发言人希望丘吉尔让印度享有充分的自治权。他曾于 1923 年在莱斯特击败过丘吉尔。在辩论中说道：

“具有巨大潜在能量的印度仍处于沉睡状态之中，需要把它唤醒。就像神话故事里的公主一样，只有经王子用魔法一点，才能使她的脉搏跳动。这个比喻的意思是说，首相就是那个王子，唯独他有能力以一种议会内外旁人所办不到的方式，同印度进行接触。之所以这样说，部分是由于他过去同印度事务曾有联系，部分是因为他是现任首相，部分是由于他具有极好的口才。”

丘吉尔在议会中的辩论展现了压倒性的、强大的辩论实力。被人们冠以幽默天才之誉的丘吉尔具有极优秀的辩论资质。丘吉尔的政敌、自由党的党魁哈巴·阿斯契史曾批评丘吉尔说：

“他是保守党的领袖，但是保守的字眼实在无法涵盖他的事迹。他并不属于哪一个党，毫无疑问，他是英国政界中的巨人，正如政治扑克牌中的那张王牌般，是不可能有哪一张扑克牌能打败它。”

这位政敌准确地指出了丘吉尔的辩论实力。一位平时就憎恨丘吉尔的女议员对丘吉尔咒骂道：

“假如我是你的太太，我会在你要的那杯红茶中下毒！”

面对女议员的恶态，但见丘吉尔平心静气地回答说：

“假如我是你的丈夫，我大概会很高兴地喝下那杯毒茶。”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丘吉尔真正成为议会辩论中的一张王牌。

丘吉尔在 1941 年战争最艰难的时期表现了极大的政治理智。他在德国进攻苏联时发表了支援苏联的声明。这个时刻丘吉尔体现出一个大国活动家的风度。他了解自己国家的根本利益所在，了解在当时条件下符合国家利益的最好处置方法，因此他能完成英国政治和他个人活动中的巨大转折。在英国没有哪一个人能比温斯顿·丘吉尔更坚决更顽固地敌视苏联，但是正是他决定实现这一转折。

丘吉尔下令英国广播公司 6 月 22 日晚 9 时广播他的支援苏联的演说。这一大他整天都在准备讲稿，其中的基本原则他早已胸有成竹。

丘吉尔在广播中说：“我看到的是，俄国士兵站在祖国的边界上，捍卫着他们的祖先自古以来耕种的土地。我看到的是纳粹的战争机器，大批经过训练的头脑迟钝、唯命是从的残暴的德国士兵像一群饿狼似的向他们扑去。我看到这些德国士兵的背后有一小撮策划、组织这场威胁人类的大恐怖的恶棍。我们大英帝国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决心消灭希特勒和纳粹制度的一切痕迹。我们要给予俄国和俄国人以一切可能的援助。……俄国的灾难就是我们的灾难，也是美国的灾难，俄国人为保卫家乡而战的事业是世界各地各个自由人的斗争事业。”

丘吉尔的演说将曾经对立的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联合起来，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这一年也正是二战的转折时期，丘吉尔实现了这一转折。以后的战争形势开始发生有利的变化。丘吉尔在英国最困难的时刻掌权，他表现出同英国人民一致的战斗决心，坚决作战从不动摇。如果丘吉尔

当年不是以这样坚定的立场，那么英国的慕尼黑分子就会在法西斯强国前屈膝投降，并且在国际劫掠政治中同法西斯分子勾结在一起。在丘吉尔行使政府权力后，为适应继续进行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采取坚决措施把国内经济和整个生活引上战时轨道。丘吉尔比英国其他政治家更早更清楚地懂得同苏联和美国建立军事同盟是拯救英国的保障。因此在1941年6月同苏联军事力量联合起来。在丘吉尔逝世后的百年诞辰时，人们都认为正是丘吉尔在1941年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拯救了全世界。

丘吉尔将英国甚至全世界从法西斯斗争的泥淖中拔出来，并赢得了这场为生存而战的伟大胜利。每一次对时局政见的演说都体现出他的超群智慧、坚强的意志和坚韧不拔的毅力。丘吉尔的演说如号角激励着每一个人。

1945年，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克莱门蒂娜·丘吉尔代表他的丈夫——英国首相发表演说，她说：

“你们取得了把侵略者赶出国并击溃纳粹暴君的辉煌胜利，对此我代表英国人民向你们致以衷心的祝贺。我坚信，人类的未来取决于英国和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互相了解。今天在我们岛国的家乡里，我们时常想念你们大家，并从内心深处祝愿你们幸福和繁荣。我们一起走过了遭受一切牺牲和苦难的幽谷之后，也应该本着忠实友谊和相互同情的愿望共同走在胜利和平的阳光大道上。我请我的丈夫向你们大家转达这种友好和钦佩之意。”

丘吉尔妻子的演说正是对丘吉尔在这次战争中的胜利的褒奖，也是对丘吉尔的演说才华在战争中所起的不可代替催化剂作用的肯定。

丘吉尔在首相位置上并非像自己的预料的那样顺利。二战胜利后的大选，他落选失去了首相职务。他十分难过，如自己所述“像海兽由深海上涌，或像潜水员突然上浮，因压力的下降，使我的血管有爆裂的危险”。

丘吉尔没有放弃政治上的进取，1951年，他再次上任首相。

“以我之高龄，现在仍身居高位，肩负重任，这次非因为我贪恋权势或官职，这两者我已足矣。我之所以继续留任，是因为我有一种感觉，我可以做一些事情，对已经发生的事情施以某种影响，尤其对我所最关心的问题，即建立可靠和持久的和平。”

丘吉尔的演说是他上任的最好托辞，这给他的批评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钱农在他的日记中写到：“这是他有生之年的几次演说之一。”

“他才华横溢，巧言令色，富于情趣和讥讽，对着寂静的、敬畏的议院，倾吐着麦考莱式的成语。那是奥林匹亚的场面……然后，他退到吸烟室，因自豪、愉快和胜利涨红了脸，坐在那里吸着白兰地和接受祝愿达两小时之久。像一个小学生那样面露笑容。”

丘吉尔政治生涯结束是1955年，此次是辞职，没有上次离任的苦痛。《泰晤士报》报道如下：

“在离开前，他举行茶会招待全体公务人员。当他由房子走向等候的车子时，他们站在大楼唱‘他是一个快活的好伙伴’，他吸着雪茄，用他有名的V字手势向聚集在唐宁街上的祝贺群众打招呼。温斯顿·丘吉尔先生在祝福的欢呼声和叫喊声中，乘车慢慢地离去。”

正是丘吉尔勇敢、坚定、果断，使他的雄辨天资得以发挥，而这些素质更使他在政治舞台上取得了显赫的成就、卓越的业绩。

丘吉尔的演说艺术与辩论技巧不仅成为英国政治家们竭力效仿与学习的典范，而且也影响其他国家的演说家们。从麦克米伦、希思、撒切尔夫人、

里根等国际风云人物的演说中就可以窥视到丘吉尔的演说魅力的影响无所不在。

牛津大学的演说风气的形成与丘吉尔在牛津保守党协会中的演说，以及在全校的演说听激起的热情是分不开的。正是这样伟大的演说者让牛津大学的学人们看到了演说中最光辉的精彩一面。

第四章 撒切尔夫人，从牛津走向世界的伟大女性

1943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中期，牛津大学在战争氛围中失去了校园的宁静，这不是每一个学生实现理想的地方。战争，战争，还有什么呢？学习是次要的事。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在这个不合时宜的时候，进入了实现不了愿望的索默维尔学院学习化学。或许，一切的不合时宜造就了这样一个“充满自信”的“不合时宜”的“铁女人”。

撒切尔夫人凭借女性的政治天性进入了男权至上的英国政治舞台。她“明确的信念”“滔滔不绝的辩才”犹如夜雨后的星空分外灿烂耀眼。

牛津保守党协会的会场上、牛津郡的村子集会上、牛津市政厅、格兰森小城选区。撒切尔的演说在牛津大学得天独厚无与伦比的值得骄傲的传统风格中一步步前进。她登上英国首相之位，并连任三届，成为世界风云人物，在牛津文化氛围中是理所当然的。人们并不认为她——一个女人凌驾众人之上，有什么不合时宜的。在她咄咄逼人的演说中，一个时代的政治思想得到宣扬、推行——预言之中，撒切尔时代到来……

牛津校园，初露峥嵘

“我的第一次参加大选的活动是牛津的市政厅里听霍格的演讲。”1945年，在牛津大学念书的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为昆廷·霍格战胜工党候选人、争夺议员席位而呐喊助阵，这是撒切尔夫人的政治生活的小小的开端。后来回忆时说了这句话，这是她初次尝试到了大选的滋味。在牛津大学生活时，撒切尔夫人就开始表现出了杰出的政治演说辩才。

1943年正是二次世界大战的中期。牛津大学的校园里弥漫着战争的气息。许多应该上学的年轻人不是已经战死就是在前线作战。各类学院暂时消失了，建筑物被军队或政府机构占用。为满足战争的需要，自然科学院系从事军工研究，并以青霉素，氮化芥子气和碳氢化合物而著名。当时，想去牛津学习化学的学生内心都很矛盾。他们知道，牛津不一定是实现理想的地方，大学生们不可避免地要为打败德国而从事种种激动人心又极其神秘的活动，学习就成了次要的任务。

但这没有动摇玛格丽特上牛津大学的决心，尽管她差一点没有通过入学考试。牛津大学的索默维尔学院到最后才给她发了入学通知书。在此之前，她拼命学习拉丁文，希望通过索默维尔学院的入学考试。但该学院的首批录取名单上没有她的名字，她被列入候补名单。幸运的是新生中有人放弃了入学资格。她填补了空缺，得以实现父亲的宿愿。

玛格丽特曾经对特丽西娅·默里说：“我的父亲确实想在我的身上实现他的抱负。”送孩子到高等学府深造是许多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们的梦寐以求的愿望。在她上学以前，父亲设法为她凑够了学费，因为她不享受助学金。

1979年5月，当撒切尔夫人作为首相搬进举世瞩目的唐宁街10号时，她说，她的信仰和促使她获胜的信念与父亲的教诲和罗伯茨家族价值观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她说：“我把我的一切成就都归功于我的父亲。”

6年后，撒切尔夫人的父亲去世，她对父亲的感激之情没有改变：“正直诚实的品德。他教导我必须首先寻求信仰，然后把它付诸实践。在关键性问题上不要妥协让步。”

撒切尔夫人在多种场合清楚地承认父亲对她的影响，表达了她对父亲的崇敬，而其他的政治领袖人物往往为自己的成就沾沾自喜，忘却了父辈对他们的培育之恩。

撒切尔夫人的父亲艾尔弗雷德本人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但他对教育极为热心。他崇拜维多利亚时代的教育风尚，认为教育是使人生充实而有意义的关键。玛格丽特便是他父亲一手培养的。在她年幼时，父亲为她安排了钢琴课，带她去图书馆，后来又送她上小学。他没有让她上附近的小学，而送她到上层人居住区的一所学校学习，因为这所学校教学效果良好。在家里，玛格丽特不断提问题，艾尔弗雷德总是不厌其烦地予以解答。他决心把自己学到的知识以及生活经验和信条，尤其是如何理财的知识传授给女儿。后来，玛格丽特满怀崇敬的心情写道，父亲要求把每个便士都节省下来。

艾尔弗雷德夫还把自立的精神灌输给玛格丽特。教堂是玛格丽特生活的中心，对她严肃认真的个性的形成产生了很大影响。每个星期天，她至少要去教堂两次，几乎没有时间玩耍。星期天禁止一切娱乐活动，甚至不能读报。大概在这座教堂里，玛格丽特悟出了宗教和现实生活之间的联系。不过，她

更加注重现实生活。她曾经对一位传记作者说：“过去我们都是卫理公会教徒，卫理公会教义强调条理和秩序。”

严谨、准确、注重细节，对正确和错误具有严格的区分标准是卫理公会教徒虔诚性格的突出特征。“有些事情你就不能去做，就这样。”玛格丽特对那位传记作者说，“我们的头脑里有着根深蒂固的责任感——对教堂的责任、对邻居的责任以及良心上的责任。”

艾尔弗雷德从鞋匠的儿子到杂货店老板，成为受人尊敬的人。他们的家庭一直遵循着传统的价值观和社会道德。在这个家庭长大的孩子们具有高度的献身精神。

艾尔弗雷德靠辛勤劳动和坚强的毅力改变了自己卑微的出身，而玛格丽特的出身与父亲大不相同。但他却执意要给她创造一种俭朴的生活环境，这是因为他是白手起家的人，养成了克勤克俭的生活习惯。她所熟悉的父亲不属于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工人阶层，而是日益兴起的小资产阶级。

艾尔弗雷德擅长诡辩，曾任格兰森市长。撒切尔夫人继承了父亲的政治热情和演说天才。在她上学期间就露出一定的政治才华。凯斯蒂文学校的辩论俱乐部使她大显身手。小时候她常常和父亲辩论，似乎学到了父亲能言善辩的本领。课堂上她异常平静，但在辩论会上，她非常自信，一开口便滔滔不绝，其他同学望尘莫及。同学们并不认为她才华出众，但她毫不气馁。来学校作演说的人总会碰到玛格丽特提问题。她讲话慢条斯理，带林肯郡腔调，但准确而响亮。她很有信心，一开口讲话就忘掉了自己，同学们都不是她的对手。

但是，艾尔弗雷德的家庭虽然美满却缺乏欢乐。父亲和女儿都为自己的严肃而高兴。她的同龄人、朋友威克斯回忆说：“我认为她没有幽默感，她的父亲也没有幽默感。她的母亲更谈不上幽默。他们太严肃、太勤奋了。对他们来说，生活是严肃的，必须认认真真对待。”

“玛格丽特拥有的一切，包括做人的准则和宏伟的抱负，都是父亲传授的。在读牛津大学时，父亲才给了女儿这个机会。”

战时的牛津一点也不迷人，但它是她实现第一个理想的地方。对她这个未出过远门、不通世故的女孩子来说，牛津同宁静的格兰森相比，仍有天壤之别。这里，生活紧张有趣。她也有一两个来自格兰森的朋友。尽管如此，她承认她还是有点想家。紧张的学习生活和政治活动对她的思乡愁绪有所缓解，她开始效仿那些后来功成名就的成年人。

幼年时期的玛格丽特是艾尔弗雷德的掌上明珠，是他倾心培养的对象，所以她能够进入牛津大学深造，也是不足为奇的事。四年的大学生活是她终生致力于保守党政治、入主唐宁街10号政治生涯之开端。

玛格丽特全神贯注的第一件事是工作。那时，勤奋工作是人们应尽的责任，也是非常流行的风尚。牛津大学的课程繁重，实验活动多。人们对这位漂亮但不引人注目的姑娘的印象是：勤奋好学，效率高，做起实验来井井有条，但她不是一个出色的化学研究者。

霍奇金教授是玛格丽特打过交道的人中最出色的女性。作为一个政治家，撒切尔夫人总是对自己周围能力超群的女性存有戒心，但在上大学期间，能够碰到这么一位独特的女教师，对她来说实属一件幸事，尽管她在快要当首相时，从未对蜂拥而来的传记作者提到过她。撒切尔夫人是英国历史上唯一的早年接受自然科学教育的首相。那么，学习化学对一个人的思想有什么

作用呢？这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说：“我认为学习化学有助于人们尽可能地寻求解决问题的多种方法，有助于人们把支离破碎的东西组织起来。它还有助于人们运用已取得的结论解决新的问题。”

教授的这种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的务实主义思想是政治家撒切尔夫人思想的基本成分。

大学的学习生活是独立生活的象征，使她感到充实有用。但这些课程没有改变她的人生，也没有发掘她的真正才能。科学对她的思想的影响比不上保守党的影响。正因为她在牛津大学找到了保守主义，所以她在牛津的经历才具有重大的永久性的意义。

一上大学，玛格丽特就参加了牛津大学保守党协会。战争时期英国由联合政府执政，各党派取得了暂时的联合，保守党在全国的地位很低。

保守党的境地很窘迫，但该党的领袖丘吉尔并不介意。丘吉尔从来就不是一个可靠的保守党人。有人认为他根本就不是保守党人。历史学家保罗·安迪森指出：丘吉尔“把党看成是建立自己在历史上的世界领袖地位的跳板，但对党向他提出的要求有些怨恨。”只要能保住他的国家领袖宝座，不管什么政党形式他都不介意。这就给克莱门特·艾德礼和工党的领袖人物进入政府造成了可乘之机。但丘吉尔毫不在乎。1943年底，丘吉尔甚至考虑到战后继续采取联合执政的政府形式。保守党一部分议员鼓动一切力量瓦解联合政府，反对丘吉尔的独裁。以后这些人成了丘吉尔世界和40年后形成的撒切尔夫人世界的联系。

玛格丽特一到牛津就参加了保守党协会，这一决定似乎不是深思熟虑的政治举动。她曾对特丽西娅·默黑说：“我特别感兴趣的是，在那里有机会见到众多的来自不同背景的人。”然而，她显然没想到，加入其它俱乐部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

在她大学生活里的前两年，牛津大学保守党协会正像她所期望那样，是一个社交俱乐部。保守党内部的辩论仅仅局限在下议院内，尚未波及牛津大学。战争剥夺了许多年轻人上大学的权利，玛格丽特自愿去士兵俱乐部帮忙，并以保守党协会智囊团的成员身份，到牛津郡的各个村子里去演讲。

1945年的大选里，玛格丽特与当选的独立党人、军火制造商牛尼斯·青达尔针锋相对。《格兰林报》首次报道了她与他之间的论战。该杂志认为她“具有她父亲那滔滔不绝的辩才”，并对她在这次大选中的作用作了这样的评价：“这位年方19的姑娘具有明确的信念。她的出现对本地区的女性投票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这样的评价玛格丽特并不一定完全满意。

在以霍格为直的改革派看来，保守党已经和选民，尤其是和正在前方作战的士兵失去联系。党的领袖丘吉尔企图使党回到战前的路线上去。在打败希特勒的战争中，他做出了毋庸置疑的贡献，但他却忽视了选民的心理要求。他错误地估计了国情民情。当时，全国人民已经看到强有力政府的优点，他们渴望依靠政府获得就业机会，成家立业，享受福利待遇。

保守党此次大选失利，丘吉尔政府下台。牛津大学的保守党人拥护保守党的主张。但是他们也感到保守党需要改革，可这并不意味着保守党应该回到战前的路线上去。1945年大选失败后，保守党内相当一部分人开始寻求一种合成剂，把保守党的主张和显而易见的社会事实以及战后英国人民的追求结合起来。这些人在党内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

哈罗德·麦克米伦是这股潮流的先锋。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保守党濒临

灭亡，它在议院里的议员们无所事事，等待着竞选的摆钟摆向他们。这些人“虽然无能，但势力强大，稳坐着保守党的席位。”麦克米伦认为，保守党需要的是新的政策。他说：“我们必须使战后的选民相信，我们接受解决就业，提高福利待遇的要求；接受中央计划经济的政策；必要的时候接受控制物资的要求。”他认为这种观点是“旧的自由主义和新的社会主义”相结合的产物。

当保守党在全国进行大辩论的时候，牛津大学的保守党协会正在重新组阁。该协会的重要人物是玛格丽特。她刚刚进入大学的第三个学年。两年来，她紧步几位女性政治活动家的后尘，终于跻身进入牛津大学保守党协会的领导阶层。该校的政治活动家有机会接触保守党的高层人物，这是他们的特权。玛格丽特像他们一样，结识了许多保守党要人，学会了从事政治活动必需的社交技能。

1945年秋，玛格丽特成为学校保守党协会的理事。如果她在这个岗位上干下去，主席的宝座非她莫属。在这一时期，玛格丽特仍然保留着她早期一贯坚持的政治观点。牛津大学保守党协会下设一个三人委员会，该委员会起草了一份报告，重申协会的宗旨，审查协会的组织机构。在报告上署名的作者中，玛格丽特的名字排在第一位。这时玛格丽特就已表现出后来的某些特征：精力充沛，办事干练，讲究实效。

她早已在保守党高层人物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46年3月，她出席了保守党联合会和联合主义者协会的代表大会，并在会上发言。她的发言表达了牛津大学保守党人对保守党中央总部旧观念的不满。她还以个人的身份提出，保守党应实现自己的诺言，以鼓舞“更多的工人阶级出身的官员们”的士气。

牛津大学保守党人的看法是，该党应该学习社会主义者的热情和制订政策的方法。在这次大会上，玛格丽特没有成为政治评论家或性别歧视者评头论足的对象。据一家晚报报道，她持有公众普遍接受的，切合实际的政治观点。她“衣着漂亮、头上什么也不戴，不是相貌丑陋的书呆子。”她的同龄人雷切尔·史密斯回忆道：“在我的记忆中，她穿着整齐，性格恬静，长着迷人的棕色头发。和她在一起使人感到愉快。总之，她和今天的样子不大相同。”

作为保守党协会的主席，玛格丽特见到了所有的关心学生工作的保守党重要人物。在她上任的前一年，哈罗德·麦克米伦、彼得·桑尼克罗大特、奥利弗·斯坦利、杰弗里·劳埃德等政界名流都和牛津大学保守党协会的官员吃过饭，并做过演说。

玛格丽特没有参加牛津大学联合会的活动。该联合会接收女性会员是20多年以后的事了。这个联合会是孕育政治家的摇篮，好几个撒切尔夫人以前的保守党领袖都是从这里开始走向政府内阁的。麦克米伦在这里练就了能言善辩的本领，在政治道路上节节获得胜利。功绩显赫的爱德华·希思首相也是在这里学到了滔滔不绝的辩才。

不幸的是，玛格丽特没有资格像他们那样炫耀大学时代的政治生活。但她在牛津大学保守党协会里的政治活动也使他结识了许多上层人物。她进入该协会不久，就成了这个世界的权威人物，开始了终生倾心的政治生活。她所见到的人将在她以后的政治生活中重新出现，英国政界历来如此。尽管她似乎没有给这些人留下深深的印象，而他们却印在了她的脑海中。

后来，玛格丽特仍然和这些人保持着特殊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关系反映了人们所熟悉的牛津现象——老同志关系网。这种现象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反映在那些很早就进入关系网的人的成年生活中。

在牛津大学上学期间，许多同学都成为政治潮流的代表人物。他们或是政治敌人或是政治同党，互相利用，共同生存。在激烈的政治战斗中获得了政治资本，实现了各自的目的。许多时候，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敌人有时和朋友一样有用。

在玛格丽特的牛津大学协会做过演说的人中，道格拉斯勋爵的地位最显赫。他曾任保守党领袖、英国首相、外交大臣，并和撒切尔同为希思政府的内阁成员。

1985年，当有人问到他在牛津大学保守党协会演说的情况时，他似乎对该协会主席玛格丽特没有什么印象，也似乎忘记了1963年在他的政府里担任生活津贴和国民保险部政务次官的撒切尔夫人。他说，他第一次见到撒切尔夫人是在希思政府的内阁会议上。”那天我回家后对妻子说：“她一个人的头脑顶我们好几个，我们得当心。”

对撒切尔夫人来说，道格拉斯勋爵很重要，是她早期崇拜的政治明星。他们后来又出现在她的生活中。不论是在任职期间还是退休以后，他们都是她的政府忠诚不渝的支持者。

牛津大学具有孕育政治家的独特传统，好几代政治家都是从这里脱颖而出的。玛格丽特在牛津大学的经历为她以后的首相生涯奠定了基础。

牛津大学使撒切尔夫人的人生发生了巨大转折。在学校里的保守党协会举行娱乐活动，接待内阁大臣，请他们作演讲，使玛格丽特耳濡目染学到了许多演讲技巧。她的组织才能和演讲口才由此得到了锻炼和施展的机会。一天，她刚作了演讲下来，一位朋友对她说：“听了你的演讲，我觉得你应当一位议员。”言者无意，听者有心，从此，玛格丽特开始了政治生涯。

雄狮·斗士

1949年2月，在达福特市提名玛格丽特为该市议员候选人。玛格丽特从牛津毕业以后，初次参加竞选，毕竟有些稚嫩。她的竞选演说充满了反社会主义的陈词滥调。她认为工党和保守党的竞选实际上是奴隶制的支持者和自由的支持者之间的竞选。她说，工党等级界限森严、嫉妒心很强。依靠这样的政党“你不可能建设一个伟大的、平等友爱国家”。她的讲话体现了对自由的信仰。30年以后，她的讲话还是这样。她说，工党的主张“从表面上看非常合理，实际上对国家和人民生活有百弊而无一利”。工党的福利国家政策把人民像鸟儿一样，关在笼子里，“给他们提供社会保障，提供衣食。但鸟儿没有自由，不能出去独立生活，这一切有什么用呢？”

玛格丽特后来的政治思想从这时就开始萌芽了。在一次妇女午餐聚会上，她发表演说道：

“不要被经济学家和内阁大臣们的高谈阔论所吓倒。我们要从家庭主妇的角度考虑政治问题。妇女在生活中接触的是食品匮乏、住房紧张和儿童福利条件日益降低之类的问题。政府应该面对现实。”

“记住：政府给予人民的权利愈小，人民承担的责任就愈少。”

此次竞选，玛格丽特失败了，但她确立了自己的终身职业，进入了和她的志趣完全相投的世界。在两次竞选中，她尽了最大努力，克服了女性的弱点。没有人因为她具有宏伟的抱负或者聪明过人而嘲笑她，卑微的出身没有成为她的不利因素。她是毫不掩饰的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是保守党在北背特区的新鲜血液。在两次竞选中，作为最年轻的女候选人，她比男候选人更引人注目。由于女性的特殊价值，她的表现引起了保守党总部的注意，并成为了经常使用的政治工具。

当上候选人以后，玛格丽特确信她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家了。她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学习法律，期望通过律师资格考试。在选举委员会中，选举委员对律师出身的人当议员都很感兴趣，他们衷心认为律师巧于辞令，擅长辩驳，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准能为本党赢得更多的选民。因此，他们物色候选人时，很看重律师。

1950年，法律委员会招收玛格丽特为业余学员，1953年12月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通过了律师资格考试。

律师的经历对撒切尔夫人思想和观点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律师生活是一个人走向国家政治中心的基础，因为它能够使我们练就一副能言善辩的口才。

后来，撒切尔夫人认为，她的律师经历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律师生活含有一定哲理，法律和政治密切相关。1974年6月，她对英国广播公司记者说：“法律的魅力主要在于它对自由和民主极为重要。”还说：“我认为，英国人民在国家实行一人一票制之前，就应该把自己称为自由的人。这是因为在很久以前，我们就重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我认为人们还没有充分认识法律对自由和民主的重要性。有时我想，人们要是能够认识到这一点，那该多好啊！”

律师经历是玛格丽特政治生涯的一个转折点。1951年12月，她与丹尼·撒切尔结为伉俪。丹尼是一家生产抽漆和其它化学物品的大公司经理，玛格丽特的高攀，使她一跃成为富裕阶层的一员。

嫁给丹尼斯后，玛格丽特不必自谋生计，能够专心致志地攻读法律知识。她不再为经济问题发愁，她的真正志向是在政治上，尽管政治是挣不了大钱的职业。有了孩子以后，她雇了一个保姆照看孩子，料理家务，自己可以安心工作。

在早期的一篇演说里，玛格丽特表达了她的志向，认为妇女不应该把操持家务看作是自己的义务，而应该有一个职业。”这样，她们的天赋和才华才能发挥出来，为社会服务，而不致于被浪费。”

还说：“那种认为妇女工作，家庭就要遭殃的观点纯粹是胡说八道。妇女不仅要工作，而且要努力在某一行业上出人头地。更重要的是妇女应该参政议事。”

又说：“现在威斯敏斯特宫里的 625 个议员中只有 17 位妇女，为什么不能有更多的女议员呢？妇女应该和男人一样，担任重要的内阁职务。为什么不能有女财政大臣或女外交大臣呢？”

结婚以后，撒切尔夫人雄心未成。她知道走向国家政治中心的必经之路是当议员。她现在有钱了，但寻找合适的选区并非易事。好几个地方的保守党协会拒绝接收她。撒切尔夫人并不甘心，她是一个“具有坚定信念的政治家。”在生了孩子一年后，她开始在竞选的道路上忙碌。经过努力，她的名字上了奥尔平顿地区的候选人名单，但最后没有选上，找其它选区显然来不及了。1957 年，丹克纳和梅斯两个选区都拒绝接收她为候选人。她在牛津区的努力也以失败而告终。

这一切挫折反而使她因祸得福。1958 年，芬奇莱选区出现空缺，该区的保守党议员不再参加大选。芬奇莱区是距威斯敏斯特宫最近的选区，拥有 1200 个保守党人。竞选就如抽彩票，运气是重要因素。撒切尔夫人有过竞选的经历，这次成功的希望很大。报名竞选的 200 人经过淘汰，只剩下 4 人。撒切尔夫人是其中的一个，其他三位是上过公立学校、参加过二战的绅士和军官。在第二轮投票中，撒切尔夫人获胜。

32 岁的撒切尔夫人终于坐到了被一个平庸的男人霸占了二十多年的议员席上。新闻界非常兴奋，《芬奇莱报》欣喜若狂。从该报的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撒切尔夫人对保守党的政策，包括党在她不熟悉的领域内的政策，已经了如指掌了。

《芬奇莱报》是这样描述撒切尔夫人的就职演说的：

“撒切尔夫人口才流利，不看讲稿却能击中要害。她准确地评价了中东局势，像一个家庭主妇配菜那样熟练地分析了苏联宣传机构的动机，抨击了埃及总统纳赛尔。接着她的话锋转向国内问题（看来她对工资和工会问题非常熟悉）。然后她预测了保守党的光辉前景。与会者屏心静听，信心倍增。”

撒切尔夫人的口才有她父亲的风格，同时在牛津大学保守党协会中的讲演以及学习保守党要人演讲，使她的天才得以发挥。特别是后者，对她的影响相当大。在牛津校园里，她的口才与演讲能力得到了系统的、专业化的训练，这在同代的人那里是罕见的。“坚定的信念”使她的演讲充满力量，听众都难以相信一个弱女子会有超越男性的坚强不屈。在英国的政治舞台上，她扮演着“雄狮·斗士”的形象。

在 1959 年的大选中，撒切尔夫人获胜，成为芬奇莱区议员。她特别喜欢芬奇莱地区，喜欢这里的人口素质和生活环境。撒切尔竞选获胜那年，该区 20% 的选民是犹太人。因此人们常常认为撒切尔具有犹太人的某些特征：

自助自立、大胆追求物质享受、喜欢自给自足的社区生活。但她并不具备犹太人关心别人、富有同情心的传统美德。

芬奇莱区成了撒切尔夫人获得成功的地方。它标志着她已成为一名职业政治家了。

进入议会后，撒切尔夫人虽然没有结识到保守党领袖麦克米伦，对她来说他有些高不可攀。但是有几个人她是可以接近的。这些人在结识她以后生活的道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黑尔什姆勋爵就是当年的昆廷·霍格。在 1945 年有大选中，撒切尔夫人为他竞选牛津区议员而呐喊助阵。那是她第一次参加大选活动。另一个撒切尔夫人认识的人是爱德华·希恩。

在 1950 年大选中，他们出现在同一个讲坛上。希恩竞选议员获胜后，在贝克斯利区妇女午餐俱乐部举行了一次集会。会上，玛格丽特做了女权问题的长篇演说。她对希恩的听众们这样说：

“不要被经济学家和内阁大臣们的高谈阔论所吓倒。”

撒切尔夫人犹如家庭妇女平静而沉着的对希恩的演说进行批驳。由此，不难看出她的演说词锋锐利，让人不可喘息。希恩后来对女性政治家持轻蔑态度。

撒切尔夫人进入议院后是幸运的。人们常说撒切尔夫人是一个幸运首相。同时，她也是幸运的后座议员。她进入议院后不久，鸿运就来了。按照惯例，每届新员可以向议院提出议案，但必须抽签方式决定提出议案的先后次序。撒切尔夫人幸运地抽了第二名。

更为独特的是她的处女演说。她没有唠唠叨叨地叙述“当选为议员深感荣幸”之类的陈词滥调，而是开门见山，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自己的议案——“公共团体”议案。该议案的目的是允许新闻界参加地方议会的会议。

撒切尔夫人介绍议案的方式是她深思熟虑的风格的早期表现，这一风格的形式与她平时广泛阅读、积累资料的习惯是分不开的。她讲了 27 分钟，几乎没有看讲稿。她列举了一串的统计数据来证明公民有权知道地方政府的开支。她的处女演说赢得了许多人的赞许。

来自布莱克本区的女议员巴巴拉·卡斯尔很佩服撒切尔夫人流利的口才。她说她支持撒切尔夫人的提案，尽管她是反对党议员。就连政府住房部的大臣亨利·布鲁克也为撒切尔夫人的辩才而震惊。他说：

“我很难用语言来形容这篇漂亮的引起了一场争论的演说。”

阿什福德区议员迪兹不仅赞同这项议案，而且特别欣赏提出这项议案的年轻女议员的“勇气”。他说，只见玛格丽特神采奕奕，很有风度地登上讲台，不用稿子，花了半个小时，侃侃而论，阐明了很难说清而又容易引起议战的议题，在表决时，该议案以压倒多数得到通过。议员们拥向玛格丽特，祝贺她演讲获得巨大成功。就连反对该议案的工党议员，也不得不承认说：“撒切尔夫人的演说确实具有前座议员演说的质量。”

作为后座议员的撒切尔夫人对税收很感兴趣。她担任首相后无数次演说的两个主张和她在这一时期观点完全相同。进入议院 18 个月以后，她对芬奇莱区的保守党人说，她最关心的是公共开支。

“理论上弄清楚公共开支问题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那么容易。我们斤斤计较成百上千英镑的小开支，却对百万英镑的大开支无动于衷。有朝一日，我们必须改变公开的政策。国家应该像一个公司对其股东那样，向国会公布开

支帐目。”

撒切尔夫人在演说宣扬她的以上观点时，淋漓尽致的发挥了她在演讲、辩论中，思维敏捷，能熟练地引经据典，精确地掌握数字的惊人才能。1961年10月，她出任麦克米伦内阁的年金和国民保险部政务次官。她作为高级官员参加的第一次重大辩论使人难以忘怀。由于反对党指责政府没有提高年金。玛格丽特在答辩中列举了一系列数字：公布了1946~1951、1959和1962年这年里年金的数目；有吸烟者和无吸烟者家庭生活费用；年金上的支出总额以及瑞典、丹麦、西德的年金水平。她一口气讲了40分钟，使在座的议员听得目瞪口呆，为她的精湛的演讲技巧所折服。

她的顶头上司约翰·博伊德一卡本特起初有些瞧不起她。他后来回忆说：“我当时认为，麦克米伦任命她为政务次官不是出自诚意。她是一位年轻漂亮的女人。麦克米伦让她在政府里供职显然是为了提高他的政府形象。”然而事实表明，这位不同寻常的女人谙熟税务，对工作热心，而且演说口才高明，完全能胜任政务次官繁杂的工作。当然，女性身份也是一个特别有利的因素。它使撒切尔夫人尽早地开始了前座议员的政治生涯。

1963年，麦克米伦因病辞去了首相职务。1964年大选，此次撒切尔夫人支持了过去曾和他同台演说，后来做了她的敌人的爱德华·希思。

麦克米伦、希思、撒切尔夫人都是牛津大学政治英才。他们之间有许多或远或近的某种联系。在牛津大学他们都受到牛津文化的熏陶。希思赢得了此次大选。

保守党新领袖希思是许多保守党人、尤其是年轻的保守党人希望的灯塔。他们认为英才执政的时代已经到来。希思出身卑微，说话带有浓重的地方口音。在等级森严、门第观念极强的英国社会里，这显然是他的不利因素。希思成为新领袖预示着保守主义新时代的开始，麦克米伦或霍姆代表的保守主义新形象将渐渐消失。希思的成功表明：领导上层社会的人不一定是上层社会出身的人；传统的社会模式已经破裂。社会等级模式的破裂和保守主义的新招牌对撒切尔夫人启迪很大。希思赢得了党和撒切尔夫人的欢心。

希思的背景和撒切尔夫人大致相同。他的成功为她向上层社会迈进扫除了一些障碍。假如托利党没有推举木匠的儿子希思担任领袖，那么十年以后，他们也不会把杂货商的女儿撒切尔夫人推上领袖宝座。撒切尔夫人和希思的成长过程既有共同点又有不同点。一个有趣的事实是，撒切尔夫人终始为她的出身感到自豪；希思终生都在为摆脱他的身世而努力。

希思是工人阶级的儿子。他的父亲威廉·希思满足于自己的生活，从来没有攀登社会等级阶梯的奢望。他曾说：“我们是工人阶级家庭，无法改变自己的境遇。”然而，两位未来首相幼时的家庭信奉着某些相同的价值观：勤俭、整洁、重视教育。但希思是在毫无政治和社交气氛的环境里长大的。据莱恩的描述，他的父亲威廉“似乎相信他本人是个自由党人”，但他在政治上一事无成。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家境贫寒，不得不乞讨土豆度日。撒切尔夫人是在格兰森小资产阶级的生活环境中长大的。她的父亲艾尔弗雷德是高级市政官，和政治家来往频繁，认识威尔士王子的知心朋友布朗洛勋爵。这样的环境在希思早年的生活中是不存在的。对他来说，上学都是非常困难的事。刚入牛津大学伯洛尔学院时，他没有获得奖学金，他的父亲甚至怀疑他该不该上大学。由此看来，登上保守党领袖宝座的希思跨越了极大的社会等级阶梯。这个距离远远超过了他的接替者撒切尔夫人走过的过程。

然而，牛津大学对他们的恩赐是相同的。这两位文法学校的毕业生很早就投身于保守党的事业，在牛津大学的经历更加坚定了他们的政治思想。他们不放弃任何一个实现理想的机会。但他们有一点不同之处。在大学四年里，希思像其他许多学生一样，经常到外国去旅游，而撒切尔夫人的第一次国外之行还是几年以后的蜜月旅行。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希思就在当时动荡不安的欧洲大陆上旅行。1937年他在德国；1936年他去了正处在内战中期的西班牙，旅途中他目睹了许多重大事件，如德国的纽伦堡大会。“我对那次大会记忆犹新”，他对莱恩说，“使我震惊的是弥漫在会上的那种歇斯底里的气氛。”在西班牙，他访问了人民阵线的部队，险些被炸弹炸出旅馆。1939年夏天，他在波兰和德国观光，战争爆发的前两天才回到英国。

在希思成长的年代里，政治受国际局势的支配。他和撒切尔一样，很早就想成为政治家，但他却没有像撒切尔夫人那样尽早地把政治信仰确定下来。1937年，希思被选为牛津大学保守党协会主席。1938年10月，在牛津区的补选中，他为伯尔洛学院院长林赛战胜绥靖派候选人立下了汗马功劳。慕尼黑协定签字6个月后，他被选为牛津大学联合会主席。

希思和撒切尔夫人都是在牛津大学崭露头角的。牛津大学使他们在保守党内赢得了声誉，而且提供了结识政治家的机会。希思领导牛津大学保守党加入反绥靖阵营，反对张伯伦及党的领袖人物。他的大胆举动得到了未来的恩主麦克米伦等人的赞赏。大学毕业前夕，希思已是牛津大学“重要的保守党人了。”

希思成名的过程几乎与十年后玛格丽特成名的过程相同。她领导牛津大学保守党协会投身于战后的政治主流。她和他都遇到了重重困难。她克服了女性性别带来的障碍；他摆脱了怯懦、自卑、经济拮据等问题。两人都获得了成功。

然而，1965年登上领袖主座的男人和1975年登上领袖宝座的女人之间存着有大的差异。他们有着不同的见解，执行着不同的政策，在各自的领袖和首相任期中走着截然不同的道路。政见上的分歧使他们俩人之间常常存在着这样那样的恩怨，并且裂痕之久是英国政治史上少见的。他们是20世纪保守党政坛上一对互不相让的敌人。

1967年，撒切尔夫人进入影子内阁，任动力事务部发言人。由于她的演讲辩论才华出色，得到党内人士的褒扬。这时，希思已经认识到她对自己的威胁。在撒切尔夫人被提升之前，希思问吉姆·普赖尔所说的“秉公办事的女人”是谁，普赖尔推荐撒切尔夫人。希思沉默良久才回答道：“是的。怀特洛认为她是最有能力的女人。但他说一旦她出人头地，我们别想再对付她。”

一年后，尽管人们对撒切尔夫人看法不一，希思还是任命她担任影子内阁教育大臣。这一职务使她有机会接触政府各个部门，并在议会亮相。她同工党政府大臣，尤其是财政大臣拉汉进行过激烈的舌战。但在关于保守党前途的论战中，撒切尔夫人没有做出引人注目的成绩。

这场辩论在1966年后变得更加激烈。1966年3月，威尔逊宣布大选。工党获胜。保守党不得不认真地反思过去，筹划未来。以后，撒切尔夫人没有参加保守党的重大辩论。1965年至1970年保守党人演说记录中几乎没有撒切尔夫人的名字。她和希思至少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实干家。她乐于用具体的办法解决问题，对高深莫测的理论问题避而远之。在担任住房部政

务次官期间，她批驳了工党设立土地委员会的计划。1966年大选后，撒切尔夫人出任影子内阁财政事务部发言人。当时，工党政府财政大臣拉汉提出了一套向雇主征税的办法，撒切尔夫人挺身而出，同卡拉汉进行了激烈的舌战，给议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工党政府提出物价和工资议案时，撒切尔夫人不放过其中的每一项条款，逐一指出它们的弊病。在担任影子内阁燃料和动力事务发言人期间，撒切尔夫人不得不学习天然气和核动力方面的知识。她还参加了亚伯番惨案的辩论。不久，她被调到影子内阁运输事务部工作。她碰得到许多实际问题，掌握了许多有用的数字和资料。这些数字和资料使她的辩论很有说服力。不过，撒切尔夫人和希思一样，对政治斗争本质问题很反感，不愿意发表看法。

唯一例外是，1968年撒发尔夫人在保守大会上做了长篇演讲，题目叫《政治上的弊病》探讨政府的职能。这次大会是保守党一年来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她应邀发言，全面阐述了她的政治思想。

撒切尔夫人认为，总的来说，政治上的弊病在于，批评过多，信仰过少。这篇讲话反映了过去和未来的几位思想家的观点。她对经济增长的优点持怀疑态度，她讲道：

“促使经济增长的主张当时赢得了人们的赞许。在经济增长率的最高限度上两党发生了争执。增长多少呢？4%呢还是再高一点？结果是政治争论的重点从人的方面转到经济方面。”

她还从道德角度肯定了保守党反对工党收人政策的做法。她说：

“从原则上讲，人们对高收入的需求无可非议。但是，只要求增加收入而不愿意奉献就不对了。高工资高收入的先决条件是勤奋工作。所以，收入的多少取决于劳动量的大小，不必用法律限定收入。”

反对共识政治是撒切尔夫人言论的一贯调子。在这篇讲话里，共识政治第一次出现在撒切尔夫人的词汇里。她指出，共识政治对英国的政体具有极大的危害性。它不利于发挥政府和反对党之间的相互作用。

撒切尔夫人反对政府过多的干预，但她的措词比较温和，以免触犯希思等领导人物。她对官僚势力深恶痛绝。她说：

“我们需要的是发挥个人的责任心和决策权，缩小政府的权力，减少人民对政府的依赖性。”

她认为人民不要依赖于国家，应该自由地选择赚钱和花钱的方式。钱在生活中是很重要的，人们应该尽可能多地攒钱。她总结道：

“乐善好施的人也需要钱啊。不然，他就没办法帮助别人。”

此外撒切尔夫人对政府获得信息资料的能力和用计算机储有个人档案材料的做法感到震惊和愤慨。她讲道：

“想想我们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吧。我们出生前政府发出生证；母亲领取生产补贴；我们享受税收津贴甚至生活补贴；政府给我们一个医疗编码；上学后学校保存学业成绩；申请助学金上大学；找一份工作；开始付国民保险金和税收；买电视机，考驾驶执照；贷款买房子；偿还抵押借款；买几张有奖彩券；付人身保险费；买一些股票；结婚；领退休金；死亡。死后政府发给死亡证和安葬费，子女向遗产税务办公室交纳遗产手续。政府各个部门对我们了如指掌。难怪人们感到，生活确实就是‘一张一张地填表’。”

撒切尔夫人为人们私生活受到威胁而深感不安。牛津大学的自由、民主让她深感怀念，那样一种宽松的氛围给她的思想打上深深的印痕，即使当她

步入政界，直至登上首相的宝座，她也禁不住说出这样的话：

“每一个人的一切情况都登记存档。我认为，政府的权力太大了，对人民钳制过死。”

这篇演说暗示出撒切尔夫人的道德观：勤俭、自助、对政治事业忠诚不渝。然而与鲍威尔的深邃圆滑、震撼人心的演说相比，撒切尔夫人的讲话有家庭妇女式的政治议论风格，缺乏果断和自信。这位未来的政治理论家毕竟有些稚嫩。她在以后的政治生涯中，慢慢变得老练和果断，充满自信。

撒切尔夫人在希思政府任教育大臣时，夜以继日的工作，她的文件箱子总是空空的，她从不积压文件。所有的文件都有她用蓝铅笔写的批示。她还是那个讲信用的人。她工作有经验，开会从不迟到。此外，撒切尔夫人能言善辩，总是能够说服财政部，为教育部争取了大批经费。任何一个消费部门的官员都会喜欢这么一位部长。

但她的同僚却带来一个严重的失误，他们取消了对中学生免费供应牛奶的政策。顿时，撒切尔夫人第一次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报界纷纷指责撒切尔夫人给小学生的健康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夺取牛奶的撒切尔夫人”成为庸俗小报和工党政治家的口头禅。更糟的是，在公众的眼里，撒切尔夫人是个严厉、好强、自以为是的人物。无故剥夺孩子们牛奶的举动正好与她的形象重合，所以人们把一切愤怒都发泄在她的身上。此外，她之所以引起轩然大波也与她的性别有关。一个女人从无辜的孩子嘴里夺去牛奶显得特别恶劣。

牛奶事件使政治新手撒切尔夫人学到了一些经验。派尔在回忆录中写道：

“她第一次受到如此大的打击。但在公众场合她从未流露出痛苦。牛奶事件像其它事件一样反而使她更加坚强。她学会了如何保护自己。她知道，她必须这么做。”

在希思政府政策施行中，犯了许多类似错误。后来撒切尔夫人几乎拒绝谈论那个时期内阁里所发生的一切。1974年为竞选保守党领袖，撒切尔夫人发表了一系列演说。这些演说含糊其词，对这段历史未做定论。她只是说：“保守党在执政期间和在野期间犯了一些错误。集体的责任中也有我的一份。”

开诚布公的忏悔绝对不是撒切尔夫人的风格，她从未公开承认过错误，即使在她后半生的主张与前半生相矛盾的时候，她也未做任何解释。

1975年，撒切尔夫人继希思后又一位成为牛津大学培养出来的政治领袖，她当选为保守党领袖。撒切尔夫人平步青云，缺乏经验。较之社会暴发户希思的训练有素，精通政务，用历史术语来说，她的当选是不该发生的错误。她上台后言词激进，但行动却很谨慎。撒切尔夫人不是那种健忘的政治家，保守党也不需要那样的政治家。作为领袖，她重新发现了保守党的基本原则，义正词严地声明要弘扬这些传统原则。

在工会问题、移民问题以及其它社会问题上，撒切尔夫人都是采取左右两派都不得罪的政策。在1978年1月，她未同内阁成员商量，擅自发表演说支持右翼成员，便是她的政治手腕的明证。她的演说充满政治热情，赢得了右翼分子的支持。

撒切尔夫人对演讲稿的要求很高。她像希思一样勤勤恳恳、专心致志，工作卖力，总是揽事太多。总是把别人为她起草的讲稿修改得面目全非，常

常亲自撰写讲稿。

撒切尔夫人尽力给人一种与希思不同的形象。希思从来就不是一个成功的领袖，撒切尔夫人决心做一个成功的保守党领袖。希思瞧不起后府议员，连他们的名字也记不住。撒切尔夫人对他们特别器重，让他们参加各种政策制订工作。她和希思的另一个差别表现在外交风格上。她对外事一窍不通，在此之前从来没有以官方身份出访过外国。出国访问是她非常陌生、渴望学习的一门课程。

撒切尔夫人 1975 年和 1977 年两次访问美国具有重要的意义。1975 年她的演说给美国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她打破了保守党政治家不能在国外披露国家丑闻的惯例，把英国描述为“处在危急时刻的民族，”抨击“追求平均主义”的做法。工党政府外交大臣詹姆斯·卡拉汉指责她外扬家丑，她反唇相讥：“为这样一个政府的脸上贴金不是我份内的工作。”

她的美国之行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这只是她和美国关系的开始，这种关系从来没有间断过。担任首相以后，与美国保持良好的关系一直是她的外交政策之一。她见到了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等人。访问结束后她说：“我觉得他们是把我当作国际人物接待的。有人说我永远也不会得到这种待遇。”

两年以后，她作为国际人物形象渐渐树立起来。1977 年在伦敦的高级会晤上，她第一次见到了美国新总统吉米·卡特。卡特总统的安全顾问认为她“意志坚强，目的明确，对国际事务的专业知识不甚了解，但对世界事务也有一定的看法，极愿意把这些看法表达出来。”

后来，她滔滔不绝的演说风格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在另一次出访美国期间，卡特破例邀请她到白宫会晤。法国反对党领袖密特朗也未曾享受此等殊荣。对此她没有表现出受宠若惊的样子，也没有流露出丝毫的羞怯。她抓住这个机会滔滔不绝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而卡特对高谈阔论极不习惯。卡特的一位助手回忆道，卡特在会见了撒切尔夫人以后说：“我平生第一次让一个人讲了 45 分钟，我自己只讲了 5 分钟。”

撒切尔夫人担任反对党领袖不足一年后，哈罗德·威尔逊突然辞去了首相职务。

在议会里，撒切尔夫人成功地同威尔逊进行了斗争。她能言善辩，常常运用一连串统计数据加强演说的说服力，把工党政府弄得眼花缭乱，狼狈不堪。查阅资料和熟记数字的能力使她成了一名称职的反对党领袖。

工党女政治家巴巴拉·卡斯尔对撒切尔夫人的政绩感到满意。她说：“是保守党内最好的‘男人’，同时她也具有女人特有的巨大优势。我感到振奋，尽管我相信她担任领袖将会给我们党造成很大威胁。”

1979 年大选，撒切尔夫人对此信心十足，但公众舆论认为她不一定能够获胜。在大选宣言中提出了撒切尔夫人主义。政府将削减所得税、减少政府债务，严格控制货币供给量，出售市政房屋，逐步实行住房私有化。在竞选过程中，撒切尔夫人的演说虽然有一种使人紧迫的感觉，但它主要目的是消除人们对她的恐惧。她说：

“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政策和方向，否则，我们伟大的国家很快就会变成悠久历史中的记述，成为人们模糊记忆中一个远离大陆的孤岛，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被人们遗忘。英国就像亚瑟王的宫殿所在地喀麦劳特一样，只是因为有一段辉煌过去才被人们偶然记起。”

像任何一个反对党领袖一样，撒切尔夫人花了大量的篇幅抨击政府的过

去，没有具体描绘保守党的政策将会创造什么样的世界。她谨慎地拣起了工党扔掉的工会这张牌。她说：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这个民族差一点成了工会纠察的一统天下，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工人们是如何乞求工作的权利的。”

在大选活动中，撒切尔夫人最出色的是精力充沛的演说。为了表现自己，她始终马不停蹄，在全国周游演说，进行电视演说、电台讲话。这次她在公众心中的形象比以前好多了。这不得不归功于撒切尔夫人的演讲艺术。

终于，她赢得了此次大选，登上了首相的宝座。这是一个新时代的开端，在这个时代里，一位普普通通的政治家，克服了重重阻力，终于成为国际风云人物，为她的国家作出了不同寻常的贡献，使英国开始了一次大规模的变革。撒切尔夫人这个名字已被视为英国生活的象征。

撒切尔夫人一进入唐宁街 10 号，就发表了充满自信的演说。她慷慨激昂地读道：

“凡是出现分歧的地方，让我们树立起忠实的信念，凡是悲观失望的地方，让我们为和谐融洽而努力；凡是错误的地方，让我们来矫正；凡是产生过怀疑的地方；让我们带来希望。”

这段演说如果作为承诺，它的意思并不明确；如果说它试图再现一种圣徒般的神圣气势，它则有些不合时宜，因为这些词语容易使人想起 19 世纪虔诚的风尚。不过，作为领袖的讲话，它的确带有一种贵族的气势。它似乎表明撒切尔夫人已经认识到自己的地位了。

英国广播公司的记者问她，她是否怀疑自己担任首相的能力，她回答说：“当然我有些疑虑，因为我充分认识到这个职务责任重大，我只希望人民对我和我的能力要实事求是。”

牛津的口才带动了一个撒切尔夫人时代

撒切尔夫人的改革在逐步展开。她在控制公共开支的问题上，发表演说：“我们难以照顾社会的穷苦阶层，除非我们拥有巨大的财富。仅有善良的意愿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充足的资金。”她认为公共开支不能超过公共收入，它必须视财富积累多少而定。为了说服人们，撒切尔夫人反复生动地表述这一问题的看法。1980年8月，她说：

“我们不应该把国家看成慷慨大方、乐善好施的神仙，在你洗礼时为你祝福，在你人生征途的每一个阶段陪伴你，在你的葬礼上为你致哀。”

她的演说似乎说服了人们。

撒切尔夫人执政后的第一个预算方案是在未同所有内阁成员商讨下决定的。她大选前的讲话中就有所表明她的领导方式。

“如果你要做你想做的事（当然我只想政治上有所作为），你必须有一个团结一致的内阁。组阁的办法有两种，一种是由党内持各种不同观点的人组成，这样你可以获得广阔的思想；另一种是由那些愿意朝着你认为正确的方向前进的人组成，这样的内阁稳定，坚强、有毅力，而且方向明确。我们必须朝着明确统一的方向前进。”

撒切尔夫人提出不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内部的争吵上”，但这一承诺与事实相差甚远。她所有的同事都认为，在他们熟悉的领袖中，她是最喜欢争论的人。她对人总怀有敌意，无关重要的日常谈论也会被她变成面红耳赤的舌战。没有在影子内阁中担任过职务、新提拔上来的大臣们从未有过唇枪舌箭的经历，一时难以适应撒切尔夫人的风格。每次争吵撒切尔夫人必须是赢的，这或许是她所说不允许吵的含义吧。

撒切尔夫人任首相以后，在外交上渐渐成熟，许多国际上举足轻重的政治家都对刮目相看。在撒切尔夫人在任保守党领袖时，就通过大量阅读和实地考察作准备。为了抨击苏联的霸权主义，她强迫自己多方面了解苏联，请了好几位苏联问题专家给她作辅导。在1976年1月，她发表了一篇言辞激烈的演说抨击苏联：

“因为它是先生产枪炮再发展黄油，而我们是什么都发展了才发展军事。苏联人清楚知道他们是超级大国——仅就军事而言。他们的经济濒临崩溃，人权毫无保障。如果英国不理解这点，用苏联人的话说，‘我们将注定被抛弃在历史的垃圾堆里。’”

这段演说令苏联人极为恼火。苏联的官方通讯社——塔斯社立即予以回击，戏称她是一个“铁女人”。这个称号同时标志着撒切夫人脱颖而出，步入了国际政治家之列。

在日本东京，她的到达震动了整个日本，因为她是与国际政治家站在一起的唯一女性。她的财政大臣回忆说：

“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我们是和德斯坦、施密特、卡特等名人站在一起。无数的日本人，包括许多妇女，被撒切尔夫人所倾倒。他们目光中流露出的好奇和钦佩之情难以用语言描述。撒切尔夫人是最后一个发言，也是唯一一位不用发言稿的人。她的发言多次被听众热烈的掌声打断。这可以说是日本人对她的热情问候吧！”

但是，在国际外交上，撒切尔夫人并非一直都熟练启如。在非洲问题的辩论会上，她讲话含混不清。在读讲稿时脸上毫无表情，“那种语气肯定不

会引起人们的兴趣。”她读讲稿时不断绘声绘色地插入自己的话，致使讲稿与她的话自相矛盾，弄得外交部发言人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无法自圆其说，极为狼狈。

在欧共体中，撒切尔夫人的外交口才得到了一次显露。她咄咄逼人的外交作风，不仅使其他首相感到震惊，而且也使她所谓的外交顾问们感到诧异。她强烈要求削减英国支付给欧共体的巨额费用。她此心已决，寸步不让，不仅充满了必胜的信心，而且以饱满的热情与其它首脑展开辩论，不屑于在微妙的外交技巧上劳心费神。她锋芒毕露的言辞和毫不妥协的态度几乎葬送了这次最高级会谈。共同体官员图根哈特说，他目睹了撒切尔夫人首相将共同体的预算称作偷窃英国国库的凶恶强盗时的情形：西德总理施密特听了她的话差点昏了过去，法国代表团的汽车已经发动起来，准备退场。”法国总理德斯坦被评论为：“与其说德斯坦是一国之君，不如说他是一个俨然不可冒犯的天神。”德斯坦以轻蔑的口吻说：“一个杂货商之女成了一国之主，岂不是咄咄怪事！”

在演讲艺术上，撒切尔夫人能够通过发挥天资牢牢地控制住后座议员。这是一方面因为她具有一种独特的争辩能力。众所周知，她不是卓越的讲演家，没有出口成章的天资。她出任首相 10 年以来没有说过一句值得收进著名演说集里的话，也没有做过一次令人难忘的演说。然而，她讲起话来总是胸有成竹，对各种细节了如指掌。她并不是因为拥有出众的口才，而是因为她讲话时那种咄咄逼人的气势才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她争强好胜，不屈不挠，宁可开枪把对手打死，也不愿意把他当作人质留下活口。

撒切尔夫人虽然身处逆境，但她的斗志仍然很旺盛，所取得的任何一次小小胜利都是很大的安慰。1981 年 12 月 10 日，工党领袖迈克尔觉得他想到了一个足以难倒她的有关削减社会福利的问题。

他问撒切尔夫人：“一个结了婚、有两个孩子、如今失了业的男人，假定他原来拿的是平均工资，今天是否比政府削减社会福利费用之前每周少收入 13 英镑？”

首相立即不假思索地反问道：“请问那位给我提供这个数字的可敬的先生，您是怎样计算与收入相关的救济金的？”

迈克尔没有料到她会反问他，一时张口结舌。实行这一政策的正是撒切尔夫人，她理应回答这个问题。她难道不知道，失业救济金在最近 15 年来，大大贬值了吗？

“我知道那位尊敬的先生对他所说的数字并没有什么把握！”她冷嘲热讽地说。领取与收入相关的救济金的人仅占失业者的一小部分，因此，并不能说所有失业者每星期都少领了 13 英镑。

在公开场合，撒切尔夫人总是这样语不饶人，咄咄逼人，然而在私下，她也极其重视修补篱笆。她不仅利用一切机会与前来同她讨论问题的议员促膝谈心，而且极其重视协调党内各派的关系。她手下有一批“训练有素的修理工”，给她在“修缮”关系方面帮了不少忙。

在英国与阿根廷间的福岛战争时，撒切尔夫人表现了政治家的干练与果断。美国总统里根对撒切尔夫人在战争期间的言行做了如下评价。他说：

“她在战争中的言行是无可挑剔的。她当时的处境非常困难，但是她应付得非常自如，这是因为，她能迅速做出决策并能迅速付诸行动。”

撒切尔夫人在战后的演说中将自己在国际舞台上的自信扩大到英国再

次兴起的自信上。她说：

“我们在南大西洋表现的精神才是真正的英国精神。如果我们能够进一步弘扬这种精神，那将是一件十分有益的事件。”

在伦敦 11 月份举行的庆祝宴会上，她说：

“悲观论调充斥着整个 70 年代。当时，几乎所有人都觉得国家日渐衰弱，人民没有精神寄托。现在，阴霾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怀疑我们能处理好自己问题的人越来越多。今年春天，特种部队的行动就是最好的证明。”

她在柏林的一次集会上利用福岛战争的胜利，充分表达了她更远大的理想。她说：

“你们应该知道，英国特别尊重它承担的义务。福岛战争就证明了这种决心。我今天就是以这样一个国家首相的身份做演说。”

撒切尔夫人和里根的关系一直很密切。里根认为，玛格丽特是他“最喜欢的人之一”，他非常乐意与她交谈。美国官方无论她来得多么勤，美国每次都要向致以异常热情的欢迎词，称她是一位坚强的小妇人，是继温斯顿·丘吉尔之后不同于任何人的一位女性。

大选过后几周，她以第二任首相身份，去美国接受温斯顿·丘吉尔基金会奖。奖状上写道：“撒切尔夫人像温斯顿·丘吉尔一样，以勇气、坚定的信念、决心和意志力著称。她像丘吉尔一样，是力挽狂澜的巨人。”

1985 年 2 月，她又一次访问美国。她在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了讲话。她是自丘吉尔后第一位享受这种殊荣的英国首相。她在讲话中像老熟人那样直呼丘吉尔的名字——“温斯顿”，并大量引用他的话。她的讲话被掌声打断了 24 次。此次讲话，她对国会说英国支持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

牛津大学在她执政近 6 年后授予撒切尔夫人牛津大学名誉博士学位。在她的前任中，艾德礼、麦克米伦、希思和威尔逊也曾在执政后得到了牛津大学名誉博士学位，而道格拉斯·霍姆和艾登则在出任首相之前就获得了这项荣誉。撒切尔夫人同她的那些前任一样，毕业于牛津大学。

撒切尔夫人作为政治领袖，通过演说艺术将她的“雄狮·斗士”的形象树立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同时在国内，她通过演说技术兜售自己的观点与计划。撒切尔夫人十分注重说服技巧，并具有自己的特殊风格。

在 1986 年，由于执政上的粗心大意，就给她带来了出任首相以后最严重的一次个人危机。她犯了一系列错误之后，不得不采用大量的权宜之计，以挽回这些错误带来的不良影响。作为功说者，她的“表演”才能在很大程度上是后天学习到的。她的演说才能生来就不高，并且一直没有什么进步。她控制下院靠的不是令人难以抗拒的雄辩能力，或者显著的演讲技巧。没有人会指望她讲起话来口若悬河，更没有人指望她的演说幽默风趣，可以使人消除敌意和怒气。她在连续三届议会选举中获得绝大多数的支持，靠的是议员们的忠诚，而不是自己卓越的才能。在 60 年代中期以后的 25 年里，从爱德华·希思到撒切尔夫人首相，所有保守党领袖在讲话时，只能赢得他们的信徒的掌声。撒切尔夫人无论是在下院还是其它场合讲话时，都不能令听众信服。事实上，出于安全和新闻管理上的考虑，她从来不在中立，更不用说在敌对的听众面前，试图用自己言词的力量打动他们，使其接受并支持她的观点。

她通过刻苦的学习获得了许多能力，这些能力多少弥补了缺少讲演才能的缺陷。撒切尔夫人从来没有学会天才议员那种令人无法抗拒的雄辩力。她

只是由于事先做了准备，因而在议会发表讲话常常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她的高龄并没有使她对细节的注意减退。她在执政第十年为两周一次的议会“提问时间”所做的“彩排”，同她执政第一年时做的准备一样认真、充分。她每次发表重大的讲话之前都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为了有些细节，她甚至要工作至深夜。只有在极不正式的场合，她才允许自己做即席讲话。她讲话时，总是把事实和数字按最有说服力的顺序排列，她有时还让别人为她设计一个新鲜生动的形象——虽然后者很少被用在下院的讲话中。撒切尔夫人是英国执政最长的首相，也是对英语语言贡献最少的首相。没有哪位首相在议会辩论中能像她一样赢得辩论。

电视是宣传政治主张最重要的工具。在电视上讲演时，人为的痕迹更加明显。同对待自己的议会形象一样，撒切尔夫人对自己在电视上的形象也十分注意。一开始，她就自愿接受形象师戈登·里斯和电视形象大师蒂姆·贝尔两人的指导。他们一直陪伴在她的左右。除此之外，也极大地改变了她的说话方式。一位政治演讲术权威马克斯·阿特金斯，甚至成功地用仪器测出了撒切尔夫人在嗓音上的变化。阿特金斯在这个很少有人问津的政治科学的偏支上，做了一番探索。《大师们的声音》就是他这次探索的结果。他说，她请国家大剧院的指导给她上发音课，并且进行哼唱训练，以降低她天然嗓音的频率。训练的目的在于将她的嗓音变深沉，语速减慢，使她说话的语气更具有国务活动家语气特点。阿特金斯听了许多她的演讲录音后说，这个实验是成功的。他非常严肃地写道：“当这些录音通过一台频率强度分析仪时，我们可以看到，她成功地将声音频率降低了46赫兹。这个数字仅仅是男女音频率之差平均值的一半。”此外，她是在年事已高、音频开始呈上升趋势时做到这一点的。不过辛勤的努力没有使她的嗓音变得悦耳动听。阿特金斯还说，撒切尔夫人也许为未来的女政治家创建了“形象上的先例”。

撒切尔夫人刻苦学习，终于具备了很好演讲才能。她知道自己的缺陷，并想弥补它。她通过自己力所能及的方法做到了这一点。她还希望能做得更好。她最羡慕里根的表达能力，因为他总是将自己的观点和意见准确无误地传达给对方。为了超过他，她愿意采纳新闻官员提出的任何建议。撒切尔夫人使用所谓的“忠实机器”，即将一篇文章反射到讲话人前方一块听众看不见的屏幕上。这是美国发明的一种电子“玩意”，使用它之后，讲话者看上去像是即席对电视观众讲演。1983年大选之后，撒切尔夫人做重大的电视讲话时，都经常使用这种“机器”。

撒切尔夫人所做的这些自我改变，是为了使自己成为优秀的政治领袖。进行自我改变并不是撒切尔夫人所独创的。同她的前任们一样，她也是最大限度地利用自己有限的才能，不断增加自己的魅力。但在政治领导艺术的另一方面，即执政方面，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她本该向雄辩的德摩斯梯尼学习，然而她却成为了马基雅维里的传人。她对马基雅维里推崇备至。她带着自己的习惯和偏见使她不同于她的前任们。她这样做极其危险，几乎葬送了她的政治前途。

撒切尔夫人风格最早的表现之一就是每当主持会议时，她总是率先发表自己的意见。她对威尔逊·卡拉汉及希思的做法不屑一顾。他们喜欢听听每个人的意见，然后才做总结。

许多大臣都在撒切尔夫人典型的辩论技巧面前吃过苦头。一位高级官员吃了许多这样的苦头后告诉记者，首相对理性的争论并不真正感兴趣。虽然

她渴望与人争论，但“与她争论令人极不愉快”。他接着说，撒切尔夫人从没有改变过她的方式，她不是在争论，而是在陈述自己的意见。她并不是从不改变主意，相反，她有时会突然改弦更张。但这种改变一般不是在深思熟虑之后做出的，因而毫无例外地总使人不快。他举了与她有关的两个决定为例：一个是关于1997年将香港归还中国的问题，另一个是英国对星球大战计划的反应。在香港问题上，经过“很长很艰苦的争论，她才放弃了自己的主张”。在星球大战计划问题上，她同外交大臣豪举行了许多会谈，顽固地坚持自己的立场，决心帮助里根实现他的梦想。

撒切尔夫人的这种执政技巧有时也有些徒劳无益。她只是借争论之机发泄怒气或释放一些过剩的能量。大臣们发现，与她争论是“令人无法忍受”地浪费时间。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在争论中失败了，而是不论胜败如何，她总是要与人争论，这些争论常常离题万里。一位大臣在一次这样的争论发生一小时后对记者说：“这种争论令人精疲力尽。这对政府是没有好处的。它们纯粹是浪费精力，它们几乎从来不能澄清什么。这主要是因为，撒切尔夫人习惯于突然扯到题外去，用半个小时的时间去讨论一个不重要的问题的细节。”

或许这正是女政治家的风格，是撒切尔夫人个人任性的表现。她的演说与辩论正是基于这样的个性特征表示出了与以往政治家不同的演说风格，并吸引着那些政治演讲爱好者，也为后来的女政治家们提供了极好的范例。事实说明，牛津塑造了撒切尔夫人，撒切尔夫人影响着她身后的一大批女政治家。

第五章 麦克米伦，明确的措辞，透彻的思想

牛津大学的博德利方院北门是谢尔登剧院，对于麦克米伦来说并不陌生。这里他参加了无数次各类政治活动的演说，用拉丁文演讲，辩论国际政治，用幽默的语言作致辞……，每次掌声雷动，每次人群欢呼，都令麦克米伦激动不已。他喜欢这一切，演说与辩论是生命的一部分，与他血肉相联，密不可分。

麦克米伦在牛津大学踏上了政治道路，并从这里学到了作为政治演说家的基本素质。在牛津大学联合会里，他贪婪地吮吸着前辈们的演说辩论知识。用孩童般的眼对陌生的却又给他极大乐趣的东西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保守党政治要人们每次来这里作演说与辩论，麦克米伦都如享受一顿丰盛的晚宴般感到滋味十足。

麦克米伦将目光投向丘吉尔、劳合·乔治、威尔逊，从这些大演说家身上体会演说艺术的高深之处。

正是这样的努力，一个敏感而害羞的小伙子成为了才思敏捷的政治演说家。这样的评价对他或许并不过分，一位政敌不无嫉妒地说：“他是个绝对的大演说家——风趣横生，措辞明确，思想透彻。近代没有这样的演说家了，也许丘吉尔还差不多。……”

麦克米伦在英国政治舞台上以表达政治见解准确，辩论说服力强闻名。如果说丘吉尔的演说有纵横家的气质，撒切尔夫人的演说有口若悬河的风格，那么麦克米伦就是以自己的强烈思辩色彩的演说，在逻辑分析的透晰上让世人惊叹。

“你不善辞令，但你是个好小伙子。”

麦克米伦的辩论才能是他在少年和牛津大学时期就刻苦地练习的，在政治生涯中磨而得越来越锋利。

麦克米伦家是地道的伦敦住户。麦克米伦在 1894 年 2 月 10 日，出生于伦敦卡的根街 52 号，就是他父母在伦敦住家将近 50 年的那幢房子。麦克米伦家的家庭生活比他们亲戚和邻居的家庭生活多少要严峻一些。麦克米伦是在重视艰苦工作和专心致志的传统中教养起来的。麦克米伦从小就佩服他的大哥丹尼尔，在他的回忆录这样写道：

“由于我的大哥丹尼尔是一个有才华的学生，我跟他比起来，真是相形见绌。他是伊顿公学的头等生，而我仅仅是三等生。在巴利奥尔，他是他那个年级高级古典文学奖金的获得者；而我仅仅获得一般的奖学金。他获得牛津大学古典文学学士学位初试的第一名，水平很高，我好不容易才勉强得到牛津大学的优等成绩。另外，后来我侥幸长得比他高了，我就不再接受他穿完的衣服了。”

麦克米伦的争强好胜的进取心正是在这种家庭环境中培养起来。

麦克米伦的父亲是富有的产业者。他对女子的教育十分重视。在每星期日的晚上，他给孩子们朗读文章，麦克米伦广泛的阅读兴趣在少年时代就得到了发展，为他日后在牛津大学的突出的表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麦克米伦在回忆录中回忆到：

“每星期日的晚上，我父亲给我们朗读，这是我们简单生活中安闲的乐趣之一。他朗读大部分是诗——莎士比亚、密尔顿、济慈以及大量的丁尼生的作品。”

“我们个人阅读的内容很杂。父母从来制止也不鼓励我们读哪一个特定的书。我们手头总有大量的书籍，但还塞给我们大量的材料。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喜欢司各特和狄更斯的作品；当然我们同样欣赏亨蒂、赖德·哈格德以及科南·多伊尔。那时，每一篇舍洛克·福尔摩斯的侦探故事都使我感到新鲜、兴奋。”

在这样一个典型的维多利亚式或爱德华式的家庭，那种舒适而朴素的生活条件，麦克米伦在多年以后还留恋不已。

在麦克米伦的小时候，他十分害羞和敏感。在他的眼里，世界非常令人可怕，各种年龄的人们似乎都让他感到讨厌，而不是使人喜欢。后来，他发觉这样的心理阻碍着自己的发展，经过长期刻意的自我训练，才在某种程度上克服了这种拘束。在每逢发表一次重要的演讲，每一次议会质询之前，麦克米伦都鼓足勇气去克服这种天生焦虑的痛苦。麦克米伦回忆说：

“每逢发表一次重要的演讲，我在头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感到强烈厌恶。下院或者讲台对我说来同样地使人讨厌；甚至在我担任了 7 年首相快要辞职的时候，我对于议会质询也有痛苦之感，就像人们在参加竞赛或战斗之前的感觉一样。每逢星期二和星期四的质询日，我都单独用午餐，我总是把这做为一个规则。我即使不能在服这种神经质，也能把它隐蔽起来，其原因也许是由于我童年时听说过，这种焦虑是天生的，不可避免的，必须设法忍受。”

麦克米伦在 12 岁就离开家去伊顿公学学习。学校的一幢幢大楼和回廊以及该校创始人亨利六世的美好回忆，它的全部值得骄傲的传统，这些都是

得天独厚无与伦比的。学校的生活朴素和思想高尚，在这两种风尚的熏陶下麦克米伦度过了少年时代。

在伊顿公学时期，麦克米伦和许多朋友保持了良好的友谊，而在上大学的几年中又使之加强了。在这些好友中，最亲密的是朱利安·兰巴特（后来他是伊顿公学的低年级学监和副校长），哈里·威林克（后来他是卫生大臣、剑桥大学马格德林学院院长和副校长），以及哈里·克鲁克香克，他大战前后曾多次担任内阁大臣的职务。像在牛津大学一样，麦克米伦和他的同学保持了一种特殊关系。在这种关系网里，他们或是敌人或是朋友，但是在政治道路上，这样的敌人和朋友都对自己有很重要的帮助。撒切尔夫人与希思的关系就是最好的说明。

在麦克米伦去牛津之前，他的两个哥哥已经开始工作了，他们分别经商与做了律师。在家里麦克米伦最小，他与兄弟之间的分歧很少。那时他们大部分时间住在苏塞克斯的乡间家中。尽管他们不断争论，因而吵起来，但是却是非常团结的。麦克米伦的父亲很欣赏孩子们之间的辩论，但他本人很少参与。麦克米伦兄弟们可以讨论任何题目——宗教、历史、文学、经济。父亲只是不赞成有关食物和金钱的讨论，他认为这是庸俗的，不值得认真考虑。这种辩论引起了麦克米伦探讨各种问题的兴趣。

麦克米伦在牛津大学的生活对他来说是甜蜜的。麦克米伦作为从家规严格、母爱几乎把人束缚住的家庭出来的青年，一下子进入自由的大学生活中，自己觉得突然长成大人了。麦克米伦热情地和朋友们交往。在学期间，他从事各种活动，参加每个可以参加的讨论。麦克米伦当时在政治上是混乱的，既是自由党激烈进派，又是保守党民生派和费边社会主义者。在大学生俱乐部里，他一般是支持当时的自由党政府的，特别支持它比较激进的作法。麦克米伦很佩服迪斯雷利，他津津有味地阅读迪斯雷利的每一本书，把他作为自己心中的英雄。

麦克米伦参加了牛津大学联合会的活动。这个联合会是孕育政治家的摇篮，它培养出了好几位保守党领袖，这些政治家从这里开始走向政府内阁。麦克米伦在这里与保守党的重要人物接触，学会了各种政治技巧和演说才能。每次保守党内的辩论都令麦克米伦激动，他练就了能言善辩的本领。这为以后麦克米伦在政治道路上的节节胜利奠定了初步基础。

在牛津的生活中，麦克米伦积极参加了各种旅游和活动。以至1914年，他勉强在牛津大学文学学士学位的第一次考试中得了个优等，其实他完全有能力花上大精力取得奖学金。在学期中，他参加非常愉快的社交活动；和几位牛津朋友结伴到意大利去游览，在厄克哈特先生的萨沃伊德避暑处的小屋中举办朗诵会。而在假期时，麦克米伦就刻苦读书。这种学习方法在他以后回顾起来，自己都感激不尽。

1914年的夏季学期是麦克米伦最难忘的，那时距文学学位考试还有两年多，因此，这一学期他几乎完全可以纵情享乐。那年夏天，麦克米伦与朋友在河上撑船、洗澡，院内闲坐，与朋友一起吃饭和争论，在学生俱乐部里进行辩论，在纪念舞会上跳舞。学期结束时，麦克米伦还和朋友计划在国外或国内举行朗读会。

麦克米伦从牛津大学毕业后，入伍参加了驻绍森德团，在第十九营服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受伤回到伦敦。当麦克米伦再次回营时，被任命为驻加拿大总督副官。

1924年，麦克米伦参加议会选举，成为议会中保守党的议员。在这一年中，麦克米伦的政治兴趣迅速增长着。他与一位内阁大臣密切联系，并且发展了他的内弟哈廷顿勋爵之间的友谊，在1920年，勋爵曾是一位落选的候选人。麦克米伦同时联系了他学生时代和当兵时期的朋友，这些人都正在以不同的方式开始政治生涯。所有以上这一切都激发了麦克米伦。

麦克米伦成为了提兹河畔的斯托克顿选区的候选人。这次选举是他的政治生涯的开始。对麦克米伦来说，在政党高度组织起来的现代制度下，一个候选人先前没有履历，是不能当选的。想赢得胜利，这个候选人必须有过游说经历，或者属于青年保守党运动的成员（如果他是一个保守党人的话），参加过政治学校和地区集会。或者曾在地方政府担任过什么职务。通常是在一定时期的服务和准备之后，才被挑选作为候选人。由于战争以及麦克米伦战后的生活环境，他毫不具备这样的背景。对什么是一个党派社团，他一点概念也没有。

麦克米伦从未搞过游说的活动，对于政治演讲毫无经验。他是从同时代的人那里，或从他父亲那些爱推究哲理的政治家朋友们的口中学得政治的。在牛津大学获得的某些政治知识对麦克米伦算得上一根救命稻草。但是，麦克米伦在牛津的时间不长，他的雄心壮志也难超出牛津大学学生俱乐部的范围以外。麦克米伦通过他的岳父紧密地接触了许多实际政治问题。但所有那些都是高级资料——会议室里的政治，他从来没有参加过集市和街道的乱哄哄的集会上的演说活动。

麦克米伦突然地进入竞赛，使他振奋和困惑是因为他对自己要进入的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实践知识。

麦克米伦的朋友这样评价他：

“你不善辞令；但你是个好小伙子。”

在表决候选人的会议上，除了别的事情以外，麦克米伦作为一位实业家和出版者而受到推荐。麦克米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就接受了家族公司——一家出版公司。一个青年在大厅后站了起来，他显然已受过中等教育。他说：

“你叫麦克米伦。你们出版的《霍茶二氏代数》吗？”

麦克米伦回答道：

“是的，我们出版。”

他说：

“既然是那样，我就不投你的票！”

麦克米伦回答道：

“你一定是买到了那个不好的版本。你应该买有答案的，不要买不带答案的！”

麦克米伦的回答，体现出了他的辩论技巧已有了自己的风格，思维敏捷，词锋锐利。

麦克米伦的朋友第二次批评他时说，麦克米伦的演说逐渐地有了改进，对于他，充满希望。

也许是出于恶意，或是因为愚蠢，会议给麦克米伦的感觉像是安排在幼儿园。麦克米伦在回忆录中描述道：

“我依然可以看见大量听众拥挤抢坐那些小长凳子。我立即明白了主持人的重要性和危险性。想保持事情相当安静的任何希望都可能由于他的开场

白而很容易地破灭。如果他是一位地方上的雇主，用‘你们雇员们’这样的话开头，那就糟了。起初我的那些演说都加以润色，用于牛津大学俱乐部，比用于蒂勒里或波尔特霉克或帕拉迪伊兹·罗（这些都是久已清除了的贫民窟）等处更为适宜。人们偶尔以一种敬畏的态度来倾听这些讲话，这种敬畏常常是向一个传教士或一个训诫者表示的。那些演讲被高声喊叫所压倒那更是经常的事。不久我明白了，人们来的目的（如果有什么目的的话）是为了提问题的。甚至在我第一次竞选结束时，我找到了一个窍门，就是在乱哄哄的地方不要发表演说，而是把整个时间用于回答问题就行了。在那种情况下，人们发表演说似乎不能或只是偶然地涉及到听众感兴趣的论题。在无线电和电视机使用很久之前的那些日子里，开会是十分重要的，甚至是有决定意义的。”

麦克米伦尽心费力地草拟了一份优美的演说词，人们告诉他说，每个选民都将认真阅读这篇演说词。结果，或是出于政治偏见，或是由于厌恶，演说稿的绝大部分都被邮递员从联结斯托克顿和索思纳比的大桥上扔到提兹城去了。后来，麦克米伦听说这种举动并不是偏心的，所有候选人都吃过同样的苦头。

这次大选麦克米伦落选了。但在某种意义上，他胜利了。他学到许多东西。

口才是战斗的一大武器

在麦克米伦第二次竞选中，即四年以后的大选，麦克米伦重新读自己的演说稿，他的关税问题的主张得到了维护。他说要“维护，防卫，保护”，并且要利用新的税则做为“一个谈判的武器”。

竞选活动确实是活跃的。许多集会吵吵闹闹，可是实际上解散的却为数很少。一天一天过去了，越来越明显的竞争将在保守党和自由党候选人之间进行。许多温和的自由党选举人和那些在前次选举中认为自由党最有可能去击败社会党人而支持了自由党的保守党人，都明显地倒向了麦克米伦这一边。麦克米伦又一次去拜访某些自由党的显要人物，若得到了他们的支持，便能控制他们圈子里的为数可观的追随者。但和以前一样，主要的工作还是逐街逐户，踏踏实实的奔走游说。麦克米伦开始懂得个人接触像公众集会一样重要，并且更有可能赢得选票。他不断给自己打气。他想起了自己在牛津大学联合会的“风云岁月”：他知道竞选实际上就是让别人承认自己、接受自己。怎样让别人——现在不再是学校里那一帮人，而是带有无比挑剔的目光的政治家和选民承认自己呢？麦克米伦利用了自己的家庭去游说。

麦克米伦的妻子已成了这种艺术的一个熟练的表演者。她从小就在政治交际的氛围中长大，她的父亲是保守党的重要人物。那时，麦克米伦已有了两个孩子，他最后的手段——一幅最动人的家庭图画——通过有点令人作呕的标题例如“投爹爹的票！”来传布。

这种传统的，在那时有有效的办法令现在的我们难以置信。

这是一场十分令人振奋的竞选活动，麦克米伦在古老的巴勒大厅外面临时搭起的平台上面时，那场面真是十分动人。人群里发出千万个喉咙中欢呼胜利的吼声。人们支持麦克米伦。大选获胜了。

麦克米伦顺利地当上了后座议员。在这里通过“质询时间”，他学习到了许多政治知识。麦克米伦认真地参加各种辩论，熟识了双方大部分人士的姓名和外貌。他努力地研究议会辩论的技术，不过这些技巧真正只有在议会本身辩论发言中才学到的。在麦克米伦的一些较老的朋友的劝告下，他在下院当了大约5个月的议员，他还没有想要发表初次演说。

在处理根据实际上是迷惑人的失业保险的数学概念而进行的法律上的和学究式的辩论耗费了麦克米伦大量在议会的时间。以后，麦克米伦对处理这类问题有了娴熟的经验。

麦克米伦还从首相劳合·乔治那里学到了议会辩论的技巧。他与劳合·乔治有相当密切的联系，但在议会里，麦克米伦只是从远处留心观察他。麦克米伦回忆说：

“这届议会没有人相信他（劳合·乔治）将永不会重新上台。他仍然是伟大的战争英雄。当他起立发言时，议会里挤满了人，议员们匆忙地从吸烟、饮茶室、餐厅、会议室、图书馆跑进来。对于我们青年议员来说，从来没有或者很少听过他讲话，这是一次激动人心的体验。既然他不再是一个前府议员，所以他何时发言便不能事先得知了。因此，在他发表宏论之前，议会总是坐得满满的。经过一两次这样的场合之后，我注意到他采取的方法是经过巧妙选择的，以应付形势。他开始时总是态度平静，声音很低，轻描淡写地提一下前面的发言者，并奉送他们一两句赞美或批评之词。他宁愿激励议员们高喊：‘大声点！’然后，当听众聚精会神地时候，他便开始口若悬河，

雄辩滔滔，细致刻划，精修言词。即使他未能使下院（他和他的党在其中形成了如此之小的少数）心悦诚服，而却能够使我们所有的人都为之着迷。他现在又出现在我的面前：奇妙的脑袋，浓密的白发（在战时几年中，从漆黑变成雪白）；他的相貌颇富表现力，瞬息间从愤怒转变为迷人的微笑，不只嘴在笑，脸颊和眼睛也在笑；尤其是他的双优美的手，真是一双演员或艺人的手，稍微那么一比划，他想描绘的那幅画面便呈现你的面前了。”

“劳台·乔治具有一种伟大人物往往都不具备的品质。他善于听取别人发言。他喜欢诱导别人讲话，尤其喜欢逗引青年人讲话。那天夜晚他使我们那一小组人都感到，他以为我们有重要的东西抛出而使他热心听取。某些伟大人物就像山毛榉树一样，在它下面什么也不生长。劳台·乔治却像一株橡树，在它下面野花和丛林草木自由繁长。这是我同他在这届议会中唯一的一次接触，但我从未忘记他那相貌言谈的魅力。”

麦克米伦从这位首相身上学习到了许多言谈的迷人之处。

麦克米伦还注意过麦克唐纳在广播中的演说艺术，并与鲍德温的演说艺术作比较。麦克唐纳的雄辩艺术风格——为大量的活跃的听众所欣赏——对人数很少的家庭听众小组来说，是没有效果的。鲍德温采用了一种方法——后来罗斯福总统所完善——所谓“炉边谈话”。他讲话简单、明确、适度，好像广播演说，——的确和电视广播一样——听众限于自己家庭中的两三个人，他们要谈话，不要演说。

麦克米伦熟悉地掌握了这两种方式，并且在不同场合全都自如运用。

丘吉尔对麦克米伦的演说影响也很大。在议会进行中，麦克米伦与其它议员都被丘吉尔的演说吸引。丘吉尔运用的那种智慧、幽默，独创性以及雄才能让麦克米伦深深钦佩。预算演说是一项艺术性工作，得说服议会通过预算而又无可指责。麦克米伦称赞道：

“我们当中从来没有人听到过任何类似的演说——语言那样精炼，论点那样缜密，掩盖弱点那样巧妙。假如像有时发生的那样，出现了裂缝，在财政法案的后一阶段需要一次退却，例如1928年煤油税的情况，那么，策略上的退却便在猛烈反攻的掩护下漂亮地进行。”

麦克米伦与丘吉尔保持了密切联系，无论他是执政还是在野，麦克米伦都为他效劳。在麦克米伦眼里丘吉尔是：盖世无双，刚愎倔强，令人振奋，有自己独特的魅力，给十分简单的政治生活带来了一种色彩感。

麦克米伦对丘吉尔的演说作过这样的评论：

“在大约一刻钟时间里，他有如瀑布倾泻一般不停地发出抨击与呼吁，而我很遗憾，在听得见的地方没有速记者，因为一些出口成章的警句是非常宝贵的。”

麦克米伦认真地学习丘吉尔的演说风格。“丘吉尔那滔滔不绝的说话所产生的影响是无法描述的。他那激动人心的思想总是用同样有力的措辞表达出来。就是在这些年里，我初次品尝了后来我有幸尽情享受多年的宴席。”

1925年4月30日，丘吉尔的预算演说在保守党内引起了极大的热情。在预算会议的辩论中，麦克米伦利用这个机会发表了第一次演说。除了在战时“爬出战壕”之外，几乎没有什么经历像这次那样使麦克米伦感到可怕了。麦克米伦在回忆录中记下这段感受：“等待的时间很长，精神非常紧张。接着是那个不可改变的‘进入战斗’。尽管督导们和议长好心相待，常为一个年轻议员安排好，通知在什么时候可能叫到他，然而当这个时刻真正到来时，

仍旧有一种茫然慌乱的感觉。你同十几个别的议员站在一起，议长喊出一个名字来，你几乎分不情是否是你的名字。你犹豫不决，不知如何是好。但是当其他人一个个都坐下来了，便可断定你现在必须上场了。你也许把演讲稿已经写了出来，在那种情况下，你若呆板地照读稿子，这样你就违反了严格的议会传统；你也可能试图记熟讲稿，但一上场，你可能把它全部忘了。最可靠的办法是记提纲，记某些要点，还要记下几句你认为是最动人的语句。议会的桌椅排列很不好，当你站起来发言时，前面的凳子好像正卡住你的膝盖，这样给你一个感觉，好像要朝前倒在地上。可是，你必须摆脱这些困难，才可以开场。大概再没有比照本宣科读旧稿，特别是自己的稿子，更为枯燥无味的了。那些演讲稿经常是晦涩难懂的，或者那些看来颇为引人注目的论点都随同过去的论战的陈词滥调而消失了，而那些逗趣的话也似乎同上一代的已被忘却了的杂耍剧场的贫嘴一样而平淡无味。但是，一个初次上台的发言者无论如何会引起会场的某种兴趣的，人们都愿静听，不予打断，并大加赞扬，除非发言者公然不遵守议会的传统习惯。”

麦克米伦在重念他的讲稿时，他发现，他比通常预期或准许的更爱争论了。麦克米伦希望回答反对党对主要预算建议进行了相当猛烈的攻击，并且要向政府显示一下这一预算建议是多么受到欢迎，特别是受到党的较年轻的议员的欢迎。

麦克米伦的首次演说，受到了欢迎：

“我们听过一篇前任财政大臣的讲演，里面充满了他惯常的手法，并且使用了大量的发言中惯常使用的尖刻语言。我并不因此而非难他，因为我认为，这一预算的提出，他是感到事情颇为棘手的，这很自然。当财政大臣在阐明他的建议时，最令人感兴趣的是某些可尊敬的反对党议员们脸上的那种表情。最初，他们自然不得不洗耳恭听财政大臣将要说些什么，但是他们立刻对他的建议的大胆及其份量感到吃惊，而最后，我认为，当他们想到这些建议一旦在全国被接受时，他们是会感到惊恐和失望的。也许，从他们的观点出发，认为所有这一事情的可悲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自己的过错，而对这一事情增添了一点困难。……前任大臣常常表示，对于自己造成的创伤毒药总是更令人疼痛的，但是我们可以预期，对于这件事情将使他更感到痛苦。”

麦克米伦大声地又不失时机地说：

“如果不是失礼的话，我愿意说说下面的事。……如果他认为他和他的党只需要把一种乱七八糟的杂拌，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政治开胃品，如果他以为这就是给我们焦干的喉咙的一口酒，并且以为我们会乐意接受它的话，那他可就大错特错了。”

当麦克米伦结束发言时，掌声四起，随后的发言者向他作了一般的祝贺。全国性的报纸既称赞，又表示友好——从《泰晤士报》到《每日镜报》。地方报纸则非常热情。麦克米伦的朋友们都大加赞扬。

麦克米伦自己说：

“我等了五个月，我算熬出来了，在这次演讲——我的初次交锋中，我达到了我的目标，安然度过，同过去某些人的情况不一样了。”

麦克米伦的初次演说给他带来了一定名声。1925年6月，被邀请去伊斯特本参加一次补选，在那儿他就保守主义的原则发表了一次演说，引起了一定轰动。《泰晤士报》的记者评论这篇演说时写道：

“伊斯特本的想象力受到了麦克米伦上尉的一次非凡演说的触动，他是青年保守党员之一，他以他那罕见的才智和清新的精神的一系列演说初次引起了下院的注意。”

另一记者评论说：

“在这个季节和这种气候里，伊斯特本是一个沸腾的南方海滨的游乐城市，但即使如此，那里对麦克米伦上尉的演说的评论还是显示出，人们对政治投机和试验并不是不喜欢的。”

1932年到1933年，麦克米伦对救济贫困人士的政策进行了剧烈的讨论和辩论，他认为失业问题应该全面由国家负责解决，对政府作出一部分负担由地方政府负责提出了批评：

“财政大臣失去了大刀阔斧干一场的机会。他准备承担照管失业人员15%的义务，而对其余的5%却踌躇不决。……那么什么原则要地方当局为它提供资金呢？这本来是一个表示度量的好机会，但是这个机会被错过了。这位十分令人尊敬的先生像一位胆小的情人，打算改变结婚仪式，他对他的新娘说：‘我把我的95%的财物交给你；那其余的5%得你自己去找了。’”

麦克米伦在演说时的幽默与生动性常常使议会议员忍俊不禁，他的演说充满了诱人的说服力。这种幽默感直接来源于他的生活实践活动。但是从根本上说却受益于他的大学时代——在牛津的学习和生活阶段。正是在那里他练就了出类拔萃的演讲能力——当然也就包括了怎样在谈笑风生中征服对手？在辩论投资政策时，他引用《泰晤士报》的一段后来支持观点：

“我们的剩余既不在国外投资，也不在国内投资。因此，我们的金钱‘打扮得漂漂亮亮，但却嫁不出去。’”

在讨论“特殊地区法案”（在下院称“贫苦地区法案”）时，在三读中，发生了激烈的争论。麦克米伦与奥利弗·斯坦利之间几乎是在轻剑刺去，而不是短棒猛击了。他们之间的直接了当，令人对此次辩论的风格和特征都深感兴趣。麦克米伦在阐述自己理由时说：

“在这个法案的最后阶段，我们现在能看到它的真正前景了。委员们被派往贫苦地区，引起了很大希望。……我想我在任何阶段都没想低估这个法案的重要性，我认为它是伟大的，但这个法案和我们面临的问题比起来，却只不过是一只小老鼠——一只漂亮的小老鼠，很好的小老鼠，有益而且有用的小老鼠，然而也是一只可笑的，用显微镜才能看到的，小人国里的小老鼠。”

奥利弗·斯坦利以一种嘲笑的但是多少有点伤人的方式跟他开玩笑，对此麦克米伦回答如下：

“……对议员们说来，在他的政治生涯的突出成功和我的失败中间，他的发言看起来好像是一种隐蔽的但仍然是有力的对比。然而，我对那却一点也不感到沮丧。我很高兴他身居显要……但我感到对于这些事情，即使我们这些不任公职的议员也有我们议员的用处。如我的十分令人尊敬的朋友所熟知的，最熟练的骑师也须借助于鞭子和踢马刺，特别是当他跟一匹执拗而又懒散的坐骑打交道时更是如此，我感到我也许在某些方面对他还有点用处，尽管他必须承认跟我有什么关系，并且设法隐瞒——而他总是隐瞒不住——他对现在的主人兼教练员的政策显然是不大耐烦。”

关于他现在在内阁的地位时，麦克米伦不禁补充说：

“然而，他已经得到了一项很大的好处。他以前的同盟军是粗野而不成熟的，而他现在有了内阁成员们作为他工作的鼓舞源泉。挑剔的食客不仅选

择他们的菜饭，也看重共同进餐的人选，如果他对跟他一伙人的感到满意，我对我的同伴也感到十分满意。”

在最后提到劳工大臣时，麦克米伦说：

“也许认为是摘掉假面具的时候了。我的真正令人尊敬的朋友说：‘我们现在都是计划者了。’我有一点比他强。他说话时，我能看见他的同事的脸上出现了一种满意和高兴的神情——我想他们是参与策划的人；但在其余的人的脸上却不禁露出不自然的苦笑。比尔博姆先生写过一句实在而又俏皮的话，‘人生是一所没有铁栅栏的监狱。’一个内阁也是这样。我不知道议会在今后两年要写出怎样的历史。我不清楚我们是否还会继续任其自流……而不制定政府广泛的政策，但我知道，即使对政府政策范围感到不满仍然留有政府中的成员们身上、担负着巨大的责任。我们有言论的自由，而他们却有保持沉默的责任。”

这个使人忧郁的题目在议会上进行了多次讨论，但没有结果。麦克米伦大声对反对派说：

“我们只好去见我们的人民。你们现在意志沮丧——你们一定会变成被抛弃的人们。”

麦克米伦在作议院议员时，1938年3月，麦克米伦在演说时，生动而略有些夸张，他的演说风格逐渐形成，这为他被任命为军需供应部政务次官作了预备。他阐述他对福利事业政策的准备：

“一个访问者从另一个行垦到这里来，看到这个国家，他会说，‘是的，你们有这么多福利事业。你们为人民做出了这么多的好事。你们免费教育你们的孩子。但却不给他们吃的，你们为什么教育他们呢？’这对他来说是一件多么奇怪的事，‘是的，因为在维多利亚时代，总是免费送给某人他并不特别需要的东西当作体面的事。但是给一个人粮食，给一个人房子——哦，不好，那就使他成为穷人了’；不过，你怎么能使已经是贫穷的人再穷呢？我是永远也不能了解的。”

麦克米伦的辩论激发了议员们的情绪。工党议员埃伦·威尔金森小姐写信给麦克米伦，内容如下：

“我以极大的兴趣倾听了你的演说，对此谨表祝贺。”

那时麦克米伦是保守党议员。

麦克米伦在政治舞台上成为活跃的中心人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45年大选后，麦克米伦被任命为空军大臣、住房和地方政府大臣、国防大臣、外交大臣以及财政大臣。

麦克米伦与威尔逊同是牛津大学的学生，在威尔逊去世时，麦克米伦在哀悼会上这样评价演说以表示他对威尔逊的钦佩：

“首先，他是一个真正的人。他没有丝毫虚假。如果有激烈的意见（那怕是偏见），他就用激烈的言词说出来，但他是诚恳的。其次，他是一个愉快的战士，而且是一个有豪气的战士。如果他给人的打击有时招致恼怒的反击，他总是准备承受这种反击的。还有，如果他的话有时厉害，但从从不枯燥乏味。他有时苛刻，但从从不迂腐。最后，在他自己和他的副业中，在他的一生中，他表达了全国普通老百姓的一些最深刻的感情。和许多先知者不同，他在自己本国特别受到尊敬。他是一个精明的政治家，但他从不玩弄政治手腕。他多少是一个革命家；他始终是一个爱国者。同时，在他那热情奔放的外表下，他是一个极为严肃的人。”

麦克米伦是佩服这位牛津大学联合会的活动家的，他在牛津大学读书时就很关心这样走出去的政治家。这些人之中，丘吉尔是一位麦克米伦的被崇敬者。麦克米伦追随丘吉尔多年，并且忠实地支持着这位伟大的政治家。

早在 1943 年 3 月，丘吉尔发表著名的广播讲话，宣扬建立欧洲的重组和重建计划。那时，麦克米伦在餐后聆听了这次广播。麦克米伦在回忆录中回忆了当时的情景：

“那是个星期天；那时一场行将扭转非洲战局并使我军可能早日登陆欧洲的大战已经激烈进行了两天。我和亚历山大将军都沉浸在丘吉尔先生的想法——对未来的想法上了。当时我们根本没有想到，亚历山大会在两年内接受地中海战场上与他相对峙的全部德军的投降。”

在 1945 年大选与丘吉尔丧失直接政治权力之后，丘吉尔在全世界的声誉和威望仍然是巨大的。1946 年 3 月丘吉尔在富尔顿发表演说。此次集会取得了良好结果。9 月，他又在苏黎世发表演说，其结果几乎也是同样惊人的。丘吉尔为呼吁议会赞成重建统一的欧洲以抵制社会主义势力强大的苏俄，他激动地喊道：

“摧毁了纳粹政权之时，我曾问我自己，对这个遍遭涂炭民穷财尽的欧洲大陆的兄弟公民们，我能向他们提出什么最好的建议呢？我向欧洲提出的建议可以概括为一句话：联合起来！”

麦克米伦十分佩服丘吉尔的演说稿的生动而富有感染力，这或许是牛津大学的演说风格，威尔逊、撒切尔夫人、希思，以及麦克米伦自己这些先后出自牛津大学的政治家们几乎都带有这种幽默生动极富鼓动与感染力的演说风格。麦克米伦就在回忆录中记录下了丘吉尔的许多演说词以显示自己的演说风格。1947 年，丘吉尔发动了成立统一欧洲运动，麦克米伦参加了管理委员会的工作，希思也参加了。在发起这一创举的首次会议上，丘吉尔发表了著名的演说，艾伯特大厅里挤满了人，台上布置得气派非凡。丘吉尔上台演说道：

“欧洲各国的悲惨苦境大家已经看到，在我们为重振欧洲的光荣、幸福与繁荣而进行的工作中，可以肯定说我们是从它命运的最低点出发的。”

丘吉尔把昔日欧洲的情况与今日的卑微可怜的景况作了对比，接着说：

“这里是地球上最美好、最温和宜人、最富饶的地区。多少世纪以来，欧洲以及基督教世界的势力和影响曾塑造和主宰了历史的进程。欧洲儿女曾奋身外出，把他们的使命信息传遍世界各处。全世界的宗教、法律、学术、艺术、科学、工业，在那么多的地方，在世界各种不同气候的地区，都深深印着起源于欧洲的烙印或欧洲影响的蛛丝马迹。

但今日的欧洲又是怎么样呢？

它成为一堆废墟，一所陈尸堂，孕育瘟疫和仇恨的场所。民族间的旧恨，意识形态上的新争，使苦难饥馑的人们无所适从而又愤怒满腔。心怀恶意的说教者提出像数学上那样准确的数字要求偿还旧账，误人的引路者把人们指向无情的报复，妄以为这是通向繁荣昌盛的道路。”

丘吉尔最惊人慷慨的陈词也许就在于对德国重建的呼吁：

“德国今日一蹶不振，嗷嗷待哺。我们显然不能指望它主动有所作为。该让法国和英国来带个头。他们必须和衷共济地携手起来，把德国人民拉回欧洲圈子里来。”

麦克米伦在大臣的职责上忠实的执行了这些原则，尽管丘吉尔并未执政

当权。

在丘吉尔重返议会，竞选首相时，他受到盛大欢迎，并作了一次非常动人演说。演说词用英文写成，译为法文，讲的声调比往常好。大广场的每个角落都挤满了人。

麦克米伦在此后几周的辩论中，深深体会到丘吉尔演说的好处。在委员会和全体大会上的辩论是又有趣又有益的。麦克米伦发了几次言，颇获好评。有人这样恭维他。

“你是个幸运的人。你在辩论中发言最出色，你还有那个极其美丽的女儿——真像个天使。”

1957年，麦克米伦继艾登之后出任首相，至1963年10月卸任。这一时期，麦克米伦成为世界风云人物。他的演说受到人们欢迎。一个工党领袖无不嫉妒地说：

“他是个绝对的大演说家——风趣横生，措辞明确，思想透彻。近代没有这样的演说家了，也许丘吉尔还差不多。”

麦克米伦的议会发言总是热情洋溢的。几处稍带幽默趣味的话都很适合。有时听众是靠耳机通过蹩脚翻译来听取他的发言，这种场合下的发言技巧是很不简单的。人们实际是在听他的广播讲话而不是听他当场演说。然后麦克米伦的广播讲话有直接听他演说的效果，这对麦克米伦的追逐者来说吸引很大。

麦克米伦在竞选时，在演说中也不忘随着用于势作了一次精彩的表演。他曾作这样的演说：

“再鼓一下气把他们撵下台。”

说话前先表演动作，而且表演得精彩。他把手臂从肩部往前推——前后大力摆动；然后像希腊神话里的力士推石上山时那样把他那阔肩膀猛的一耸。

这使满座笑不可支。

麦克米伦是牛津大学的骄傲。在他出任首相一年之后，就被授予牛津大学荣誉博士学位。在1960年被选为牛津大学校长。牛津的人文之光与语言风格正是在这样的杰出政治家、演说家中发出灿烂的迷人之处，并且激励着那些后来的牛津学子，为他们树立了楷模的杰出形象。还有什么能比这样的骄傲传统让人去为之追逐呢？牛津大学与她的学子们正是这样悠悠地发扬着高贵而古老的神秘之处，吸引着有为的青年人去深造，并从这里出发去开创更美好的明天！

第六章 激情之辞与飘逸之致

——道同志不同的艾登与希思首相

安东尼·艾登，这位英国政府叱咤一时的风云人物，也许对于我们并不陌生。对于二战有所记忆的人，应该不会忘记这位丘吉尔政府里有强有力的外交大臣。然而，或许是丘吉尔的光彩太耀眼了吧，反而掩盖了那些本该熠熠闪光的一时豪杰，艾登或许正是其中之一。但是，在丘吉尔之后，是谁在运筹帷幄？是谁在振臂疾呼？不是艾德礼，不是麦克米伦，而是他——安乐尼·艾登。

牛津校园，初露峥嵘

我们已经在《风雨牛津》之中无限欣羡地说过：英国 40 位首相中，有 29 位出自牛津。是的，牛津是人才的摇篮，堪称拔尖人才龙综凤集之地。我们也已经说过，丘吉尔、希思、威尔逊和撒切尔夫人都（曾经）是牛津闪耀的群星中的灿烂的一颗。现在我们所要提及的是万千群星中的另一颗，他就是安东尼·艾登。

艾登早年进入牛津大学，即表现出罕见的演说天才，佼佼不群。这一点既使得他风光无限，也助长着他日益膨胀的“野心”。他的“野心”客气一点说应该是宏伟抱负，夸张一点便称之为“野心”，谁也不知道，只有他自己心里有数，但后来的事实却无疑是公开地泄露了他的秘密。

然而，尽管这个早慧的艾登有天纵之才，但要想在这个群星璀璨的课堂里卓尔不群又谈何容易？牛津所给予每一个学生的机会都是均等的。因为这个熔炉不但会熔炼出真金，也会淘汰掉杂质，就像生物界的优胜劣汰现象一样残酷而又公平。艾登尽管年少气盛，但他并没有抛弃掉牛津所加惠于他的每一个创造和发展的机会，在这里，他如饥似渴地吸取着知识的营养，迎接着一场又一场严峻的挑战，也锻炼着自己坚忍的意志力和雄辩的口才，这一切在不远的将来就带给了他丰厚的回报，也使得他在以后的仕途中能够一帆风顺，青云直上，并使得他面临各种（场）激烈而复杂的谈判都能得心应手应付自如。

是牛津，把他由一个年轻气盛的可造之材锻炼成了一个成熟的国家栋梁之具；是牛津，为他最初的显露峥嵘提供了广阔大地。在以后的政坛生涯中，艾登多次谈到自己的母校时仍然激动不已，他无法估量牛津大学已经带给他一切的价值。

动荡时代，崭露头角

艾登长期以来是英国统治集团内的重要决策者之一。他从 1935 年起先后在英国政府内阁中任职 20 年，其中任外交大臣十年，任首相近两年。我们知道，从 1933 年起，世界就已经不再太平，法西斯的魔力正在伸展而战争的乌云蔓延在欧洲大陆晴朗的天空，这是一个多事之秋。有句话说得好：时势造英雄。艾登便是从这时势中被挑选出来的众多英雄之中的一个。

他的政治生涯是从战争中开始的。他是在战争中度过的，也是在战争准备时期和战后的余烟里度过的。1945 年春，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的时候，为了寻求建立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可能性，艾登受命率领一个包括艾德礼和索耳兹伯里在内的阵容强大的英国代表团，出席旧金山会议。此时尽管政治家们对于建立国际秩序所怀的希望还是那样热切，但较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人们已经变得更加审慎了。但是在艾登的有力斡旋下，终于赢得了美国代表团的全心全意的合作。

1950 年保守党再次战胜工党而成为执政党时，丘吉尔再度出任内阁首相并再次邀请艾登作外交大臣。这次上台后，艾登较之以前更加显得胸有成竹和雄心勃勃。他要把自己和国家坚强信念变成有力的行动，为此他主动出击，穿梭于大国之间，以其雄辩的口才和强悍的说服力努力改变着大国的态度及其与自己国家的僵化关系。

1952 年 1 月，丘吉尔访问华盛顿，艾登陪同前往。1 月 11 日，哥伦比亚大学授予艾登名誉博士学位，并邀请作演说。艾登高兴地接受了这一殊荣并滔滔不绝地发表了辞锋犀利的精彩演讲，再一次显示了他作为牛津之子的独特风采。

“美国人民和英国人民应该彼此了解对方民族特性中的优点。如果你驱使一个民族采取与它的本能背道而驰的行动，你就削弱了而且可能会摧毁它这种行动的动力。”

艾登开宗明议，点中要害，很巧妙地唤取了美国听众诸君的强烈共鸣。接着他说：

“这是我们不愿意——我们中间任何人也不愿意——对我们赖以有效合作的一个盟国所作的事情。

“你们会意识到我是在讲屡次提出的关于联合王国应该参加欧洲大陆联邦的说法。我们确实认为这个是我们所不能作的事情。

“我们知道，假如我们去作的话，我们就会削弱我们在西方民主事业中的行动的动力。因为英国的经历和它的利益，是远远超出欧洲大陆之外的。我们的思想越过几个海洋，直到世界各个角落的许多社团，在那里都有我们的人民在起作用。这些是我们民族大家庭的纽带。这才是我们的生活，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只不过是住在欧洲沿海一个岛屿上的几千万人民而已。单是这一个岛屿，谁也不会对它有什么特别兴趣。

“但是，这是否意味着我们正在背弃欧洲呢？肯定不是。我想提醒你们一个事实：我们在欧洲大陆驻有比其他任何大西洋国家数量更大的装甲部队。而且我们已经保证，只要为了共同防务的目的而需要它们，我们就将把它们和我们的其他部队都留在那里。

“难道这是要背叛欧洲的行动吗？”

至此，演说戛然而止，可谓落地有声。

走向巅峰

如果说，艾登是在动荡时代崭露头角的话，那么我们倒毋宁说：正是在从1935年以来的十多年的政坛交锋中，艾登已造就了他的过人的胆识和敏锐的眼光。这一切都为他不久以后在政坛上走向巅峰奠定了基石，扫清了道路。

1955年4月，温斯顿·丘吉尔正式辞去首相职位，并由丘吉尔一贯信任和推崇的“皇太子”艾登接任。一则由于丘吉尔的气量，二则由于艾登长期以来身居仅次于首相高位的亲身体验和丰富经验，轻车熟路，因此两个人的交接工作是相当顺利和井井有条的。紧接着，艾登在议会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高度的赞扬丘吉尔的丰功伟绩以及他们二人之间长期的愉快的亲密合作关系。

“居然在我们熟识的人们当中，丘吉尔先生阁下的生活兴趣恐怕是最广泛和最多种多样的——这是实在的——可是我仍然认为，他的最大兴趣还是在政治生活方面，而且他的政治见解又是最全面的。我还没有见到过任何人能像他那样，既能使人洞察问题的全貌，同时又能使人抓住问题的核心。我认为，这应该归功于他全部才能中最为可贵的一面。

“除了这些东西以外，以气质方面来说，他气度宏大，这是最为人所称赞的一种美德。坦白地说，在我们看来，没有一种美德是我们能够经常泰然奉行的，虽然我们都有这样的愿望。他所以能做得比较自然，我认为恐怕一部分是由于他在考虑问题时始终是从人情出发，而不是从抽象的概念出发的，这正是他所以获得下院一致爱戴的原因之一。

“最后，正如一般人所津津乐道的，他很幽默——他能有这种幽默是由于他能够无比自如地运用英国语言，这种幽默往往引起我们的喜悦，即使在国会质询时，这种幽默所引起的喜悦也不小。我深信丘吉尔先生将深深地为今天下院各位议员先生的临别赠言所感动，因为他对下院是热爱的——无论（是）当下院和他合作时或者和他发生矛盾时，他一直热爱着下院。”

以小见大，洞幽显微，这种几近其人的精微剖析或许比那种无故加之的泛泛之论更有力更强烈也更能拨动听众了心弦。

艾登的走向权力的巅峰，并不是偶然的，后来，他在追忆自己的竞选经过时曾不无得意地说：“我对于竞选不能说没有经验。”他认为，要赢得竞选就必须提出一个有份量和有吸引力的政治问题作为旗帜进行广泛的号召，竞选也需要凭三寸不烂之舌去争取听众，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他认为，历来成功的竞选者无不倚重于这一点。在竞选过程中，除此之外，他还采取的灵活机动的竞选策略，竭力向工人发表演讲，并许之以微薄的利益争取他们的支持；对外则大肆鼓吹自己的成绩，也不失为成功之道。他综括自己的成绩，显示了他的不容怀疑的坚定的信心：

“我们加强了大英帝国在世界事务中的影响。

我们在促使两次大战结束和促成西方的团结一致方面起了应有的作用。

在国内方面：人民的收入增加了，储蓄变多了，税收负担减轻了，社会福利制度完善了，增强了，商品丰富了，充足了。全国人民都将拥有更多的希望，更多的机会和更多的自由。

我们的工作并未做完。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因此，我请求你们重新把国事托付给我们，以便使我们能继续在国际上为保持和平、在国内为建立民主

政体而不懈奋斗。

通过严密的组织和大张旗鼓的宣传，他们终于战胜反对党而赢得胜利。如果我们对此颇有微词的话，我们不妨讥之为“假民主”但有一点却是不容分辩的，即一个没有出色的演讲口才的人不可能入主唐宁街！当然我们也不会本末倒置，说仅凭演讲就能骗取人民的信任，不是的！决不是这样。竞选所凭借的，仍是行动，强有力的行动，而演讲不过是为了争取信任，而这信任是民众对待能力所作的一个综合判断。（这）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你的口才。”

当然，令人遗憾的是，尽管艾登十分出色和成功地领导了他的政府在风雨飘摇之中稳步前进，但是由于他在国际事务中的短视和偏激，他一方面虽然在苏伊士运河问题上通过外交手段巧取豪夺了苏伊士运河 44%的股份，但另一方面，他却又在侵略埃及问题上拙劣地失败了，并进而危及自己已奠定的地位，而终于不得不辞职下野了。

当我们再一次追溯艾登外交部长到内阁首相这 20 多年漫长历程的时候，我们或许会得到这样一个有益和显而易见的结论，那就是演讲也是一条成功之道。已经成功了（或）和期待着成功的人们是不应该对此漠然置之和视而不见的。

希思，这位令牛津大学情感荣耀的牛津巨子，身为英国首相，或许并不能使他感到自豪和满足，最大的人生乐趣，对他来说，只有旅行、音乐与演讲。

做首相也许是实现这些乐趣的道路，而这样的奋斗行程同样令希思着迷。他曾经在回忆录中说过：

“孩提时代，我就有一种如饥似渴的欲望——想亲自探索周围所发生的一切。”是的，这种如饥似渴的热望之中探索一切的勇气正是希思的精神，也正是他的风骨。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希思从小就生长在布罗兹泰尔斯市郊外的圣彼得村，乡村的宁静生活使小希思对外面的世界充满神往之情。

“我从寓所前面可以望见大海，每当我沿着悬崖峭壁散步的时候，我总是要遥望英吉利海峡对面的法国海岸。有时，加来海峡上空阳光灿烂，对岸的一切显得洁白、清晰；有阴天，那儿仅仅是地平线低处黑乎乎的一团。要是骑自行车到多佛尔去，我便可以坐在城堡旁的一座土岗上，观看渡轮在渡口进进出出，真是其乐无穷。我小时候就有想跨越这一切界线的愿望，当时只不过想去看看对岸是个什么景象。”

为了达成这样的愿望，小希思知道唯一的道路是读书上学。他在 13 岁时，希思的父母为了奖励他，答应了他到法国去旅行的请求。因为希思在 13 岁这样一个小小的年纪就通过了学校的毕业考试，另外是为了促使他勤奋学习，以便在来年夏季获得伦敦大学的录取证书。

正是这次旅行，希思身上扎下了对世界各地始终持有好奇心的根子，并下了决心要目睹现状之后，才能对其他民族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做出判断。这样还把希思的其他爱好，诸如政治、航海、演说和音乐，就结合在一起，赋予了他大量的机会，使他会见了如此众多的人物，游览了那么多的地方。

在法国巴黎，希思决心学习法语。那年秋季他就要进六年级，到时候，就要全力以赴攻读现代的课程，包括语言学和经济学，所以希思抓住这个机会提高自己讲法语的能力。后来，他花了大量的时间阅读法语资料，对法语的达意和明晰深表钦佩。1972 年 10 月，希思任英国首相，为扩大经济共同体，在巴黎举行的政府首脑会议上亲自起草了公报，在会场上没有任何文章能像这份公报那样写得优美而有条理。有些法国人听了希思用法语在广播中发表的演讲，这样评价道：“他所作的尝试真带劲”。

结束巴黎之行后，希思为自己体验到了另一个国家的生活方式而感到高兴，并充分意识到自己对世界上其它地方的人究竟在怎样生活，还几乎是一无所知。6 年之后希思到德国去访问一个同年的学生。尔后打算到位于德国的另一侧的巴伐利亚去旅行，因为他想看看这个与音乐相关的国家。作为贝利奥尔学院大风琴奖学金的享有者，希思与音乐结下了不解之缘。他还下定决心学习德语，并在南方找到一处安静的地方，可以补习一下由于政治和音乐活动而在本学期中被忽略了的阅读课，这次旅行，除了一只衣箱外，还随身携带了一只装书的大箱子。

在德国，希思亲眼看到了纳粹党徒的丑恶面目，不仅在慕尼黑，而且在科尔周围的村庄里。每天清晨，那里的孩子排着队，唱着纳粹的歌曲。希思在大学里是政治活动的积极分子，参加了保守党组织的活动和牛津大学学生联合学的活动。对于独裁者所持的观点早就很清楚了。德国的见闻对于希思的政治观念形成了重大作用，争取和平一直是他以后任首相的执政信念。

在希思以牛津大学辩论团的成员身份出席班贝尔的集会时，他再一次认清了德国法西斯的本来面目。他说“对我来说，那是一次心急如焚而又沉闷乏味的经历。”希思在回忆录中写到：

“纳粹头目届时将在主席台上出现。当会场的气氛变得越来越紧张时，那些头目鱼贯而入，在各自的座位上坐下来，其中有戈林、戈培尔、希姆莱等，

每个人露面时都引起了一阵狂呼。接着，说话声渐渐平息下来，令人紧张不安的沉寂笼罩了整个礼堂。我突然意识到，希特勒本人正从礼堂后面进来，健步从中间的入口处走上主席台。当他登台时，会场上的人都跳将起来，纳粹式的口号声在我的四周轰鸣，主席台上的人将手臂‘刷’地举起致以纳粹式的敬礼。我的座位挨近人口处的内侧，我记得，当时脑子里只是在想通道太窄，肯定容不下一个保镖同行。真的，希特勒从我身边走过时，几乎是擦肩而过。我曾留意，他独自一人走的，随行人员都跟在后面。他看上去比我想象中的要矮小得多，而且是个很普通的人。他的脸上几乎没有血色，穿的制服似乎比他的部下要显赫些。当他登上主席台时，会场上反应变得歇斯底里起来。”

希思对希特勒的演说感触最深，他写道：

“希特勒的讲话声在体育场四处回荡的时候，越发加深了我的这种感觉。演讲开始时，他是不动声色的，但渐渐地便慷慨激昂起来，发表了我们都很熟悉的那种长篇大论。句句都说得抑扬顿挫，加上单词的重读和富有戏剧性的手势，都有助于带动那黑压压的人群掀起歇斯底里般的反响。那位昨天看上去还是普普通通的人已一去不复返了。眼前是个流氓演说家，一个蛊惑人心的政客，他在听众中煽起种种邪恶的情感。至于他那种固有的演说技能，或许是凭本能这样夸夸其谈，那是丝毫不用怀疑的，这是我所经受的第二次创伤。这家伙显然能够把德国人民引到任何愚蠢的歧途上去，不管是多么鲁莽。演说结束之后，他又登车绕场一周，顺着进来时的路线退场了。毫无疑问，他对自己这一天的工作是完全满意的，却使我们当中的一些人萌发了可怕的念头。那天晚上在班贝格吃晚饭时，我们两三个人私下议论了我们的见闻所包含的弦外之音。”

牛津学子大放光芒

希思的演说辩论技巧在牛津大学保守党协会中练就出来的。在一次次协会中的辩论中，希思以儒雅之态驳斥对手，赢得了会员们的推崇。不久，希思便当选了牛津大学保守党协会主席。1938年夏天，西班牙内战期间，希思作为英国全国学生代表团的成员，应邀访问西班牙共和政府所管辖的地区，亲眼看到了那儿的情况。在访问中，希思在西班牙学生中发表演说，与政府人士交谈政治形势。他在西班牙共产党的会场去听“热情之花”之称的多洛雷斯·伊巴露丽的雄辩式演讲。对于这位女政治家，希思极其钦佩，并对于她竭力鼓舞起人民起来击退埃布罗河对岸的武装力量的坚强意志赞叹不已。

为了参加各地的演说活动，在牛津大学读书的希思遵照发布的动员令主动到大学征募委员会报名参军。这也是当时从政的手段之一。温斯顿·丘吉尔在踏上政治舞台之前，参加过骑兵团，并在战斗中被俘过。麦克伦也在军队中服过役。参军似乎是政治家共同的经历。

在去炮兵部队报名之前，希思着手准备到美国24所大学去作辩论和旅行。从英国各所大学中挑两位辩论员进行这样的访问是一种由来已久的传统。这一次两人都是从牛津大学挑选出来的。希思的旅伴是曾任牛津大学学生会司库的彼得·斯特里特。行前，英国外交部向希思他们作了详尽的情况介绍，特别强调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千万不能显得是在干涉美国的内政，而且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不能谈论战争问题，否则将会引起外交纠纷，他们将立即被召回国。

希思怀着非常复杂的心情动身前往美国。他有机会亲自评估一下美国对欧洲事务的态度，也许还能向他的同代人解释英国为什么作如此强烈的反应。希思花了一些时间准备讲稿，将自己的政治观念，漫游经历以及在保守党协会辩论中形成的政治见解都作了阐述。按照惯例，他们要拟订12个题目，供美国的大学在每次辩论时选择。希思为每个议题准备一份讲稿，写好之后，如果其他辩论团也选上这个题目，这份稿子就可以派几次用场。议题并不深奥，包括这样一些问题：“听众相信大英帝国是日不落帝国”“听众将支持罗斯福总统连任第三届总统。”

辩论的会场设在一幢新建的摩天大楼中，里面有一个可容纳几百人的礼堂。辩论的实况由广播电台向东部几个州播放。由于辩论的题目是“美国应该立即与盟国一起参战”，而匹茨堡大学的辩论将反驳这个论点，公众都是十分关注。希思脑中闪现出外交部的告诫。“干涉美国的内政”、“外交事件”、“立即回家去”将会出现在报纸标题下。希思委婉而又坚决地对无法辩论这个问题表示遗憾，并解释了其中的原因。美国人答复说，这不单是匹茨堡大学感兴趣的论题，也是其他大学唯一感兴趣的题目。这意味着辩论旅行将取消了，希思要求他们给点时间好好考虑一下。

最后希思与旅伴决定答应辩论，但要求可以一个表示赞成，另一个人表示反对，这样没有任何人说他们试图使美国人卷入战争之中。希思在大多数访问过的大学中也正是这样做的。在牛津大学的辩论团中，他们交替变换立场进行辩论。目的就在于确有把握地掌握问题两方面的情况，并向美国朋友表明他们确实对辩论感兴趣。

在匹茨堡大学的辩论中，希思第一次领略了美国辩论团进行正式辩论的技巧，每次发言，一上来就提出一个命题，或者，如果是反驳的，则提出一

个相反的命题。然后，摆出表示赞成的具体论据，并逐一列举以反驳的论据。发言结束时，再来一次正式小结，阐明辩论者的看法。有几次，裁判委员会根套这用一程式的成功程度来评分。牛津大学学生会从来不搞这一套。希思他们决定最好的办法是决不要作以证明得分的演讲。他们要坚持自己的风格，尽力阐明一个论点，同时又要使听众能够接受。这常常使他们的对手困惑不解，他们根本不知如何反驳，但总的说来，听众们看来是对此表示赞赏的。

在佛罗里达州的杰克维尔，一位妩媚的姑娘在辩论结束后走到希思跟前说：

“今天晚上，你们打破了书本上的所有条条框框，这样要有趣得多了，我们也将照着这样做。”

希思继承了牛津的演说风格，并成熟地运用于以后的政治竞选之中，获得了成功。美国之旅让希思耳闻目睹了美国的政治经济生活，他注意到当时美国种族歧视的严重性，黑人只许坐在汽车后部。以后希思还在费城，锡拉白丘兹等地方的大学作过辩论，受到同龄学生们的欢迎。

希思回国以后便参加了军队去法国作战。在战后，1950年，希思竞选议员成功。1954年8月希思作为出席英联邦议会协会的英国代表团保守党副领袖去了开罗，辩论有关苏伊士运河的英埃协议。在埃及，希思访问英国基地，与军方就基地的重要性进行磋商，会见了埃及新领导人，同时他也有机会走遍令他心驰神往的整个非洲大陆，观看埃及珍宝。

希思是执行统一欧洲行动的拥护者，得到了当时首相麦克米伦的赏识。麦克米伦希望内阁中有这样能言善辩的阁员。1961年，麦克米伦委派希思率领代表团就英国的加入欧共体的可能性进行初步磋商。正如麦克米伦所预见的一样，希思在这件事上做出了成果，谈判比预想成功得多，当地的人们在酒店中看到希思时大喊：“希思是欧洲先生。”大街上一条又一条的通栏大标题也这样称。希思不久又得到麦克米伦的提拔，麦克米伦知道他必须是一位内阁议员在众议院处理有关外交事务的质询，这样希思被任命为掌玺大臣。希思与麦克米伦同是牛津大学的毕业生，他们的关系比其它内阁成员无形之中又进了一层。希思在处理外交事务上儒雅风范十足，他常常在露天聚餐，喝咖啡和法国白兰地时就解决了许多棘手的外交问题。

美国参加越战后希思希望执行和平共处的外交原则，他在演说中说：

“处于战争状态的一个世界，而心中在想它怎样能变成一个和平共处的世界。我们现在的一个世界又有了不同意义——一个转瞬间可以了解别人发生什么事的世界。这对那些年轻的亚洲人会产生样的影响呢？只能使他们发问为什么西方的生活水准比他们高许多呢？接着会要求自己也应达到同样的生活水准，随后宣称他们用不着像我们工业革命以来所做的那样，不用花150年的时间便可很快达到这一水准。但怎样达到呢？他们选择美国和西欧那种自由企业的社会吗？或者选择莫斯科那种中央集权的政权吗？这个选择，并不像我们在西方有时喜欢设想的那种简单。他们承认苏联个人的自由是有限度的；但他们确实看到，那儿的人民通过自由的努力改善了自己的境遇；在那些国家中，确实人人都有了一份工作，而且没有火箭式的通货膨胀。至于我们的自己的社会中，他们看到自由已为飞快的通货膨胀和高失业率所玷污了。在我曾访问过的那些国家中，我清楚这一点。”

希思的政治观点可以说无不是他的世界漫游与演说的结晶，通过漫游，

他不仅使自己日益变得广博名闻，而且也理解到不同文化背景里人们的不同价值观。这一点是可贵的。

希思的超群才智和渊博的语言知识使他赢得了保守党人的心。1966年希思当选保守党领袖。1972年希思出任英国首相。

希思终其一生对旅行孜孜不倦一往情深。放松而自然的旅途中，他吸收了许多东西，眼界扩大了，精神振奋了。而在这行程中所作的演说所接触的各类人都对他的交际能力裨益非浅，而且有了一种崭新的思维方法，而不是拘囿于狭隘偏僻一隅。

希思以一种新的方法——游历——获得了政治交际能力，这正是牛津思想兼容并蓄的博大的一面。

第七章 人类之爱，智慧之光

牛津八百年泱泱学府，源远流长，涅濯群芳。她的内涵是那樣的丰富，那樣的深厚，那樣的磅礴，使得每一个亲炙过她的人都引以为莫大的自豪并且不得不折服于她的魅力，她的博大以至无穷；同时，她的成就又是那样辉煌，使得她已经不再需要人们为她捧上知识与智慧的冠冕。我们不能明确地说出她的儿女有多少的辉煌，但我们至少可以肯定，她已经慷慨地给予了她的儿女们以最宝贵的东西——知识、爱和智慧——那可以使他们终身受用无穷的并且能够以之而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东西。

拥有 35 个学院的牛津，在它出名的学子中，有罗杰·培根和伊拉斯谟，有 T·S·艾略特和威廉·戈尔丁等十几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有英国的一代代桂冠诗人和文豪如雪莱、格林、奥登等等，也有现代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威尔逊、希思和撒切尔夫人。……一时人文之盛，万千风流，而这倒使我想起了当年中国号称英才毕集的岳麓书院高悬在他的山门上的一幅气势颇恢宏的对联：唯楚有材，于斯为盛！牛津有过之而无不及，可谓美哉！壮哉！

牛津大学不愧为拔尖人才的摇篮，不愧为文化的摇篮。同时她也是领导时代潮流的一面光辉的旗帜，是人文主义最早的发源地之一，它真正地代表着这一种精神。

我们不必去说牛津大学就是“我初恋的对象”（麦克米伦语），我们也不必去赞美牛津大学所带给我们的一切——它提供的机会，它的理想，它的成就，我们只要切切实实地去感受一下她的人文精神，哪怕只是微不足道的一点，就已经可以使我们感到欣幸和深感自豪与满足了。

那么牛津大学的人文精神之源究竟在哪里？她的涵盖无穷的内容又有多少方面？一代代牛津学子又是怎样将她的这一内涵不断地发扬光大、不断地推向新的高峰的呢？他们之间的衍变和承继关系如何？……这些实在是太博大浩瀚了，即使就其中的任何一个问题稍作阐释和梳理也已经可以显出它的丰富了。但是如果我们不愿去作这样的一次旅行也实在是大可遗憾的事。因此尽管我们只能抓住其中的一鳞半爪，我们也将了无遗憾。

事实上，我们可以从牛津莘莘学子与其诸多成功人士的煌煌巨文和他们的英雄业绩中隐隐透视到这一人文精神之线索。而在这条大线索的背后，是这样两面光辉的旗帜：一面是人类之爱，一面是智慧之光，或许这正是牛津大学人文主义精神最丰富也最深厚的底蕴吧。

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雪莱，这位英国历史上与拜伦相媲美的浪漫主义诗人，就是从牛津大学走出来的一位具有牛津之风骨牛津之精神的牛津之子。

虽然他是在 1811 年因发表《无神论的必然性》一文而被牛津大学开除的，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正是牛津大学为他展开了新的更加广阔的视野，也在他的身上注入了最初的人文主义精神的灵光。尽管他最后与牛津分道扬镳了，但是他却是沿着牛津人文主义精神的大道而走向更加光明的道路并且走得更加遥远的。因此，尽管他只在牛津呆了一年多，但牛津对他的影响却是深远的，这一点是勿庸讳言的。我们从这样一个耐人寻味，但又符合人类之常性与向上精神之旨的事例中就可以明显地意识到这一点。在雪莱当年就读的“大学学院”，现在塑有他的纪念像，就在这个学院的第一个四方院的西水角。这一事实不仅说明了学院当局有胆量改正前人所犯的错误，而且有力地证明了人类永远是追求自由，如何进步向上的。而雪莱无疑便是一个走在时代前面的人。他是先驱，他是代表人文精神的更加向上一途的。

雪莱和拜伦是英国 19 世纪诗坛上的两颗巨星，他们以其旷远的绝唱和热情的诗歌发出战斗的号角，号召人们为自己的合理地位和自由而斗争。在他们的这些充满战斗热情的诗篇中，不仅表现出了他们的真知和远见，而且表现出了他们冲破黑暗势力的大无畏精神。他们的这些诗篇，极大地鼓舞了人们争取自由独立的战斗热情，强烈地震憾着一切追求进步与自由的人们的心灵。

雪莱出生于一个富豪的贵族家庭，早年的生活和求学都很顺利自然。但是当他的思想日益变得成熟变得激进变得倾向于革命时，他却愈来愈不被他所属的那个腐朽的注定要灭亡的阶级所容了。自 19 岁开始，雪莱就成了被七层社会排挤出去的流浪儿，但同时，一个日益坚决的革命者也日益成长起来。

生活的贫困颠沛，再加以社会的诽谤和迫害，都丝毫没有消磨掉雪莱的坚毅的意志。他本人就像他所歌唱的“云雀”一样，带着欢乐的歌唱直飞向他所向往的天空，仍没有回顾和反悔。尽管当时有人这样咒骂雪莱，说他只是一个“美丽然而不切实际的安琪儿，枉然在空中拍打着他闪烁的银色的翅膀”。但他对此却只是轻蔑的一晒：“喜爱黑暗的人对光明是盲目的！”

是的，雪莱是不喜欢黑暗的，他向往光明，他热切地渴求光明！这就是雪莱。那么他是怎样成长为一个积极的革命的浪漫主义诗人的呢？

给年轻诗人的心灵以深刻启发的，首先是他对自然科学的研究，其次是阐述进步思想的书籍，比如威廉·葛德汶的《政治的正义》。托玛斯·潘恩的《人权论》，洛克·休谟以及斯宾诺莎的论著等，但最终和最有力的影响却是雪莱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环境，是当时英国和欧洲的社会及政治运动。

雪莱在中学和大学时期，对物理、化学和电学都抱有极大的兴趣，并且在自己的房子里堆满了仪器，进行了很多试验。他认为自然科学会使人认识到自然界的秘密，帮助人成为世界的主宰者，从而可以把人从“偏见”和奴役状态中解放出来。虽然在离开学校后，他就不再接触实验科学了，但对科学的爱好已经给他的推崇理性和对世界的唯物论认识奠定了基础。我们已经说过，雪莱早年的政治见解固然部分地由阅读书籍而形成，但更主要的是生活本身使他认识到英国的现实。

离开牛津不久，他到了凯斯维克，就是湖畔诗人华兹华斯在那儿歌颂自

然之美的地方。但他却没有看到自然的美，他看到的是另一种景象，他后来在文章中写道：“我看到了悲惨的景象。工人们处于饥寒中。我们的士兵被派到诺廷汉去了……如果他们是为了杀死当地任何一个饥民的话，让上天诅咒他们吧。”这是怎样尖锐而激烈的言辞，这是怎样无私的情怀，装着无私的人类之爱的胸怀！他接着写道：“在这凯斯维克，虽然风景是可爱的，但人们却可憎。厂主们带着他们的污浊伸进了这平静的山谷，以人的恶浊破坏了自然的美。来到这里的大家族们，他们荒淫的奴仆也有助于使整个道德沦丧。”这是对于旧世界怎样激烈的咒语，而这其中又饱含着诗人对于美的世界的多少向往和憧憬。

不久之后，他到了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他看到了什么呢？“在这以前，我从没有想到人间的悲惨可以达到如此地步。都柏林的穷人确实是最不幸最悲惨的了。在他们那狭小的街上，仿佛有成千人在一起埋伏着——简直是一堆活人的垃圾。这种情景多么剧烈地震动了我！”雪莱后来这样写道。这是真实的，也是为雪莱所痛彻肺腑的。

第二年，他又带着自己所写的《告爱尔兰人民》的小册子，再次到爱尔兰去鼓动当地的民族革命。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实际的革命工作，因为不久之后他就拿起笔作为战斗的武器了。在《告爱尔兰人民》的小册子里，他写道：“人们侈言贫穷不是恶端，——他们定是没有身受，否则是不会这样想的。”“被统治者也应过问政府的工作”。“战争对你们的幸福和安全难道是必要的吗？穷人从国家的财富或疆域的扩展中得不到任何好处。他们从‘光荣’得不到什么，这个字眼不过是政治家用来掩饰他们的野心或贪婪罢了……穷人用自己的血、劳作、快乐和美德当作代价，来买这‘光荣’和这财富。他们为了这魔鬼的事业而战死沙场。可悲的是：下层人民所以牺牲自己、生命和自由，不过为了使压迫者更凶残地压迫他们自己。可悲的是，穷人必须把那使他们全家免于饥寒的财物当作税款交出来。……许多丰衣足食无所用心的人们在斥责改革；狠心的、或者无所用心的人们呵，有多少人正在你们权衡利弊时忍饥挨饿，有多少人正为了助成你们的快乐而死去。”这样雄浑博大的篇章！这已经不是慷慨激昂、激情澎湃的演讲，这是战斗的号角和鼓点！

雪莱很重视他的这次爱尔兰之行，他认为“不是最高贵的成功，就是最光荣的殉道”在等待他。他把《告爱尔兰人民》的小册子一面廉价在书肆出售，一面还亲自在都柏林以各种方式散发它。他的妻子海瑞特后来这样回忆他们散发小册子的情景：“我相信，你要是看到我们怎样散发小册子，你会大笑的。我们把它从窗口投出去，又把它分发给从我们街上路过的人。这样做时，真要把我笑死了，可是波西（雪莱昵称）却严肃得很，昨天他还把一本小册子放在一个妇人的衣兜里呢。她一点也不知道，我们就走过去了。”除此之外，雪莱还把传单放在用木塞塞好的玻璃瓶中，置于海上任其漂流，或者用轻气球把它送往空中。

尽管后来雪莱的一切努力都失败了。但是这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不可避免的，雪莱不仅是孤身奋战的而且他没有预料到他的敌人是何等强大。但是不得不使我们深感惊奇的是，这时雪莱不过20岁，便具有如此天才的远见！

雪莱是一个热情而勇敢的革命家，但环境却不允许他在实际的革命活动中有所发展。因此他不得不转向写诗，开始以诗为武器，在思想上向反动派宣战。但他在早年所形成的革命思想和对未来的坚强的信念，却尽其一生未

曾改变，而是与日俱增地贯穿在他此后的一切诗作中。

诗人的这一决定是高贵的；但同时，由于放弃了实际活动和政治斗争，诗人的蓬勃精力和热情也就不能朝革命最有力的方向去发挥了他的生活也无法和广大人民的生活相结合，这就自然而然引起了他的忧郁和自我怜惜的感情。但这只是事实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更其重要的方面是：雪莱的一生都是战斗着的。而这种忧郁我们也不妨将其理解为这样一种战士有时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雪莱又是个严肃的思想家，他尊崇柏拉图哲学并接受了它。他之所以接受柏拉图哲学，是出于改造世界的意愿，是出于求真的精神；他要追寻宇宙的秘密，要掌握自然与人间一切现象的总规律，因为在他看来，只有认清了这一规律，才能顺利进行改造世界的工作。他的这种对于知识与真理的热烈追求，难道其中不曾包涵着人文主义精神，某种底蕴吗？比如，在他的《爱的哲学》这样一首迷人的小诗里，岂不是充满了这类哲学的影子吗？

泉水总是向河水汇流，
河水又汇入海中，
天宇的清风永远融有
一种甜蜜的感情；
世上哪有什么孤零零？
万物由于自然律
都必须融于一种精神。
何以你我却独异？
你看高山在吻着碧空，
波浪也相互拥抱；
谁曾见花儿彼此不容：
姐妹把兄弟轻蔑？
阳光紧紧地拥抱大地，
月光在吻着海波。
但这些接吻又有何益，
要是你不肯吻我？

尽管如此，现实的感受总比哲学的泛泛之论要强烈得多。雪莱生活在王权与教会的双重统治下，他要以诗来对这种统治和压迫下的种种罪恶现象作顽强的斗争。当诗人以坚决的革命者的身份来讲话的时候，他的诗就饱含着清醒的现实感觉，他的诗的刻画和描绘就中肯而有力，而他的声音也就成了广大人民的呼声。而且，诗人越是为现实所激怒，他洞彻一切的理性就越占上风，他的诗也就更加清晰地闪耀着现实主义的光芒。在卡色瑞统治期间，也是反动势力看来最强大而又稳固的期间，诗人已经能够看出自由的刽子手们是正在走向坟墓了；他能从“灭亡”“毁灭”“罪恶”和“财富”的欢笑的筵席上听到它们自我“毁掉！”的声音。他能看出上层建筑中的宗教和法律都是欺骗人民的，是“害人的陷阱”。他断言“奴隶和暴君原是双生的仇敌”，因为，他相信，只要奴隶不肯自居为奴隶，暴君也就不存在了。他看到唯有“饥饿”和“辛苦”的人才是自由女神的侍奉者，因此，他劝告他们不要为那“合伙的打劫”伸手支援，因为“你们是自由的儿子，只为她而战。”

诗人无疑是爱憎分明的。在他的笔下、他的诗中，他全力歌颂光明和未来，又全力痛斥一切剥削、伪善和恶势力。诗人对人类的压迫者“帝王”和精神的奴役者“教士”投以最深刻的憎恨：

但愿自由人能把这名字：“帝王”，
践踏为纤尘！不然，就写在土里，
好使这污渍在名誉之页上
有如蛇蝎的足迹，将被风的呼吸所抹去，被沙土从后面覆盖！
对于教士，他说：
哦，但愿智者能以他们的头脑
照明这幽暗的世界的大厦，
使“教士”，这苍白的名字，退缩到
地狱里：这才是它原来的家，——
它本是魔鬼渎神的一声嘲笑。

诗人对于未来，对于人的光明品质从没有丧失过信心。他相信，是愚昧和欺骗使人民暂时尊奉了“压制”和“压制者”了，只要一旦自由的概念从人的精神深处把“智慧”引来，人类就会凭这智慧而获得解放。

在《世界上伟大时代重又降临》一诗中，雪莱表现了他一贯持有的思想，即世界的黄金时期是在未来，而不是过去；他相信在未来，帝国和宗教都将成为“残梦的遗迹”，财富和战争再也不至于蹂躏人类了。这是多么真实和响亮的预言啊！在《虐政的假面旅行》一诗中，诗人完全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规定了“自由”的内容。什么是自由呢？对于工人，自由就是面包、衣服、炉火和享有一个快乐而整洁的家庭；自由就是对富人的“一种克制”；自由就是合理、智慧与和平；自由是爱情，它的明灯是科学、诗歌和思想。由此看来，早在一个半世纪以前，雪莱就已完全明白了：“自由”不能是一个抽象概念而是有丰富的内容的，自由作为一种精神状态，也必须有其物质基础，贫困的人们是谈不到自由的。因此，他号召工人阶级：

起来吧，像睡醒的狮子，
你们多得无法制服；
赶快摇落你们的锁链，
像摇醒睡时沾身的露——
你们人多：他们是少数。

这一切为社会历史的不朽灵感所照耀着光辉的思想，是多么的宝贵啊！最后我们不得不提到的是雪莱的一首早已传遍世界的登峰造极之作——《西风颂》

哦，犷野的西风，秋之实体的气息！
由于你无形无影的出现，万木萧疏，
似鬼魅逃避驱魔巫师，蔫黄，黧黑，
苍白，潮红，疫病摧残的落叶无数，
四散飘舞；哦，你又把有趣的种籽
凌空运送到他们黑暗的越冬床圃；
仿佛是一具具僵卧在坟墓里的尸体，

他们将分别蛰伏，冷落而又凄凉，
直到阳春你蔚蓝的姐妹向梦中的大地
吹响她嘹亮的号角
给高山平原注满生命的色彩和光芒。
不羁的精灵，你啊，你到处运行；
你破坏，你也保存，听，哦，听！……

像你以深林演奏，请也以我为琴，
哪怕我的叶片也像森林的一样凋谢！
你那非凡和谐的慷慨激越之情，
定能从森林和我同奏出深沉的秋乐，
悲怆却又甘冽。但愿你勇猛的精灵
竟是我的魂魄，我能成为剽悍的你！
请把我枯萎的思绪播送宇宙，
就像你驱遣落叶以催促新的生命，
请凭借这韵文写就的符咒，
就像从未灭的余烬喷出炉灰和火星，
把我的话语传遍天地间万户千家，
通过我的嘴唇，向沉睡未醒的人境，
让预言的号角奏鸣！哦，风啊，
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诗人笔下的西风，既是摧枯拉朽，破坏旧世界的革命力量的象征，又是传播革命思想、春天消息的媒介。洋溢在诗行中的，不仅是对西风神威的礼赞讴歌，更突出的是诗人对于未来的希望和愿为这个希望的实现而献身的精神。这是一种充溢着活力的、渴望战斗的灵魂的呐喊。诗人最后所发出的预言，便是诗人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哦，风啊，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这闪耀着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光辉的诗句，已经响彻全世界各个角落，成为一切正在为人类进步事业斗争的人们的心声！

清华之气与儒雅之辞

如果我们说雪莱是秉持着牛津之精神而在人文主义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并最终与之分道扬镳的话，那么更早一些的一位牛津学子培根则更多地体现了一种真正牛津精神的文化内涵。如果我们说雪莱的语言风格是激昂的豪迈的，那么培根的风格则是庄重的，敦厚的。他们都各从一个方面很好地体现了牛津人文精神的真正内涵并将其流露于文辞之间。

由于培根生长在一个贵族廷臣的家庭，不仅很早就了解到贵族社会的方方面面并顺利进入了上层社会，而且由于他受到了家庭的濡染和良好的教育，在他身上，逐渐培养和形成了一种贵族子弟所特有的清华之气，表现在他的文辞中，就是一种特有的儒雅风格。

让我们来看看他的这样一篇文章。从他的这篇《论辞令》文章中，我们可以很好地体会到他的那种儒雅庄重的风格。

有些人在他们的谈论中喜欢以反复善辩见称为有才，却不甚注意以能辩真伪而见称为有识；好像知道应当说什么而不知道应当如何思想是件可称赞的事情似的。有些人善于谈论某种平常可见的题目，可是缺乏变化；这种贫乏大半令人生厌，而一旦被人发现，则是可笑的。辞令中最可贵者是引起他人的话头的话；以及能节制自己的言语并转移到别的题目上去的那种话；如果能这样，那末这说话的人就可算是舞蹈的领袖了。在言谈之中，最好是有所变化。在当前的所谈之中参以辩驳，在叙事中夹以议论，发问中杂阶发抒己见，诙谐中和以庄语，因为一个人若是总在谈论一个题目，如今语所谓“鞭策过度”，则将使人厌倦了。至于诙谐的话，则有几种题目，应当避免，如宗教、国事、要人，任何人目前的要务，以及任何值得怜悯的事情皆是也。然而有些人却一定要锋锐辛辣，伤人之之心，以为不如此则他们的机智是迟钝了。这是一种应当制止的脾气：

童子，少使刺棒，多拉缰绳，即此之谓也。一般言之，人们应当辨别出来成与苦之间的不同。那喜欢讽刺，使别人怕他的话锋的人，将不能不因此而怕那人的记忆，这是一定的。多问的人将多闻，而且多得人的欢心，尤其是如果他能使他的问题适合于被问者的长技的时候为然；因为，这样他就可以使他们乐于说话，而他自己则可以继续地得到知识也。但是他的问题却不可烦琐惹厌；因为那就成了审问者的问题了。一个还应当注意，务使他人有说话的机会。不但如此，如果有人要霸占一切说话的时间，就应当设法把这种人移开而使别的人开言，就好像乐师们看见有人跳“欢乐舞”跳得过久的时候的所为一样。假如别人认为你知道的事件而你假作不知的话，则以后你所真不知道的事情，人家也要以为你是知道的。关于自己的话应该少说，而且应当谨慎择言。我认识一个人，当他说及他所看不起的某人的时候，常说“他一定是个智者，因为他关于自己有那么多的话说。”一个人称扬自己而不显丑态的唯一的时候，就在他称扬别人的长处的时候，伤及他人的话应当少说，因为谈论应当像一片广田，人可以在里面东西行走；而不应当像一条大道，

直达某家的门口也。我知道有两位贵族，都是英国西部的人；其中的一位喜欢菲薄他人，但是在家中宴容的时候却总是肴撰极丰的；另外的一位常常问那些曾经与宴的人，“老实告诉我，在他的席上没人受他的嘲弄和玩笑么？”对这个问题，那作过客的人就答道：“有某事某事在席上发生了。”于是这位贵族就说：“我早就料到他会把一桌好筵席弄坏的。”慎言胜于巧辩，用适当的话向我们与之交涉的人谈话是比我们言辞优美、条理井然还要紧的。一个人若会说一篇滔滔不绝的言辞，而不善于问答，则显得他的说话迟滞；若善于应答而不能作持久的而有始有终的言辞，则显得其人的言语之浅薄无力。这就如我们在动物界所见的一样，最不善走者却最敏于转身，如猎犬与野兔问之分别是也。在说到正题以前叙述许许多多枝节话是可厌的；若全然不顾枝节，则又太率直了。

读这篇精彩的演讲是一种享受，从中我们不仅可以感受到某种绰有余裕和天马行空的洒脱，某种庄重典雅而又优美动人的格调，而且我们不得不拜倒于其见识的广博及其学识的丰富。而这一切正是一种典型的牛津风格的再现。培根正是在牛津大学三一学院里濡染并形成了他的这种并非独具但却杰出的风格的。

当然，我们纯粹地赞美这种风格若不说是没有根基，也是浅薄的。因为我们忘掉了在这里面所深深涵蕴的人文主义精神之灵光。如果我们看看他的《论学问》、《论美》、《论荣誉》、《论无神论》、《论友谊》、《论人的天性》等文，我们就不难发现贯穿于其中的某种人文主义的风神——那种对于知识的渴求和探索，对于真理的追求以及对于自由的向往。对于人的美德，培根说：“没有一件恶德能和被人发现是虚伪欺诈一样使人蒙羞的。”对于真理，培根的议论更是精妙，见解更是独到：“可是‘真理’这东西可说是一种元隐无饰的白昼之光，世间的那些歌剧、扮演、庆典在这种光下所显露的，远不如灯烛之光所显露的庄严美丽。真理在世人眼中其价值也许等于一颗珍珠，在日光之下看起来最好；但是它绝够不上那在各种不同的光线下显得最美的钻石和红玉的价值。……然而这些事情，无论其在人们堕落的判断力及好尚中是如何，真理却教给我们说：研究真理，认识真理和相信真理乃是人性中最高的美德。”

是的，探索真理，认识真理，相信真理和坚持真理，这正是激发人们向上的人文主义精神的真正底蕴。

如果说人文主义在培根那儿还显得很温柔敦厚的话，那么到了雪莱那儿则是走得太远了。同样，如是就语言风格而言，培根是儒雅庄重的话，到了铁娘子撒切尔夫人那儿则又变得雄放了，显出某种大气和磅礴来。

第三部分 文采风流

——演讲的艺术与幽默的艺术

谈话是一门艺术，演讲也是一门艺术，幽默更是一门艺术。在或庄或谐、或露或隐的文字背后，说不尽的文采风流汨汨涌出……

第八章 腹有诗书语自华

——演讲的若干准备与技巧

在使用一个漂亮的词语之前，请先给它成个位置！

——摘自（牛津格言集）

演讲准备的七个步骤

我们经常会惊叹于牛津学子的滔滔辩才，但我们却往往忽视了一点，那就是，他们并不是天生的；真正的辩才，是从严格训练中而来的。

做任何事都应当有个计划。所谓“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正是这个道理。如果没有一个事先制定好的，周密而系统的计划，那些意义重大的人类努力就不会取得成功。譬如建一幢高楼，不可能起于一旦，成于一旦，而必须首先有一个全盘的考虑和规划，诸如确定建楼目的、选择建楼场地、绘制蓝图、招标、备料、施工等步骤，然后按此规划逐一做去，才可能把高楼建起来。

演讲也正如建楼，也需要一个准备的过程，这是你通向成功演讲的必由之路，我们把这个艰苦的或者还有些刻板的过程大致划分为七大步骤，即选择题目、确定目的、确定要点、归纳材料、收集辅助资料、拟定提纲和预讲七步，下面我们将逐一展开、予以阐发。当然，如果你是一名经验丰富的演讲者，是大可不拘泥于这些步骤的，因为你已经可以自如地把它们运用到演讲的准备工作中去，自然地从一个环节过渡到另一个环节。但是，如果你是一名初学者，最好还是一丝不苟地按部就班地做下去，或许那样是对你大有神益的。

1. 选择题目

对于一个演讲者来说，首先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讲什么？这个问题的实质是：我没有一篇时间适当而又符合特定要求的现成的演讲词。事实上，只要我们细想一下是不难找到可供演讲的题目。比如，几乎每个人都有某些特殊的兴趣：一种业余爱好，一篇写得很成功的论文，在生活中学到的某一技艺，从一本书中获得了某一感受，等等，都可以作为演讲的素材。因而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如何下一番苦功夫把题目变成演讲词。

选择题目应顾及听众所需要使听众从中获得教益及有趣的或某种娱乐性的知识。如果你的演说属于说服、劝诱性质，就应当选择那种令人听之折服的题目。如果你是一个被邀请去做演讲的专家，对你来说这并不成问题。然而，如若你只是个正在学习演讲的人，就应该首先分析你的听众，然后再确定一个适合他们的题目。由于听众中的一些人——你的同学和你自己可能完全相似，所以你可以询问自己：“我喜欢听关于哪方面的演讲？”（或：我不喜欢听关于哪方面的演讲？）据此来决定题目的选用。

2. 确定特定的目的或目标

任何成功的演讲应做到目的清楚，亦即目标明确。一次出色的演讲首先要了解听众的特殊要求，并且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这种要求上去。而大多数拙劣的演讲者并不清楚这一点。

在听众中发现你所期望的特殊要求，是极其重要的环节，因为它决定着你的准备演讲的其它步骤。抱有明确目标的演讲者如同一个有目的的旅行者，他首先要确定旅行的目的地，然后拿出地图、选定路线、计算时间、确定中途休息点、用餐、给车加油、筹算旅行费用以及携带哪些衣物。

演讲的一般目的是对听众进行说服教育。而特定的目标则表明你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的意图，比如，你的目的是为了听众相信该国家是安全的，或者你的目的是为了驳斥西方国家关于自由与人权的元耻谰言，等等。这都属于特定的目的，具体的要求，是与演讲者本人的意图直接相连的。

作为一个演讲者，如果不具备这样一个明确而具体的目标，他非但不大像个有目的的旅行者，反倒如同那种到了星期日才想起开车的人：星期日开车的人心中无数，没有目的。他既无事先计划好的往返日期，也不知道确定哪几条旅行路线。而且，他还往往成为那些有目的的司机的障碍。

有些演讲者事先没有精确周到的考虑，临时抱佛脚，不知道听众对他的演讲有什么要求，不清楚在演讲中将要说些什么，也不能准确地计算出演讲需要多长时间，等等。可以想象，这样的演讲无疑会令人生厌，即使不是这样，听众也会感到不知所云而如坠五里雾中，这种演讲就像那些于瘪乏味的哲学课一样，使学生既感到枯燥又提不出问题。

3. 确定要点

如果你心目中有了一个可以引起听众反响的明确目标，并且也掌握了有关演讲题目的必备知识，那么，这一步就易如反掌了。应当注意的是，要点必须鲜明，这样才能达到预定的目标。

假如你要想在听众中通过发行新的学校债券的建议，那么你就应当至少使他们相信以下各点：一、现在我们学校的校办工厂业已过时，拥挤不堪，难以继，等等。二、发行的新债券的提议如能通过，将会救活这个工厂，使它走出低谷、重新振兴。三、新债券的发行是改善学校的最切实可行的方法。

如果你清楚了自己的目标，就应该寻求听众的反响，而不至于茫然若失，不知所措。这样，你就能够确定所要采取的必要步骤。

4. 归拢所掌握的材料

在明确了演讲的特定目的和为实现这一目的所确定的要点的基础上，就要集中自己所掌握的材料，用以阐明自己的要点。

坐下来准备好笔和纸，写出那些有助于演讲的真实可信、饶有趣味的每一事实、数字、对比和例证。一般说来，行之有效的办法是把一个事实或一个例证，分别记在一张卡片上，这样在最后定稿时，就便于你反复推敲，决定取舍。

你在记录每一论证材料时，应力求做到精确无误。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你在演讲时就很可能含糊其辞，这样只能使听众失去对你的信任感，而这就注定了你演讲的失败。比如我们列举时间，决不能用“很久以前”，“大约20年左右”等等模糊两字的模糊语，而必须达到这样的精确度，即如“1976年7月28日，……”或是“三小时以前”等等。

5. 进一步收集辅助性资料

如果要写成一篇内容丰富而生动的演讲词，尚需进一步充实自己的原有资料，做一些深入的研究工作。这通常是指深入到图书馆中去查询资料。如果你可以较自由地使用一个较好的学院图书馆，那将是非常幸运的。注意：研究工作是绝对必要的，你必须去搞研究。要知道，那种仅仅靠坐在屋里绞尽脑汁，而没有经过走出去进一步收集资料的准备过程所做出的演讲，或许偶尔能够取悦于听众，但一般说来，成功的希望是很小的。

应当强调指出的是：尽可能多地收集材料。你应该占有的材料要远远超过演讲时所需要的材料。头脑中要装满你所要讲的内容，并确信自己已经掌握了所要演讲的全部材料。记住：一位经验丰富的演讲者在准备演讲材料时，面临的困难往往不是使用哪些材料，而是删掉哪些材料。应该努力去创造理想局面，演讲中所使用材料的实际数量与所掌握材料的多少应成正比，正如

冰山浮在水面的大小与其沉在水面下的大小成正比一样。

6. 拟定提纲

收集到足够的材料以后，在每张卡片上记下一个观点，根据所要阐述的要点再将卡片分类，然后拟定出演讲提纲，把提纲中的各论点分开写，每一论点下面又有它的分论点及其论证材料。在这之后，就可以考虑出一个出色的开头和结尾。不过，拟定提纲时首先应该考虑这样一个特定的目的，根据提纲可以进行预讲。

7. 预讲

到目前为止，我们主要考虑的是有关演讲的相当机械而艰难的准备工作。现在我们要接触一个比较富有活力的、不那么机械的领域，这就是预讲阶段。处理这个问题往往因人而异。一些人依据提纲反复进行口头表达练习，每次都要变换着措词，这样做可以记住演讲提纲中的一系列观点。当你多次练习过后并且对于自己的练习感到满意和兴奋时，你就可以胸有成竹地走上讲坛了。这时，那些应讲的东西就会有有条不紊地浮现在你的脑海之中，并且能用自己已经习惯的语言很流畅地表达出来。毫无疑问，这种进行得自然而流利的口头表达练习很能收到所期望的效果。

另一些人用录音机把依据提纲做的一遍或几遍演讲练习录下来，再根据录音整理成文字，之后再对形成文字的演讲词删改和润色，并且，反复预讲改定的讲稿，直到它完全变成所要演讲的东西。用这种方法写成的手稿较之一开始就写成书面文字的手稿更容易适合口头表达的风格。首先进行口头练习，然后形成文字，这两者不可本末倒置。注意，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上面提到的两种方法，一般而言，似乎第一种方法更为可取，因为当演讲者和听众实际交际时，便于进行临时发挥，从而收到更好的效果。如果的确需要使用讲稿，建议采用第二种方法。

一般而言，你的演讲——无论是指定的还是被邀请的——都是有时间限制的。因此，预讲要尽可能接近实际演讲。如果演讲需要的时间较短，就必须将材料压缩；反之，如果演讲需要的时间较长，就应该增加一些材料。

在这里需要提出来加以强调和阐述的是：要使预讲接近实际演讲，就要努力做到以下几点：一、预讲时要站着，大声讲。坐在写字台前反反复复地朗读记录的卡片，是与预讲相去十万八千里的。因为这种做法只能算是在进行某种研究或“做某种准备”，而不是在进行熟悉真实过程的预讲。二、预讲时要使用在正式演讲中所需要使用的一切材料。正式演讲时你使用 35 毫米的幻灯片吗？使用地图，黑板或教学板吗？使用高架电影放映机和图表吗？那么在预讲中也要使用他们。这就是说，你必须尽量做到“全真模拟”，即便你现在所穿的衣服也应是上场时的服装，而决不要做“缺席审判”。三、在一个与你正式演讲的房屋规模、大小、类型都相同的房屋或大厅里进行预讲。你能进入进行正式演讲时所用的房屋并在那里至少预讲一两次吗？如果你有幸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在进行正式演讲时，你就很容易因某种熟悉感和亲近感而较快地找到感觉，进入状态。如能这样，那么你的演讲就已经有了一半成功的把握；四、尽可能在听众面前预讲，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让你的夫人、朋友、秘书、同僚听你的预讲，听听他们的批评和反应。他们是否听明白了你的演讲？你的演讲把他们说服了吗？他们认为你的表情和声音是否适当？你有没有什么习惯性的特殊嗜好使他们感到厌烦？你的服饰看上去还能给观众以某种美感吗？

总之，在你准备演讲时，必须遵循上述这七个将引导你的演讲走向成功的步骤。请一定不要绕开这些步骤而想走捷径，一旦你走了捷径，很可能就会误入歧途。因为捷径之中往往就隐藏着陷阱。

演讲的心理准备及激发

有人问德摩斯梯尼，一位演说家最主要的才能是什么？他说，表情。其次呢？表情。再其次呢？表情。

在某种程度上，演讲者的心理素质决定着他是否能够成为成功的演讲家。很难想象，一个心理素质糟透的演讲者能够自始至终满怀信心地进行他的演讲，或者能够很好地控制和调动听众的情绪。因此作为一个演讲者，是有必要进行一些心理准备和心理素质的训练的。下面，我将这个问题从三大方面进行一些必要的阐发。

一、心理的定位

同一句话，由不同的人说出，其含义大不一样。黑格尔这句名言的原意是指同一语言形式可凝聚深度和广度都相去甚远的内容。比如同样是一句“我爱祖国”，由小孩说出和由学者说出，其份量是大相径庭的。但黑格尔的话也可借来表述另一种情况：同样的话，凝聚着深度和广度完全相等的内容，仅仅是因为它是由不同的人说出的，而使听众以为其含义大不一样。如一位威信较高的讲师和一位研究生相继讲授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那位讲师的确讲出了不少东西，而研究生讲课的新意也不在其下，可课后大多数学生却认为那个研究生的学术水平太低。这种情况是怎么造成的？主要是由“注意层次”的不同造成的。

优秀的演讲是思想深刻、观点新颖、材料丰富、条理清晰、语言生动的。听这种演讲时，听者的注意力高度集中，情绪高度兴奋，既获得启迪，又欣赏了美。反之，糟糕的演讲既然很少可取之处，对听众来说必然无异于一种惩罚。其注意力无法集中，情绪也提不起来，心理上充满了厌恶和抗拒。一个人对上述情况有了经验之后，他会很自然地把演讲者分成不同的类型：优秀，一般，糟糕等。同时，他的注意也被训练出与此一一对应的不同层次：主动配合，若即若离，抗拒。当一个新演讲者站在面前时，听者会很自然地去寻找一些标记，帮助确认演讲者所属的类型，同时决定自己的注意层次。假如发现的只是些“糟糕型”标记，那么他会不由自主地产生“抗拒”的情绪，同时对演讲进行“恶劣化”的评价——即不再注意或不大注意演讲可取的成分，而对演讲中的错误缺点却变得异常敏感；假如发现的只是“优秀型”的标记，那么他可能对演讲者说出的一句平而常之的话都会感到余味无穷，而演讲中的若干或隐或现的缺点却被他悄悄地从大脑的“兴奋灶”处过滤掉了。

因此，演讲心理的要素之一就在于：应该拥有一定的标记，用来向听众提供信息：这是“优秀型”的演讲——要用高级的注意层次来对待。这样，听众的心理活动就产生定向反射，形成了特殊的期待类型：深刻化倾向（努力控制演讲中哲理）、生动化倾向（努力感受演讲中的情趣）……而演讲所企图传递的其它种种信息在这个基础上才得以顺利地听众接受。这种帮助决定听众注意层次的标记的确立，有人称之为“定位”。

常见的“定位”方法主要有：

仪表定位——一个人的仪表能给人以联想：白发苍苍常使人感到经验也许丰富，服装花哨常令人觉得浅薄，动作拘谨又常意味着初学后进。因此，演讲者的衣着、动作要以一种明朗而不刺目的美，稳健而不板滞的节奏来吸

引听众。

语言定位——这包括语音和文字两个方面。语音定位的基本要求是明白流畅。明白是指要用听众都听得清楚的普通话，尽量克服方言音的影响，避免说错字音，前面所说的那位研究生主要就是由于表达不流畅而影响了学生的注意层次。流畅是指语流与节奏既不能快得出现“结巴”，又不能慢得一句三换气，语流速度应与听众的心理节奏相适应。文字定位的基本要求是准确美观。假如一位教师既不写错别字，又能有一手漂亮的书法。布置合理的板书，那么将大大提高学生对他的信任感。

情绪定位——这点相当重要，有不少人自己看书看不进去，而听好的演讲却领会得很好，其中一个因素就是因为是在听讲中，讲与听有情绪上的交流，而看书则没有。情绪定位的要求是应该充分表现出自信和热爱。演讲者的自信力首先会影响自己能力的发挥，国外的心理学家曾用五个兵士作过测量平均最大握力的试验，先录出正常情况下为 101 磅；对他们催眠后，暗示他们是软弱无力的，于是只有 69 磅；随后又暗示他们很有力量，这次测得结果竟达 140 磅。因此可以说，一个“承认失败的人，在开始以前已被打倒。”演讲者表现的自信力同样将影响听众，“我是胜任愉快的”的信息很快会转化成听众头脑中，并进而引出高层次注意类型，演讲者表现出的热爱也是不容忽视的。古罗马诗人贺拉斯说得好：“只有一条唯一的路可以打动人的心，就是向他们显示你自己首先已被打动。”“对这一学科甚有兴趣”的概念常与“对这一学科很有研究”联系在一起这问题“使主讲常感兴趣”也很容易导向“也会使我感兴趣”。

二、心理的兴奋

“心理定位”固然重要，究竟只不过是第一印象和外在感觉的东西，更重要的是在于演讲内容本身。在说与听、刺激物与感应器的矛盾运转中，更使感应的马达不停地运转，刺激物就应不断输送足够的电能。这就要求：

刺激清晰

即演讲内容的清晰，包括：1.主题集中——在一次演讲中，不要期望解决太多的东西，因为多而杂的刺激在听众的神经组织中产生的痕迹一来无法得到强化，二来往往会互相抑制，因此，演讲要有一个核心。2.要注意逻辑——富有逻辑的演讲，能使听众既听得懂又记得牢，尤其是讲演一些难度大、内容多的题目，缺乏逻辑安排的演讲就是一堆没有用一定编码程序的信息，刺激感应器后，不仅使感应器降低了感应性即接受刺激了灵敏度，而且易使感应器发生疲劳，导致兴奋性抑制，注意力就不易再次集中。3.段落层次要清晰——清楚的层次易造成明朗的节奏。标明层次可用数字编号，也可用有规律的间隔反复或排比句式作为每段的开头。

刺激新鲜

新异的刺激最易被感应器接受并发生探究反射，新鲜的演讲最易为听众接受并激起其积极的思维活动。因此，演讲者要不断追求刺激的新鲜，即：1.思想的新鲜——对于已掌握一定知识和能力的大学生来说，他们希望能时时听到令人耳目一新的见解；但对年龄太小的学生来说，过分的新鲜将是难以接受的，因为太陌生了。2.事例的新鲜——这种新鲜无论谁都欢迎。但是，能使低年级同学听得津津有味的掌故，却可能使高年级如同嚼蜡；哲学系学

生很熟悉的哲人名言，却能令数学系学生耳目一新。因此演讲者的演讲既不能落俗，也不能过于逐奇追新，二者都有所偏颇。演讲者所追求的，应是相对新鲜。3.叙述方式的新鲜——与直线式教材相比，圆周式的教材更应讲究叙述方式的新鲜。基本内容的简单重复需要克服，叙述方式的雷同也应研究改进。比方说，大学可不可以尽量将讲授与调查研究结合起来呢？

贵有悬念

悬念是对暗示的动作要实行而动作的实际结果却又不确定的一种期望。悬念的出现可以一下子抓住听众的注意力。设置悬念可以运用对比、质疑，但后者即向听众的这种智力挑战却更为重要。英国牛津大学的一位心理学家柏西·布克认为：“真正的教学‘不是单方面的灌输’，而是使他们自己去发现，甚至假如他们失败了或发现错误了，也比自己造成伤害好，因为加强了使用心理的习惯。”在向听众提出问题，要注意两点：一是提的问题要有启发性，不经思索就能答出的问题最好不要提；二是不要以为所提问题必须是听众通过思考能回答的。比如世界知名数学家陈景润，他的中学老师（演讲者）在向（学生）听众提出问题这一点上就做得很好。他在课堂上提出世界著名难题“哥德巴赫猜想”，不仅在当时使学生立即集中了注意力，使课堂气氛活跃

了起来，还为未来的大数学家在心理上作了训练。

三、心理的休息

一些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兴奋与休息必须交替进行，才能形成张弛有致的心理节奏。

这种节奏首先来自整个演讲的时间的长短相宜。马克·吐温说过这样一个故事：某次他听一位牧师传教，很有好感，于是准备捐献一块美元；传教进行了一个小时，他减去了半块美元；传教至一个半小时，他决定分文不给；当牧师总算结束了长达两个半小时的传教时，马克·吐温反从捐施盘里倒拿了一块美元作为时间损失的补偿。可是我们的某些演讲者却不管有无必要，一做报告就是几个小时，结果是台上唇干舌焦，台下鼾声四起。

要保持这种节奏还应考虑预定时间的长短。因为对于听众来说，或许是因为“习惯成自然”，他们的生物钟常被卡死在一个时段内，一旦这一段结束，他们的生物钟就会自动地通知他“解除戒备”，即由有意注意转向无意注意，进入休息状态。

即使在一次演讲中，也应该注意兴奋与休息的互相交替。国外心理学家曾作过这样的试验：找出常人能够多长时间地把他的头脑完全集中在一件事上而不至于被其它思想所打扰或打断，结果是11秒。这等于说，听众将不得不每隔11秒即把他们的注意力猛地拉回来注意你说些什么。这种强制性的注意很容易产生心理疲劳，所以，演讲者每隔一段时间就得设法将这种疲劳消除掉。具体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如“抒情的插曲”和幽默逗趣的语言。柏西·布克认为要消除这种疲劳就应“变换主题”，这话虽有不少合理的因素，但提法却不尽妥当。因为不断“更换主题”势必造成主题散漫，使听众难以接受。我们认为，较稳妥的提法应是善用“抒情性的插曲”。这一点我们从任何一位著名的演讲家的演说词中都可以领略到。即使是政论型的讲演，也往往是文采斐然的，并且常常在讲演中间穿插大段情绪激昂、气势汪洋的激情之词。比如丘吉尔的演说和拉·甘地的演说都是如此。

演讲的结构与形式

牛津人士在谈到自己，演讲艺术时，往往提到这样一点，即在一篇成功的演讲中，演讲的结构与形式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我们探讨这一结构形式所应具有的一些普遍性的原则，无疑也是对演讲的成败具有重要的意义的。

一、演讲结构的一般原则

演讲结构的一般原则，是演讲内容在结构上的基本要求。演讲内容在结构上包括演讲的开头，演讲的主体和演讲的结尾三个部分。其结构原则大致与一般文章的结构原则一样。但是，由于演讲是具有时间性和空间性的说话活动，因而演讲结构的原则还具有其自身的特点。这个特点在演讲的开头和演讲的结尾表现得尤为明显。

（一）演讲的开头

演讲的开头要具有吸引力，美国演说家洛克伍德·桑佩曾经说过：“在整个讲话过程中做到轻松地、巧妙地与听众交流思想是困难的。然而，做到这一点的关键是讲话开头的用字和表达。”从心理定位趋向来看，听众通过对优秀演讲和低劣演讲的多次认识并由此形成经验之后，在心理上对后来的演讲则往往只凭某种记号来分配注意力和确立评价态度。演讲的开头是演讲者向听众出示的第一个，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记号，这个记号是否能够表现出优秀演讲的特征即是否具有吸引力，对于演讲的成败往往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怎样才能使开头具有吸引力呢？瑞士作家温克勒说：“开场自有两项任务：一是建立说者与听者的同感；二是如字意所释，打开场面，引人正题。”这可以说是对演讲开头一般原则的最为中肯的诠释。所谓“建立说者与听者之同感”，就是促成演讲者与听众的思想和情感的一致。而所谓“打开场面，引人正题”，就是要开门见山，抓住听众的注意力。唯其如此，才能迅速地搭起“演讲者与听众之间的一座桥梁”，从而为整个演讲的成功奠定基础。在演讲史上很多优秀演讲的开头都体现了这个原则。1883年3月17日恩格斯发表《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即是一篇著名的演讲。比较一下这篇演讲的草稿和定稿的开头，我们对演讲开头的一般原则便可获得明确的认识：

就在 15 个月以前，我们中间大部分人曾聚集在这座坟墓周围。当时，这里将是一位高贵的崇高的妇女最后安息的地方。今天，我们又要掘开这座坟墓，把她的丈夫的遗体放在里面。

（草稿）

3月4日下午两点三刻，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停止思想了。让他一个人留在房里总共不过两分钟，等我们再进去的时候，便发现他在安乐椅上安静地睡着了——但已经是永远地睡着了。

（定稿）

草稿的开头从马克思夫人燕妮的逝世谈起，这样略嫌离题并且人题较慢。在定稿中，恩格斯则开门见山地从马克思的逝世谈起，使听众在演讲一开始就沉浸于对马克思的缅怀与崇敬之中，从而达到演讲者与听众的思想和情感的一致。对于这一点，《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的演讲实践已经给予了

充分有力的证明。

无视演讲开头的一般原则，那就难以顺利实现演讲的意图。比如说，有的演讲一开头就是“党的‘十二大’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蓝图，一个伟大的前景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老生常谈，结果使听众注意力松弛，情绪低落，评价态度也不积极。更为恶劣的是，有的演讲者习惯于以“今天本来没有什么准备”之类的空话套话开头，则只能使听众对演讲产生反感。

演讲的开头并无固定的格式，或阐明主题，或说明情况，或介绍背景，或提出问题，或引用诗文，但一般原则是要具有吸引力。

（二）演讲的结尾

演讲结尾的一般原则是要给听众留下深刻的印象。演讲的结尾是对整个演讲的收束。结尾给听众的印象往往将代表整个演讲给听众的印象，言简意深、余音绕梁的结尾往往能够使听众精神振奋并促使听众不断地思考和回味，而松散拖沓、枯燥无味的结尾只能使听众感到厌倦并随着事过境迁而被遗忘。因此，演讲的结尾能否给听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对于听众确立评价态度具有重要的影响。

怎样才能给听众留下深刻印象呢？美国作家约翰·沃尔夫说：“演讲最好在听众兴趣未尽时戛然而止”。换一句话说，演讲最好在演讲达到高潮时果断收束，以此来强化给听众的印象。可以这样认为，这是演讲结尾的最为有效的方法。在演讲处在高潮的时候，听众大脑皮层高度兴奋，注意力和情绪都由此而达到最佳状态。如果在这种状态中突然收束演讲，那么保留在听众大脑中的最后印象就特别深刻。在美国独立战争前夕，国务卿裴特瑞克·亨利在弗吉尼亚州议会上的演讲便是采用这种方法结尾的。

我们的同胞已经身在疆场了，我们为什么还要站在这里袖手旁观呢？先生们希望的是什么呢？想达到什么目的？生命就那么可贵？和平就那么甜美？甚至不惜以戴锁链、受奴役的代价来换取吗？全能的上帝啊，阻止这一切吧！在这场斗争中，我不知道别人会如何行事，至于我，不自由，毋宁死！

亨利在给议会中屈服于英国武力的温和派以致命打击之后，把演讲推向了高潮。至此，亨利以“至于我，不自由，毋宁死”九个字戛然而止。致使全场愕然，随后就响起“拿起武器”的呼声。而“不自由，毋宁死”则成了美国人民争取独立与自由的名言。

演讲的结尾最忌冗长拖沓、画蛇添足。有的演讲在结尾时总是三番五次地说：“我讲得不好，请大家批评指正，”“再耽误大家一会儿，有个问题再强调一下”之类的话，这就势必引起听众的厌烦情绪，因而就可能冲淡给听众的印象，甚至会给听众留下恶劣的印象。

演讲的结尾也无固定的格式，或对演讲全文的要点进行简明扼要的小结，或以号召性、鼓动性的话收束，或以格言警句以及幽默俏皮的话结尾。但需强调的是，它的一般原则是要给听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二、演讲结构的技术手段

演讲结构的技术手段，是根据演讲的时空特点对演讲结构进行技术性处理。恰当地运用演讲结构的技术手段，有助于使演讲的内容构成更适合于演

讲内容的发表，从而提高演讲的质量。演讲结构的技术手段主要是对演讲结构的层次、演讲结构的节奏和演讲结构的衔接进行技术性处理。

（一）演讲结构的层次

演讲结构的层次是根据演讲的时空特点对演讲的内容和材料加以选取和组合形成一个顺理成章的层次结构。由于演讲是一种讲话活动，靠的是声音的传达而非文字的载体，因而其结构层次是无法凭借视觉加以把握的，而听觉对层次的把握又要受限于演讲时间的一维性。因此，演讲结构的层次比一般文章结构的层次具有更高的要求。

怎样才能使演讲的结构层次清晰明了呢？根据听众以听觉来把握层次的特点，显示演讲结构层次的基本方法就是在演讲结构中树立明显的有声语言的标志。以这种标志适时诉诸于听众的听觉，从而获得层次清晰的效果。1940年5月13日英国首相丘吉尔出任首相时的施政演说就是用的这种方法：

你们问：我们的政策是什么？我要说，我们的政策就是用我们的全部能力，用上帝所给予我们的全部能力，在海上，陆地和空中进行战争，同一个在人类黑暗悲惨的罪恶史上从未有过的穷凶极恶的暴政进行战争。这就是我们的政策。你们问：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可以用一个字来回答：胜利——不惜一切代价，去赢得胜利；无论多么可怕，也要赢得胜利；无论道路多么遥远和艰难，也要赢得胜利。

在这段话中，丘吉尔用了两个设问来树立标志，一个问政策，一个问目标，然后分别给予回答，观点十分鲜明，层次十分清晰，有助于听众更好地把握丘吉尔演讲的意图和内容。以反复设问来引导演讲，并以对这一系列设问给予回答来阐述自己的观点，使之在结构上环环相加，层层深入，这是设置语言标志的一种方法。此外，以排比句、过渡句等作为语言标志，也是使演讲的层次清晰明了的有效方法。1863年8月28日美国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在林肯纪念碑前的演讲，其中一连用了四个“我憧憬着有一天”领起的排比句，句式整齐，感情澎湃，收到了极好的演说效果。

（二）演讲结构的节奏

据心理学家研究认为：人听讲话的有效注意力每隔5~7分钟就会有所松弛。因此，演讲者必须适时地消除听众可能产生的兴奋性抑制，才能始终维持听众的有效注意力。

演讲结构的节奏，主要是通过变换演讲内容来实现的。演讲史上优秀的演说家几乎没有一个不长于使用这种方法。1984年7月27日林肯在华盛顿众议院的演讲尤为突出地表现了这一点：

前几天，佐治亚州一位参议员艾弗森先生，一个能说会道学问高深的人（我自己没有学问，只能这样判断）出乎意料地对我们严加斥责。他使用了《巴尔的摩美国人》认为的尖刻狠毒的语调。在他第二次发言以后，我两眼发黑，赶紧用手掐自己的身体，以确知自己还活着……

这是一篇反驳词。全篇大多是说理和论证，因而也就极有可能显得枯燥。林肯为了能够始终抓住听众的注意力，一边进行反驳一边插入讽刺、幽默的话，从而使整篇演讲有张有弛，节奏鲜明，产生了极好的效果。

总之，演讲结构的节奏既要鲜明，又要适度。平铺直叙，呆板沉滞，固然会使听众紧张疲劳；而变换内容过于频繁，也会造成听众注意力涣散。鲁迅说：“讲演固然不妨夹着笑骂，但无聊的打诨，是非徒无益，而且有害的。”所以，插入的内容应该是为实现自己的演讲意图服务的。

（三）演讲结构的衔接

由于演讲结构的节奏需要适时地变换演讲内容，因而也就容易使演讲结构显得零散。衔接便是对结构的松紧、疏密的一种弥补，它使各个内容层次的变换更为巧妙和自然，从而达到演讲在某种程度上的整合，而演讲富于整体感，是有助于使演讲的主题深入人心的。

演讲结构的衔接方法，主要是运用过渡段和过渡句。德国作家雷曼麦说：“衔接部分是十分鲜明直接地反映着某一种形势或是将要论及的问题的。这一部分必须同演讲内容有密切的关系”。1934年高尔基在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的演讲就非常巧妙地运用了这种方法来衔接演说的开头和主体：

我觉得，这里提到高尔基的名字，常常加上一些形容词“伟大的”“高大的”等等。……在这里，我们大家的年龄尽管差别很大，然而却都是同一个年轻的母亲——全苏联文学的孩子。

高尔基引用别人形容自己的话，显然是为了活跃气氛。但接着就以“我们大家的年龄尽管差别很大，然而却是同一个很年轻的母亲——全苏联文学的孩子”这一过渡句引入正题，使开头和主体过渡得极为自然，具有浑然一体的效果。

三、演讲结构的特殊形式

演讲的时间性和空间性，决定了演讲结构还具有其特殊的表现形式。演讲结构的特殊形式主要是指它的时间形式、空间形式和时间交错形式（运动形式）。

（一）演讲结构的时间形式

演讲结构的时间形式是利用听众听觉的时间一维性（即时间的方向是永远向前的，它不可能在任何哪一个地方暂停）来表现演讲内容的形式。但是由于时间本身是没有内容的，并且无法用语言文字固定在演讲结构中，所以，演讲结构的时间形式只有在演讲内容发表时才具有具体而确定的内容。也就是说，演讲的这种特殊形式只存在于演讲发表的那一段确定的时间里。在演讲中正确地运用演讲结构的时间形式，可以获得独特的演讲效果。

英国政治家赖白斯曾在伦敦参事会演讲关于劳工的情况。赖白斯在演讲中途突然停顿，取出了表，站在那里一声不响地眼看听众达72秒之久。正当别的参事员和听众都以疑问的眼光望着赖白斯的时候，他说：“诸位刚才所感觉的局促不安的72秒长的时间就是普通工人垒一块砖所用的时间”。演讲者在这里充分利用了演讲的时间条件，把时间作为演讲结构所组成部分。以具体时间来表现具体内容，这种方法有助于听众对演讲内容的理解。运用起来富有成效，致使当时伦敦的各大报纸都争相登载了这段新闻。

（二）演讲结构的空形式

演讲结构的时空形式是利用听众视觉的空间“三维性”（即空间是立体的，是有容积的，表现为长、宽、高三维）来表现演讲内容的形式。空间本身也是没有内容的，但在演讲内容发表时（当时当地），空间具有传递视觉信息的作用，因而恰当地使用演讲的空间形式，可以弥补声音艺术之不足。

（三）演讲结构的时空交错形式（运动形式）

由于演讲是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进行的，所以演讲的结构须随语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黑格尔说：“既然要产生一种活的实践效果，演说家首先要充分考虑到演讲的场合以及听众的理解能力和一般性格。否则，他们的语调就会由于对时间，地点和听众都不适合而不能达到所预想的实践效果。”这段话提出了演讲结构运动形式的依据。

1863年11月19日，美国国务卿埃弗雷特在葛底斯堡国家烈士公墓落成典礼上发表演讲。当时天气格外晴朗，景色宜人。埃弗雷特立即打消了原来的开头而改用这样的开头：

站在明净的长天之下，从这片经过人们终年耕耘而现在还安静
慈息的广阔田野放眼望去，那雄伟的阿勒格尼山脉隐约地耸立在我
们前方，弟兄们的坟墓就在我们脚下……

为了适应特定的语言环境，埃弗雷特即兴以描述风景的形式开始他的演讲，把壮丽景色与对烈士的崇敬心情融合在一起，使演讲一开始就显示出了强大的吸引力。1935年高尔基应邀在苏联作协理事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演讲，代表们一见到高尔基便长时间鼓掌，高尔基即兴说：“如果把花在鼓掌上面的全部时间计算起来，时间就浪费得太多了。”高尔基以此来取代原来的开头，使会场十分活跃。

一言以蔽之，演讲的形式，对于演讲的成败具有重要的意义。演讲结构的一般原则，是对演讲结构提出的基本要求；演讲结构的技术手段，是提高演讲质量的重要方法；而演讲结构的特殊形式，则是对演讲的特点有效利用。正确地认识和运用这些原则和方法，是完成优秀演讲的重要基础。

演讲与大众语言

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的语言，而且通常各个时代词汇的差异要比思想的差异大得多。

——摘自《牛津格言集》

演讲作为一门语言艺术，它必须考虑它所使用的这种媒体的形式，即它究竟是使用口语还是采取书面语，是用典奥的文言还是用流畅的白话。由于演讲作为信息传播活动这一性质的规定，而且由于演讲需要面对的是听众而不是读者，这些都使得演讲自然地走上了以大众语言作为媒介的大道，而把其它语言形式摒弃在纯粹科学是哲学论辩的“自留地”里了。

演说之所以最终选择了作为大众语言的口语形式，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必然性的。

首先，它在于书面语与口语的巨大差别及其适用范围上。口语和书面语虽具有源流关系，但书面语却是不适于演讲的文体。因为书面语需要一番“解读”才能最终被理解，而口语则不需要这个过程而可以立即被理解。有这样一个很生动的个例。一天傍晚，一对夫妇在屋里激烈地争吵。盛怒之下，丈夫脱口骂道：“该死的，我真该把你从牖里扔出去！”当然他并不能这样做。妻子一时茫然，莫名其妙。因为他丈夫的这半文不白的骂人话里，有一个该死的“牖”字。对于我们日常的说话而言，谁都不会想到要用这样一个典奥古雅的字眼的，除非是附庸风雅的文士拙劣地卖弄他的文采风骚！那么什么是“牖”呢？说白了，也就是“窗子”。很明白的！如果我们把那个“牖”字替换一下，那么这话真是司空见惯、不足为奇的。

这个例子或许只是一则笑料或是幽默，但它却生动地显示了白话与文言，口语与书面语之间的天壤之别。从另一个侧面，我们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书面语是“读”的语言，口语才是“讲”的语言。因此，如果在一篇演讲中书卷气太浓或是别出心裁地偶尔来两句古奥之词，那真是不叫人听了。

讲话是线性的一个系列——语言的系列，它是不间断地进行的。听者稍一停顿，就有可能间断思维序列而被远远抛在后面，更何况他还要费尽心思去琢磨那一个“牖”字呢？

其次，演讲之所以必须使用大众语言还在于口语作为一种语体具有自己的独特的特点，而这些特点正是它适于接受和表达的原因之所在。近年来的定量研究倾向于支持这样的结论：标准的口语文体和标准的书面语文体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那么口语文体究竟具有哪些特点，演讲在使用语言上应注意些什么呢？归纳起来，大致有如下数点：

1. 句式短小。这正符合演讲不宜使用过长的、冗繁的句子或句式的要求。
2. 使用通俗易懂的常用词汇。
3. 使用音节清晰、易于接受的词汇。
4. 多使用简略语。
5. 力图掌握运用一些流行的口头词汇。这些词汇如同季节一样，经常变化，富有生气和活力。
6. 恰当地运用“然而”“但是”“除了”“如果”等关联词，造成活潑生动的气氛。

7.多重复以突出重点。重复，是写文章之大忌，但在演讲中重复一些重要的句子或观点，可以加深听众的印象。

8.可以较多地使用那些表明个人倾向的词汇。

9.为适应听众智力变化的过程，应多选择一些带有引导性、启发性的内容。

10.必须强调和重复你要阐明的主要观点。

使用大众语言进行演讲，这是一个趋势，这也是演讲艺术必然的选择。

类比法的运用及技巧

类比法，是建立在类比推理基础上的一种逻辑方法。它要证明和反驳的论题或论据，或者全是一般性原理，或者全是具体的事实，因而它是用一种一般来证明和反驳另一种一般，或者用一种特殊来证明或反驳另一种特殊的方法。运用这种方法说明道理常常能做到深入浅出，把道理说得透彻明了。所以，人们在说理和论辩中常用这种方法。

有这样一个故事，很好地说明了类比法的妙处。一位学生问他的老师：“老师，多说话到底有没有好处？”他的老师回答说：“话要是说得太多，还有什么好处？比如池塘里的青蛙，整日整夜地叫，弄得口干舌燥，却从来也没有人去注意它。但是，报晓的雄鸡，只在天亮时叫一两声，大家听到了就知道天要亮了。所以说说话要说得有用处，要说到点子上。”在这里，这个类比法运用得既准确又巧妙，它有力地说明了一个极朴素的道理：说话不在多，而在于有用。同时它也是对那些多嘴多舌，喋喋不休的空谈家的辛辣嘲讽。

在世界现代史上，人们都知道第一颗原子弹是美国总统罗斯福拍板定案制造的，但是罗斯福在制造原子弹问题上犹豫不决时，是谁用什么方法促使他下定决心的这一点却鲜为人知。1939年10月11日，美国总统罗斯福默默地听着他的顾问萨克斯朗读一封爱因斯坦的来信。信中，对德国在原子弹实验方面遥遥领先表示忧虑，并要求美国在粉粹德国原子弹成功之前赶制出第一颗原子弹。当时，罗斯福举棋不定。于是，他的顾问萨克斯给总统讲了一件事。他说，当年拿破仑想征服英国，当时一位叫富尔的科学家建议他赶快制造蒸汽船，但是，拿破仑拒绝了富尔的建议，一意孤行，仍然使用帆船。结果终于未能横渡英吉利海峡，征服英国的愿望从此灰飞烟灭。听了萨克斯的一番话，罗斯福经过痛苦的思索，终于在19日决定制造原子弹。这里，萨克斯运用类比法进行劝说，无疑是极具说服力的。

类比法不仅在立论证明中可以运用，在反驳论证中也常常被巧妙地加以运用。在延安批驳王明的“左”倾路线时有一篇文章，就灵活地运用了类比法。这篇文章尖锐地指出：“‘拼消耗’的主张，对于中国红军来说是不合时宜的。‘比宝’不是龙王同龙王比，而是乞丐与龙王比，未免滑稽。”针对王明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反对战略转移及害怕“打烂坛坛罐罐”的错误路线，文章驳斥道：“如果我们丢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战胜敌人，加恢复土地，再加扩大土地，这是赚钱生意。市场交易，买者如果不丢失金钱，就不能取得货物；卖者如果不丢失货物，也不能取得金钱。革命运动所造成的损失是破坏，而其取得的是进步的建设。睡眠和休息丢失了时间，却取得了明天工作的精力。如果有什么蠢人，不知此理，拒绝睡觉，他明天就没有精神了，这是蚀本生意。”“不在一部分人民家中一时地打烂坛坛罐罐，就要使全体人民长期打烂坛坛罐罐。”在这里，文章用市场交易中的买和卖，日常生活中的睡眠和休息的相反相成关系作类比，把丢失土地和不丢失土地，打烂坛坛罐罐与不打烂坛坛罐罐的辩证统一关系讲得一清二楚，从而使人们清楚地认识到王明路线错误之所在。

在谈话中应用类比具有极强的说服力。但如果运用不当，也会造成机械类比。所谓机械类比，指的是论据和论题之间的缺乏有机的、必然的联系，而只是表面的、偶然的联系。值得注意的是，机械类比是许多诡辩家常用的

一种方法。据说，古罗马时代，有一次奴隶造反，政府的议员梅涅里·阿格利巴就用他的貌似类比法的形式进行诡辩，欺骗暴动的奴隶。他对暴动者说：“你们每人都知道，人体有各部分，并且各部门都有自己的一定职责，双脚走路，大脑思想，双手工作。国家也是一个机体，里面每个部分都有自己的职责。贵族是国家的大脑，双手拒绝工作，大脑拒绝思维，人体就要死亡。同样道理，如果百姓拒绝尽自己的义务，国家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梅涅里的这段说教，从形式上看似乎是类比，但实际上是诡辩，因为他把人的生理现象和社会现象作了不恰当的类比。两种现象只有形式上的相似，而无本质上的联系，因此类比失当。

总之，我们不仅要善于运用类比法，还要善于识别类比中的诡辩，这样才能使我们的谈话或论辩更有力，更能说服人，永立于不败之地。

诡辩及其反驳

没有错误的推论我们就无法推论。

——摘自《牛津格言集》

提起诡辩，有些人总是把它和胡搅蛮缠联在一起，并且大有不屑一顾、不值一晒的慷慨和义愤。殊不知，高明的诡辩却是逻辑严密的一系列论证过程，非得慧心明目不能攻破。比如著名的芝诺诡辩，原本就是和哲学联系在一起的，而且时至今日，他的证明“阿基里斯永远追不上乌龟”以及“飞着的箭不动”等命题中所包蕴的某些光辉思想，对于我们仍是有着启发意义的。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

但是诡辩不是科学，而是反科学。正如黑格尔所说：“诡辩这个词通常意味着以任意的方式，凭着虚假的根据，或者将一个真的道理否定了，弄得动摇了；或者将一个虚假的道理弄得非常好听，好像真的一样。”这是对诡辩极其简要精确的诠释。诡辩者总是从主观意图出发，把次要夸大为主要，把现象说成本质，用支流掩盖主流，玩弄十分狡诈的手法为其谬误进行似是而非的论证，达到迷惑他人的目的。

为了对诡辩进行有力的反驳，我们有必要掌握一些常用的反驳技巧。分别叙述如下：

一、事实胜于雄辩

希腊著名哲学家芝诺有一系列的诡辩并因此而知名。他说什么“阿基里斯永远追不上乌龟”“大小两个轮子的直径一样长”，对于这些荒谬的结论，尽管它的逻辑论证是多么严密，但只要用事实的利剑一刺，它就全部坍塌。据说，战国时宋国雄辩家兜说是“白马非马论”的创始人，他坚持这一诡辩命题，并在参加齐国稷下学宫的学术大辩论中，用滔滔不绝的宏论战胜了所有论敌。一次，他骑着白马通过边境关卡时，被守关兵士拦住纳马税。于是他施展他的雄辩术，大谈“白马非马”的道理，可是在场的百姓只是笑，谁也不相信马不是马。最后，士兵坚持不纳马税就不放行，兜说只有乖乖地掏出了腰包。

这说明诡辩不管披上什么外衣，总是经不起事实检验的。事实是对诡辩最有力的驳斥。

二、抓住实质击中要害

俗话说：“打蛇要打七寸。”同样，对诡辩的反驳要抓住实质，击中要害。实质性问题总是要害问题，实质决定了问题的基本倾向，抓住它，就可以置诡辩于死地。例如：无产阶级的叛徒托洛茨基在混入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时，曾发表过这样的声明：“我加入布尔什维克党这件事本身……，已经证明，我已经把过去所有那些使我和布尔什维主义分开的东西放在党的门口了。”他那些反党的东西，或者抛弃，或者保留，二者必居其一，为什么要说“放在党的门口”呢？这是一种模棱两可、含糊其词的政治诡辩花招。斯大林同志就这件事驳斥道：“他把这些东西放在党的门口是为了储藏起来以备将来在党内进行斗争之用呢？还是干脆把它们拿去烧掉？看样子，托洛茨基把它放在党的门口是为了储藏起来。否则，如何解释托洛茨基入党后不久就跟党发生的并且直到现在还没有停止的那些连续不断的意见分歧呢？”斯大林同志的反驳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托洛茨基玩弄政治诡辩的实质，暴露出

他的反布尔什维克党的真面目。

三、以退为进

正面指出实质所在固然是有力的反驳，但对那些极其荒谬的论题，光靠指出实质有时反而显得无力。这时，如果恰当地运用“归谬法”，就可以轻而易举地使诡辩者的荒谬理论大白于天下。归谬法的特点是：先假设论敌的论题是成立的，然后按其论题的逻辑加以引申，得出一个荒谬的结果，用荒谬的结果证明论题的荒谬。例如，西方某些激进分子有这种言论，来为火车误点辩护，他说：“希特勒的火车最准点，分秒不差。”言外之意是：谁要求火车准点，谁就和希特勒是一样的。后来有人反驳道：“既然希特勒要火车准点，那么，要火车准点的也是希特勒。但希特勒也要吃饭，为划清界限，自然也是以不吃饭为好。”这显然是荒谬的。

四、以子之手，攻子之盾

荒谬的论题总是有懈可击的，我们只要细心分析，抓住其自相矛盾的地方，采用“以子之手，攻子之盾”的战术，让诡辩者自己打自己的耳光。

例如：对于流行的“辩无胜”这种谬论，即认为参加辩论的双方都不能获胜。有人反驳道：试问你们的“辩无胜”之说是的对呢还是不对呢？如果你们的说法对，那就是你们辩胜了；如果你们的说法不对，那就是你们辩败了，而别人辩胜了，怎么能说“辩无胜”呢？这样就抓住了“辩无胜”这个论断自相矛盾的地方，用他们自己的话堵住了他们的嘴。

五、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我们对诡辩进行反驳，有时还可以运用以毒攻毒的方法，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有这样一个故事：古希腊著名诡辩家欧布利德在某大公那儿当谋士，一天，他对他的同事说：“你们没有失掉的东西，那么你就有这件东西，对吗？”他的同事回答道：“对呀！”欧布利德跟着说：“你没有失掉头上的角，那你头上就有角了。”众所周知，人的头上是不会长角的，可是欧布利德却振振有词地“论证”他的同事头上有角。他在不同意义下两次使用“没有失掉”这个词语，前一个“没有失掉”的是对原来具有的东西说的，就是没有失掉原来具有的东西；后一个“没有失掉”是对本来就有的东西说的，就是没有失掉原来所不具有的角。他的同事对这个荒谬的结论不服，就拉他到大公那儿去评理。大公很聪明，就对欧布利德说：“在这个城堡里，你没有失去坐牢的机会，那就请你享受三天吧。”大公“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驳得非常巧妙。

在实际生活中，诡辩的手法是千变万化的，而反驳诡辩的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这就需要在实践中运用正确的观点和逻辑学知识对具体论题具体分析，采用灵活机动的反驳战术，去战胜诡辩。

外交斗争与论辩艺术

不仅仅在牛津大学校园里，而且在世界外交斗争的大舞台上，无数牛津学子们其雄辩的天才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外交活动常常是一种十分复杂的政治斗争。外交活动家作为外交活动的主要参加者，他是主权国家的代表。从其个人素质来说，他除了应当具有高度的政治理论水平、敏锐的观察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对于任何突发事变的应付能力以及丰富的外交经验外，还必须掌握高超的论辩技巧，这是出于外交活动这种特殊斗争形式的需要。从国家的整体利益上说，论辩艺术运用于外交，比它在其他任何领域的应用都更具有重要性和特殊性。原因之一，就是它直接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利益。可以说，一次外交斗争的成败，将会直接影响到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甚至整个世界局势的变化；而高超的论辩技巧，无疑是取得外交斗争胜利所必不可少的一种有效手段。

外交斗争中的论辩艺术，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政治性和严密性

众所周知，外交斗争中的论辩，其内容往往是涉及到从某一国际角度说的重大的政治、军事或经济等方面的利益，因而，论辩过程中的每一得失，都有可能政治或经济等方面给国家带来收益或造成损失，并会产生相应的国际影响。因此，这就要求参与这一论辩的外交家必须十分谨慎地去斟酌自己的只言片语，除使其符合自己国家的意图外，还必须设法驳倒自己的对手，达到预期的目的，任何无所顾忌的口若悬河都会导致斗争的失败。

二、尖锐性和逻辑性

如果要形容外交论辩的尖锐性的话，那么大概没有比“唇枪舌剑”一词更为恰当的了。在谈判桌上，对于涉及双方（或多方）实质的问题，往往是各不相让，措词激烈。各方自然都是求胜心切，但是如果如果没有尖锐有力的论辩，不能给对方以有力的驳斥，则势必使自己处于极其被动的地位。然而，这种尖锐有力的反驳并非是拍桌子打板凳的大喊大叫，而是要凭借自己的机智和论辩技巧，也就是注重论辩的逻辑性。只有合乎逻辑的论辩才能够取得实质性的效果。自然，对于一般性的讽刺和嘲弄，也同样必须运用你的论辩技巧适时地给予回击。这里不妨举一个小小的例子：在一次国际会议期间，一位西方外交人士挑衅性地对我代表说：

“如果你们不向美国保证：不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那么显然就是没有和平解决的诚意。”

我代表说：“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采取什么方式解决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无须向他国作什么保证。请问，难道你们竞选总统也需要向我们作出什么保证吗？”

简短的两句话，顿时使对方哑口无言。这位西方外交家狡猾地把话题一转：“阁下这次在西方逗留了一段时间，不知是否对西方有了一点开明的认识？”言外之意是控告我代表无知。看我代表的回答：

（淡然一笑）“我是受西方教育的，40年前我在巴黎受高等教育，我对西方的了解可比你少不了多少，遗憾的倒是您对东方的了解可真是太差了。”

反驳得干脆有力！

不仅仅在牛津大学校园里，而且在世界外交斗争的大舞台上，无数牛津

学子们其雄辩的天才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这个例子还可以用来说明外交论辩的另一技巧，即外交论辩的灵活性的分寸感。

三、灵活性和分寸感

大家知道，外交事件的产生有其突发性和复杂性两个特点。两个本来相安无事的国家，可能会在一夜之间成为交战的双方；一架民航班机会突然被击落等等类似这样的突然事变随时都有可能发生，而产生这些事件的潜在因素及其前因后果又是错综复杂。一个外交家当其还没有摸清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之前，就有可能已经面临了有关这一事件的发问或论辩。同样还有其他类似的情况，诸如会谈过程中话题的突然转移，出乎意料的气氛变化等等。面对这些情况，作为一位外交家就必须熟练地运用外交论辩中的灵活技巧，并且掌握好讲话的分寸。显然，突发事件的进一步的发展以及最后的结果，往往也是难以把握的。因而，当我们不得不对这一事件表态时，就应当想到要为事态的发展留有回旋的余地，也就是说，不要把话说死。一般说来，当对于某一事件的真相或实质尚无把握，或是从利益的角度看不便明确表态的时候，所使用的字眼多是具有伸缩性的，正如人们常说的所谓“纯粹的外交辞令”，诸如“对……表示关切”，“我们注意了××事态的发展”等。无论措词如何，目的是要使别人无法把握你的真正意图。

灵活性的另一方面，就是将自己不便回答的问题巧妙地岔开，使对方的注意力转移到其他方面去，请看这个例子：

甲方：我想知道××问题贵国能采取的最后措施是什么？

乙方：请阁下相信，我们最终是会解决这个问题的。而我倒真有点担心，如果贵国的反政府运动继续发展下去，贵政府是否仍具有维持现行统治的能力。乙方有意回避甲方的问题，并把话题转到甲方最头痛的问题上，给甲方造成思想上的压力，迫使甲方无力再追问下去。

四、隐晦性

当外交家由于某种原因而不愿意明白地表示自己的态度，却又希望对方了解自己意图的时候，就需要运用外交论辩的隐晦技巧。

请看下面的例子：

甲问：阁下的声明是否表示贵国政府对××会议的成效有所怀疑？

乙答：我不这样说，你可以随便解释。

乙实际上是默认了甲方的问题，但又不便甲方抓住任何把柄，使甲方无法向外公布乙方的观点。再看一个例子：

甲问：我们的意图是使下次会议能在纽约召开，不知贵政府认为如何？

乙答：贵国饭的味道不好，特别是我上次去时住了那个旅馆更是糟糕、

甲问：那么您觉得我今天用于招待您的法国小吃味道如何？

乙答：还算可以，不过我更喜欢吃英国的。乙方用隐晦的语言表达了自己希望在英国召开这次会议的想法。类似的例子在外交活动中还很多。不能以为这是故弄玄虚，有意做作，事实上，隐晦技巧的运用，在很多外交场合中确实具有调和气氛、试探对方等方面的功效。

总之，论辩艺术与外交斗争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在外交活动中，何时需要长篇累牍地讲话，何时只需三言两语地表态；何时需要明谈，何时又需要暗示，诸如此类，确是每一个外交活动家所必须认真研究的课题。

第九章 亮出你的才华护照

——演讲与人生

令人惊异不止的，并不是星球的疆域如此辽阔，而是人类居然能够测量它。

——摘自《牛津格言录》

成名的捷径——演讲的能力

演讲的能力，是成名的捷径。这种能力使一个人受人瞩目，鹤立鸡群。而一个说话得人心的人，人家对他能力的评价，往往超过他真正的才华。

今天，成人教育的运动已经普及；而这项运动中，最大的力量来自戴尔·卡耐基，他比任何人都多得多的听过、批评过更多成年人的演讲。根据李普莱最近所发表的一幅“信不信由你”的卡通画的统计，他评论过15万次的演讲。如果这个辉煌的数字吓不倒你，别忘了这个数字表示，自从哥伦布发现美洲以来，几乎每天都有一次演讲。或者，换句话说，如果所有那些在他面前发表过演讲的人，只使用3分钟的时间，一个接一个地讲下去的话，要等上整整的一年，日夜不休息地才能听完。

戴尔·卡耐基的事业充满沧桑，是一个有创意和热忱的人，他的一生是通过艰苦奋斗而成功的显著例子。

他出生在密苏里州一个离铁路10里的农村，在12岁之前，从没见过电车；但46岁时的他，到过天涯海角，从香港到哈摩费斯特；而有一次，他距离北极比拜尔将军在“小美国”的总部比距离南极还要近得多。

这个密苏里州的小孩，一度为人拣草莓，割野草，一小时赚五分钱，但现在替大公司训练高级职员表达自己的意念，一分钟的代价是一块美金。

这个乡下小孩，以前在南达科他州替人赶牛，烙牛，集牛，后来到伦敦去，在威尔斯亲王的参观下，露了一手。

这位仁兄，起初在大众之前练习演讲失败了五六次，后来变成了一个时代的风云人物。

年轻的卡耐基必须为受教育而奋斗，因为在密苏里西北部的那个老农场上，恶运总是当头，船具飘泊，船身互撞。年复一年，当地河流时常泛滥，使得农场的经营濒于绝境。

一家人在失望之余，就把农场卖掉，到密苏里州去，又买了一块农场。在市镇上，一天吃住的费用是一块钱，但卡耐基负担不起，因此，他住在农场，每天骑马赶三里路到学校去。在家，他挤牛奶，代木，喂猪，在煤油灯下研读拉丁文，直到他的眼睛模糊，头脑拒绝工作为止。

即使他在午夜时上床，仍然把闹钟拨到三点。他的父亲饲养的良种猪，若在严寒的夜间，小猪就有冻死的危险，因此小猪就被放在一个篮子里，盖上麻袋，放在厨房炉灶的后面。那些猪的天性是，它们在清晨三点一定要吃一顿热食。所以，当闹钟响起的时候，戴尔·卡耐基就要爬出被窝，把那篮小猪带到母猪那儿，等着它们吃奶，然后再带回厨灶温暖之处。

州立师范大学共有600多学生，戴尔·卡耐基是少数五六个住不起镇上的人之一。他因为穷得每天晚上必须骑马回到农场去挤牛奶而感到羞耻。他为自己那件太紧的外衣而不好意思，而且他的裤子也太短了。他很快就养成了一种自卑的心理，于是寻求出人头地的捷径。他很快就看出，学校中某些人享有影响力和名望——足球和棒球球员，以及那些辩论和演讲的获胜者。

他知道自己没有运动的才华，就决心在一次演讲比赛中获胜。他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来准备。当他骑着马上学、放学途中，他练习着；当他挤牛奶的时候，他练习着；然后，他爬上谷仓中的一堆稻草上，手舞足蹈地大声演讲有关制止日本移民的必要，把鸽子都惊走了。

但是，即使在竭诚的准备之下，他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他当时18岁

——既敏感、又骄傲。他变得如此地失望，如此地灰心，甚至想要自杀。然后，突然间，他开始获胜了，不止一次比赛，而是学校中的每一次演讲比赛。

其他的学生请求他训练他们；而他们也获胜了。

从学院毕业以后，他在内布拉斯加州西部和怀俄明州东部多沙的山上，开始对那些农场的人，推销函授课程。

虽然他有着无限的精力和热忱，仍然没有什么进展。他失望透顶，回到内布拉斯加州亚莱斯的旅馆房间内，在大白天之下，横躺在床上，失望地啜位起来。他渴望回到原来的学校去，他渴望从冷酷的生活中退下阵来，但是他不能那么做。因此他决心到奥马哈布去，再找个工作。他没有钱买普通的火车票，因此搭乘一部货车，以喂饲两车厢的野马作为代价。在奥马哈市下车后，他找到了一份工作——为阿摩尔公司贩卖火腿、肥皂和猪油。

他的工作地区要到南达科他州西部的“恶劣地域”，以及印第安人地区。他坐货运火车、驿车和骑马，来回于这大片地区上，睡在简陋的旅馆里，而房间的隔间只是一张麻布床单。他研读推销术的书，骑小野马、玩扑克牌，及练习如何收取欠债。当店主不能用现金偿付订购的咸肉和火腿时，卡耐基就会从他店里架子上拿下十几双鞋子来抵偿，然后把鞋子卖给铁路员工，又把卖得的款项寄给阿摩尔公司。

他常常搭乘货运火车，一天跑 100 里。在火车停下来卸货的时候，他就急忙跑到镇上去看三四家商店，取得定单。当火车鸣两笛要开动的时候，他才从镇上快步跑向火车站，火车已经开动了，他才跳上火车。

在两年之内，他把一个没有什么收获、位居第二十五的地区，提高到第一名。阿摩尔公司有意擢升他，说：“你已经达到了似乎不可能的事。”但是他拒绝被擢升，反而辞职了。辞职之后，他到了纽约。在美国戏剧学院搞研究，并周游全国，演出《演戏团的宝莉》中的一个角色。

他不是一个演戏的天才。他对这点有自知之明。因此他又回到推销工作上，为派克汽车公司推销卡车。

他对机械一无所知，也毫不关心。日子过得非常不愉快，他每天必须鞭策自己去工作。他极渴望有时间读书，写出他在师范学院就梦想写作的书。因此，他不干了。他要把日子花在写小说上。于是他一边创作，一边在夜校教书，以维持自己的生活。

教什么呢？当他回忆过去，看看他在大学所攻读的科目时，发现他在公开演讲方面所受的训练，带给他的信心、勇气、镇定以及人际关系的能力，比所有其他大学课程所加起来的，还要可观。因此，他就劝说纽约青年会给他一个机会，为商业界人士开设一个演讲的课程。

什么？使商人变成演讲专家？荒谬。他们心里一清二楚。他们已经开过这种课程，每次都失败了。

当他们拒绝付他一个晚上两块钱美金薪资时，他同意以抽取佣金的方式，按净利的百分比来拿钱——如果有任何百分比的话。而在三年之内，他们以那个方式，一个晚上必须付他 30 块钱——而不是两块钱。

这个课程愈开愈大。其他的青年会听到了这件事，后来别的城市也知道了。不久，戴尔·卡耐基就变成一个享有盛誉的讲师了。他往返于纽约、费城、巴尔的摩，后来又包括伦敦和巴黎。对那些来上课的商业界人士来说，所有这一类的教科书，学术味都太浓了，太不实用了。他毫不畏惧地坐下来，写了一本《语言的突破》。这本书很快就变成了所有青年会、美国银行公会

以及全国信托协会的正式教本。

今天，每一个季节到卡耐基这儿来上演讲课的成年人，比去上纽约市所有 22 大学所附设的演讲课程的人，还要多得多。

卡耐基的成功决不是偶然的，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他的成功，不仅使我们看到一个人的素质及其所经受的磨难的重要，而且也为我们创开了一条通向事业之门的捷径，那就是演讲的能力。希望自己在事业上卓有成效的人，希望自己的人生放出璀璨光华的人，希望有朝一日出人头地的人，不能不努力去具备这项必不可少的素质。这是一个启示，也是一个秘诀。

如何说话才得体

当一个人无话可说时，一定说得十分拙劣。

——摘自《牛津格言集》

人们为了表达思想，交流感情，协调行动，每日每时都要说话。可以说，说话得体与否是衡量一个人交际能力强弱的一个标志。

生活中有这样的“妙事”，可以一笑，也可以一悟。有个叫刘大的人，特地邀请好友张三、李四、王五和赵六来家祝寿。快开饭了，赵六还没来，刘大急了，自言自语地说：“唉，该来的还不来。”张三听了，心想：“那么我们就可能是不该来的。”于是，他很不高兴地走了，刘大一见张三莫名其妙地走了，着急地说：“唉，不该走的又走了。”没想到，这话偏偏又被李四听到了，心想：“那么我们是该走的了。”于是也拂袖而去。刘大见此情景，无可奈何地对王五双手一摊说：“你看，我又不是说他的。”王五听了，叹了口气，一转身也走了。刘大傻了，不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还自言自语他说：“我又没有得罪他们，怎么都走了呢？”

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说话的效果总是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表现出来的。刘大好客却反把客人得罪了，主要是因为他没有注意语言环境和语言表达方式，连连发送了不得体的信息。

那么，如何才能把话说得得体呢？

首先，要看清对象，因人而异。任何交际，都不能离开特定的对象。与人说话，必须根据对方的实际情况，如年龄、身份、地位、文化、教养、性格及彼此间的亲密程度等等，恰当地传达信息。

不看对象，不要听众的对牛弹琴者是可悲可笑的！

其次，注意目的，有的放矢。交际目的不同，说话的详略，重点的选定都应有所不同。否则，就会降低语言表达的效果。

科学巨人法拉第在进入英国皇家学院工作之前，曾和介绍人戴维爵士进行过这样一次谈话。

戴维：很抱歉，我们的谈话随时可能被打断。不过，你还幸运，此时此刻仪器没有爆炸。法拉第先生，信和笔记本我都看了。你在信中好像并没有说明在哪里上的大学。

法拉第：我没有上过大学，先生。

戴维：噢，但你做的笔记证明你显然是理解这一切的，那又怎样解释呢？

法拉第：我尽可能去学习一切知识，还在自己房间里建立了小实验室。

戴维：年轻人，我很感动。不过，可能因为你没到实验室干过，所以才愿意到这儿来。科学太艰苦，要付出极大的劳动，而只有微薄的报酬。

法拉第：但是，只要能做这件工作，本身就是一种报酬啊。

戴维：哈哈，你在看我眼边的伤疤，这是氢和氮实验引起的一次爆炸留下的。我想，你装订的那些书籍总不曾将你弹痛，让你出血或把你打昏吧。

法拉第：是的，不曾有过。但每当我翻开装订的科学书籍，它的目录常常使我目瞪口呆、神魂颠倒。

这段对话重点突出，详略得当，饶有趣味，戴维爵士所强调的是从事科学研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需要付出艰苦的劳动，甚至付出伤残或牺牲的代价。而法拉第所表示的是对知识的强烈渴望及对科学的热切追求。谈话的结

果，戴维爵士破格让法拉第当了自己的助手。从此，法拉第便在科学事业中大显身手了。假如当初一个强调学历，一个贪图金钱，那肯定是另一番情形了。

第三，适应场合，注意色彩。说话要区分不同的场合，否则就会破坏交际效果。某法院开庭审理一起盗窃案。被告对作案时间交待不清，为了核实，审判长决定传被告之妻作证。

由于过分着急竟脱口而出：“把他老婆带上来！”

法庭顿时哗然，严肃的气氛荡然无存了。

当时，审判长应该运用法庭用语，宣布“传证人××到庭”。由于用日常口语取代了法庭用语，不适应场合，显得很不得体。

汉语词汇丰富，表达感情细腻，只有依据不同的场合，选取最恰当的词语，才能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城市里，每当人流的高峰时，交通比较拥挤，某些乘客往往没等公共汽车停稳，就涌向车门。遇到这种场合，一些优秀的乘务员总是热情地说：“各位乘客，请别慌，慢慢上。”由于一个“慌”字用得贴切，既稳定了乘客急躁的情绪，又显出乘务员的文化教养。如果换成“抢”字，那就有些糟了。

第四，理解心境，恰如其分。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喜怒哀乐，人之常情。只有理解对方的心境，说话适度，褒贬扬抑恰到好处，才能得到对方的信任与尊敬。

某电台“青年信箱”的播音员曾收到过三位听众的来信，说他们听了优美动听的播音，真想见一见播音员同志，但知道不可能，所以，希望能得到播音员同志的照片。面对这一棘手的难题，播音员同志理解听众的心境，说了一番动情而又恰如其分的话：“三位听众朋友，首先，我非常感谢你们的好意，你们也许听过这句格言：‘知人知面不知心’，看来，交朋友最难的是交心。那么，还是让我们做个知心朋友吧！”可以想象，这三位听众听后，一定会倍感亲切。

第五，上下协调，前后照应。一句话是否合适，能否取得最佳效果，不仅取决于谈话的对象、目的、场合、心境，也取决于和“上下文”的关系。如果说话人在运用语言时没有注意上下文的配合照应，那么，听话人就无法辨别表达者究竟表达了哪种思想，容易引起理解上的歧义。因此，交谈时要周密安排对话，言之有序，前后关联。

请看下面一段谈话。谈话的双方是：一位退休老工人和几位“送温暖”慰问团的干部。

“您老身子真够硬朗，今年高寿？”

“七十九啦。”

“人生七十古来稀，厂里数您最长寿吧。”

“哪里，××活到八十四啦！”

“那您老也称得上长寿亚军呀。”

“不过，××去年归天了。”

“唷，这回可轮到您老了。”

谈兴正浓的老人听了这句话，话锋顿收，脸色陡变。毛病就出在了“这回可轮到您了”这句话里。轮到老人什么呢？是轮到“长寿冠军”，还是轮到“归天”？意思不清，说话人当然是指前者，但从“上下文”分析，也可以理解为后者。“一句话惹人笑，一句话惹人跳”，说话不注意“上下文”

的配合，不注意前后照应，就不能充分发挥语言的交际功能，反而会给融洽的交际平添周折。

可见，说话得体，的确是一种艺术。只有面对不同的语言环境随机应变，才能取得最佳的表达效果。

如何注意谈话时的礼节

粗鲁损坏一切，甚至损坏理智和公正。

——摘自《牛津格言集》

适当的礼节，不仅对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十分重要的，而且在谈话中，它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一个有经验的谈话者总是保持着恰如其分的礼节的。那么他们是怎样作的呢？

· 谈话的表情要自然，语气和气亲切，表达得体。说话时可适当做些手势，但动作不要过大，更不要手舞足蹈，不要用手指指人。与人谈话时，不宜与对方离得太远，但也不要离得太近，不要拉拉扯扯，拍拍打打。谈话时不要唾沫四溅。

· 参加别人谈话要先打招呼；别人在个别谈话时，不要凑前旁听。若有事需与某人说话，应待别人说完。有人与自己主动说话，应乐于与其交谈。第三者参与谈话，应以握手、点头或微笑表示欢迎。发现有人欲与自己谈话，可主动询问。谈话中遇有急事需要处理或要离开，应向谈话对方打招呼，表示歉意。

· 谈话现场超过三人时，应不时地与在场的人攀谈几句，不要只与一两个人说话而不理会在场的其他人，也不要与别人只谈两个人知道的事情而冷落第三者。如所谈问题不便让旁人知道，则应另找场合。

· 在交际场合，自己讲话要给别人发表意见的机会，别人说话，也应适时发表个人看法。要善于聆听对方谈话，不轻易打断别人的发言。一般不提与谈话内容无关的问题。如对方谈到一些不便谈论的问题，不对此轻易表态，可转移话题。在相互交谈时，目光应注视对方，以示专心。对方发言时，不要左顾右盼，心不在焉，或者注视别处，显出不耐烦的样子，也不要老看手表，或做出伸懒腰，玩东西等漫不经心的动作。

· 尤其和外宾谈话，一般不要涉及疾病、死亡等事例，不谈一些荒诞离奇、耸人听闻或者黄色淫秽的事情。一般不要询问妇女的年龄、婚姻状况。所谓“见了男士不问钱，见了女士不问看”是也。不要径直询问对方履历、工资收入、家庭财产、衣饰价格等私人生活方面的问题。与妇女谈话不要说她长得胖、身体壮、保养得好等语，对方不愿回答的问题不要追问，也不要究根问底。对方反感的问题应表示歉意，或立即转移话题。

· 男子一般不要打扰或参与妇女圈内的议论，也不要与妇女无休止地攀谈而引起旁人的反感侧目。与妇女谈话更要谦让、谨慎，不与之开有伤大雅的玩笑。争论问题要有节制。

· 谈话中要使用礼貌语言，如：你好，请，谢谢，对不起，再见……等等。在社交场合中谈话，一般不过多纠缠，不高声辩论，更不能恶语伤人，出言不逊。即使争吵起来，也不要斥责，不讥讽辱骂，最后还要握手而别。

如何做说服工作

善于劝说，是一种极为可贵的能力。在日常生活中，有些事情，如教育子女与人为善，解决与邻居的矛盾纠纷等等，若能掌握一些说服人的技巧，可能会使你的努力得到意想不到的回报。

一个人的说服力并不是一个常数，它是可以用巧妙的表达技巧来增强的。以下六点，便是可以帮助你增强说服力的经验之谈。

1. 善用地利

许多人在自己的客厅里说话比在别人的接待室里说话更有说服力。因此，精明的交涉者在与人洽谈重要事务时，总是争取在自己的而非对方的办公室里进行。

最近，美国心理学家泰勒和他的助手兰尼做过一次实验。他们先给巴尔的摩市约翰霍金斯大学的大学生评分，鉴定他们对别人的影响力，然后把其中愿意者分成三人一组，每组由影响力大、中、小不同的人组成，然后请他们讨论并表决该校预算中十项可以削减的项目，哪几项最宜减掉。一半的小组会议在影响力最大者的寝室里召开，另一半则在影响力最小者的寝室里进行。最后结果显示：讨论时，即使主人的影响力最小并且客人开始也持反对意见，最终还是屈从了主人。

2. 注意仪表

美国某镇内有一位艺术家，常因一些地方问题到镇议会去控诉。他去时常穿一件油渍斑斑的工作服，胡子也不刮。因为他从来看不起那些以衣冠整齐来取悦于人的，认为人只要有头脑，别人就会听取他的意见，穿着好坏并无要紧。可事实是，年复一年，照样没人理会他，他则自我麻醉地认为这是由于那些人愚蠢之故。也许是吧，不过，他自己也聪明不了多少。

美国心理学家塞肯曾在马萨诸塞州州立大学里召集了 68 名志愿者，吩咐他们每人跟四位行人谈话，请求他们支持一个反对校内早餐供应肉类的团体。在跟行人接触前，研究人员对每位志愿者的各种情况，如：外表是否漂亮，口齿是否伶俐，能否令人信赖，能否说服人以及智力高低等等，都作了鉴定。结果发现，在相同条件下，外表漂亮者一般比不大漂亮者更为成功。

3. 站在听众一边

牛津大学的研究者们趋向于认为：要改变别人的想法，劝说者必须与听众站在一边，两者的关系越融洽，劝说的话便越容易入耳，这是因为人类有一个共同的天性，即喜欢听“自己人”说的话。纽约市立大学、布鲁克林学院的心理学家哈斯也说过：“一个酿酒专家也许能告诉你许多理由，为什么某一种牌子的啤酒比另一种牌子的要好。但如果你的朋友，不管他对啤酒是否在行，教你选购某种啤酒，你很可能听取他的。”

另一位心理学家莫恩在加利福尼亚州一个海滩上搞了一个传播训练公司，他发现，最佳商品推销员都能模仿顾客的声调、音量和言词，表现顾客的姿态和情调，甚至还能下意识地在呼吸动作上与顾客相协调，好像是一架绝妙的反馈机器，把顾客发出的每一个信号反射回去。

勿庸讳言，这种由于在具体行动上，甚至是些很微不足道的方面表现出来的在感情上与你的听众的亲近感与认同感，往往会使你得到巨大的感情回报和共鸣。而一旦建立了这种感情共鸣，还需要什么苦口婆心的劝诫与说服呢？

4. 考虑听者处境

假如你要到隔壁去，请那里的新婚夫妇参加一项社会公益活动，你采用什么方法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

平庸的劝说者可能会直截了当地说一番大道理，而善于劝人者则会先考虑对方的处境，赢得听者的信任。如果对方说自己正为某事烦恼，劝说者便会对他：“我理解你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要是我处在你的位置，也同样会烦恼的。”这样就既表示了对人的同情，设身处地地为人留下了广阔的空间，同时又巧妙地赢得了对方的注意。

善劝者听见对方反驳自己的话时，也会做出反应，但绝不会反驳。他会把反对的话重复一遍，承认其有道理。好些研究表明：劝说时，照顾双方的意见，比只提供单方面意见的说服力强得多。

5. 论据要坚实

什么样的论据才有说服力？这是一个很值得重视的问题。我们认为：一个很基本的要求就是论据要坚实可靠，不可使人产生不信任感。我们相信：向听者提供切实的资料比提供主张更有力。但对于一个犹豫不决的人来说，资料来源也是很有影响的，并且其影响之深不亚于资料本身。这并非因为人们只信任特定来源而不信任其他的来源，而是因为他们听到引述的话来自十分可信的权威，便不会再为自己的成见辩护。这是一种非常奇妙的心理作用。不过，引述权威的意见也不宜过分，过犹不及。资料大多也可能引起听者的反感。

6. 运用经验和例证

善于做劝服工作的人都知道我们做事受个人的具体经验的影响比受空洞的大道理的影响要大得多。对于一个病人来说，如果大夫劝他服某种药物，那么即便医生再三证明这种药物有效，说了许多的药理知识和道理，病人总还是不免心存疑虑的。但如果换一种方法试试，如医生告诉他：我自己也服这种药，只用了一个疗程就大病痊愈了。听了这样活生生的个人体验，病人一定再也不会有所顾虑了。

心理学家莫恩在研究这种方法的效果时发现，成功的推销员往往使用具体的例证向顾客说明：他们现在的选择已有人作过。

以前，人们总是固执地认为：说服力很神秘，是人的天赋所致。实际上，它也是可以学习和提高的。只要你掌握了一些说服人的真正技巧，那么你便不怕说不服人。

如何促使意见一致

为了说明这一问题的要害，我们不防先引用一下牛津人文研究者们提供的一个具有一般性的结论来作为我们阐述的一般原则和心理性基础，那就是：我们比较喜欢依照自己的意思行动，我们喜欢别人征询我们的愿望、需求和意见。这是一个真正的自由人的潜在心理，也正是人文主义精神照射出的一点微弱的亮光。

你是不是对自己的想法，要比别人提供给你的要有信心？如果是的话，那么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别人的身上，不是很不智吗？我们是不是最好只提供我们的看法，而由别人自己想出结论？

有家汽车公司展示中心的业务经理阿道夫·赛兹，发现公司的业务员办事没有精神，态度也很散漫，实在有待加强。于是他召开了一次业务会议，鼓励属下说出对他的期望。他把大家的意见写在黑板上，然后说道：“我会尽量达到大家的期望。现在，你们知道我对大家的期望是什么吗？”答案很快被提出来：忠诚、进取、乐观、团结精神，每天八小时热心的工作……等等。会议结束的时候，大家都觉得精神百倍，干劲十足，有个业务员甚至自愿每天工作 14 个小时——赛兹报告说，以后他的业务果然蒸蒸日上。

“这些人跟我做了一次道德交易。”赛兹先生说：“只要我实践自己的诺言，他们自会实践他们的诺言。征询他们的愿望和期待，正符合他们的需要。”

没有人喜欢被支配，或强迫去做一件事。这是我们行事的一个原则。

让我们再来看尤金·韦森的例子。韦森先生贩卖新设计的草图给服装设计师和成衣厂商，三年来，他每星期或者最多每隔一星期都前去拜访纽约最著名的一位服装设计师。“他从没有拒绝见我，但也从没有向我买东西。”韦森说道，“他每次都仔细看过我带去的草图，然后说：‘对不起，韦森先生，我们今天又做不成生意啦！’”

经过 150 次的失败，韦森体会到自己一定过于墨守成规，所以决心研究人类行为的影响，好帮助自己获得新观念和新力量。

之后，他采用了新的处理方式：他把几张没有完成的草图挟在腋下，然后跑去见设计师。“我想请您帮点小忙，”韦森说道，“这里有几张尚未完成的草图，可否请您帮忙完成，以符合你们的需要？”

设计师一言不发地看了一下草图，然后说：“把这些草图留在这里，过几天再来找我。”

三天之后，韦森回去找设计师，听了他的意见。然后把草图带回工作室，依着设计师的意见完成。结果呢？全卖出去了。

“我知道为什么多年来都不能把东西卖给他。”韦森说道，“我一直希望他买我提供的东西，这是不对的。后来我要他提供意见，他就成了设计人，他的确是的。我并没有必要把东西卖给他，他自己买了。”

从上面这个例子中，我们已经隐隐可以发现一个秘诀，一个促使人们意见一致的秘诀：让别人觉得那是他们的主意。人们所缺乏的也许并不是才华和智慧，而是一种主观能动性或者是一种自我的确证。如果你使他觉得他就是主人，是这样一个大公司的主人，那么他还会有什么顾虑而不竭尽全力呢？

如何使别人马上喜欢你

你相信自己的魅力吗？你相信你将大受欢迎吗？那么你将怎样去做？不过在做之前，记住：你要别人怎么待你，就得先怎样待别人。

让我们来做这样一个大胆的设想。假如你现在正在纽约第 32 街和第八大道交口处的邮局里排队等候寄一封挂号信。这时你发现，那位柜台后面的办事员显然对工作感到不耐烦——称重量、拿邮票、找零钱、写收据——年复一年都是同样单调的工作。所以你对自己说：“我要让那位办事员喜欢我。显然的，要让她喜欢，必须说些好话。不是关于我自己，而是与她有关。”接着你又自问：“她有什么理由可以让我称赞一番的？”有时这实在是个难题，尤其当对象是陌生人时。但是，眼前这位对你而言似乎并无困难，你马上就找出了可以称赞的地方。

当她为你的信件称重时，你热切地对她说：“真希望能再一次看到这样美丽的头发。”这时，她招起头，有点惊讶地看着你，脸上泛出微笑。“啊，它已经不像以前那么好啦！”她谦虚地回答。你告诉她，虽然它可能已没有原来的美观，但仍然很美。她十分高兴，便和你谈了一会儿，最后说道：“许多人都称赞我的头发。”

我敢打赌，当你这样做了之后，这位小姐外出吃午饭的时候，一定步履生风；晚上回家的时候，一定会将此事告诉她丈夫，可能还会照着镜子对自己说话：“这头发多么漂亮。”显然，你已经给别人带来了欢乐。

那么，你究竟想想从那人身上得到什么？你究竟从那人身上得到什么？

如果我们真是那么自私，一旦没有从他人身上得到好处，便不能表示一点赞赏或传达一点真诚的感谢——如果我们的灵魂没有比野生的酸苹果大多少，我们会变得多么贫乏。

不错，你是希望从那位小姐身上得到一点东西。但那东西是无价的，而且你已得到了。你得到了助人的快乐，这种感觉会在事过境迁之后，还永远存在记忆里。

人类行为有个极重要的法则，如果我们遵从这个法则，大概不会惹来什么麻烦；事实上，如果我们遵守这个法则，便可以得到许多友谊和永恒的快乐。但是，如果我们破坏了这个法则，就难免后患无穷。这个法则就是：时时让别人感到重要。约翰·杜威说过：“人类本质里最深远的驱策力就是：希望具有重要性。”威廉·詹姆士也有同样的观点可与之相媲美。他说：“人类本质中最殷切的需求是：渴望被肯定。”我们在这里还要进一步指出：正是这种需求使人类有别于其它动物；也正是这种需求，使人类产生了文化。

几千年来，许多哲学家都曾就这个问题深思熟虑过。而他们产生的结论只有一个，这个结论或者称之为法则的东西并不新颖，可以说和历史一样陈旧了。2500 年前，亚里斯多德在希腊用这个原则教导门徒。基督降生前 500 年，佛陀已在神圣的恒河流域教诲众生；1900 多年前，耶稣基督在犹太山上，以此训诲他的门徒，并且用一句话做总结——这大概可以算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法则：“你要别人怎么待你，就得先怎样待别人。”你需要朋友的认同，需要别人知道你的价值；你希望在自己的小世界里，有种深具重要性的感觉。你不喜欢廉价的言不由衷的恭维，而渴望出自内心的赞美。你喜欢友人正像查理·夏布所说：“真诚。慷慨地赞美人。”我们都喜欢那样。

所以，让我们衷心服膺这个永恒的金律：我们希望别人怎么待我们，我

们就怎么待别人。

怎么做？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答案是：随时，随地。

让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

克里斯是个安静、害羞、缺乏自信心的男孩，平常在课堂上很少引人注目。一天，罗兰见他伏案用功，便走过去跟他搭讪。他的内心上似乎有一股见不到的火焰，当罗兰问他喜不喜欢所上的课时，这个年方 14 岁的害羞男孩的脸上，表情起了极大变化，可以看出，他的情绪很激动，极力想忍住泪水。

“你是说，我表现得不够好吗？罗兰先生？”

“啊，不！克里斯，你表现得很好。”

那天，上完课走出教室的时候，克里斯用他那对明亮的蓝眼睛看着罗兰先生，并且肯定有力地说：“谢谢你！”

“克里斯教了我永远难忘的一课——我们内心深处的自尊。为了使自己不致忘记这一点，我在教室前挂了一个很显眼很醒目的标语：你是重要的。这样不但每个学生可以看到，也随时提醒我：每一个我所面对的学生，都同等重要。”后来克里斯这样回忆并评论道。

的确，这是个不需加任何渲染的事实：差不多你遇见的每个人都以为在某些地方比你优秀。所以，要打动他们内心的最好方法，就是技巧地表现出你衷心地认为他们很重要。

“同人们谈谈他们自己，”曾经统治过大英帝国的迪斯雷利——这位牛津大学的高材生这样说道：“同人们谈谈他们自己，他们会愿意听上好几个钟头。”

是了，这的确是个重要的法则：让别人感到他们的重要——要诚心去做。

如何批评才不致引起怨忿

或许我们不喜欢批评别人，但是有时我们却不得不这样做。那么批评就真的不好吗？或者就一定会使朋友变成仇敌，甚至弄得六亲不和吗？不，事实并不是这样。如果我们真正懂得批评，那么我们可以相信：我们能够做得很好的，并且不致于引起怨忿。

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批评？下面的三个原则，如果你照着去做，会获益匪浅的。

1. 间接指出别人的错失，要比直接说出口来得温和，比较不易引起别人强烈的反感。

下面的一个例子或许是对这一原则的极精辟的诠释。

我们知道，许多后备军人在受训期间，最常抱怨的就是必须理头发，因为他们认为自己仍算是普通老百姓。那么假如是你作为军官，你会怎么做？是按照旧时一般军人的管理法去对兵士们大吼大叫或出言恫吓，还是会做得更好？

有位军官是这么做的，他对他的兵士们做了一次动情而又感人肺腑的演说：“诸位，你们都是未来的领导者。诸位都知道军中对头发的规定，我今天就要按照规定去理发，虽然我的头发比你们还短得多。诸位等一下可以去照照镜子，如果觉得有必要，我们可以安排时间到理发室去。”结果，许多人真的去照了镜子，并且依规定理好了头发。这个军官是聪明的也是机智的，他没有强迫别人去做，那样做只能事与愿违。相反，他采用了迂回的战术巧妙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从这里面，我们愿意明确地指出：改正他人错失最好的办法就是：间接提醒别人。

2. 在指责别人之前，先谈论自己的错误。

听别人数说我们的错误很难，但假如对方谦卑地自称他们并非完美，我们就比较容易接受了。

德国最后一位皇帝威廉二世，是个傲慢自大的家伙。他吹嘘他的陆海军队所向无敌。更甚的是，他在英国访问的时候，公开说了许多狂傲、荒唐的蠢话。比如：他声称自己是德国唯一对英国友善的人；他新建立的海军是用来对抗日本威胁的；只有他才能使英国不致被苏俄和法国所糟蹋等等。

谁也不会相信这些举世震惊的狂言居然出自一位欧洲皇帝之口。整个欧洲大陆都在议论纷纷，英国被激怒了，德国的政治家则被吓呆了。就在举世一片惊愕之中，这位自命不凡的皇帝也知道自己说了错话，便召来大臣布罗亲王，希望他来替自己承担过错，他要求布罗宣称这一切都是他的责任，是他令使皇上讲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话的。

“但是，皇上，”布罗反驳道，“没有人相信我会建议陛下讲那些话的。”

这话一出口，德皇立即大发雷霆之怒。布罗知道：一失言之间已经铸成了滔天大错了。

“你认为我是一只蠢驴，”他咆哮道，“会犯下你所不会犯的错误。”

布罗知道自己应该赞美在先，然后再伺机进言。但现在一切都已太迟了，他必须弥补过错，赶快说些赞美的话。

“微臣没有资格说那些话。”他恭敬地回答：“陛下在许多方面的成就，臣实难望其项背。不只是军事方面的知识，还有自然科学等其它知识，臣都

是望尘莫及的。臣曾经听过陛下谈论晴雨表、无线电信感光，臣很惭愧在这方面一无所知，对物理化学也毫无概念，连最简单的自然现象都不知如何解释。但是——”布罗继续说道：“臣正好有些历史方面的知识，这可能对政治还算有用，尤其是外交政策。”

德皇终于笑逐颜开了，因为布罗已经赞美过他，还有什么不好原谅的？“老天，”德皇热情地说道，“我不是常告诉你吗，我们是最佳搭档，互补有无。我们应该永远在一起，我们会的！”

假如几句恭维话可以使一个傲慢、自负的德皇变成坚定的朋友，你就可以想象这个方法在日常生活中会多么有用。马上使用看看，绝对会有意想不到的奇迹出现。

承认一个人本身的错误——就算你还没有改正过来——可以帮助别人改善行为。这真是个绝妙的迂回战术。

3.用建议的方法，容易让一个人改正错误，可以保持个人的尊严和自觉具有重要性。

美国资深传记作家伊达·塔贝尔在写她的名著《欧文·扬传》的时候，曾和一位与扬先生共事三年的人谈话。这位先生宣称，他从未听到过扬指使别人——他只是建议，不是命令。譬如，欧文·扬不会说：“做这个，做那个。”或“别做这个，别做那个。”他会说：“你可以考虑这样。”或“你觉得那有用吗？”他常常在口授一封信之后，说：“你觉得这样如何？”在看过助手写的信之后，他会说：“也许这么写比较好些。”他不教助手做什么，而让他们自己去做，让他们自己在错误中学习。

这种方法容易让一个人改正错误，可以保持个人的尊严。这种方法赢得合作，而不是背叛。

相反，无礼的命令会导致长久的怨忿——即使这个命令是用来改正很明显的错误。有魄力的领导者会这样做：以提出问题代替命令。

如何巧妙应对

会话是一种随意的反应性的言语活动。会话的双方由于临时受到对方发言的制约，事先不可能知道对方将提供怎样的支持，会话之前很难对发言内容作系统、周密的筹划，同时对话双方所处的环境相同，话题一致，有的事物不言而喻，有的意思心照不宣。眉飞色舞的表情，举手投足的动作，都以非语言的形式补充替代着双方会话中省略了的语言成分。这些在表达和理解方面都对心智活动提出了一定的要求。所以，会话是锻炼辩论及演讲口才的初阶。而会话就其一方对另一方而言，也就是应对。

参加会话，要善于听取对方的说话，判断说的真正意图，抓住话的中心意思，使自己的答话在不同的场合，根据不同目的和条件，具有针对性。所谓针对性，我们可以从以下几种手段中加以选择。

蝉联应对

就对方说话的意思，顺承而下，即对你所说的内容加以补充并继续下去，同时深化你所要表现的中心意思。

让我们来看下面这个例子。甲乙两人正在议论××厂改革问题，谈到个别领导缺乏硬碰硬精神。

甲：王厂长对改革不是没有一套打算，就是遇到有些部门的顽固堡垒，他不敢碰。

乙：王厂长不敢“虎口拔牙”，生产局面就一定改不了。

蝉联应对适用双方意见一致、关系十分融洽的情境。这种谈话的结果，往往使双方的认识一步步深入，甚至采取一致行动。蝉联应对在对答之间，可以表现出从浅到深、由轻而重。自小及大的层层顺势推进的顺序。例如：

甲：一个人只知道闭门造车，不与外界接触，孤陋寡闻，坐井观天，哪能搞什么设计？

乙：对！搞设计的人应该多掌握一些科技情报，多了解其他单位技术革新的消息。

甲：了解不能只限于听，还要多看。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应该到处跑跑，开开眼界。

丁：常言说，见之，不如知之。看了还要分析、研究别人的经验，才能扬其所长，避其所短。

戊：知道了还应该实践。只有实践才能出真知。

以上五人的会话，是按照“不闻”、“闻”、“见”、“知”、“行”的层次，从较小的范围而到较大范围，由浅入深的蝉联。当然我们也可以从大到小，由重到轻地蝉联。但无论是逐层加深还是逐层递减，既可运用于几个人的会话中，也可运用在一个人的独自中。

对峙应对

对峙应对是指会话中甲与乙所说的事，相互对峙，但又和谐地统一在一个共同的语境之中。同时它也表示：甲与乙所表达的意义是重叠反复的，并无深浅先后的区分。

例如：

甲：我认为无论干什么，都得有个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乙：对，没有五音难成六律，没有章程办不好事。

这真是绝妙的对峙。寓刚于柔，寓反驳于不经意的“假”赞成之中，既出人意料，又似乎很巧妙地承接了甲的话，起到了很好的反驳效果。

相反应对

两人谈话，内容一正一反。而且，在是与非上乙的应对或使甲的话衬托得更为鲜明，或两人的话交相辉映。例如：

甲：你看你偏要搞什么试验，糟蹋这么多材料，简乙：我搞试验是为四化作贡献。成功了能大大节省原材料，是最大的节约！

回环应对

回环应对就是绕圈子说话，多半用于不便直率说出的场合或是先避开要说的不说，而从看来无关的事物说起，最后仍然回到自己要说的本意上来。

有个民间故事便是回环应对的典型。

从前有个很喜欢画老虎的县官，可是往往画虎似猫，一点也没有虎威。有一天，他画了一只虎，唤一个青年衙役来看，满以为这个青年衙役会赞不绝口。于是县官便问：“你看这画的是啥？”衙役答：“是猫。”县官大骂：“你有眼无珠，将虎看成猫！”于是下令将青年衙役重责40大板。县官又叫一个老年衙役来看画。老年衙役见有人挨了40大板，不敢说。

县官问：“你说呀，这是啥？”

老年衙役答：“老爷，我不敢说。”

“你怕啥？”

“我怕老爷！”

县官生气地责问：“那么，我怕谁？”

“老爷怕皇帝！”

“皇帝又怕谁？”

“皇帝怕老天。”

“老天怕什么？”

“老天怕云。”

“云怕什么？”

“云怕风。”

“风怕什么？”

“风怕墙。”

“墙怕什么？”

“墙怕老鼠。”

县官又问：“老鼠怕什么？”

老衙役指着画答：“老鼠什么都不怕，就怕老爷的这张画！”

县官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

无效应对

有些话不愿讲，讲了等于不讲。或者听上去是表达了某种意见，实际上什么也没有说，便是无效应对。

古代有个人叫他父亲去看太阳。因为古代没有钟表，靠看太阳来确定时间，因此他的意思是叫父亲看看现在是什么时间的。可是他的父亲有点不愿意，便回答：“太阳在天上。”他再叫父亲去看太阳怎么样？回答是：“正圆着呢？”他急了，就再进一步指出：“我问的是什么时间。”又回答说：

“就是现在这个时间。”这三个答案都是真实的，却又都是废话，根本没有解决问题。倒也不能说他“答非所问”。可又实在没有作任何回答。

法国喜剧作家莫里哀在《无病呻吟》中也讽刺地类似的论证：鸦片之所以能催眠，是因为它有催眠的力量。那末，鸦片为什么有催眠的力量呢？回答又是：因为它能催眠。这样兜来兜去，岂非无效应对。

模棱应对

有时候人们需要斩钉截铁地决断，有时候却不能这样。比如在纷繁复杂的外交斗争中，就必须采用一种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策略。即对问题的正反两面都含糊其词，不表示自己明确的态度，也不提出明确的主张。

比如下面一例便是对模棱应对的生动展示。

甲：你认为这个人好不好？

乙：有人说他好，也有人说他不好。

甲：那么你认为他的优点是主要的，还是缺点是主要的？

乙：那就要看你用什么标准去衡量他。标准定得高一点，他的优点就不是主要的；标准定得低一些，他的缺点就不是主要的。问题是衡量一个人的标准应当定得恰当，不过高也过低。

这个著例可以作为消极应对的典型，但是，这种应对技巧若应用恰当也是会起到积极作用的。假如有一位外宾问你：“中国发行了多少人民币？”你即使知道这个数字也不应该说出来，因为这是国家机密。那么你怎么做？你也不妨来个模棱应对：“中国发行的纸币是拾捌元捌角捌分。就是一张拾元的，一张五元的，一张贰元的，一张一元的，还有五角的、贰角的、壹角的、伍分的、贰分的、壹分的，这些面额的钞票加在一起不就是拾捌元捌角捌分吗？”

看，这种回答多么风趣，多么恰如其分！

第十章 人生难得开口笑

——幽默与口才

轻轻揭开那撩人的面纱——幽默，她是什么？

“缺乏幽默是悲哀的”。审时度势，在现在这个人们日益青睐口才，崇尚幽默的开放社会里，幽默感在人们的语言修养中占据特殊的地位。

为什么只要卓别林，一露脸，一张口、一举手、一投足，立即就能把人们的心弦拨动，使千万人为之捧腹为之喷饭倾倒？这神秘的奥妙之一就在于：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充满了启人心智。令人愉悦的幽默，可以说，幽默时刻在他们身边！

幽默，是什么呢？是语言的调料，有了它，什么话都可以让人觉得醇香扑鼻、隽永甜美。是引力强大的磁石。有了它，便会把一颗颗散乱的心吸入它的磁场，让脸上绽开欢乐之笑。是智慧的火花。可以说，智者多幽默，幽默与智慧是天然一对，是知识者灵感勃发的光辉。

幽默，实在具有神奇的魅力；可以为孤僻者增添情趣，可以使欢乐者更欢悦；可以使愁眉者笑逐颜开，可以使泪水盈眶的人破涕转喜；可以叫年长者变得年轻，可以为慷慨者带来活力，可以让勤奋者驱散疲惫……幽默，对谁也不可缺少。为了使你的生活更加欢乐，为了使你的话语更具魅力，我们学会幽默吧！

但幽默需要技巧，在我们的周围，能掌握开玩笑的尺度与技巧的人却太少了。

俄国文学家契诃夫说：“不懂得开玩笑的人是没有希望的人！这样的人即使额高七寸——聪明绝顶，也算不上真正有智慧。”那么如何才是会幽默呢？

一、内容要高雅。笑料的内容取决于开玩笑者的思想情趣与文化修养。内容健康、格调高雅的笑料，不仅给对方启迪和愉快的精神享受，同时也是对自己美好形象的有力塑造。钢琴家波奇一次在美国密西根州的福林特城演奏时，发现全场有一半座位空着，他当时很失望。但是他最后还是大步走到台前，向听众表示谢意。并对听众说：“朋友们，我看到你们福林特这个城市的人们都很有钱，我看到你们每个人都买了二三个座位的票。”于是这半屋子听众放声大笑，使劲儿鼓掌。波奇这句无伤大雅的玩笑话使他顷刻之间反败为胜，赢得了听众的同情与尊重。在开玩笑时，要注意别损害人家的自尊心。对别人的隐私、忌讳之处；对别人的生理缺陷；对别人的亲戚朋友等都不作为取笑的对象。有一则笑话是：

三个斜眼的囚犯站在一个斜眼的法官面前。法官怒视着第一个犯人厉声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伊·克兰茨。”第二个囚犯答道。

“我不是跟你说。”法官大怒。

“我什么也没有说呀！”第三个犯人大嚷道。

这则笑话虽能逗人一笑，内容却不可靠。笑料还应杜绝黄色下流、低级趣味的内容。须知这类笑料尽管能使人发笑，但别人笑过之后，就会以为说

笑者思想格调低下，人品高尚者是不屑与之为伍的。

二、态彦要友善。法国作家、伦理家拉罗科说：“嘲笑是一种最诱人的、恰恰也是最危险的智慧品质。巧妙的俏皮话虽然总是拿别人开心，但是被取笑的对象同样有办法对付只爱取笑的人。”

此话可谓说到点子上。与人为善，是开玩笑的一个原则。开玩笑的过程，是感情互相交流传递的过程。如果借着玩笑对别人冷嘲热讽，发泄内心厌恶、不满的感情。那么除非是傻瓜才识不破。也许有些人不如你口齿伶俐，表面上你能占到上风，但从交际的平等原则考虑，别人会认为你不能尊重他人，也就不不是一个好的合作者。

三、行为要适度。开玩笑除了可惜助语言外，有时也可以通过行为动作来逗别人发笑。如相声界的许多艺人都利用了形体语言来表达某些语外之意。但行为不要过分夸张，适可而止。

四、对象要区别。同样一句幽默话，能对甲说，不一定能和乙说。人的身份、性格、心情不同，对玩笑的承受能力也不同。要幽默，就要严格区别对象。一般来说，后辈不宜同前辈开玩笑；下级不宜同上级开玩笑；男性不宜同女性开玩笑。在同辈人之间开玩笑，应掌握对方的性格特征与情绪信息。对方性格外向、透明度高能宽容忍耐，玩笑稍微过火也能得到谅解。对方情绪稳定，喜怒有常思维敏捷，伶牙俐齿，也不妨幽默一番。对方性格内向，喜欢琢磨言外之意，则开玩笑时就应慎重。对方木讷寡言，人世不深而自尊心极强，就不宜开玩笑。

五、场合要分清。俗话说：到什么山唱什么歌。任何玩笑的效果与环境背景都是紧密相连的。环境背景不仅决定着玩笑的内容，同时也决定了听众的思想感情。

美国前总统罗纳德·里根有一次在国会开会前，为了试试麦克风是否好使，张口便说：

“先生们请注意，五分钟之后，我们将对苏联进行轰炸……”

一语即出，众皆哗然。

里根在错误的场合、错误的时间里，开了一个极为荒唐的玩笑。为此，苏联政府提出了强烈抗议。总体上说，在庄重严肃的场合不宜开玩笑。如出席重大会议、正在聆听领导同志的讲话、参加追悼会等，都应以严肃为好。

懂得了这些基础的幽默常识后，让我们来看看幽默是怎么构成的。

幽默一词，源自拉丁直译。它指在语言和举动中引人发笑，又使人深思的内在因素。幽默语言的特点是富于风趣，使人发笑，又意在言外，引人深思。轻松发笑是幽默的外壳，富于哲理是幽默的内核。幽默是情趣与哲理的有机统一，它的形式是轻松愉快的，但它揭示的道理是严肃的。

幽默是一种高超的表现艺术，是各种智慧的结晶，要真正掌握这门艺术，还必须努力提高语言表达能力、想象能力、应变能力、思辩能力和文学素养。

不要怒吼的震动——幽默的斥责术

人，谁不希望于公或私都能拥有顺畅的人际关系。可是，事事并不然。因为当人在要说服别人或为自己做辩解，对人提出异议时，往往会很冲动地把情感赤裸裸地表现出来。

事实上，想要用大声吼叫或急促说话的方式来降服对方，其情景经常可见。然而，这是很难成功的。

基本上说来，要想降服对手，最好先听听对方的意见，然后再以幽默风趣的话语来进攻，这种方法才有效。

赤裸裸地批判人家的不是，必然引起别人的反目成仇。如果对方是自己的上司，工作的前途势必大受影响。可是，如果对方的表现，实在有令人不吐一言则不快时，最有效与灵验的是，说一句幽默式的笑话吧！

身为主管的人，难免有不得不要斥责属下的情况。可是有许多人不会处理，却转而变成喜欢唠叨下属的人，斥责别人时，最大的难点是，稍有不当就会伤害到对方的自尊心。所以，不能伤其自尊，而且要设法让他们愿意自动自发。这就需要培养自己的幽默感，或许就可以迎刃而解。

当然幽默风趣的话跟笑话是不同的。一般的笑话，或许会博人一笑，可是除了引人发笑之外，在说服、辩解、反论上丝毫不会有效果。而一则幽默的话，在事后会让听者有如梦初醒的顿悟。

不管是在哪一个时代，指责别人总是一件至难的事，而现在的人对此好像特别感到棘手。现在的人很少会有斥骂或指责别人的事实，这就是一种证明。

目前，无论是在家里或在学校，甚至在办公室，那种雷鸣似的怒骂声已经是绝少而仅有的了。

这种“异常的性情”，或许是人类朝文明动物进化中的一个好现象。但实际上，总是令人觉得又好像不尽然是如此。

有关这种辩论我们姑且不谈，但总之，现代的人对于如何斥责别人，确实是非常地缺乏要领。

虽然如此，还会斥责别人缺失的人，或许总比已经把此事忘却的人还要有药可救吧！只会一味地怒吼大骂，毕竟太无情趣了吧！如果能在斥责中加入一点风趣的幽默感，是否会更好呢？

例如，在绝大多数的公司中，从业人员经常会有一些轻微的过失发生，令管理人员有说也不是，不说又不行的苦楚。其中最共通的问题，尤以下属的迟到和缺勤最令人头痛。

虽然下属真的生病或有其他不得已的原因，那就另当别论，问题在于常喜欢寻找藉口，而主管却又不能戳破其真相并加以制止。

以下介绍几则马上就可以应用的，斥责迟到的幽默范例：

在临下班前，经理把那位喜欢喝酒而经常上班迟到的职员叫来说：“今晚你有没有空？哦不！应该说是不是与什么人约会有约会？”

职员听经理这么说，以为可能是主任要请他喝酒，于是喜出望外，赶紧摇头说：

“怎么可能有人找我呢？今天晚上我一点事也没有。”

经理于是很快地接着说：

“哦！既然如此，那么今晚就早点睡，明天应该就不会再迟到了吧！”

虽然这种话似乎有点欺诈的味道，但对于斥责别人有所顾虑的管理者来说，实不失为一种好方法。有个总是迟到的职员，今天仍不改常习地在已过了上班时间才姗姗来迟。一进入办公室后，马上就去向主任叙述迟到的原因：

“今天早上，在车站的阶梯上滑了一跤……”经理一听，很惊讶地说：

“你上班的时间是八点，但现在已经是九点了。这么说来，难道在阶梯上跌一跤，竟然就要花你一个小时的时间爬起来。”

对这位迟到的职员，他想要说的是因为跌了一跤受了伤所以无法赶来上班。可是主任却无视于此，而简单地就时间差距的观点作答。这不也是很耐人寻味的吗！曾是法国总理，世界闻名的戴高乐也是名幽默大家，对斥责迟到者他也留下了一则脍炙人口的轶事。当时戴高乐的阁僚中，有一名迟到成癖的阁员。有一天，开内阁会议，该阁员又迟到了。虽然该阁员有理由要说，但戴高乐却斩钉截铁地说：

“不用说了，反正你迟不迟到，跟内阁会议无关。”

我想再也没有比这更令人难堪的话了吧！据说从此以后该阁员再也不敢迟到了。如果把这句话应用到经常喜欢迟到的职员身上，其迟到的现象，相信一定会马上改正吧！

虽然经常迟到，但总是会来上班的职员尚且可以，可是如果情况继续恶化下去，就会演变成“故意缺勤”的现象。对于有此恶习的职员，可就得好好地训诫一番了。当然最好的方法是狠狠地幽默他一下。

故意不上班时最常用的方法是装病。这时若明知对方装不来上班，身为主管的人如何应付。

一位故意缺勤的职员，打电话向上司请丧假。

“家叔突然逝世……”

“噢！您的叔叔不是今年年初就逝世了吗？”

“啊！那是我……我的亲叔叔。现在逝世的是我太太那一方的叔叔。”

于是，上司用很严厉的口吻：

“你不是单身吗？怎么说有太太？明明还活着的人你却说他已经死了，甚至连根本不存在的人你也要咒他死，你真没良心啊！”

以上的上班态度问题是很令人伤脑筋，可是接下来的工作态度问题更叫人头痛。

有些经常离开办公室出去兼职的职员，喜欢在工作中打瞌睡的职员，讲私人电话、喜欢打长途电话的职员……等，诸如此类劣质的职员。对于这些人，一位具有幽默感的管理者应该做到类似下列的斥责法。对于常在外面兼职的职员，可以半带威胁地对他说：

“你那张椅子是不是坐起来不舒服，怎么老是空着没有人。我们是不是把它从办公室里搬出去呢？”对于训斥喜欢打长途电话的职员，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范例。

一位职员打长途，上司站在他旁边很久。职员放下电话问上司：

“有什么事吗？”

“我也想插嘴讲几句。”

有些职员偶尔也会发出无心之过，或实在是因为能力不足而出错。由于其本人也真的努力在做事，所以遇到这种情况时，做上司的都很想给当事者一个忠告。俗话说：“忠言逆耳，良药苦口。”事实上，要能令人感到心悦诚服的忠告是极难的。

幽默，让你含笑接受批评

法国式的幽默可以概略地说是一种富有批判精神的机智笑话，例如：

在某餐厅，一位已经喝得酩酊的客人，从座位上走出来，对站在其附近的服务生，大声地嚷嚷：“喂，小子！厕所在哪里？我要去小便啦！”于是服务生毕恭毕敬地回答道：

“是的先生，厕所是在大厅最里面面向左转后，通道的尽头。入口处的门上写有“绅士”两字，不过您也可以进去。”

在某餐厅内用完餐的一位先生把店主叫了过来说：“你店里的厨房实在干净得令人佩服！”“多谢您的夸奖，可是您从未参观过我们的厨房，怎样了解呢？”

“这用不着看也知道啊！你店里的每道料理都带有肥皂味呀！”

上面两则笑话，其实都带着强烈的批判意味，但听者即使会感到惭愧脸红，但并不致于发怒吧。现代人对于这种寓斥责批评于笑话的说话方式，似乎很不在行。所以试着学习一点法国式的笑话或许是很有用的。

例如，在我们的交际圈中，总会遇到一些实在合不来，又令人厌恶的人。在自己与第三者交谈时，话题若触及那些人物时，总是借机数说一顿，这乃人之常情。可是，这样做往往使自己变成背后论人是非的恶徒。因此，一位富有幽默气度的人，绝不会这样做的。因为不必如此，他也能如意地给予严厉地批评。古今中外，就有许多幽默大师，留下了众多精彩的批评典范。

“不是明晰的话，就不是法语。”

以此名句而闻名遐迩的，是18世纪的法国文学家黎朋诺鲁，他就是一位有批评妙言的毒舌幽默大师。他曾批评法国革命时期的政治家又是雄辩家的米拉膜说：

“那个人为了钱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即使善行他也会做。”

法国还有一位家喻户晓的幽默大师小仲马先生。

他曾经帮一位律师修改剧本，而让该律师的剧本大受欢迎。可是，那位律师不但一点也不感谢小仲马先生，而且还经常在人前炫那是他自己的才华。对于律师的这种言行，仲马说：

“他的确是一位优秀的律师，而且是一位会利用我的时间来写剧本的人。”

18世纪苏格兰的诗人巴恩斯，有一天在码头亲眼看见一名水手救起了一名差点溺水而死的富商。可是，当那位富商苏醒过来时，却只拿出一先令给水手作为谢礼。

此时，现场围观的群众，都为这位富商的吝啬感到愤怒而群起抗议。巴恩斯见状，就上前制止群众说：

“各位，算了吧！那个人的生命值多少钱，他自己是最清楚的。”

这种当面幽默地批评式笑话，一定是最能大快人心的。在富商的面前是以其无可反驳的批评，使他在众人面前怒而不敢言。

不过，在批评人时，有一种非常困难的场合是下位者要批评上位者，即人们常说的谏言。但是，只要这种场合里话说得幽默，就很圆满了。

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听说黎朋诺鲁曾经很严厉地批评过他。于是，有一天路易十六就传唤黎朋诺鲁到宫里来：

“黎卿，我目前正遇到一些关键性的难题，希望你能很率直地给我一点

建议，告诉我应该怎么做才好。”黎朋诺鲁当时便很快地回答道：

“国王陛下，请您就做出个国王的样子吧！”黎朋诺鲁巧妙的回答让国王在笑声中接受了批评。有一次，希特勒问一位曾经放言批评过他的女占卜师说：

“我什么时候会死呢？”

女占卜师正色说：

“你将会在犹太人的节日那一天去世！”“你怎么知道呢？”

希特勒继续追问着。于是女占卜师又道：“因为不管你在何时去世，犹太人都必定会大加庆祝的！”

正如上述两种情况下，对至高无上的强权者进谏，如果有直言不讳地批评，恐怕都会为进言者招来杀身之祸。可是，利用幽默这一工具巧妙应对，使自己的处境转危为安。幽默不愧是进言者首先考虑的方式。往往下决断或批判时，都会影响到人际关系。而许多批评又是必须给予的，那么要想顺利地提出自己的批评而又能保住人际关系，这就非求助于幽默的说话艺术了。有一个关于苏东坡的幽默笑话是很好的例子。有一天，一位士大夫兴冲冲地拿着自己刚刚作的诗，跑到苏东坡的住处去请教。苏东坡读完他的诗后说：

“100分！”

这位士人真是喜出望外，不过他却硬是要求苏东坡进一步说明何以会得满分。于是苏东坡淡淡地说：“你的声音有70分，剩下的30分就是你的诗。”我们也可以不防学学苏东坡的幽默艺术。在公司上司或许可应用这则轶事来评论部属的不精确计划书：

“你的字可以得90分，剩下10分就是你的企划案的得分。”

美国著名的幽默作家马克·吐温也创造了许多批评式的幽默。有一次，一个人带着自己写的作品来请求批评。

“不管您有任何感想请尽管明言。”

这个人非常谦虚地说着。可是马克·吐温并不直接回答，只说：

“哦！不，还是让我们保持友谊吧！”

这里有则德国名作曲家布塔姆斯的轶事。有位年轻的作曲家带着他自己的作品来请教。只是布塔姆斯看了乐谱后，却说：

“你用的这五线谱的纸，实在很好，这是哪里买的呢？”

以上虽然都是很好的幽默例子。但是如果是对一些反应迟钝的人，可能会弄不清别人在说他些什么。对这种情况则可以参考下列一些较平易的幽默。有一天，某人带着两剧本来请小仲马批评。小仲马看了其中的一本后，就下了评语说：“另外一本比较好！”

“咦？可是另外一本您还未过目呀！”

“哦！我想应该不会有比我看的这一本还沉闷吧！”

小仲马通过欲抑先扬的方式批评了这样的恶作剧作家，几乎是不留痕迹，大有弦外之音的功效。

批评并不一定是上对下的事情，在下者要批评上位者时，可以参考下面的例子。

传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曾自己作了一首极其拙劣的诗文。有一次他就把这诗文拿出来向当时的大诗人勃怀特请教：

“你看！我写得如何呢？”

勃怀特一时之间实在不知该怎么回答，只好据实答道：

“陛下神通广大没有什么做不到的事。陛下如果有意要作一篇拙劣的诗文，那么这种作品一定还是会完成的。”

这是多么严厉批评呀！但乍听之下又有一点赞美，所以其辛辣度自然减轻了不少。

怎样自我宣传与自我推销——自夸的幽默术

人们在自我夸耀时，总感左右为难。希望表现自己，让别人赏识自己，同时又害怕别人说自己自夸自大，一点不谦虚。特别是在中国这个礼仪之邦，讲谦让是一种传统美德，人人都以谦谦君子作为自己言行的标榜。但在现代社会，人们需要推销自我以求在竞争中获得有利地位。特别是在应聘的时候怎样自夸是很重要的一种才能。自我夸耀时首先需要是有幽默感，让别人在笑声中接受你。

在商业化的社会，自夸并不可耻，而是一种宣传、广告是所有商业行为的基础。

但是如果过分或低俗地自我炫耀，就会招致别人的反感。因此自我宣传和自我夸耀首先应具有适度的幽默感，才能避免别人反感。

日本百货业界的巨人，丸牛百货公司在推出可以签帐购买任何东西的“绝色签帐卡”时有一句很幽默的话：

“除了爱人之外，什么东西都卖给你。”

要自夸就要大大地吹嘘一番。

我们以前认为：“谦虚是美德。”认为凡事谦恭不与人争。即使自己有着优越的才能，但强鹰不露爪，所以绝不轻易地展现能力。

因此，即使是那些胜利成功者们，他们也都极力强调，那只是“幸运”或“大家的帮忙”。

可是，现在是个人能力竞争的时代了。强鹰若是不张爪，可能将捕不到好猎物而终其一生。反例是那些毫无才能，因装着尖锐假爪的劣鹰，却能时时大获朵颐。

于是积极想要推销自我能力的人越来越多，可是虽然能力的高低是重要因素，但推销方法的高明与否则往往是成败的先决关键。有些人甚至就因为方法不好，虽然颇具才华，但却给人不好的印象。

因此，尽管在注意个人才能展示的时代，在向别人推销自我时，如果言辞大过于自夸，在较含蓄的社会中还是不太容易被接受的。不过，同样是一句自夸的话，若是由具有幽默感的人来说，可能就不太刺耳。

自夸的话语之所以听起来很逆耳，那些话语中经常带有自夸不实的描述，是其中一个理由。或许我们可以更肯定地说，自夸的话多少有些吹牛，不过，既然是吹牛，那种暧昧式的吹牛，可说最让人感到厌恶。

希特勒在他的著作《我的奋斗》中就说：“既然要吹牛就大吹特吹吧！”尽管希特勒的言行是颇待争议的，但光就这一句话来说，我们不得不承认，他实在是说得极其自夸，但却极有技巧和说服力。

以下几则幽默笑话，就是这种以吹牛方式来夸耀自己的佳作。

有位超级大富翁，乘坐直升机到美国佛罗里达州度假。当他的直升机降落在饭店顶楼后，有十数人的服务生就开始来为他搬运行李。可是有位服务生发现行李中竟然有滑雪板，于是就向那位富翁说：

“对不起，这里是佛罗里达呀！这里是不下雪的。”

可是富翁却很不在乎地回答：

“没关系，雪和行李一起运来。”

在目前这种竞争激烈的经济时代，许多商场上搏杀的人士在竞争中更需要具有高明的自我推销技术。而事实上，这种善于推销自我的宣传有时反而会

受到排斥，使自己的能力受到怀疑。因此，假如我们以幽默的说话术来配合自我的宣传，至少也可以保住自己多少是具有幽默感的形象。

一位外语能力很强，兼通各国语言的人，也可以很幽默地自夸说：

“我可以用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来保持沉默，可是一旦有话要说，则只说英语。”

乍听之下好像很谦逊的话，事实上却充满着自信的自我宣传。

推销员在推销商品时有效地利用幽默可以增强商品的吸引力，使推销工作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某电器行的老板在店面处，以大声吆喝的方式来招揽客人。

“喂！来来来……欢迎光临，便宜大拍卖！我们的东西便宜得连小偷也要吓一跳！”

结果有位过路的妇人好奇地问：

“怎么小偷会……？”

“是呀！昨夜我店里遭了小偷，那位小偷偷了一部电视机，可是后来看到售价牌，发现价钱实在太便宜了，感到非常失望而主动自首了。”

给自己找个梯子下台——自我辩解

在战争中“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获胜的人所持的言论即使再怎么俗劣，还是照样被奉为典范。而落败者的言辞，则不管如何都将陷入“里外皆不是”的困窘之境。因此，贤明的先人给我们一个很有智慧的建议：“败军之将，不可言勇”，即守住沉默是落败者的上策。

但在当今竞争激烈的时代，一味地认为“沉默是金”，反而将使情况越变越糟。有能力的担当者，即使失败了，反而更应该积极地挺身一辩。

一向执日本啤酒业界牛耳的麒麟牌制造商葛利玛企业，就在数年前，被朝日啤酒公司所生产的一种加重酒精浓度和辣味的新型啤酒夺走了大片市场。为此而造成葛利玛企业经营团的大恐慌，不过当时该企业的总裁本山英也发表了一句败将的妙言，他说：

“就因为我们一直坚持正统啤酒的风味，不知不觉中却因而没有赶上潮流。”

败军之将亦可有大言。由此可窥一斑吧！

英国有一位诗人说：“过是人，赦是神。”

这真是一句至理名言。对无神论的人来说，后半句或许会有听异议。但前半句人会犯过错的讲法，应该谁都不会有异议的。

如果有顽强的人硬是表白他就是从来不错。那么至少我们似乎可以说，他在讲这句话时就已经犯下一个错误了。

有人说，人生是一篇错误的记录史。

虽然人在犯错时最佳的对策是虚心地认错赔罪，可是有时也会有叫人无法立即诚实地谢罪的情况。再说，要一年到头到处向人赔罪，也未免太亏待自己。

所以在遇到情况时，懂得幽默的人，则会说一些巧妙的话语来替自己做辩解。

有辩论天才之誉的丘吉尔也曾经指出，要身为政治家，其不可或缺的条件之一，即“有预言未来的能力”和“能够说明预言为何没有实现的能力”。

一位能言善辩的人，没有高明的自我辩解能力是不行的。

事实上，古今中外的雄辩家，在自己的失败、丑态等暴露出来时，都会很巧妙地自我辩解。古希腊哲学家达列斯，有一次曾毫不在乎地说：“性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东西！”

于是有人就借此来激他说：

“既然如此，那你何不干脆把它丢弃呢？”这时达列斯就辩解说：

“可是，死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呀！”

日本文坛中有江户时代最佳的剧作家之称的假名垣鲁文，也是一位很会为自己做辩解的人。有一次，他在报纸上连载小说中，某人物的妻子本来应该是已经死去了，可是突然问却又出现。于是读者就对鲁文提出抗议。面对这种纰漏，鲁文仍然很平静地说：“像那样穷凶恶极的坏女人是随时都可能复生的，实在是不能掉以轻心呀！”

除了先圣名人会很潇洒地为自己找辩解外，在市井间流转着一些小笑话中，也有很多这种故事。

学会拒绝——说“不”的幽默术

中国人对拒绝别人，要对人说“不”似乎很不擅长。拒绝别人很容易伤害到别人的感情，以致在人际关系上搞得很糟。还会造成许多误解，甚至引发纠纷。说“不”需要胆量、勇气和决心，但是利用拒绝幽默术的技巧，许多交际难题就会迎刃而解了。例如对公司、单位发布的降级、调迁……等不利于个人的命令时，我们就坚持以“这不是真的吧……”的台词，把事情当作是别人对你恶作剧，这是个很好的应对方法。

拒绝别人经常造成许多误会与纠纷。例如，有些女性明明不喜欢来追求她的男士，但却不很明确地拒绝人家，结果搞得大家不知如何是好。还有些人因为不好意思拒绝，而糊里糊涂地当了借款的保证人，结果破财惹祸上身。

当然这种不愿意让对方受到刺激和伤害，不愿意看到对方悲哀的心情，或许可以说是东方人的善良。

因此，要保持这种善良的本性，维系人生的友情，而又要避免自己受到伤害，最重要的课题之一，即懂得如何拒绝别人，就是要求说话具有幽默感。

首先，让我们看一看欧美人以幽默来表达拒绝意思的技巧。

有位作家，拿着他的新作品去拜访丘吉尔，坚持请丘吉尔一定要阅读那作品。最后丘吉尔很严厉地拒绝说：“我只看有趣或有益的书呀！”

美国第 28 届总统威尔逊，在其尚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时，有很多该校校友要求校长让他们的孩子到该校就学。结果，威尔逊的回答是：

“所以不能让他们来就学的第一理由，正因为那些孩子是你们的孩子。”

这是兼具讽刺与拒绝的幽默。

下面来看看这则幽默。

一对中年夫妇一起去看电影。当电影中出现剧中男女接吻的镜头时。那时太太就悄悄地对先生说：

“亲爱的，你偶尔也要对我这样呀！”

那位先生也同样悄悄地回答她说：“你知道，那位男演员之所以努力这样地演出，电影公司要付给他多少的报酬吗？”

在工作当中，如果不懂得拒绝的技巧，往往会吃亏上当的，因此，我们应该特别注意下面介绍的办公室内幽默的拒绝技巧：

大个子吉姆是一位被公司冷落的老主任。有一天，某部门经理拍着他的肩膀说：

“吉姆，你看是不是要早日把你的职位让给年轻人！”

“好啊！就这么办！”

“噢！你愿意！”

“是啊！不过俗话说，‘鸟去不浊池’。所以我有一个请求，希望能让我把正在进行的工作彻底做好再走。”“哦！这是理所当然的。不过，你那个工作预计什么时候可以完成呢！”

“我想，大概还要十年吧！”

这回答乍一听，似乎是很大度的人，不计较个人利益，然后找了一个听来十分堂皇的借口“站好最后一班岗”，而部门经理不知道，这正是他回绝的理由，迂回中才表露出来。

我们都不得不叹服这位老主任的幽默才能。再介绍一则公司降调的拒绝

幽默。

主任有意将皮克调到别部门，而对他说：

“听说营业部门欠缺人手。而公司有意要调我们科里的人过去支援他们。小皮克，你觉得怎么样。”“我无所谓呀！如果主任你被调走了，我也会尽量想办法把工作做好的。”

工作中常需要你拒绝，看看下面几则幽默：某职员与无能的上司发生意见冲突，觉得多辩无益，而掉头要离去时，该上司却抓住他的手道：“喂！你给我回来！”

于是，那位职员说：

“经理，如果你想要留住我的话，就用你的嘴来说服我，请不要用手。”

为了加薪的问题，员工代表使出了眼泪战术，向老板哀求说：

“老板，请你一定要帮帮忙，现在这点薪水我实在无法和我太太继续在一起生活下去呀！”老板回答说：

“好吧！那么我会出面来说服你太太不要跟你离婚的。”

有位年轻的职员要代上司做贷款保证人。“主任，拜托您，请一定要做我的保证人。”“好啊！不过你得去找一个愿意为这件事给我做保的证人。”

不喜欢喝酒却被强邀时，有一个很好的拒绝方法。“今天晚上，去喝酒吧！”

“好啊！不过今天我心情很不好！如果酒后失态做出什么傻事，你可要负责呀！”

如此大概没有人会真的跟你去喝酒吧！

当你面对一些吝啬鬼时，常常需要讽刺他们一下。若太直露就会激怒这些人，那么我们就幽默他们一下吧。

有两位苏格兰的人约好在某地见面。结果一人先到。而后来的那一个人气喘吁吁地跑过来说：

“我没有搭上开往这里的公共汽车，所以就追在车子的后面跑来。不过，还好，我因此赚到了3便士的车钱。”

那位先生的回答说：

“那真是太浪费了。既然要这样做，不如跟在计程车后跑来，这样岂不是可以多赚12便士的钱吗？”

将吝啬人的吝啬思想符合生活逻辑的夸大，吝啬人的吝啬行为就立竿见影地呈现出来了。

别人向你借钱是很为难的事，许多讨债人的苦楚就让你在借钱时不寒而栗。回绝别人又常常会破坏双方的关系，严重时还会损伤借钱人的面子，因为有人借钱是相信你会帮助他，才鼓起勇气对你说的。幽默的回绝，这样的尴尬场面就会在友好的气氛中缓和下来。

例如，汤姆很友善地向汉斯打招呼。

“你怎么了呢？好像很没精神呀！”

“是呀？最近为了还债到处筹钱，搞得身心疲惫，晚上烦恼得睡不着觉！你能不能帮帮忙呀！”

“当然好啊！明天我就带来给你，我家有安眠特效药。”

通过回避主要问题，而是将话题引向细枝末节，这样的回绝是很高明的。

拒绝借钱人，我们得在具体环境中做到随机应变。敏捷的思维是幽默者

的素质之一。一位经常因为各种名目和红白贴而每月要支出大笔交际费的主管，看见某部属又好像要来向他要钱的样子，于是先发制人说：

“喂！要是有什么不幸的事，我绝对拒绝哦！”“不！刚好相反，事实是百分之百的喜事，下个月我要结婚啦！所以今天来是请经理喝喜酒的……”

经理回答说：

“你着，这对我明明就是不幸的事嘛！”

能言善辩也是成功之道——幽默的反驳术

在竞争的社会中、诽谤、中伤、互相攻击，是很平常的事。一个人要想成功，就必须有耐得住攻击并懂得要如何有效的反击。

纵观世界各地的风云人物，无不能言善辩，既能耐得住批评，也懂得如何反驳。不擅长反驳的人，在商场中总是无法顺利地出人头地。

但是反驳别人的批评，很容易因此加深对方的敌意，有时虽然赢得了论争，但同时也为自己树了一个一生的敌人。

不过，善用幽默的话语来做反驳的人，将不致于产生这样的结果。

日本 HHK 的会长就是一位个性强烈的人。只要他认为该说的话，不管对方是谁，他都直言不讳。当然也因此树敌不少，所以经常有许多中伤他的谣言。对于这些层出不穷的谣言，他曾辩解说：

“我清楚自己的见解并不好！可是，半数以上的人都是因为‘不要听自己说的话’而讨厌我吧！”

《反败为胜》的作者爱柯卡，在批评日本时，曾经说过这么一席话：

“如果，美国人真的都想要成为日本人放在门前清洁鞋子用的门垫，这并不是日本人的责任，而是那要成为门垫者自己不好。想要用门垫把鞋子弄干净的日本人只会认为这样很好而已。”

正是因为此言出自爱柯卡之口，所以要令人觉得这则幽默是不怀好意。

美国的下议院员史蒂芬生是一位头脑聪明但体型短小的人。有一次，某位人高马大的议员与他发生争吵，最后嘴上斗不过，却愤愤地说：

“你这矮鬼，我一口就可以把你吞下。”

“要是这样，那你肚子里的大脑一定会比你的头多。”

以其言反治其人。这是最高明的反驳术吧！通过这种方式，在降伏对方之余，也能使自己更为凸显。

英国的作家兼评论家巴拿得·琼，是一位干扁型的人物。有一次，一位体态肥胖的人，对琼讥讽说：

“看到你，只能让人联想到以前英国一定闹过饥荒。”

琼一听，很不服气地反驳道：

“看到你，一定让人联想到，原来好几次饥荒的原因是出在你的身上。”

这位胖子自以为幽默，殊不知强中更有强中手，以其不逊之言还置给他，让这人有苦难言，犹如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

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画家达芬奇，也留下一则很幽默的反论。

有一次，一位品行不正而知名的僧侣到达芬奇家做客。这位僧侣对绘画一点也不在行，但却指着达芬奇的一幅画批评说：

“画中那个人的肤色好像画得太红了点。”于是达芬奇很郑重的回答道：

“因为看到像你这样的人来访，而感到有点羞愧的样子。”

这些先人的幽默中可见他们的睿智。在现实中、我们也不妨学习一下，提高对那些冒犯自己的反驳技巧。例如，在公司中有关部门相互推委责任的情形是司空见惯的事。而且同事间经常发生舌战争吵，遇到这种情况，就可拿上述的例子来应用一番。

有一家电机制造厂开会讨论业务。

会议中各个部门互相推委业绩不振的责任。于是，制造部的经理很不客

气地说：

“即使我的部门做出再好的商品，但营业员个个都不用心推销，业绩当然好不起来。”

营业部经理马上反驳说：

“如果制造经理说的都是实话，我要告他盗用商品，因为他从来没有交给我那些好的商品。”约翰发现奖金的数额跟他的努力不成比例，于是很气愤地去找人事主任理论：

“主任，您的眼睛不会有问题吧！好像没有睁开眼睛看我工作的情形！”

于是，主任回答说：

“是啊！你说得对，我对你的过失总是闭上眼睛呀！”

能言善论虽然很好，但是反论只具有攻击性而没有幽默感，这绝对不是真正的幽默素养者的言行。懂幽默的人，有时候，还是要具备如何以幽默来化解摩擦的技术。

16世纪初美国议会中赫赫有名的毒舌家蓝道勒夫议员，有一天，与其政敌克林在一条横跨在泥泞道上的跨板上相遇。两人同时上这跨板，可是跨板宽只允许一个人单行。两人势必要有一人退下让对方先通过。可是，两人谁也不愿自己先让步。两人互相凝视了一会，最后，克林先开口道：

“我是绝对不会为恶徒让道的！”

蓝道勒夫回答说：

“我经常让道给恶徒呀！”

说着，他就走下跨板，让克林走过去。

这句话乍听起来，好像是让道的蓝道勒夫，自我卑屈地举白旗降服，可是从人的处世的胸怀来看，克林则根本比不上蓝道勒夫。这可能说就是弃卒擒帅的兵法吧！

有一则与此类似的故事。

有一美丽的贵妇人在宴会场的门口处与一位美丽的舞者相遇，舞者在擦身而过时说：

“要论美貌先看年龄吧！”贵妇人一听，气从中来说：

“可不是吗？丑猪之前有真珠呀！”

贵妇人如此反驳后就悻悻地走了过去。

以丑猪与真珠相比，说“舞者的丑猪之前有真珠的妇人”的这位妇人很幽默。不过与蓝道勒夫相比，器量可就窄小得多了。

类似这种具有攻击性的幽默反驳例子，事实上还有不少杰作。与前述的黎朋诺鲁同为知名、幽默嘲讽大师强弗尔身上就发生了许多轶事。

有一天强弗尔看见一位三流医生要去打猎，就开口对他说：

“光是病人，还不够吗？”

由此可见他的讽刺有多狠毒。

又有一次，一位友人笑他说：

“你还在打光棍呀！真是固执！”

强弗尔的反驳是：

“与其要去牵就别人的缺点，我还是比较习惯自己的缺点。”

还有一位哲学家萧宾浩亚，也是幽默反论的名人。有一次，有人批评他说：

“身为哲学家却滥用钱财。”

他回答说：

“我因为没有赚钱的才能，所以只好重视花钱的本事。”

像这样的辩论法也可以应用在办公室中。例如公司里的厕所，不仅是生理的排泄所，同时也经常是职员们精神发泄所。有一次，两位年轻的职员，在厕所中大说某上司的坏话，可是，没想到，另一面厕所的门一打开，从里面走出来的竟是那位上司。一时之间，二人愣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这时，但见这位上司，走过来拍拍他们的肩膀说：

“请放心，我刚刚用水冲过了。”

上司的幽默和大度缓和了这样一个双方都尴尬的局面。我想这两位职员的怒气会转变为对上帝的佩服与尊重。

若说上面的情况中上司是个好上司，但下面的情况中上司却没有这样的好心情：

科长对他的部属实在气极了，可是嘴上又说不过，于是抓起了桌子的烟灰缸丢了过去。那职员幸好躲过了，但却见他猛然冲到科长的身边叫声道：

“科长，现在这样大概就打得到吧！”

在生活中，经常在人前说大话、吹擂自我的人，总是令人讨厌的。事实上，谁也没有义务要默默地听他吹擂。如果在你的心中会想过一有机会就要找一句话来堵这种人的口，那么至少表示您已充分的具有幽默家的素质了。让我们给那些吹擂者的狂热大脑一盆冷水吧！

现在，先让我们瞧瞧先人们又曾经如何来幽默消遣那些喜欢在人前炫耀自我的人。

法国查路路·戴高乐将军有一次在和美国总统约翰逊会谈时，仍然以得意洋洋的语气说：

“我要拯救法国的这个使命，是上帝亲自授给我的。”约翰逊淡淡地回答说：

“这就奇怪了！我怎么不记得曾经给过你这样的使命呢？”

约翰逊和戴高乐都是极有幽默感的人。

还有一则泼人冷水的幽默故事，发生在有“铁女人”之誉的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身上。有一次，撒切尔夫人与工党领袖加纳翰同机。在伦敦的上空，撒切尔夫人从窗口丢出了一张十英磅的纸币道：

“捡到它的人一定会很幸福吧！”

没想到加纳翰却马上补充地说：

“假如是你自己投身下去，那么全国人民一定会变得幸福。”

读到这里，你是否已经掌握了揶揄别人的要领了？那就在实际生活中去做吧！

让对方与自己同调——幽默的说服术

让别人信服你，给你支持，那么你的成功之路就更平坦，成功的彼岸就更容易达到。

海部俊树在初当众议院议员时，在某祝贺会上，曾作了如下的致词。

“敝人在昭和 29 年从早稻田大学毕业，而在这第 26 次总选举中，以 29 岁之年龄当选众议员。院会分配我的办公室是众议院第 629 号室。还有，我的秘书河野先生的忌日是昭和 3 年 2 月 16 日。29 这个数字无疑是支配我个人命运的一个数字。既然如此，今后若能承蒙大家再给我 29 年的支持，敝人一定竭力努力登上首相之位，以回报大家支持之恩情。”

就在 29 年后即日本平成元年时，海部果然如其所言地成为日本首相。

这是一个很成功的使用一个数“29”来为自己宣传而得效果的事例。

虽然刚好有这么巧合的资料可利用，是可遇而不可求，但是即使不如此，只要言辞能有适度的幽默感，照样可以很容易打动别人的。

像有些大公司的新职员入公司时，公司的老板给以训示。然而深含说教意味的训示，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不易接受。不过，如果能寓训示于幽默之中，则往往令人印象深刻。例如：

继日本的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后掌管日本松下集团的盛田昭夫会长，在某年的新员工入公司典礼中，就作了如此幽默的训示：

“在我们这里，年龄序列这部电梯的电源已经切掉了，谁要想往上爬，就必须靠自己汗水和智慧。”

在人生中经常会出现需要说服别人的情况，可是却不见得每次都令人有满意的结果。因为有许多人甚至不知道要如何才能使自己的言辞极有说服力。

在商场中，说服的情景几乎无时无刻不在发生。例如，生意交涉，对部属的工作委派、激励、禁止，对上司做建议……，所以在商场中翻滚的人，其相当程度的说服力，是不可或缺的。

以下列举几例可以应用来作为说服武器的幽默供参考！

德国画家利贝尔曼，也是一位幽默风趣的名人。有一次在画女性的肖像时，女模特儿就问他：“你真的可以把我画得微妙微肖吗？”

利贝尔曼回答她说：

“我的画一定会画得比你更像你！”这句话在事后回想起来或许会认为一派胡言。可是当时听来，倒会给人不可思议的神奇感和安心感。有一位收藏了好几幅毕加索名画的贵妇人，有一次问毕加索：

“你的画我一点也看不懂呀！”

毕加索回答说：

“你懂中国话吗？”

“我不懂！”

“可是懂中国话的人至少有 10 亿人哦！”有说服力的幽默，其重点在于，能令听者在一瞬间有“原来如此”的顿悟。

有一次，记者访问一位制造肥皂而致富的人说：“请问您成功秘诀是什么？”

富人说：

“是清洁的生活！”

有一位女士为了第二天要外出旅游，怕中途晕车呕吐，所以事先就到医院去找医生商量。

“明天我要去旅行，必须坐长时间的游览车。糟糕的是我会晕车，请教医生，我事先要吃些什么东西好呢？”医生回答说：

“事先最好吃最便宜的东西。”

一位牙痛的男士到某牙医诊所请求治疗：“请医生把发痛的牙拔掉！不知治疗费要多少？”。男士听了医生所开出来的价钱后，很吃惊地说：“拔一颗牙只要几秒钟，也要收这么高的价钱吗？”医生回答他：

“如果您觉得不划算，我可以慢慢地拔久一点呀！”当我们要拜托别人或要制止别人的行为时，使用幽默的言辞也较具有说服力。

某餐厅的经理，在开店前召集所有的服务员说：“今天，请各位同仁要拿出最好的态度来对待客人。”

“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客人要来呢？”

“哦，不！是今天料理的肉，特别硬！”

公司的基层职员要去祝贺上司的新房落成，而向该上司询问如何走法。经理把走法详细地说明了以后，又补充地说：

“哦！等各位来到寒舍大门口时，请用手肘按压装在门口的门铃！”

“为什么说用手肘呢？”

“是呀！因为这时候，你们的两手不都是拿满着东西吗？”

某公司财务部门的职员盗用公款买房子，结果东窗事发，老板要解雇他。于是，这位职员就告诉他的老板说：“请不要把我解雇。因为我想要的东西已经得到了，所以，今后我应该是最值得信赖的人……。”在任何公司中，一定会有些无法达到公司要求的职员；而身边经营者或管理者自然就必须有适当的处置。而正因为这是对人的事，所以在处置的过程中，在言辞上必须要具有相当的技巧和说服力。以下列举几则解决办公室难题的实例：

有一天，经营者把一位实在不成材的职员叫来说：“我们公司决定最近要导入各项电脑设备，到时候希望可要把你的能力发挥出来。”

“是吗？你是说要我做什么事？”

“当然只有你才办得到的事呀！等电脑设备导入了以后，希望你自动辞职。”

上司把一位考绩不佳的职员叫来，告诉他要调职的事：

“下个月开始要请你到北部小区小镇的营业所上班！”

“哎！经理，你是说要把我的能力掩埋在偏僻的山中吗？”

经理回答说：

“你说掩埋能力吗？哦！你一定要向那边的人展现一下这种能力。在我们这里一直都无法欣赏到你这么神奇的能力，实在遗憾。”

某职员能言善道，可是却不做事。有一天，上司告诉他，他将要调到营业部门去：

“从下个月，你到营业部上班！”“哎！这怎么可能！要来这公司时我已经说过了，除了营业的工作外，其他任何事我都会尽心尽力去做呀！”

“是呀！我们就是看中你这么说话，所以才希望你把这种口才运用在营业的工作上。”

彼得领到公司发下来的奖金后，很不满地向上司报怨：

“和我同时期来公司的斯蒂芬拿到 400 英镑的奖金，而我却只有 300，

这不是很奇怪、不公平吗？”上司立刻回答他说：

“嗯！这的确是很奇怪，你好像要再还公 100 英镑吧！”

一位年轻的职员因被上司说了两句，就很气愤地说：

“我要辞职！”

上司在稍做劝阻后说：

“其实你辞职，公司一点也不会受到影响呀！反倒是你如果很坚定地说‘我一定要一直待下去’，我看公司的每一位干部都会张惶失措。”

在做生意的时候，怎样说服顾客是赢利的关键。幽默的话常让人慷慨地掏钱，因为顾客相信你的话。法国有这么一则小笑话。

有位为自己身后事着想的老人，来到一家殡仪社要卖棺材。店主于是很热心为他介绍各种价格不同的棺材。这位老人问店主：

“请问三千法朗和两千法朗的，有什么不同？”“是的！三千法朗的棺材，其内部有足够的空间让你的手充分地伸展。”

由此可知，不管是哪一行业，说服客人的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经营之道。

秃头与生发剂也经常被当作是小笑话的题材。以下介绍二则言辞中颇具说服力而又幽默的笑话。客人看了药店老板介绍给他的生发剂后，问道：

“这……真的有效吗？”

“是啊！这种药在我的顾客中，有人甚至连续用了 5 年啊！”

另外，还有一则笑话，药店的老板对同样的质问回答说：

“那当然啦！不过这种药在使用上稍微有点麻烦。就是必须要用棉棒擦抹。以前用手直接沾着擦的客人有很多曾来抱怨过，手上的毛该怎样除去，它们太长太多了，猴子似的。”

有时遇上凡事都质问的客人，生意很难做。在餐厅中来了一位对菜特别挑剔的客人，对每一道送上来的菜都一一加以批评。后来又突然叫来服务生质问菜的原料：

“喂！你们这道菜中的鱼排是比目鱼还是鲈鱼？”比目鱼和鲈鱼原是同一类别的鱼。只因为眼睛的位置不同而名称有异而已，看来这位客人是存心给服务生出难题。可是这位服务生却以反问来代替回答：“你凭味道就觉得出来吗？”

“我就是感觉不出来所以才问你呀！”“既然如此，那么不管是哪一种还不都是一样吗？”对于从事访问推销或业务外交的人来说，幽默而又有说服力的说话术是非常重要的。

有位汽车推销员积极地游说，可是客人却反对他说：

“即使买了车子，可是现在汽油费，停车费又是一笔大开销，还有保险费、保养费、检查费，这些费用不断地支出，这可是一大负担呀！”

推销员于是很小心地说：

“哦？不！这只是发生车祸前的一点忍耐吧！”当然，这样推销可能就激怒客人了。我们在推销中以幽默来缓和气氛，使双方在亲切融洽的氛围做成交易是最理想的。

在某房地产中介公司内，有位妇人看了业务员推荐给她的资料后，说：

“可是，这个房子离车站得走 30 分钟，太远吧！”业务员回答道：

“这位太太，你一个人当然是太远了。不过要是跟你先生两个人一起走，一个人就只用花 15 分钟就到了呀！”

以谬误的逻辑回避自己产品的缺点，让人在笑声中忽视它的存在，而寻找机会发挥产品的优点。这样推销会容易得多了。

幽默的交谈，使生活变得轻松

人人都喜欢幽默。人人都希望多一点笑声，多一份幽默，多一种情怀，而不至于为人世喧嚣所淹没，不至于气急败坏和偏执极端。

但是，在生活中，并不是每个人都活得幽默，都能够幽默。这可是悲哀的事。但是，凡事皆可也。我们难道不可以学会幽默，培养幽默么？让我们努力去做，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心灵和血液之中都流淌着一股幽默的隐身，让我们去找到它，引导它，发扬它！

我们说：从容才能幽默。

平等待人才能幽默。

超脱才能幽默。

游刃有余才能幽默。

聪明透彻才能幽默。

我们说：浮躁难以幽默。

装腔作势难以幽默。

钻牛角尖难以幽默。

捉襟见肘难以幽默。

迟钝拙笨难以幽默。

因此我们之所以希望多一点幽默，并不仅仅是为了博取“回眸一笑。”我们当然也希望一点笑容，但这点笑容是透明的，澄澈的，弃绝了任何的伪饰与矫情。

我们希望多一点笑容，因为我们更愿意少看见一点你死我活；

我们希望多一点清明的理性，因为我们愿意少看见一点斗狠使气；

我们希望多一点雍容大度，因为我们愿意少看见一点斤斤计较；

我们希望多一点趣味的轻松，因为我们愿意少看见一点亡命习气；

也多一点语言的丰富、美感，乃至至于游戏，少一点千篇一律倒胃口和干瘪无味吧，因为生活需要色彩！

我们唾弃那种自己不愿幽默或不想幽默或不能幽默因而也不许别人幽默的人，他们太可怜了。说到这，我倒想起了一段很有色彩和味道的名言：如果人群中有一个危险分子而你不知道他是谁，那么请你讲一个笑话，有正常反应即有幽默感的人大体是好人，而一脑门子官司，你愈说得可笑他愈是横眉怒对的，则多半是“克格勃。”

这是一个尖刻的嘲讽吗？不！这是一个幽默。聪明的你，难道不也想出它一默吗？

进行一次生动活泼，轻松愉快的谈话，对于我们来说，无疑是一种莫大的享受，是一次美妙的旅行。相反，参与一场枯燥无味、死气沉沉的乃至一本正经的“训话”则简直无异于牢狱般的折磨。你在生活中定有这样的亲身体验的，那么你是否想到过：我要用幽默来使生活变得美好和轻松。如果你已经想到过，那么这又何不尝试着去做呢？没有什么可怕的，也没有什么可犹豫的，如果你还是有点胆怯，那么不妨按我们的这些忠告去做，你一定能够成功的。

一、迂回

与对方交谈时，以个人或日常生活为话题，先从个人兴趣、身体状况、家庭、社会有关的趣闻谈起，以观察对方各方面的反应，并分析对方的心理状况，掌握对方的特点，然后逐步将话转入正题。

二、辅助

当对方在语言上发生困难时，可以提供适当的话语，加以辅助。切勿使谈话陷入困境，同时要注意只引话题而不掺进谈话者个人的意见，以求客观和公正。

三、择要

对于对方的散漫不经心的消极反应，要加以有效、诱导和适当的归纳，并择其要点提供给对方，使对方的话题相应集中。如果你这样做了，并且做得贴切自如，恰到好处，就能得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四、追求

当交谈涉及到问题的实质时，则要力求辞锋集中、犀利、穷追不舍，必欲擒之而后快。但要掌握问话的频率，追问到一定程度时还当注意间歇；找些轻松愉快的话题来缓和一下紧张的气氛，然后再继续追问。如果对方故意以“不知道”或“没意见”来搪塞时，可采用激将法激起对方的冲动，进而达到合作的目的。

五、反复

对谈话所涉及到的关键问题及其主要内容，必须反复询问，由此可以起到重复查证或刨根问底的作用。

六、指导

即掌握对方谈话的主要内容，不要远离话题或引导话题，以免停止不前。其方法有“开门见山”、“抛砖引玉”、“引水归渠”等，用此法必须根据实际情况予以灵活运用。

七、判断

注意在某些情况下，不要盲目追求某一问题的解决，只要求得基本情况，依次分析、判断，即可达到弄清事实真相的目的。

八、收束

在某些情况下，问题谈到一定程度时，就要收束话题加以对照来给予总结，然后巧妙地来它个“回马枪”或是“反戈一击”，如果问题尚待解决的话。

当然，任何技巧都不是格式化的，也不是可似通过机械摹仿而获得的。唯一的捷径只能是在培养你自己的幽默人格与充实自己的个人素养中达到对于幽默的了然于心与习之于口。

我并不是在说笑话——询问的幽默艺术

不论我们在任何人以怎样的方式生活，了解他人的态度和想法已成了每个人都日益感到重要的问题。人世间几乎所有的问题都被探询过。当我们启用人员或申请工作时；当我们与上级或下属谈论工作时；当我们去看病，或跟亲眷和朋友谈话时，我们都在询问或被询问着。

怎样才能更有成效地询问呢？让我们来看一些切实可行的方法：

应当认识到任何交谈绝不仅仅是信息交流，而且还有情感交流，后者尤为重要。任何谈话都无法把情感排斥在外。分析一下你与定饭的服务员之间的简单对话或者你与电话中不能相见者的对白，就可看出这里不乏情感交流。因为没有情感的交往是难是实现的。

通过幽默的方式缓和谈话两方的心理紧张感，不仅可以减少陌生感，而且更有利于情感交流。一见如故的情形就是这样的。

把你的目的讲明确。“你一开口提出问题，”一个著名的民意调查人说，“对方立刻就会想：‘为什么他想知道这些呢？’你若不把自己的目的讲明白，对方只能勉强与你相谈，要不然一得机会对方就会向你刨根问底。”

看病时，你自然地会回答大夫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是由其他人向你发问的，很可能会激起你的反感。在申请借贷时，你自然愿意回答贷款人的问题，若类似的问题由大夫提出，同样也可能会引起你的反感。职业可以使人明白你询问的目的，但也给你的询问规定了范围。

用你的感情表述来响应对方。不要试图先去归纳事实（谁对谁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也不要急于试图向人家提出特别的建议。深通业务的律师总是先聆听对方或者鼓励对方充分表达自己的感情。其间不时插入响应句：“我觉得”，“我希望”，“如果……我不在乎”。或者：“这一点十分重要，对吗？”，“竟是这样吗？”。记者们承认，当对方察觉到你交流感情的愿望，感到你是铁板一块时，他就会开口的。这样，不需要你的评判或指责，就会产生让人开口的功效。

要掌握留有余地的艺术。不要提出过多的问题。不要以出考题的方式开始谈话。如今有经验的采访者以天气、体育消息等各种闲谈话题入手来开始谈话。对于深一步的内容，他们提出的问题往往留有余地，不迫使对方对某些问题做出最后的回答。这样可以让对方采取主动态度，使谈话得以进行。

不应以任何方式暗示对方该说什么。在民意调查中最易出漏洞的就是采访人以自己的喜好和愿望去收集情况。

要注意幽默和你的用词。当你想在对方的言谈中找到你希望找到的话的时候，通常就意味着你已把自己的想法在无意中强加给别人。

在征求意见时，怎样提问本身已经成了一种艺术。专家们认为：“自作聪明或很不得体的问题只能迫使或引导对方作出不真实的回答。”因此，轻松的幽默可以为你找到捷径。

要保护对方，侦探小说和描写法庭的剧本往往先把对话当成发现对方弱点的突破口。在现实生活中，那些要打听敏感问题的人都遵循一条相反的规则：他们不是从对方的弱点突破，而是把话题引向于对方有利的方面。因为自信感可以增强询问者和被询问者之间的联系。

保护对方自尊心是取得信息的关键。一个经济学家举例说：“一个老练的失业调查人员从不会这样问：‘你现在还没有工作吧？’而是说：‘你眼

下是想找工作呢，还是想等一等再找？”

以对方的话头为起点。有些新手在谈话时，常常一下子闯入对方尚没有精神准备的领域，这是不足取的。一个焦急的患者，总想要叨叨他的病给工作和家人带来的影响，而不能首先专注、客观地讨论自己的病症。善于发现别人专注什么，并从那里开始你的话题才称得上名副其实的采访者。

了解情况，并非直问，而好像是一次有益的谈话。应当让对方从中受到鼓舞，增强自信心。因为把关心他人的这种情感表现出来，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前提。

庄重与幽默的二重奏——领导者的谈话艺术

作为一个企业的领导人员，不仅要通晓管理科学，具有驾驭企业的雄才大略，而且还要娴熟的领导艺术，兼备与职工交往的细致匠心，才能进行卓有成效的管理。领导与部下的谈话，便是领导艺术中的一门必修课。

领导与部下的谈话主要有四种功能。一、监督功能——藉以获得管理工作进展的详情，监督各部门执行领导决定。二、参与功能——借此研究执行决定过程中发生的问题，探讨和寻求解决办法，使领导由“视察”地位进入参与地位。三、指示功能——从中传递上级指示或本人决定。四、悉人功能——常接触工作人员，了解他们本身的各种心理品质，做到谙人知心，而一个人在谈话中表现的回答方式和特点，可以确定他性格的基本特征。

谈话，从本质上说既是一种信息交流，又是一种人际间的接触，因而它必然带有人所特有的情感色彩。这种情感色彩同信息内容交互作用，使谈话变得微妙而富有艺术性。

那么，一个领导人员应如何同他的部下谈话呢？

一、要善于激发部下讲话的愿望。谈话是领导和部下的双边活动，部下若无讲话的愿望，谈话不免要陷入僵局。因此，领导首先应有细腻感情，分寸感，注意说话的幽默、方式及语音、语调，旨在激发部下讲话愿望，使谈话在感情交流过程中完成信息交流的任务。

二、要善于表达对谈话的兴趣和热情。正因为谈话是双边活动，一方对另一方的讲述予以积极，适当的反馈，能使谈话者更津津乐道，从而使谈话愈加融洽、深入。因此，领导者在听取部下讲述时，应注意自己的态度，充分利用一切手段——表情、姿态、插语和感叹词等——来表达出自己对部下讲话内容的兴趣和对这次谈话的热情。在这种情况下，领导者微微的一笑，赞同的一点头，充满热情的一个“好”字，都是对部下谈话的最有力的鼓励。

三、要善于利用谈话中的停顿。部下在讲述中出现停顿，有两种情况，需分别对待。第一种停顿是故意的，它是部下为检查一下领导对他讲话的反应、印象，引起领导作出评论而做的。这时，领导有必要给予一般性的插语，以鼓励他进一步讲述。第二种停顿是思维突然中断引起的，这时，领导最好采用“反响提问法”，来接通原来的思路，其方法是用提问的形式重复部下刚才讲的话。例如，部下刚讲到：“新机器停止运行了……”，出现突然停顿，领导就应问：“那么，这意味着新的机器停止运行了！”在这种情况下，说任何其他问题都会改变说话者原来的思路。

四、善于利用一切谈话机会，谈话分正式和非正式两部分，前者在工作时间内进行，后者在业余时间进行。别放过非正式谈话的机会，哪怕是片言只语，有时也会有意外的信息。

谈话是一门艺术，寥寥几条无法穷尽其妙的，只有反复实践，细心体会，才有提高。

幽默，冲破夫妻间语言交流的误区

一对夫妇驱车外出，半道上妻子问：

“想停下来喝点什么吗？”

“不，谢谢。”丈夫道。于是他们继续驱车赶路。

结果呢？妻子——她是很想停下来喝点什么的——因为自己的愿望没有被重视而面有愠色。丈夫见妻子不高兴，还莫名其妙，觉得很扫兴。

她有话为什么不直说？

其实他没明白，妻子问他不是要他拍板决定，而是在与他商量。而妻子也没意识到，丈夫说“不”时，只是在表明他自己的意愿，并无任何强人之意。当夫妻交谈中因彼此的误解而产生抵触时，他们彼此不满，指责对方自私，不体谅人。

夫妻语言交流误区在哪里呢？

误区之一：保持地位与寻求支持。男人的世界里，谈话常常是较量——不是占上风就是要避免别人的摆布。而对于许多女人，谈话是为了寻求相互支持和相互确认。每当人们说“那有多艰难，你怎么受得了”时，妻子就把他们的话当作同情接受下来。

丈夫对此并不以为然。丈夫认为他们有他的优势：在大学供职或某部门的经理，可以共享比别人更长的周末和假期。妻子不明白丈夫为什么要说这些。丈夫觉得别人的话里含着这样的意思：你们的婚姻不是真正婚姻；我与妻子在一起，我们可没有你们那种两地生活的烦恼。在丈夫向妻子指出这点以前妻子丝毫也没意识到别人的话里可能隐含着某种“胜你一筹”的优越感。男人是把世界看作一个大舞台，他们必须在那里占据和保持一个位置；而女人的眼里，世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网，她们寻求的是理解和认同。

误区之二：女人希望彼此亲近、相互支持，她们努力维护这种亲密的关系。而男人在乎的是地位和威望，他们要求独立。这些异常常导致男女双方在同一件事上做出完全不同的反映。看一下这个例子：

乔希一位高中时的同学出差来到他居住的城市，给他打来电话，乔希高兴地邀请老同学周末到家做客。晚上回家后，乔希把这事告诉了妻子琳达。

琳达有些不快：乔希邀请客人干吗不事先同自己商量？”你为什么 not 告诉你朋友，你得先跟妻子说一声？”琳达忍不住问。

“我怎么能说我必须先得妻子的同意！”乔希愤然道。

在乔希看来，与妻子商量就意味着他没有独立行事的自由，这会让他感到自己像个孩子，是个怕老婆的人。可琳达却很乐意说：“我得先和乔希商量一下。”琳达认为，这只能表明她与乔希很亲密，这有什么不好呢？

误区之三：提出建议与渴望理解。伊芙因乳腺癌刚做了手术。一天，她对丈夫马克说她很苦恼，因为手术破坏了乳房外形。马克对她说：“你可以做一次整形手术。”

这个建议让伊芙十分不快，她说：“我很难过，你不愿看到乳房变成了这个样子，但我不想再做任何手术了！”

马克大惑不解，不知如何劝慰才好。“可我一点也没有在乎那个痕呀？”他申辩说。“那你干吗还要我做整形手术？”伊芙问。“因为是你对那个疤很苦恼。”马克回答。

男人往往把抱怨、诉苦当作挑战对象，他们关心的是找到解除困境的办

法。马克认为，当他告诉伊芙可以通过手术来消除乳房上的那个疤痕时，他是在帮助妻子解脱烦恼。但是，女人常常需要的不是具体的办法，而是感情上的理解和支持。

误区之四：务实与重情。记得有部动画片，“丈夫”在打开报纸时对妻子说：“在我读报前你有什么要说的吗？”妻子当然没什么非说不可的要紧事。不过，丈夫在家埋头看报时，妻子常常是想说点什么的。

这片子很幽默，因为人们从中看到了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的影子。当丈夫在家寡言少语时，许多妻子都会感到某种情感上的被冷落；而很多丈夫又因为妻子不明的原因情绪低落而沮丧。

丽贝卡与丈夫斯图尔特应该说是幸福的一对。即便这样，他们也有他们的烦恼。丽贝卡对我抱怨说，当她对丈夫谈论起自己的思想感情时，丈夫总是一言不发地听着；当她想听听丈夫的看法时，他就是三个字：“没什么。”

向亲人和朋友吐露自己的心声对丽贝卡和许多女人来说，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内容，因为这意味着相互的关心和参与。但对于斯图尔特和许多男人来说，谈话的目的是获得信息，感情只能深埋自己的心底。

生活中还有这样一类男人：他们在社交场合很活跃，妙语连珠，海阔天空。他们关心的与其说是谈话的内容，莫如说是谈话中的自己。在他们看来，谈话是自我表现的一种方式。这种时候，他们的妻子则可能因为高谈阔论的丈夫从来不曾如此兴致勃勃地对待她们而感到自尊心受到了伤害。

误区之五：命令与建议。黛安娜喜欢说：“我们把车停到那儿吧。”“我们午饭前打扫卫生吧。”这语气让她丈夫内森很是恼火。内森把黛安娜的“我们这样吧”“我们那样吧”当成了命令。同很多男人一样，内森讨厌受制于人，但是对黛安娜来说，她并没有指使，她只是建议。同许多女人一样，黛安娜竭力避免正面冲突，她把要求化作建议而不是命令。

可是，这种委婉的方式对于有些男人反而更糟。一旦他们意识到人是在用含蓄隐蔽的方式指使他们，他们便因此感到受人操纵而恼怒，他们宁可接受直截了当的要求。

误区之六：对抗与妥协。为了避免冲突，不少女人宁可隐瞒自己的态度，而对对方的决定不公开表示反对。但有些时候，公开自己的不同意见，即便可能由此引发争执，也不见得就比委曲求全更糟。

多拉开车上班。她的车是丈夫汉克替她作主挑选的，汉克总是选他喜爱的那种中看不中用的老式车。这些老掉牙的车脾气很坏，它们给多拉带来了无穷的麻烦，有一次甚至险些让她送了命。这次多拉决心不让汉克一人作主，他俩一同去了市场。汉克一眼就看上了一辆15年前出厂的赛车，要在从前，这车就是多拉的了。可这次多拉决定不听汉克的，车是她开，她得挑辆自己中意的。多拉自作主张买下一辆新车，这车很平常，没有汉克为她选的车那样神气，那样经历不凡，可它经久耐用，又听使唤。多拉做好一切准备，她想汉克肯定会不满意的。让她惊讶的是，汉克自始至终一句不愉快的话也没讲。

生活中的小冲突不会置人于死地，妻子们用不着一味地回避争论；而一向果敢独断的丈夫们，是否也可以稍稍减缓点自己咄咄逼人的直率和谈话方式呢？

生活拒绝平淡和刻板，生活需要幽默和欢笑。而这种幽默不仅仅在于语言的轻松谐和及其形式的滑稽可笑，它也在于我们应该拥有的一种心态，一

种情怀——以微笑善待人生，以幽默点缀生活的轻松。

幽默不仅使生活充满欢笑，而且也将使夫妻之间变得和谐。

幽默，是使人笑的，决不会让你哭；

幽默，是让世界美的，决不会污尘世于浊；

幽默，是属于你的，我的，我们大家的。

附录 演说范例精析

演讲，广义他说，一切说话都是演讲，只要他是以与人交流为前提并以之去影响他人的；狭义他说，演讲是指演讲者以口语和体语为载体向听众传播信息的活动过程。在这个意义上，演讲首先是语言的艺术，其次是表演的艺术。同时演讲又是以传播信息为目的。因而要剖析这门艺术也就不可能不关注作为信息传播者的演讲者和作为信息接受者的听众，在这二者之间用富于磁性魅力与语言搭起一座沟通的桥梁便是演讲的全部题旨之所在。

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说，演讲作为一门实用传播艺术，它是一种把道德伦理、社会政治、文学艺术熔为一炉，把美学与生活实践，哲理与语言艺术技巧融合的人际传播方式；作为一种社会现实活动，演讲是鼓动民众、驳斥敌人、传播真理、倡导文明的锐利武器，推动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作为培养人才的有效途径，演讲是开发智力、丰富知识、锻炼技能、提高素质的有益活动，在人才的成长、开发、培养过程中起重要作用；作为思想教育的良好方式，演讲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授之以知、导之以善、示之以美、明之以实、联之以身的心灵碰撞，在说服人、感染人、引导人与改变人的思想和行为方面起着积极作用。

在我们已经从理性的层面上领略了牛津学子的演讲风格及其精神内涵之后。下面我们将从古往今来留存下来的浩如烟海的优秀演讲词选取一些来作一番精要的剖析和赏鉴，以此来为演讲者提供一个感性认识的可能途径。我们将用解剖一只麻雀的方式，尽可能地作一点微观的和贴近演讲词自身艺术的赏析，希望能够在这一追寻美的畅游中使你领略到一些什么，若能如此，那么我们所作的这种微薄的努力也就算是对于我们不敢过于自信的慷慨报答了。

我们将战斗到底

丘吉尔

我们必须慎重，不要把这次援救说成是胜利。战争不是靠撤退赢得的。但是，在这次援救中却孕藏着胜利，这一点应当注意到。这个胜利是空军获得的。归来的许许多多士兵未曾见到我们空军的行动；他们看到的只是逃脱我们空军掩护性攻击的敌人轰炸机。他们低估了我们空军的成就。关于这件事我曾听到许多议论；我现在之所以要离题来谈的这件事，其理由就在这里。我一定要把这件事告诉你们。

这是英国和德国空军实力的一次重大考验。德国空军的目的是要使我们从海滩撤退成为不可能，并且要击沉所有密集在那里数以无计的船只；除此而外，你们能想象出他们还有更大的目的吗？除此而外，从整个战争的目的来说，还有什么更大的军事重要性和军事意义呢？他们曾全力以赴，但他们终于被击退了；他们在执行他们的任务中遭到了挫败，我们把陆军撤退了；他们付出的代价，四倍于他们给我们造成的损失。……已经证明，我们所有的各种类型的飞机和我们所有的飞行人员比他们现在面临的敌人优越。

当我们说在英伦上空抵御来自海外的袭击将对我们更有好处时，我应当指出，我从这些事实里找到了一个可靠的论据，我们实际可行而又万无一失的办法就是根据这个论据想出来的。我对于这些青年飞行人员表示敬意。强大的法国陆军当时在几千辆装甲车的冲击下大部分溃退了。难道不可说，文明事业本身将由数千个飞行人员的本领和忠诚来保护吗？

有人对我们说，希特勒先生有一个入侵英伦三岛的计划。过去也时常有人这么盘算过。当拿破仑带着他的平底船和他的大军在布洛涅驻扎一年以后，有人对他说：“英国那边有厉害的杂草。”自从英国远征军归来后，这种杂草当然就更多了。

我们目前在英国本土拥有的兵力比我们在这次大战中或上次大战中任何时候的兵力不知道要强大多少倍，这一事实当然对抵抗入侵的本土防御问题起着很有利的作用。但不能这样继续下去。我们不能满足于能打防御战。我们对我们的盟国负有义务。我们必须再重新组织、重新建立在英勇的总司令戈特勋爵指挥下的英国远征军。这一切都在进行中；但是在这段期间，我们必须使我们本土的防御达到一种高度的组织水平，即只需极少数的人便可有效地保障安全，同时又可发挥攻势活动最大的潜力。我们现在正在进行这方面的部署。

这次战役尽管我们失利，但我们决不投降，决不屈服，我们将战斗到底，我们将在法国战斗，我们将在海洋上战斗，我们将充满信心在空中战斗！我们将越战越强，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保卫本土，我们将在海滩上作战！在敌人登陆地点作战！在田野和街头作战！在山区作战！我们任何时候决不投降。即使我们这个岛屿或这个岛屿的大部分被敌人占领并陷于饥饿之中（我从来不相信会发生

这种情况），我们的由英国舰队武装和保护的海外帝国也将继续战斗。

这次战役我军死伤战士达 3 万人，损失火炮近千门，海峡彼岸的港口也都落入希特勒的手里，德国将向我们发动新的攻势，已成为既定的事实。法兰西和比利时境内的战争，已经成为千古憾事。法军的势力被削弱，比利时的军队被歼灭，相比较而言，我军的实力较为强大。现在已经是检验英德空军实力的时候了。引撤退回国的士兵都认为，我们的空军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但是，要知道我们已经出动了所有的飞机，用尽了所有的飞行员，以寡敌众，决非这一次！在今后的时间内，我们可能还会遭受更严重的损失，曾经让我们深信不疑的防线，大部分被突破，很多有价值的工矿都已经被敌人占领。从今以后，我们要作好充分的准备，准备承担更为严重的困难。对于防御性战争，决不能认为已经定局！我们必须重建远征军，我们必须加强国防，必须减少国内的防卫兵力，增加海外的打击力量。在这次大战中，法兰西和不列颠将联合一致，决不屈服，决不投降！

为了更为深刻、更为透彻地理解和鉴赏这篇脍炙人口的演说词，我认为有必要再一次强调发表这篇演说词时的历史背景。

由于前首相张伯伦的一贯的绥靖政策，导致希特勒变本加厉，得寸进尺。第二次世界大战初，德军占丹麦、攻挪威，大败英军，咄咄逼人。特别是德国入侵法国，宣告了张伯伦的绥靖政策的全部破产，结果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以牺牲弱国小国来换取和平的“慕尼黑阴谋”，并不能投合侵略者的胃口，几个月前还往来奔走于英德之间、为和平而作竭死努力的张伯伦的全部天真与梦想在此灰飞烟灭了。张伯伦在举国上下的一致责骂声中被迫下台。在此危急关头，1940 年 5 月 10 日英王毅然决定起用前海军大臣丘吉尔，并很快授权他组织政府。当时，丘吉尔可谓受命于危难之际。但是他快刀斩乱麻，迅速组成了战时内阁。并以其无比坚定的信心和富于热情的演说迅速稳定了全国的民心。

也是在 1940 年，英法联军抵挡不住德国军队的闪电般的袭击和摧枯拉朽式的进攻，在欧洲大陆惨败。敌人步步进逼，英法联军节节败退。最后英法联军被逼到了欧洲大陆边缘，并几乎完全处于了德军的天罗地网之中。情势危急，若不渡海撤退到英国大陆上，势必坐以待毙。在这种情势下，英法联军举行了著名的“敦刻尔克大撤退”，虽然损失惨重，但毕竟为以后战争保留了大量宝贵的精锐兵力。在这次大撤退之后，面对凶残的纳粹势力的蚕食鲸吞的可怖气势，英国人民对战争普遍充满悲观情绪。这时，丘吉尔向全英国人民发表了这篇撼人心魄鼓舞士气的著名演说，极为出色地稳定了英国乃至全世界人民的抗敌士气。

这篇演说词之所以能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除了演讲者富于磁性的语言等外在因素的作用而外，是与演说词本身的艺术性分不开的。它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让事实说话。在这篇演说中，丘吉尔没有流于一般的政治鼓动和空洞安慰（那样做是毫无力量的），而只是轻轻地但又无比坚定地指出了一些令人情服的事实来说明问题，来激发英国人民的士气和斗志。“敦刻尔克撤

退”作为一个战略来说是正确的，但这却是在一个巨大的失败背后的正确。我们不能把“援救说成是胜利”。这是人们所能看到的事实，但却还有些人们没有看到的事实，即德国空军的失败，英国空军的胜利。丘吉尔对这一胜利的分析是极为谨慎和高明的。而这一事实也正是他力图加以强调和渲染的事实。英国真的失败了吗？被打垮了吗？不，英国不但没有失败，而且决不会投降，决不会屈服。他将“重建在英勇的总司令戈特勋爵指挥下的英国远征军”！而且它已经找到了抵抗侵略的“实际可行而又万无一失的办法——在英伦上空抵制来自海外的袭击”。难道这些铁的事实还不足以让人信服，足以让人倍感鼓舞吗？实在是没有再高明的理论，再华美的文辞比它更具威力了。

二、动之以情。丘吉尔演说的一贯风格，即无比充沛的激情和极具震撼力的文辞在这篇演讲词中也有十分成功的展现。我不得不暗自称赞的是丘吉尔在这篇演说词中所表现出来的高明——他并没有过多地晓之于理，而是自始至终，以一贯之地动之以情。如果他在这里讲一大篇“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类的大道理大境界，那便只是一堆毫无生气的陈词滥调而已，相反，丘吉尔在这里表现出了他与全英国人民的高度一致——同仇敌汽的爱国之情的高度一致及誓死为国而战的大境界的高度一致，因此他不需要再作一次唤醒人民的慷慨激昂的“呐喊”。演说一开始，丘吉尔就已经自觉地站在了与人民一致的立场上——这使他很快地获得了共鸣，进入了人民的内心之中。他慎重地指出“援救不是胜利”（这是人民之所以充满悲观情绪所依赖的一块基石），但“援救中却蕴藏着胜利”（这却是为人民所忽视的另一面），他一针见血地而且是无比坚定地指出这一点，显示了他雄伟的魄力和清醒的判断力。最鲜明也最集中地体现了丘吉尔的激情与气魄的是那一段历来脍炙人口的“我们将战斗到底”的雄迈的号角似的巨响与宣言。当我们听到这一段撼人心魄的文辞时，谁不会感到一股豪迈的激情与信心呢？谁不将热血沸腾以至恨不得立即投入伟大的必胜的抗战之中呢？丘吉尔的激情激起了人们的激情的彼澜，丘吉尔的坚定的信心也因而成了人民的！

三、从结构上来看，若要作苛刻的文体主义的批评的话，那么这篇演说词并不是完美的。但正是这种不完美，却给演讲者以极大的回旋空间，可以自由地不失时机地表达自己，以情动人，从而达到演说本身的大完美。在这种结构上它采用的方法是加强主旋律，回复主旋律。而这个主旋律正是抵抗和必胜。这样的话人们从张伯他的口里是不会听到的，而只有丘吉尔才能说得出来！

总而言之，丘吉尔的这篇著名演说，语言既简炼生动又内蕴丰富，态度既持重诚恳又热烈坚定，它不仅完全征服了全英人民的心灵，也强有力地鼓舞了英国人民与德意法西斯血战到底的斗志，因而使这篇演讲词成为世界演讲词宝库中的一件珍品。

丘吉尔的演说特别是二战时期的演说遗迹闻名，他也因而被誉为近百年来世界八大最具说服力的演说家之一，并获得了195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论不合作

莫·卡·甘地

有关不合作这个问题，你们已经颇有所闻。那么，什么叫不合作，我们为什么要提出不合作？借此，我愿直抒己见。我们这个国家面临着两个问题：首先是基拉法问题，印度的穆斯林为此心如刀割。英国首相经过深思熟虑的，以英国名义许下的诺言已陷入泥淖。由于印度穆斯林的努力，并经英国政府斟酌再三后所作的许诺，现已化为乌有，伟大的伊斯兰宗教正处于危险之中。穆斯林教徒们坚持为——我敢相信他们是正确的——只要不列颠不履行诺言，他们对之不可能有真心实意和忠诚。如果让一位虔诚的穆斯林在忠诚与不列颠的关系还是忠诚于他的信仰和穆罕默德之间抉择，他会不加思索地作出抉择——他已经宣布了自己的抉择。穆斯林们直言不讳地，公开而又体面地向全世界声明，如果不列颠的部长们和不列颠民族违背诺言，不想尊重居住在印度、信奉伊斯兰教的 7000 万居民的感情，就可能失去穆斯林对他们的忠诚。然而，这对其他印度人来说也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即是否要与穆斯林同胞一起履行自己的义务。如果你们这样做，你们便抓住了向穆斯林同胞表达友好亲善和深情厚谊的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并证明你们多年来所说的话：穆斯林是印度教的兄弟。如果印度教徒认为，你们同穆斯林的兄弟般的血肉情谊胜于同英国人的关系，如果发现穆斯林的要求是公正的，是出自真挚的感情的，是伟大的宗教情感，那么我们提醒你们，只要他们的事业依然是正义的，为达到最终目标而做的一切正义的，体面的、无损于印度的，你们就要对穆斯林一帮到底，别无选择。印度的穆斯林已经接受了这些简单的条件。这是在发现，他们可以接受印度教徒提供的援助，可以永远在全世界面前证明他们的事业和他们所做的一切是正义的时候，才决定接受同伴伸出（的）援助之手的。然而，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将以联合阵线的面貌发现在欧洲所有基督教列强面前，并向后者表明，不管印度还很懦弱，但她还是有能力维护自己的自尊，并知道如何为自己的信仰和自尊而献身。

基拉法问题的核心就在于此。还有一个旁遮普问题。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没有任何问题像旁遮普问题那样令印度心碎。我并非没有考虑到 1857 年暴动。印度在暴动期间曾蒙受极大的痛苦，然而，在通过《罗拉特法案》期间和此后所遭受的凌辱，在印度史上却是空前的。因为，在同旁遮普暴力事件有关的问题上，你要求从英国那里得到公正，但你不得不寻求得到这种公正的途径和方法。无论是上议院、下议院，还是印度总督和蒙塔古先生，谁不知道印度在基拉法和旁遮普问题上的感情。但在议会两院的辩论中，蒙塔古先生和总督大人的所作所为淋漓尽致地向你证实，他们谁愿意给予属于印度并为印度所急需的公正呢？我建议，我们的领导人必须设法摆脱这一困难。除非我们使自己同印度的英国统治者平起平坐，除非我们从他们手中获得自尊，否则我们同他们之间就根本不

可能有互相联系和友好的交往。因而，我敢于提出这个绝妙的而又无可辩驳的不合作办法。

有人告诉我，不合作违反宪法。我敢否认这是违反宪法的。相反，我确信，不合作是正义的，是一条宗教原则，是每一个人的天赋权力，它完全符合宪法。一位不列颠帝国的狂热推崇者曾说过，在不列颠的宪法里，甚至连一场成功的叛乱也是全然合法的。他还列举了一些今天我无法否议的历史事件以证明自己的观点，只要叛乱就其通常的含意是指用暴力手段夺取公正，我认为无论成败都是不合法的。相反，我反复向我的同胞言明，暴力行为不管能给欧洲带来什么，绝不适合印度。

我的兄弟和朋友肖卡特·阿里相信暴力方法。如果他要行使自己的权力，抽出利剑去反击不列颠帝国，我知道他有男子汉的勇气，他能够看清应该向不列颠帝国宣战。然而，作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勇士，他认识到暴力手段不适合于印度，于是他站到我一边，接受了我的微薄援助并保证：只要与我在一起，只要相信这个道理，他就永远不会有对任何一个英国人，甚至对地球上任何人施行暴力的念头，此时此刻我要告诉你们，他言必信，行必果，始终虔，诚地信守诺言。在此我能作证，他不折不扣地执行了这个非暴力的不合作计划，同时我要求印度接受这一计划。我告诉你们，在我们这个英属印度的战士行列中，没有哪个人胜过肖卡特·阿里。当剑出鞘的一刻来临，如果确实来临的活，你们会发现他会抽出利剑，而我会隐退到印度斯坦的丛林深处。一旦印度接受利剑的信条，我将结束作为印度人的生命。因为我相信印度肩负着独特的使命，因为我相信几百年的历史教训已经告诉印度先辈们，人类的公正不是建立在暴力的基础上，真正的公正是建立在自我牺牲，道义和无私奉献的基础上。我对此忠贞不渝，我将一如既往地坚持这一信念。为此，我告诉你们，我的朋友在相信暴力的同时，也相信暴力是弱者的一种武器，而我却相信非暴力这种武器属于最强者。我相信，一个最坚强的战士才敢于手无寸铁，赤裸着胸膛面对敌人而死。这就是不合作的非暴力的关键所在。因而，我敢向睿智的同胞们说，只要坚持非暴力的不合作主义，这种不合作主义就没有什么违反宪法之处。

请问，我对不列颠政府说“我拒绝为你服务”，难道这违反宪法？难道我们受人尊敬的主席先生恭敬地辞去所有政府授予的官衔也违反宪法？难道家长从公立学校或政府资助的学校领回自己的孩子违反宪法？难道一个律师说“只要法律非但没有提高反而降低我的地位，我就不再拥护法律”违反宪法？难道一个文职人员或法官指出：“我拒绝为一个强奸民意的政府服务”也违反宪法？再请问，如果一位警察或一位士兵，当他知道自己是被征来效忠于迫害自己同胞的政府时，提出辞呈也违反宪法？如果我到克里希纳河畔对一位农民说：“假如政府不是用你的税款来提高你的地位，相反地在削弱你的地位，你交税是不明智的，”难道这也违反宪法？我确信并敢于指出，这没有违反宪法，根本没有！况且，我一生就是这样干的，并没有人提出过疑义。在盖拉，我曾在 70 万农民中

间工作过，他们停止了交税，整个印度都支持我。没有谁认为这是违反宪法的。在我提出的一整套不合作计划中，无一是违反宪法的，但是，我敢说，在这个违反宪法的政府中间，在这个已经庄严地制定了宪法的国度里确有严重的违宪行为——使印度成为一个懦弱的民族，只得在地上爬行，让印度人民忍受强加于她的侮辱才是严重的违反宪法；让 7000 万印度穆斯林屈从于对他们的宗教施行不道德的暴力才是不折不扣的违反宪法；让整个印度麻木不仁地同一个践踏旁遮普尊严的非正义政府合作才是真正的违反宪法。同胞们，只要你们还有一点尊严，只要你们承认自己是世代相传的高尚传统的后裔和维护者，你们不支持不合作立场就是违反宪法，同这样一个变得非正义的政府合作就是违反宪法。我不是一个反英主义者，不是一个反不列颠主义者，更不是一个反政府主义者。但是，我反对虚伪，反对欺骗，反对不公。这个政府坚持非正义一天，就会视我为敌一天——把我视为死敌。在阿姆利则的国会上——我对你们开诚布公——我曾跪在你们中的一些人面前，恳求你们同这个政府合作。我曾信心满怀地希望那些通常被认为是英明的不列颠部长们会安抚穆斯林的感，他们会在旁遮普暴行事件中完全主持公道。因此我当时说，让我们与他们重归于好吧，握住伸向我们的友谊之手吧，因为我认为这是通过皇家宣言给我们传递友谊。正因为如此，我当时才保证给予合作。但是今天，这种信念已烟消云散，这要归咎不列颠部长先生们的所作所为。现在我请求，不要在立法委员会内设置人为的障碍，而要采取真正的、名副其实的不合作立场，这样就会使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政府瘫痪。这就是我今天的立场。

只有当政府保护你们自尊心的时候，合作才是你们唯一的职责。同样，当政府不但不保护你，反而剥夺你的尊严时，不合作就是你的天职。这就是不合作的真谛。

莫汉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是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著名领袖，“世界现代史上最具有说服力的八大演讲家”之一。甘地将毕生的精力奉献给印度的民族事业，被印度人民尊称为“圣雄”。他不仅是出色的政治领袖，同时也是杰出的思想家；他的政治、经济、哲学和宗教思想，对整个印度半岛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甘地生前对中国人民进行民族解放事业给予了大力支持。他曾留学英国、研究法律。曾在南非进行反种族歧视的斗争，提出“非暴力抵抗”的口号。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印度倡导反对英国殖民政府的“不合作运动”，吸引了相当大一部分农民参加民族运动。甘地长期领导印度国民大会党，主张印度教徒与伊斯兰教徒团结合作，并提出改良社会及妇女和“贱民”地位平等的主张。1948 年在印度的教派纠纷中，他被印度教极右分子刺杀。

甘地的《论不合作》这篇著名演讲发表于 1920 年印度国大党会议前夕，随后印度国大党会议召开，正式通过了“非暴力不合作”方案。

甘地这篇演说为政论演讲提出了成功的范例，树立了典范。这是十分难能可贵而又殊为难得的。这篇演说不仅具有甘地演讲的一贯的鲜明特色，即刚柔相济，深沉而富有哲理，言辞流畅，具有诗一般的美感；同时它也有自

己的独到之处，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深入浅出，循循善诱。对于“论不合作”这样一人庞大的主题，如果没有深刻的思想和完美的表达能力作为基础是很难做到得心应手、游刃有余的。但甘地做到了，他不仅在这篇三千多字的演讲中对自己，整个不合作思想（包括不合作的内涵，源起和内容等）作出了逻辑清晰、论证完备的阐述，而且以他既富有激情又暗含哲理的语言征服了5万多听众的心，并最终促使国大党通过了“非暴力不合作”方案。这其中的奥妙就在于甘地并没有对他的整个主张作一种如哲学家论证命题式的严密而死板的演绎，也没有像诗人一样只以饱满的感情喷溢澎湃的诗行，相反，他很好地把这二者结合起来，掌握好了它的“度”，达到了既深入浅出、容易为人所接受而又内蕴丰富启人以思考的双重美学效果。

二、正反对比，观点鲜明，加强了说服力。正反对比法在这篇演讲词中有极为成功的运用，主要有两处，一是相信暴力与相信非暴力的对比，一是违宪与非违宪的对比。在这两个节骨眼上，甘地都旗帜鲜明地表达了他自己的观点，斩钉截铁，给人以毋庸置疑之感，甚至使人相信他的思想和观点是不可能不正确，也不可能不被接受的。

三、排比和反问的灵活运用。大量运用排比和反问，是演讲者的一大法宝，并且常常是出奇制胜的绝招。在这篇演说词中，排比句和反问句触眼皆是，特别是在论述违宪问题时，一口气用了七个反问句，洋洋洒洒，有一泻千里之势。而这一组反问本身又构成了或整齐划一或错落有致的排比，显示出极为磅礴的雄辩气势，极大地调动了听众的情绪。像这样大气磅礴的排比句式即便在精典演说词中也是并不多见的。

要为自由而战斗

卓别林

遗憾得很，我并不想当皇帝，那并不是我干的行当。我既不想统治任何人，也不想征服任何人。如果可能的话，我倒想帮助任何人，不论是犹太人还是基督徒，是黑种人还是白种人。

我们都要互相帮助。做人就是应当如此。我们要把幸福建筑在别人的幸福上，而不是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我们不要互相仇恨，互相鄙视。这个世界上有足够的地方让人生活。大地是富饶的，是可以使每一个人都丰衣足食的。生活的道路可能是自由的、美丽的，只可惜我们迷失了方向。贪婪毒化了人的灵魂，在全世界筑起仇恨的壁垒，强迫我们踏着正步走向苦难，进行屠杀。我们发展了速度，但是我们隔离了自己；机器应当是创造财富的，但它们反而给我们带来了穷困；我们有了知识，反而看破了一切；我们学得聪明乖巧了，反而变得冷酷无情了。我们头脑用得太多了，感情用的太少了。我们更需要的不是机器，而是人性；我们更需要的不是聪明乖巧，而是仁慈、温情。缺少了这些东西，人生就会变得凶暴，一切也都完了。

飞机和无线电缩短了我们之间的距离。这些东西的性质，本身就是为了发挥人类的优良品质，要求全世界的人彼此相爱，要求我们大家互相团结。现在世界上就有千百万人听到我的声音——千百万失望的男人、女人、小孩——他们都是一个制度下的受害者，这个制度使人受尽折磨，把无辜者投进监狱。我要向那些听得见我谈话的人说：“不要绝望啊！”我们现在受到苦难，这只是因为那些害怕人类进步的人在即将消逝之前发泄他们的怨毒，满足他们的贪婪。这些人的仇恨会消失的，独裁者会死亡的，他们从人民那里夺去的权力会重新回到人民手中的。只要我们不怕死，自由是永远不会消失的。

战士们，你们别去为那些野兽们卖命啊——他们鄙视你们，奴役你们、统治你们、吩咐你们应当做什么、应当想什么、应当具有什么样的感情！他们强迫你们去操练——限定你们的伙食——把你们当牲口，用你们当炮灰。你们别去受这些丧失了理性的人摆布了——他们都是一伙机器人，长的是机器人的脑袋，有的是机器人的心肝！可是你们不是机器！你们是人！你们心里有着人的爱！不要仇恨哪！只有那些得不到爱的人才仇恨别人——只有那些丧失了理性的人才仇恨别人！

战士们！不要为奴役而战斗！要为自由而战争！《路加福音》第17章里写着：神的国就在人的心里！在你们的心里！你们人民有力量——有创造机器的力量，有创造幸福的力量！你们人人有力量建立起自由美好的生活——使生活更有意义。那么，为了民主，就让我们使出力量来吧，就让我们团结在一起吧！就让我们进行战斗，建设一个新的世界——一个美好的世界。它将使每一个人都有工作的机会，它将使青年人都有光明的前途，老年人都有安定的生

活。

那些野兽也就是用这些语言窃取了权力。但是他们是说谎！他们从来不去履行他们的诺言。他们永远不会履行他们的诺言！独裁者自己享有幸福，但是他们使人民沦为奴隶。现在就让我们进行斗争，为了解放全世界，为了消除国家的弊政，为了消除贪婪、仇恨、顽固、让我们进行斗争，为了建立一个理智的世界——在那个世界上，科学与进步将使我们所有的人获得幸福。战士们，为了民主，让我们团结在一起！

哈娜，你听见我在说什么吗？不管你在那里，你抬起头来看啊！抬起头来看啊，哈娜，乌云正在消散，阳光照射进来！我们正在离开黑暗，进入光明！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世界——一个更可爱的世界。那里的人将克服他们的贪婪、他们的仇恨、他们的残忍。抬起头来看哪，哈娜，人的灵魂已长了翅膀，他们终于要振翅飞翔了。他们飞到了霓虹里——飞到了希望的光影里。抬起头来看呀，哈娜！抬起头来看呀！

卓别林是英国著名电影艺术大师。出生于伦敦平民家庭。初为哑剧演员，1918年在美国好莱坞创建卓别林电影制片厂。他所拍摄的影片多为自编自导自演。在他的多部影片中他成功地塑造了一个被损害的小人物形象，用喜剧的形式揭露和嘲讽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代表作有《城市之光》、《摩登时代》、《大独裁者》等。1952年因受麦卡锡主办迫害不得离开美国，定居瑞士。1977年圣诞节在瑞士安祥地去世。

这篇《要为自由而战斗》是他在自己编导的电影《大独裁者》中插入的长达6分钟的一段演讲，它的主题思想集中地代表了卓别林民主和进步的思想认识。

这是一篇观点鲜明，立意深刻、措辞激昂、直抒胸臆的演讲词。一开始，演讲者便表述了人类应不分宗教、不分种族互相帮助的人道主义思想，并直接点明了演讲的中心论点：“我们要把幸福建筑在别人的幸福上，而不是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并主张人类要互相帮助，而不要互相仇视和鄙视。在第三段至第七自然段，演讲者先是指出人类因贪婪而迷失方向，彼此隔离，冷酷无情，互相屠杀的可悲现实，从而自然得出人类需要进步，但不应因进步而异化，而应使人性、仁慈和温情复归的结论。接着呼唤那些受尽法西斯制度折磨的人们“不要绝望”，要树立起仇恨终将消失。独裁者终将灭亡、自由终将胜利的坚定信念，继而呼吁请因不明真相而盲目战斗的战士们不要为法西斯卖命，并满怀激情他说：“你们是人！你们心里有着人的爱！不要仇恨哪！只有那些得不到爱的人才仇恨别人——只有那些丧失了理性的人才仇恨别人！”然后指出人类是有力量的！有力量创造机器，有力量创造幸福，有力量建立自由美好的生活，也有力量战胜独裁者的贪婪、仇恨和顽固。并号召人们为了民主而团结起来进行战斗，解放全人类，建立一个美好的世界、理智的世界。

尤其应称赞的是这篇演讲词中转折句式的运用和抒发感情的，呼语的反复运用。前者如第三段从反面论证观点的精彩议论：“我们发展了速度，但是我们隔离了自己；机器应当是创造财富的，但它们反而给我们带来了穷困；我们有了知识，反而看破了一切；我们学得聪明乖巧了，反而变得冷酷无情

了”，把人类异化现象揭露淋漓尽致，发人深思，促人猛醒。后者如第八段中，演讲者反复使用“哈娜，抬起头来看哪！”这一呼语，表达了对美好世界的急切向往和迎接美好生活的坚定信心，读来使人振奋，格外动情。

悼念玛丽·居里

爱因斯坦

在像居里夫人这样一位崇高人物结束她的一生的时候，我们不要仅仅满足于回忆她的工作成果对人类已经作出的贡献。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

我幸运地同居里夫人有 20 年崇高而真挚的友谊。我对她的人格的伟大愈来愈感到钦佩。她的坚强，她的意志的纯洁，她的律己之严，她的客观，她的公正不阿的判断——所有这一切都难得地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她在任何时候都意识到自己是社会公仆，她是极端的谦虚，永远不给自满留下任何余地，由于社会的严酷和不平等，她的心情总是抑郁的。这就是使得她具有那样严肃的外貌、很容易使那些不接近她的人发生误解——这是一种无法用任何艺术气质来解脱的少见的严肃性。一旦她认识到某一条道路是正确的，她就毫不妥协地并且极端顽强地坚持下去。

她一生中最伟大的科学功绩——证明放射性元素的存在并把它们分离出来——所以能取得，不仅是靠着大胆的直觉，而且也靠着在难以想象的极端困难情况下工作的热忱和顽强，这样的困难，在实验科学的历史中是罕见的。

居里夫人的品德力量 and 热忱，哪怕只要有一小部分存在于欧洲的知识分子中间，欧洲就会面临一个比较光明的未来。

爱因斯坦不仅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为人类的科学事业作出了划时代的杰出贡献；而且他还是一位社会活动家，致力于国际和平事业，反对使用原子武器，关心人类文化和道德的发展，为此做过许多有益的工作，发表过许多精彩的演讲，《悼念玛丽·居里》一文就是这些的精彩演讲中的一朵奇葩。

当人们谈起近代科学的历史时，不能不联想到原子能时代的开创者——居里夫人。作为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她一生中所作出的贡献卓越非凡，是世界上第一个两次获得诺贝尔奖的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位女性对科学事业所作出的贡献像她一样如此杰出。然而这些仅仅只是她的一方面，而且这一方面比起她博大而崇高的精神世界来，或许正如爱因斯坦所说，还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方面。

爱因斯坦的这篇悼念文，短小精悍，感情真挚，思想深刻，具有极强的震撼力。我们首先不得不称赞作者行文的简洁，很难想象，在一篇不足 800 字的文章中，却能如此完美无缺地包蕴如此巨大，如此丰富的思想内容，并给人以的振聋发聩的强烈震撼。其次，爱因斯坦没有停留在对于居里夫人的科学业绩的一般赞颂之中，而是深刻而又敏锐地提出了一个易于为人所忽视的方面——居里夫人道德品质的崇高及其不同寻常的意义。并且深刻地指出：一个人单纯的才智成就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远超过通常人们所认为的那样。真是匪夷所思的天外巨响！在提出这一中心观点之后，爱因斯坦接着就对居里夫人的道德品质的种种方面进行了集中的概括，并加以了热情而

又冷峻的赞美。“她的坚强，她的意志的纯洁，她的律己之严，她的客观，她的公正不阿的判断——”这一切竟如此完美地集中在她一个人身上，使得他已经超出了自己而在某种程度上成了道德品质的化身，是的，很难有人当得起如此赞许和殊荣，若有，那就只是燕妮·马克思了。恩格斯在他的《在燕妮·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一文中对燕妮在道德品质方面的崇高加以了这样崇高的评价：“如果有一位女性把使别人幸福视为自己的幸福，那么这位女性就是她。”

在这篇短文的最后，爱因斯坦对居里夫人如此伟大崇高的思想品质的不同寻常的意义给予了精粹的阐释，并进一步对整个欧洲知识界指明了一条光辉之路。

读罢此文，掩卷而思，心灵的震撼是难以平静的，或许这正是它作为演说词的魅力之所在吧。

